鴉雀無聲雁有聲

劉賓雁時代

◎ 馬雲龍

當局禁止鐫刻的墓志銘——

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
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
說了他應該說的話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内容簡介

您打開的這本書是一個人的傳記，他叫劉賓雁。

2005 年 12 月 5 日，去國 18 年的老流亡者在美國新澤西的雪夜與世長辭。次日晚，著名記者盧躍剛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演講。“一位偉大的記者和作家昨天去世了，你們知道是誰嗎？”聽不到任何回應。他接著問：“你們知道劉賓雁嗎？”只有一個不確定的低音回答：知道。盧躍剛又問：“劉賓雁的代表作是什麼？”全場寂靜，驚心動魄的寂靜。

“驚心動魄的寂靜”終於被打破，有了這第一部劉賓雁傳記。

劉賓雁的一生有無人堪比的傳奇：他的“右派”頂戴，由“第一代核心”毛澤東御賜；終被革出教門，放逐海外，則蒙“第二代核心”鄧小平欽點；他流亡異國，終生不得歸，又賴“第三代”、“第四代”垂恩。劉賓雁等人的二次蒙難，成了中共有民主夢想的領袖胡耀邦被貶下台的導火索、“六四”屠城的引信之一。他的命運與時代的軌跡緊緊扭結。

劉賓雁創造性地運用“報告文學”這個介乎文學和新聞之間的體裁，早年作品《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和晚年作品《人妖之間》、《千秋功罪》、《第二種忠誠》一脈相承，尤其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一篇篇作品問世，洛陽紙貴、萬人爭讀，空前絕後！

劉賓雁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意味著重振人的尊嚴，呼喚人性回歸的時代，在中國新聞史上，意味著恢復新聞的真實性和人民性的時代。劉賓雁從“人間蒸發”中復活，再次舉起他的火炬，照耀著我們的精神原野。

Liu Binyan Shidai
by Ma Yunlong
Published in 2013 by Mirror Books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 s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978-1-940004-40-2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New Yorker Design Studio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S.A.
Phone: (516)338-6976
Web: http: //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文化情理》系列 (44)
書名: 劉賓雁時代
作者: 馬雲龍
出版人: 何頻
責任編輯: 高伐林
校對: 李湘蘭
書籍裝幀: 紐約客設計所
監印: 明鏡出版集團
出版: 明鏡出版社
網址: 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 mirrorbooks@mirrormediagroup.com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 P.O.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SA.
電話: (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 978-1-940004-40-2
定價: HK149 NT489
版次: 2013 年 11 月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複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 請寄回更換

《文化情理》系列 (44)

鴉雀無聲雁有聲

劉賓雁時代

◎ 馬雲龍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目錄

7　導讀: 愈遠愈亮的星辰（鄭義）

20　前奏曲
28　第一章　松花江上
48　第二章　精神籍貫
70　第三章　初入“毛廬”
90　第四章　前車之鑒
110　第五章　風起青萍
132　第六章　天際雷聲
154　第七章　迎風而鳴
178　第八章　在劫難逃
200　第九章　硫磺獄火
222　第十章　盤馬彎弓
244　第十一章　盛世警鐘
266　第十二章　靈魂救贖
287　第十三章　風譎雲詭

309 第十四章 挑戰教廷
332 第十五章 求仁得仁
354 第十六章 花果飄零
375 第十七章 黃鐘棄毀
400 第十八章 痛定思痛
423 第十九章 丹柯之心
445 第二十章 人字雁陣

469 附錄 劉賓雁年譜初編

487 後記

導讀：愈遠愈亮的星辰

鄭義

在我們面前打開的這本書是一個人的傳記。這個人叫劉賓雁。中年以上的國人應該記得他的，年輕一點的就很難說了。2005年12月5日，這位去國18年的老流亡者在美國東海岸的寂寂雪夜與世長辭。次日晚，大海彼岸，資深記者盧躍剛按預定日程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演講。“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我要換一個題目來講。”他對年輕的大學生們說，“一位偉大的記者和作家昨天去世了，你們知道是誰嗎？”聽不到任何回應。他接著問：“你們知道劉賓雁嗎？”全場六七十個新聞系研究生仍舊一臉茫然，只有一個不確定的低音回答：知道。盧躍剛又問：“誰知道劉賓雁的代表作是什麼？”全場死一樣的寂靜……盧躍剛後來在一篇文章裡寫道：“我可以用‘驚心動魄’來形容這種‘寂靜’。”

現在，這種“驚心動魄的寂靜”終於被馬雲龍打破。本書是劉賓雁的第一部傳記。讀完書稿，感慨良多。文字潔淨、生動、洗練、莊重，與時下中國作家種種通病不可同日而語。題目也好，“時代”成為一個積極的元素，引導我們進入傳主出生、成長、追求、受難的歷史，並在此大背景下去解讀這位悲劇英雄。這無疑是一本成功之作。馬雲龍極其敏銳地把握了劉賓雁對當代的意義，以誠實的書寫拯救著民族的集體記憶，使劉賓雁從“人間蒸發”中復活，再次舉起自己的火炬，走入人群，照耀著我們的精神原野。為本書作序，本來應該是劉公的老友，如邵燕祥這種相知甚深的前輩。但前輩們俱已耄耋暮齡，求他們細讀近30萬言的書稿已難於啟齒了。馬兄轉而命我，我既奉劉公為恩師，便不可推脫。只是不宜稱序，至多是一篇隨感式的導讀。

對劉賓雁其人一無所知的讀者朋友，我建議可先閱讀第17章“黃鐘棄毀”，從劉賓雁第二次受難及所產生的社會震動一窺這個人物的風采。當局以最高規格在全國範圍內公開懲辦、羞辱劉賓雁，以為這種屢試不爽

的統治術可再次奏效。不料“表示慰勉、聲援和抗議的來信、電報和電話便像開閘的洪流一樣洶湧而來。無數素不相識的工人、學生、知識分子、農民和軍人都爭相表達對賓雁的支持。有人猜測他將要入獄，就承諾以後每月從工資中抽出 50 元來補貼賓雁的家庭，有人提出要把賓雁一家接去供養起來，還有香港的企業家和旅居澳大利亞的華僑願意出重金資助賓雁今後的生活和寫作。還有位上夜班的工人，下班後直接上火車來到北京，到了劉賓雁家，沒進門就問賓雁的情況，知道他並沒有入獄，說了聲‘保重’扭頭便走。美國著名記者索爾茲伯里來到中國，反復要求見見劉賓雁，見面時他拉著賓雁的手說：‘我就是要看看你這個人還在不在’……”最精彩的一句話出自一位《人民日報》工人之口——就在中央電視台宣布第二次開除劉賓雁黨籍的那天晚上，兩人路遇，他走近劉賓雁，說了一句至高的頌讚：“祝賀你，他們使你成為完人。”

何謂“完人”？大約相當於《聖經》裡的“義人”，宗教裡的“聖徒”吧。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歷史上，這種人之極品皆屬鳳毛麟角。我們是血肉之軀，成聖之路何其艱難！不僅要心念純真地為真理奮鬥，而且要承擔苦難，直至呼出最後一口氣。在成聖之途上，苦難不可或缺。沒有哪一位聖徒不曾經歷苦難。所以，是“他們”使劉賓雁成為完人。那位工人深刻地理解了這個人生奧秘，沒有表達同情而惟有由衷的祝賀。

就在鄧小平決定整肅劉賓雁的前兩天，中國作家協會在首都體育館舉行了一場盛大的作品朗誦會。一批著名作家出台與讀者見面，並各自朗誦一段自己的作品。其時，“劉賓雁將被開除黨籍”的流言已在坊間風傳，節目單上的作家，有的表示要退出，“這時候怎麼能和劉賓雁綁在一起？”晚會總導演張辛欣還發現，大量座位竟然被著裝整齊的便衣軍警所佔據。主要“演員”劉賓雁來找她，說練習了幾遍，實在無法在分配給他的 13 分

鐘內完成朗誦。張辛欣無言地看著他眼睛，心裡感慨萬千："賓雁啊賓雁，過完這個夜晚，到明天早上，這個土地上就再也沒有你的聲音了，誰在乎今晚你說多久？你願意說多久就說多久吧！"

轉身走進化妝室，悲憤的張辛欣一腳把門踹上，對著一群為演出報酬而吵吵鬧鬧的演員大發雷霆："你們知道今天晚上是什麼日子？你們知道現在外面坐著什麼人？你們知道現場坐著一個師的警察嗎？觀眾席裡有大學生，演員裡有劉賓雁！"她加重語氣說："坐在觀眾席裡的一萬八千人，可能不認識你，不認識我，但是人人都知道劉賓雁！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這個秘密到明天早晨就不存在了。我要說的秘密是——劉賓雁就要被開除黨籍了，而這一點也許連他自己都還不知道呢！"說到這裡，她眼裡閃著淚光，接著說："現在，我把門打開，不想幹的，現在你就可以走出去！……剩下來的，條條是好漢，為了這唯一的夜晚，讓咱們一起努力實現它吧！不要等到明天早上你再對自己說，我真後悔當時沒盡全力！"她的發怒讓那些演員面面相覷，頓時安靜下來。

就在這種悲壯的氣氛中，賓雁在整個晚會結束前最後一個出場了。這是晚會的壓軸戲，也是許多人來這裡的目的。

此時，場上淨空，燈光熄滅，音樂停止，全場在黑暗中一片肅靜；

音響中傳出鐘錶的滴答聲，上萬的觀眾凝神屏息，傾聽著時間在一秒一秒地過去；

當這聲音也停止時，場上靜得沒有一點聲音；

——這時，聚光燈驟然亮起，集中在體育館中央的一個焦點上，劉賓雁就出現在那裡。周圍是一片空曠，只有燈光追著他的身影；

他緩緩地開始朗誦，那渾厚的男低音在體育館中迴響。人們靜靜

地聽著，不去思考台詞的內容，只是傾聽著這個男子漢的聲音，曾經響徹中國大地，卻即將在這片土地上永遠消失的聲音；

這時，有不少人眼中閃著瑩瑩淚光，還有低低的啜泣聲……

現在回想起來，人民日報社工人的那句話應該理解為祝聖的賀詞，而中國作協的這個“告別”晚會也應當理解為祝聖典禮的預演。正式的典禮在18年後，那是一個喪禮。劉賓雁辭世當日，一批與劉公共度流亡歲月的晚輩作家、友人匆忙操辦後事，做了兩件不合常例的事情：第一，我們籌組了一個由中國大陸、港台、亞洲、歐洲、美洲、澳洲各界人士參與的史所僅見的治喪委員會，人數逾千。第二，我們在數日之內連發七篇公告，向全世界即時通報劉公後事安排及詳細過程。因為我們強烈意識到這是一次國喪。在劉賓雁遺體告別儀式上，我談了這種感覺：“……雖然我們沒有儀仗隊、禮炮和宏大的宮殿，但就其在如此廣泛的人群中所激發出來如此強烈的崇高感，就其在中國精神史上的地位，這可能是一次國喪，一次世紀之喪。”從那天算起，又是八年過去，進一步加深的認知是：那不僅是一次國喪，更是一次正式的祝聖禮。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新聞史上，我們還找不到另一隻如劉賓雁那樣的大雁，能夠如此英勇如此熱情如此痛苦地在風暴中飛翔。它的每一次俯衝，每一聲號叫，每一滴淚水，每一片被折斷的羽毛，都在人民的大海上激發出雷鳴電閃和掀天的巨浪。在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時代，俄羅斯作家們有一個核心的主題：人民、人民之愛。他們的難點在於：他們熱愛人民，卻不屬於那個貧窮的、受侮辱與損害的不幸的人民，而是高貴體面卻又滿懷悲憫的老爺。劉賓雁不同，很早就被

打入底層，從一個抑制不住惻隱之心的紅色新貴淪為賤民。馬雲龍寫道：“據賓雁的忘年摯友趙越勝回憶，有一次賓雁拿給他看一份人民日報社的內參，寫的是陝西一些共黨村幹部吊打村民的調查。賓雁聲音低沉，反復說：‘吊起來打，什麼傢伙都用上，吊起來往死裡打，無緣無故就吊起來打……’說的時候，他的表情是那樣悲憤，聲音也在顫抖，似乎每一下都打在自己身上。”萬潤南也曾回憶多次去普林斯頓拜訪劉賓雁的情形：“……最後一次是先生在病中、手術後。每一次話題總離不開他念茲卻不能在茲的那片故土：吏治的腐敗、民怨的沸騰、道德的淪喪、三農的困境，那種痛心疾首、那種悲天憫人，每一次都讓人深深感動。”這種悲憫，對於我們這些曾有幸與劉賓雁在流亡歲月中相守相知的晚輩作家，更是屢見不鮮了。前後 22 年的賤民生涯，使他直接成為苦難的一部分。他一次又一次拿起筆書寫人民的苦難，一次又一次受難，成為不屈與悲憫的象徵。最後，在 18 年流亡之後，在北美的彌天大雪中，升華為不朽與光榮。

仍然不敢輕用“聖徒”或“完人”這類頂級詞匯。我只敢稱之為聖徒式的人物：畢竟，他身上有歷史上著名聖徒的影子，他的生與死都在我們心中激起某種罕見的彌久常新的聖潔感。那末，感覺可靠嗎？感謝馬雲龍的辛勤挖掘，使我們第一次讀到了《千秋功罪》背後的故事。《千秋功罪》是劉賓雁與攀枝花記者余以太合著的一篇報告文學，與名篇《人妖之間》近似，也是通過一位女性罪犯揭露社會黑暗，也是“借寫真實反黨”，並在決定整肅劉賓雁的文件中與《人妖之間》共列榜首。在採訪結束，準備返回北京之前，劉賓雁提出要見一見那位已判“死緩”的大貪汙犯青素瓊。就在那天早上，她乘人不備，用一根自製的繩子投繯自盡，救下來就被帶來見“北京記者”。談話從剛剛發生的自殺開始：奇妙的是，竟然沒有誰給犯人解釋“死緩”之刑名，致使青素瓊認為必死無疑而自行了斷。

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裡，劉賓雁坦誠溫和，既核對了事實，也給青素瓊帶來重新生活的希望。他最後的告別語是："你還是有希望的！"（暗合王爾德半句名言："每一個罪人都有未來。"）《千秋功罪》發表，在攀枝花成為一個轟動性事件。作品揭開了青素瓊案件的真相，把批判的鋒芒指向隱蔽在青素瓊背後的邪惡權勢，大得民心，亦同時引來從北京到四川、攀枝花的層層圍剿。這一切，劉賓雁早有思想準備。意外的是，他收到了一封獄中來信：青素瓊在監獄裡看到《千秋功罪》，才明白當時給她以生活勇氣的"北京記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劉賓雁。反复閱讀中，她感覺到作家對她人格的尊重。這一點，在飽受侮辱的女囚心裡激起波瀾。劉賓雁字裡行間瀰散出來的悲憫之情喚醒了她沉睡的人性。從此，囚犯與作家書信往還，竟成了好友。"青素瓊甚至把賓雁當成了自己再生靈魂的依托。她在信中向賓雁匯報了自己思想變化的歷程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決心。還告訴賓雁，她已經將在獄中的勞動所得全部捐獻給了非洲災民……過了幾年，她又報告了一個好消息：由於表現優秀，她已經獲得減刑——死緩改為徒刑 15 年了。"

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在劉賓雁遭到全國公開示眾之際。馬雲龍寫道：

正在服刑的罪犯青素瓊聽到劉賓雁被開除黨籍的消息後，突然跳出監房的鐵門，赤著腳在院中狂奔，口中不停地高喊："我抗議！我抗議對劉賓雁的迫害！他是個好人，是個真正的好人哪……"那時天正在下著大雨。

據我們所知，這是為賓雁被開除黨籍而發生的唯一一次示威遊行，參加者只有一人，地點在宜賓監獄的大院裡。結果是示威者青素瓊被

戴上了手銬，投進了獄中之獄的“嚴管牢房”。

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場面，這是多麼撕心裂肺的呼喊！

流亡異國的賓雁，你聽到這勃發的人性聲音是否會感到一絲安慰？

千方百計迫害打擊賓雁的人們，你們聽到這吶喊不感到心驚膽戰嗎？

賓雁用自己的凜然正氣、悲憫情懷、人道精神和人格力量喚醒了一個罪犯的良知，讓她的靈魂重新回到了陽光之下。她曾因迷失人性的貪婪而受到懲罰，又因人性的回歸而發出正義的吶喊，自願地陪著賓雁一起再次受到嚴懲——賓雁啊，你何以竟有如此強大的的感召力！

傳記作家繼續寫道：“雖然賓雁不是一個基督教的信徒，但源於俄羅斯文學深刻的人道主義和大悲憫情懷已使他具有救贖人類靈魂的聖徒氣象……”

馬雲龍的思想是相當深刻的，這與他個人的人生體驗密切相關。他也是一位命運坎坷、幾起幾落的大記者。當劉賓雁在普林斯頓走完自己的人生之旅時，他在中國被永遠逐出新聞界。我想，這是他可能理解劉賓雁的一個基點。如果一定要談談本書的不足之處，我以為主要是傳主的流亡生涯被一筆帶過。倘若馬雲龍到美國走一走，見見曾親炙劉公風采的各色人等，本書再版必有增色。馬雲龍極為謙遜地稱這部傳記是一個“試探版本”，是將來某一位大作家更佳版本的“墊腳石”。其實不然，能寫好劉賓雁的未必是大作家，而可能正是馬雲龍這樣深切理解他的作家。劉公晚年雖再無大陸時期的那種舉國轟動，但精神世界仍然鮮活

豐富，有一種內在的戲劇性或悲劇性。在流亡美國之初，就有十分進步的朋友打算為他開一場“討論會”。辭世之後，又有人以筆代刀，討伐他的“第二種忠誠”。關於這件事，馬雲龍有很深的思考，我還想再說幾句，權作一個呼應。

《第二種忠誠》是劉賓雁長篇報告文學代表作。寫了兩位主人公，都是在殺人如麻的時代敢於給毛澤東上“萬言書”的人物，捨身忘死的義士。一位陳世忠，指責毛大搞個人崇拜，實行殘酷打擊，告誡千萬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轍。另一位倪育賢則指斥“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並非“天災”，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禍”，並提出“包產到戶”、“開放自由貿易”等一系列挽救方略。自然，他們都未能逃脫無產階級專政的羅網，陳世忠被判處八年徒刑，倪育賢被逐出軍隊，後來因呼籲平反“四五天安門運動”被判處死刑。劉賓雁把這樣兩個人物寫在一部作品中，又命名為“第二種忠誠”，實際上是在完成他從投身革命之始便萌發的反叛：“忠於黨”和“忠於人民”、“忠於真理”到底是什麼關係？劉賓雁參加中共，自己是有責任的。（王爾德另半句名言：“每一個聖人都有過去。”）同情的理解是：那是一個共產革命在全世界如日初升的時代。不用說一位不諳世事的青年，就連眾多成熟的思想者、觀察家都被那種人間天國的壯麗朝霞所迷醉。劉賓雁加入中共外圍組織和正式入黨的年齡，分別是14歲和19歲，正處於“越是主張激烈、徹底、變革的思想，便越是富於吸引力”的年紀。他之投身中共，實際上是他人道理想的錯誤投射。對此，本書第三章“初入‘毛’廬”有深入梳理。馬雲龍寫道：“從此他的一切都不再屬於自己，而屬於那個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黨’了。這就使他陷入一個悖論，他說過：‘我參加革命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放自己，實現自我。’可是為了這個自我解放和自我實現，卻要以交出自我、消滅自我為代價。”特別

讓劉賓雁震動的是他所目睹的種種殘忍無情，不僅虐殺地主，也同樣心如鐵石地對待同志。“幾乎從我接觸中國共產黨的那一時刻開始，它對於個人、個人自由的近似殘酷的壓抑，便使我感到格格不入了。”可以說，從青年時代起，兩種“忠誠”之間攪起的旋風便在劉賓雁心靈裡呼嘯。最終，他聽從了良知的召喚，唾棄了那個罪惡集團，走向人民與真理——“第二種忠誠”。

“第二種忠誠”之所以被鋒利的批判家看中，也不是無事生非。批判家說：“劉賓雁的‘忠誠論’，不管提出第幾種，最後還是要‘忠誠’共產黨……”（曹長青：《和劉賓雁分道揚鑣》）——看來是抓住了痛腳。但詩人一平有另類理解：“劉賓雁在《尋找共產黨》一文中，用了兩個‘黨’的概念，一個是張志新尋找的‘黨’，一個是把她處死的‘黨’，顯然二者不同。這類似於路德的‘上帝’與‘教廷’。對於張志新來說，前者是她的信仰，一個絕對的精神期待——近乎‘神’的另一命名；而後者，是敗壞的權力。後者背叛了前者，因此她要批判、糾正，不惜犧牲。分清‘黨’的這兩個概念，我們才能理喻陳世忠、張志新的意　義，而這也就是《第二種忠誠》的主旨。”（一平：《苦難大地，不熄的理想——劉宾雁留予我们的精神与思考》）在這部傳記中，馬雲龍對“第二種忠誠”有細緻深刻的辨析，讀者諸君可細讀。

劉賓雁也有責任。他是否“誤用”了“忠誠”這個詞匯？卻又不盡然，我記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次論及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的演講：他談起普希金的長篇小說《上尉的女兒》，回憶起“進步人士”和“權威人士”對這部傑作的尖刻批判：普希金筆下的那位薩維里奇是大地主格里涅夫的終身家奴，當農民暴動領袖普加喬夫下令絞死沙皇軍官、他的少東家之際，薩維里奇匍匐在普加喬夫腳下，哀求道：我的親爹喲！弄死我

家老爺的孩子對你有啥好處啊？要做樣子嚇唬人，就吊死我這個老頭兒吧！——批判是很深刻的："這個形象不僅是個奴隸的形象，並且是俄國奴隸制度的讚歌！"在同一次演講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談到另一個奴隸希巴諾夫，一個並非文學虛構的歷史人物。希巴諾夫的主人庫爾柏斯基公爵是沙皇伊凡雷帝的政敵，他從國外給沙皇寫了許多近乎謾罵的書信，有一封重要的信是吩咐希巴諾夫帶回莫斯科親手遞交的。希巴諾夫在克里姆林宮廣場上攔住了剛從大教堂出來的伊凡雷帝，遞上了自己的老爺、沙皇的仇人的親筆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講道："沙皇舉起他尖利的御杖，用力刺進了希巴諾夫的腿，然後靠在御杖上讀起信來。希巴諾夫被刺破了腿，卻紋絲不動。後來沙皇在回信答覆庫爾柏斯基公爵時順便寫了這樣一句話：'你為自己的奴隸希巴諾夫羞愧吧！'這意味著，他本人也為希巴諾夫而感到羞愧。"——在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眼裡，這兩個奴隸都不是奴隸，而是有著"忠誠"這種美德、這種美好人性的真正的俄羅斯人。

——如果天才的俄羅斯文豪們都從人性角度來理解"忠誠"這一主題，如果人類確實存在超階級的普遍人性，如果健康的人性可以超越政治與功利而成為美德和理想，那麼，劉賓雁所做的，正是以偉大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讚頌的那種"忠誠"來感動我們的良知。劉賓雁所謂的"第二種忠誠"，是對高尚理想的忠誠，是無神論者的信仰。在席捲中國大地的人倫劫火中，劉賓雁試圖搶救出人性王冠上那顆最珍貴的寶石——信仰、信仰的可能和力量。痛心的是，他沒有成功而只是獲得反證：在如今這個不懂道德信仰為何物的集體墮落的時代，忠誠，任何一種忠誠，無論第二種還是第一種、第N種，都不再是我們中國人有資格談論的奢侈。但我仍然相信，當時間重新開始，這隻鳳凰將從劫火中一飛衝天，緊銜著

那顆珍貴的寶石。

老詩人邵燕祥曾經在《劉賓雁紀念文集》序言中寫道："他（劉賓雁）的人道主義思想導致的溫情傾向，他的天真輕信和善良，又使他不可能'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的一些人和事……不合常情處，也就是高於常人處"。邵老的觀察是很準確的，劉賓雁確實有些"不合常情處"。他既是極權專制不共戴天的死敵，卻又總想在那場浩劫中挽救一些什麼東西。他既對中共的殘忍本性及僵硬體制有深刻認知，又對出現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式的人物滿懷期待甚至幻望。他既毫不妥協地批判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播下的罪惡，又試圖從中剝離出一種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些"不合常情處"往往是深刻之处。劉賓雁的天真輕信和善良，其實也就是《聖經》所教誨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不是要我們去當睜眼傻子，而是強調面對凶險世事也要永葆心底的善良。劉賓雁給我們留下的珍貴遺產，既有面對黑暗的英雄氣概，更有在汙濁中对靈魂的殷切守護。的確，有嚴重人格缺陷或把鬥爭奉為偶像的人很難理解劉賓雁：一位義無反顧、畢生反抗政治黑暗的鬥士，卻又超越政治，訴諸良知。他有一種彷彿天賜的噴湧的熱情。在這種熱情的驅使下，他進入了某種純淨的類似於宗教信仰的境界。他最令人感動的，不是思想的透徹，而是思想的痛苦。他正是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所盛讚的那種"燃燒的靈魂"："這顆靈魂永遠為了人民和整個世界的苦難而憂傷，這是一種難以抑制的痛苦。"

請允許我引用自己一段舊文："劉賓雁抗拒著極權社會對人性的戕害，活出了動人的美麗。他憑直覺把握了極權主義的秘密：我們和極權主義最深刻的衝突，歸根結底，聚焦於人性。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劉賓雁以

自己光輝的富於人性的生活，成為楷模。”（《像劉賓雁那樣生活》）

劉賓雁是中國苦難大地上出現的一個奇跡。他是一個啟示，一個精神秘密，一個我們至今尚未完全理解的典範。

在獻祭式的寫作中，這個人漸漸走進自己的作品，將生命、人格與文字融為一體。這個人本身，必將持久地影響我們，比他的作品更為恆長。

他的英勇和善良，如長夜裡的雙子星，照耀著我們的人生。在這部傳記結尾處，馬雲龍說得更好：“有些明亮的星星離我們有千百萬光年的距離，當我們的肉眼接收到這些發自千百萬年前的光芒時，它們也許早已熄滅了，但是這光芒穿過時空，依然會照耀著我們。劉賓雁就是這樣一顆雖已隕落，但光芒依舊的明星，而且他離我們越遠，這光芒就越明亮。”

2013 年 9 月 17 日於美國首都華盛頓

（注：未注明出處的引文皆引自本書內文。）

前奏曲

那些輝煌一時的生祠陰宮、紀念碑、紀念堂和聖躬所踐的紀念地，以及連篇累牘、充塞耳目的頌聖文字，與賓雁墓前的這塊無字碑相比，究竟孰重孰輕，孰壽孰夭，結論已洞若觀火，無須妄測，不言自明矣

2010 年冬至日，劉賓雁安葬於北京天山陵園。

前來參加安葬儀式的人們。

人民日報社的同事和學生向劉賓雁告別。

劉賓雁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時期的學生酹酒祭老師。

公元 2010 年 12 月 22 日上午十時，北京妙峰山下，西六環高速公路軍莊鎮出口旁，天山陵園。

這天上午，天高雲淡，陽光明麗。 陵園裡正在舉行一個特殊的骨灰安葬儀式。 骨灰來自美國，屬於一個擁有合法中國國籍的政治流亡者，他叫劉賓雁。 在流亡美國的 18 年中，他不斷地提出歸國要求，但遭到從江澤民到胡錦濤為首的中國政府的一概拒絕。 這個曾在中國當代史上留下重要足跡的著名作家和記者，終於客死異國他鄉，於 2005 年 12 月 5 日逝世於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

“我的要求並不高，哪怕回去打个轉，親吻一次家鄉的土地，也就滿足了……”這是他生前未能實現的遺願。

這一天，是冬至日，即一年中北半球的中國離太陽最遠、白天最短、黑夜最長的一天，劉賓雁的遺願總算實現了——他的骨灰终於在中國大地入土。 这是北京西山一個群山環抱的小盆地，安靜，肅穆，遠離他所厭惡的市井喧囂，但登上山頂就可以看到讓他晝思夜夢的北京城。 他终於得以盡情地擁抱、親吻並永久地融入故國的大地了。

為了這次深情的擁抱和親吻，賓雁的骨灰又苦苦地等待了 5 年零 17 天。 原因很荒唐：他的骨灰能否在中國大地上安葬，賓雁生前為自己撰寫的墓誌銘“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應該說的話”能否刻在墓碑上，都被反復“研究”，最後的決定是不准刻。 於是，在天山陵園裡就出現了這樣一個與眾不同的奇特墓葬：墓碑上只有亡者生前的簽名手書“劉賓雁”三字，下署他的生卒年份“1925——2005”。 蓋在墓穴上的紫晶大理石雖然打磨得平滑如鏡，卻空空如也，不著一字。

面目神情酷似賓雁的劉公子大洪肅立墓前，用深沉但平静的語調道出了這“空無”的意義：

“這塊無字的石頭剛好丈量出這個國家與當代文明社會的距離。”

“有無”之辯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哲学命題之一。有字之碑在這塊土地上矗立如林，刻在其上的歌功頌德文字浩如烟海，但其最后的命運總難免是被風雨剝蝕，湮没無聞，或被後人推翻砸爛。而賓雁墓前的這塊無字之碑將隨著時光的流逝，越来越具有歷史價值，终將成為未來的人們認識我們這個時代的寶貴文物。它不僅印證了我們這塊土地上曾有的黑暗和暴戾，更記錄了几代人艱苦卓绝的抗争、奮鬥和無畏犧牲。

當大洪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墓地的松牆後面停着三輛無牌的黑车，還有一些來歷不明、目光冷峻的陌生人在周圍逡巡，似乎在為這句話作脚注。這些幽靈般的影子並不比參加安葬儀式的人少，已經辭世五年多的劉賓雁好像還讓他們寢食不安，心驚肉跳。

儘管官方要求控制來到墓地為賓雁送行的人數，但是趕來的人數還是超過了家屬邀請的一倍。前來送行的除了他的夫人朱洪、兒子大洪、女兒小雁及其全家外，還有賓雁一生各个時期的同事、朋友和難友的代表，如天津地下黨時期的戰友代表劉保端，《中國青年報》時期的五七難友谢昌逵，賓雁在那張報紙的事業傳人盧躍剛、賀延光，《人民日報》時期的同事張寶林、高寧、劉國勝、張平力、楊良化、五七難友盛禹九，當今新聞界的前鋒胡舒立，80 年代的報告文學合作者、《血色黃昏》作者老鬼及其妻子張麗娜，以及他的仰慕者和追隨者劉國良、朱麗、沈雲彪、張蔘、朱毅等，還有一些

在他離國後才崛起的新聞人和法律界新秀，如維權律師李和平等年輕人。 而著名的理論家、思想家辛子陵大校雖然行動自由受到限制，也在稍晚的時候突圍趕到。 在這以後的日子裡，還有更多的人一個個、一批批，接踵而來，賓雁的墓前從來也不缺少鮮花。

據說，人死後他的靈魂依然存在，他高高地漂浮在人們頭頂，注視著下面發生的一切，那麼，賓雁此時應該是在欣慰地微笑了。

一塊冰冷的石頭竟能成為賓雁火熱生命的延長，讓敬他愛他的人情有所託，也讓恨他怕他的人望而生畏，這本身就是個奇跡。儘管劉賓雁的名字在中國媒體上已經消失了 20 多年，但他在人們心中並没有被删除淨盡；冬至那天北風呼嘯著席捲大地，但是它吹不動天山陵園這塊高標獨立的紫晶大理石；賓雁所自撰的墓誌銘沒被允許刻在墓碑上，但已經深深地銘刻在人們的心中了。

劉賓雁已經寫進人民心中的史冊，他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劉賓雁時代”已是中國文學史和新聞史上一個難以迴避、無法删除的重要篇章——雖然當局正蠻橫而徒勞地這樣幹著：在 2011 年底召開的中國作家第八次代表大會期間，官方的作協網站在介紹歷屆作協主席、副主席名單時，居然把第四次作代會上民主選出、得票僅次於主席巴金的第一副主席劉賓雁的名字删掉了。 這種可笑得如同《1984》小說裡“真理部”式的歷史篡改術，哪能抹掉劉公的風采與光輝，反而更加凸顯了他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劉賓雁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重振人的尊嚴，呼喚人性回歸的時代，在中國新聞史上是恢復新聞的靈魂——真實性和人民性的時代，劉賓雁創造性地運用“報告文學”這個介乎文學和新聞之間的文學體裁和新聞樣式，直面真實的現實生活，敏銳地觀察解剖

社會矛盾，勇敢地揭露被謊言掩蓋的真相，積極干預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使他的一系列重要作品如驚雷捲過大地，取得了空前的關注度和影響力。《人妖之間》、《千秋功罪》、《第二種忠誠》等力作發表時洛陽紙貴、萬人爭讀、到處轉載、街談巷議的盛況幾乎是空前絕後的奇跡。 文學和新聞，從來沒有如此震撼地影響了社會生活，這使當今的中國作家和新聞人無法望其項背。 如今已经彻底边缘化垃圾化的中國文學和已經完全喪失了公信力的官方新聞，面對“劉賓雁時代”的輝煌只能自慚形穢，無地自容了——這種變化和落差是不能用信息時代來臨、傳播形式的多元化來辯解的，遠離了民眾生活和社會真相的謊言遭到大眾鄙棄是必然的結果。 民眾識破了騙局，唾棄了謊言，使“洗腦術”漸漸失靈，這個歷史性的進步與賓雁畢生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隨著賓雁的離去，“劉賓雁時代”似乎已經結束了。 但是，正如高爾泰先生獻於賓雁靈前的輓聯所言“莫道英雄去不還，已聞新雁起寒汀”，中國大陸上的“新雁”，特別是新一代的新聞人，已經排成可觀的人字雁陣，正在他所開創的航道上頂風冒矢，奮力飛航。 在這雁陣中，有一連串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胡舒立、李大同、盧躍剛、賀延光、江藝平、程益中、王克勤、高勤榮……和賓雁一樣，他們也都屢遭磨難，被撤職，被開除是家常便飯，有的還慘遭迫害，身陷冤獄，但是，賓雁的良知、賓雁的風骨和賓雁的啟示，依然鼓舞著他們奮鬥不息。 賓雁所開山創新的“報告文學”樣式，已經發展為“調查記者”們手中的利器，以“特別報導”、“深度新聞”的形式，成為現代中國前沿媒體的重磅裝備。 至於賓雁等先行者開啟的對共產極權制度從思想、理論到實踐的反思和批判，也已經超越

了他當年所提出的“第二種忠誠”——但這並不如某些人所說是對賓雁的簡單否定，更不是“告別劉賓雁”，而是站在他肩膀上的繼續攀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劉賓雁並沒有離開我們，“劉賓雁時代”還沒有結束，他依然活在中國大地上，而且具有長遠的生命力。

本書是劉賓雁一生的傳記，也是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記錄。書中用較大篇幅寫了劉賓雁所生活的時代背景，並且把這個時代直稱“劉賓雁時代”，這不是譫妄的僭越，而是對賓雁及其事業與思想的公允評價。誰說只有毛澤東、鄧小平們才有獨霸“時代”這個大詞的特權？就個人命運而言，賓雁的一生中有個無人堪比的傳奇：他的“右派”頂戴由“第一代核心”毛澤東御賜；他終被革出教門，放逐海外，則蒙“第二代核心”鄧小平欽點；他流亡異國，終生不得歸，又賴“第三代”、“第四代”垂恩。而賓雁與方勵之、王若望等三君子的二次蒙難，居然成了中共黨內唯一有民主夢想的領袖胡耀邦被貶下台的導火索，和“六四”屠城血案的引信，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一個人的命運和時代如此密切相關，不展開這個時代的大背景，就無法說明劉賓雁之所以成為劉賓雁的原因，也不能顯示他對這個時代的巨大影響和價值意義。

嗚呼！無拳有勇，一介書生，逢此“盛世”，屢沐“隆恩”，頻遭幾代“聖主”狼顧，遂得與廟堂之上被廢黜的“現代光緒”耀邦紫陽同沉浮，與廣場之中千萬遭通緝放逐之仁人學子共命運，賓雁何其幸也，又何其壯哉！寰宇之內，有此造化者能有幾人；青史之上，逢此際遇者能有幾例？待以時日，人們當能看到，那些輝煌一時的生祠陰宮、紀念碑、紀念堂和聖躬所踐的紀念地，以及連篇累牘、充塞耳目的頌聖文字，與賓雁墓前的這塊無字碑相比，究竟孰重孰

輕，孰壽孰夭，結論已洞若觀火，無須妄測，不言自明矣。

狂飆一曲，為“劉賓雁時代”而歌；心香一柱，為賓雁先生而燃。在先生辭世八週年祭日將臨之際，謹以此書奉先生靈前。伏維尚饗。

全書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劉賓雁：劉賓雁自傳
劉賓雁：千年泥濘（未完稿）
劉賓雁紀念文集
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
趙越勝：憶賓雁
一平：苦難大地，不熄的理想
北明：路標
郭羅基：解讀劉賓雁
王康：劉賓雁的遺產
密洛凡·吉拉斯：新階級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

第一章　松花江上

在日本和蘇俄兩大巨輪的劇烈碰撞和傾軋中，劉賓雁一家的生活像夾在當中的一個小核桃一樣被碾得粉碎。……“亡國之恨”對他來說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是一種銘骨椎心的切膚之痛。個人、家庭的命運就是這樣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這是“劉賓雁時代”的基本底色

劉賓雁的父親劉岐山，是一個山東臨沂農民的兒子。

劉賓雁的父親在俄國當過華工，在中東鐵路當過翻譯。

1941 年时十六岁的劉宾雁。

唯一的一張劉賓雁和母親申雅琴的合影，右站立者為大姐劉放。

劉賓雁 1925 年 2 月 6 日（陰曆正月十五）生於中國東北的吉林省長春市。

十九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中國東北，是一片生機勃勃但又危機四伏的土地。

這片位於長城之外的黑土地原本是中國歷史大舞台的後台，是諸多北方遊牧民族登上中原舞台前的生息地和演兵場。 那裡有奔騰的江河、廣闊的山林、肥沃的草原和豐富的物產，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王朝的發祥地和“後花園”。 與中原相比，這裡人口相對稀少，土地面積遼闊，是中華民族庫存土地中最豐饒遼闊而尚未得到充分開發的處女地。 清王朝後期，由於頻繁的戰亂、自然災害和人口劇增造成的生存危機，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原腹地的難民中最具冒險精神和開拓勇氣的精英們，紛紛離開故土，越過山海關長城，來到這片高天厚土，尋求和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形成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史詩般的民族大遷徙——“闖關東”，其場景之宏大，蔚為壯觀，与西北的“走西口”、東南的“下南洋”和抗戰時期幾千萬“下江人”循長江而上投奔大後方，均為中國近代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人口流動大潮。

而劉賓雁的祖父，就是這“闖關東”洪流中的一员。20 世紀初葉，他攜眷離開了祖居的孔孟之鄉山東，渡海北上，加入了黑土地開發者的行列，從此脫離了他們世代相承的傳統生存軌道。

開拓者們在這裡面對的不僅是大自然的蠻荒，不僅是在山林裡出沒的東北虎、黑熊和野狼，還有從北方來的被稱為“老毛子”的俄國人和從東邊越海而來的“小鬼子”日本人。 當時東北的統治者名義上是中國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實際上還有兩個對這片沃土虎視

眈眈的外敵俄國和日本。這兩個巨獸各懷鬼胎，橫眉冷對，劍拔弩張，隨時會為爭奪這片土地的控制權而大打出手。這三股力量的角逐是從十九世紀後期到 20 世紀上半葉東北舞台上的主戲。

這些外來的入侵者使中國東北地區成了世界強盜餐桌上最肥的一塊蛋糕，也成了中國最早“被開放”和“被近代化”的土地。而插在這塊蛋糕上的蠟燭是一條與劉賓雁家族命運相關的鐵路——中東鐵路。

作為一個後起的半野蠻半現代化強國，俄國向西面、南面的擴張受到英國、法國和德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的制約和封堵，在第九次克里米亞戰爭（塞瓦斯波托爾戰役）失敗後，俄國於十九世紀後期開始戰略轉向，大力往遠東方向擴張，目標是要在遠東建立通往世界海洋的不凍港，矛頭直指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為此，經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批准，由皇太子（即後來的尼古拉二世）牽頭，從被強佔的中國領土海參崴（俄國人稱為符拉迪沃斯托克）起始，於 1891 年開始修建戰略鐵路“西伯利亞大鐵路”，並於 1904 年 7 月實現幹線通車（全線完成是在 1916 年）。在這期間，沙皇俄國還制定了一个“亞洲黃俄羅斯計劃”，利用 1896 年清政府派李鴻章到莫斯科參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的機會，誘迫他簽下《中俄密約》，即《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以防止日本侵略為名，決定在中國東北境內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支線，當時命名為“東清鐵路”，後來叫“中東鐵路（中國東清鐵路的簡稱）”。1898 年，东清铁路动工，俄國人從中國東北以及河北、山東和河南等地招募了幾十萬勞工，用他們的汗水、鮮血和白骨鋪就了這條當時中國的第一條鐵路幹線（實際上，中國勞工不僅修了中東鐵路，也大批被送到俄國，用於

西伯利亞大鐵路幹線的建設）。1903 年 7 月 14 日，這條與西伯利亞大鐵路銜接的中東鐵路全線通車。這條呈丁字形的鐵路幹線，以哈爾濱為中心，西至滿洲里，东至綏芬河，南至長春、沈陽和大連，總長約 2400 公里，佔當時中國鐵路總長度的 80%以上。而在中國內地，直到 1905 年最長的鐵路是詹天佑建的京張鐵路，只有 200 公里。而 1906 年 4 月 1 日通车的京漢鐵路也只有 1200 多公里。

可笑的是，在滿清朝廷上還在激烈爭論要不要建設鐵路、鐵路會不會破壞“龍脈”和風水，而民間直到 1900 年的“義和團”運動中還在以扒鐵路、砍電杆為“愛國”行為的時候，俄國人已經在中國東北的大地上用鋼鐵鑄下了一個巨大的 T 字，被愚昧的保守派視為怪異猛獸的火車已經在上面奔騰呼嘯了。這是中國十分不情願地、被連拉帶拽地拖上了近代化和全球化進程的縮影。這條鐵路的開通，對中國東北乃至整個遠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它徹底改變了整個遠東的政經地圖和發展路徑，也使中國的經濟重心明顯向東北轉移，“北大荒”從偏遠的邊陲一躍成為中國近代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新生基地和中國經濟的龍頭。當然，這一變化的另一個效應是為東北帶來了空前的危機，所謂“樹大招風，羊肥招狼”，北極熊的強勢進入，劇烈地刺激了另外一個對中國東北沃土垂涎已久的惡狼——日本。

日本原來只是亞洲東部一個封閉落後的島國，遠離近代世界經濟、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地帶，除了在中國史書上偶爾留下的關於“倭寇”的記載之外，它們在世界舞台上幾乎籍籍無名。和中國一樣，他們的國門也是在十九世紀被西方列強的軍艦打開的。但是，

在應對西方文明的挑戰這一重大課題時，日本和中國走了兩條不同的道路。當中國還在堅持固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皇權專制體制不變，想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在技術層面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時，日本則在“脱亞入歐”的口號指引下，進行了一場由上而下、具有現代化意義的全面西化改革運動，名為“明治維新”。他們從近代化政治改革入手，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术，推動工業化浪潮；在社會文化方面，則提倡“文明開化”，大力發展現代教育，使社會生活歐洲化。這次改革使日本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躋身於世界强國之列。強大起來的日本，走上了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而擴張的矛頭首先指向了隔海相望的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1895 年，他們初試新刀，就在“甲午戰爭”中幾乎全殲了當時號稱“亞洲第一”而實際上荏弱腐敗的中國北洋海軍，逼迫滿清政府割讓了寶島台灣；並把原來依附於中國的朝鮮變成了以日本為宗主國的殖民地，列入自己的勢力範圍。1900 年，他們又參加了“八國聯軍”，把“皇軍”開進了中國領土。在中國東北的南滿地區，日軍一直沒有撤走，獨吞東北，讓日本國的重心從西太平洋的幾個島嶼轉移到亞洲大陸上來，則成了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在這裡，野心勃勃的日本太陽旗和東進南下的俄國三色旗迎頭相撞了。

就在中東鐵路通車的第二年，日俄戰爭爆發了，這是日本橫空崛起的關鍵一役。這場“熊狼大戰”沒有發生在俄國和日本的本土，卻以中國東北為主戰場，戰場的中心是天然良港旅順口。中國人在自己的家門口扮演了大戰的中立看客，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任人宰割的魚肉。一年血戰的結果是新崛起的日本戰勝了強大的沙皇

俄國，而戰敗者付出的代價主要是把旅順口交給了戰勝者，並把中東鐵路南段長春到大連部分（以後稱“南滿鐵路”）也奉送給了日本。志得意滿的日本胃口更大了。發生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十年間的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崛起的日本都是勝利者，取得了遠東和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也成了世界上一個新的戰爭策源地。這個不久前還是封閉落後的島國，就以這種咄咄逼人的姿態進入了世界歷史，即將給亞洲和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而中國東北地區則首當其衝。

1905 年日俄戰爭的失敗，是促成沙皇俄國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直接導致了 1905 年的革命，這是 1917 年俄國發生的“二月革命”和所謂的“十月革命”（現在俄羅斯官方歷史稱為“十月政變”）的先聲。政變上台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列寧雖然發布了《俄羅斯蘇维埃聯邦社会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聲明“廢除沙俄同中國政府所締結的一切秘密條约和一切特權，放棄沙俄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的權益”，這個宣言曾經讓飽受欺凌的中國人感動萬分，並滿懷希望，但是，紅色俄羅斯卻從來就沒有準備兌現這個美好的諾言。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轉眼間就食言自肥，把中東鐵路長春以北的資產所有權和管轄權作為沙皇俄國的遺產，轉到自己的名下。北滿鐵路仍然是“老毛子”的囊中物，只不過三色旗換成了綴著鐮刀鐵錘徽號的赤旗。

1924 年 5 月 31 日蘇聯政府與中國北洋政府簽訂了《中俄協定》（包括“中俄解決懸案大綱”15 條、“中东铁路暂行管理協定”11 條和“聲明書”7 項），其中規定“中東鐵路純係商業性質”，聲明：“除該路本身營業事務直轄於該路外，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

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務、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外）等，概由中國官府辦理”。 還規定：中東路設理事會，為議决機關，置理事 10 人，理事長為中方，副理事長為俄方。而實際行使管理權的局長 1 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 2 人，俄華各 1 人担任。 路局正副處長由理事會委派，如處長為華人，則副處長為蘇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級人員按中蘇兩國各半任用。 隨後，蘇俄政府又於同年 9 月与實際管轄東北的張作霖政府簽訂了《奉俄協定》，把中東路無償全部交還给中國的期限從沙俄時代規定的 80 年縮短為 60 年（至 1956 年 9 月 7 日期满）。 協定簽署後，蘇聯即派出官員，取代了沙俄時代任命的中東鐵路局長霍爾瓦特。

這些條約從字面上看似乎還算公平，但問題是苏聯實際上並不打算認真履行這些條約，而中方也沒有辦法讓這些規定兌現。 如協定規定的應歸還中方的非鐵路本身之營業，如電報、電話、礦山、圖書館、天文台、學校等，就一直未交付中方。 鐵路管理局也由苏聯单方面控制，在 2700 多名職員中，中方人員只占 400 人，且多為翻译及低级職員（劉賓雁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 路局機關行文，除了理事會公文及路局會議决議是中俄兩種文本之外，其餘均為俄文，一切財政结算也以盧布為準。 實際上，中東鐵路依然掌控在“老毛子”手中。 這為後來發生的“中東路事件”埋下了伏筆，也使得日俄對中國東北和中東鐵路的爭奪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之所以要回顧中東鐵路的歷史，是因為劉賓雁家族的命運和這條鐵路有著密切的關联。

劉賓雁是“闖關東”的第三代人。 他父親劉岐山（劉鳳鳴）自幼便在一個俄國人家中當雜役帶孩子，利用這個機會，他學會了俄

語。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作為協約國參戰了，沒有派出軍隊，以工代軍，派出了 20 萬勞工到俄國和法國前線為協約國做戰場服務。 劉鳳鳴作為勞工到了俄國，後來，他還在俄國參加了所謂的“十月革命”。1921 年，他回到中國東北。 因為有這段經歷，再加上他熟悉俄語，回國後就被中東鐵路局商務代辦所錄用為俄語翻譯。 先後在長春、沈陽和哈爾濱工作，全家也跟著他沿著鐵路線游動。

當時的中東鐵路可不僅僅是一個只管運輸的外資經濟機構，那簡直是個國中之國，實際上控制著北滿的政治、經濟命脈。 中東鐵路的重要職位都由蘇俄人擔任，他們在中國享有諸多特權，中國政府無權干預，還擁有一套完善的自我服務系統，如商業、電報電話通訊、物資供應、子弟學校、休假療養地等。 中國人如能到中東鐵路打工，就會被人艷羡。 在那裡不僅可以得到穩定的較高工資，還可以享受一些福利，如家屬有乘火車的免費票等。 這就和現在的年輕人以能在“外資企業”混事感到榮耀一樣。

劉賓雁在自傳中對這段生活有愉快的回憶。 他說，早在四岁以前，他就經常乘火車旅行，全靠父亲在铁路上工作，随着他的出差、调动和全家的迁移，以及“逃難”（注意下文），他有了很多乘火车的机会。 他記得，曾經乘过講究的二等卧車（相當於現在的“硬臥”），普通的三等車（即現在的“硬座”），也乘過裝載牲畜和貨物的所谓“瓦罐”（俄語音譯）車。“即使和四十年後的中國孩子相比，我的旅行機會也是最多的。”他說，坐在飛馳的火車上，不斷變換的車窗外景物，使他更愛幻想了，見識也比一般的中國孩子要廣得多。

賓雁是劉岐山的長子，自幼就聰明伶俐，又長得漂亮，深受父

親的寵愛，只要有機會，就把他帶在自己身邊。他在賓雁兩歲時就教他識字，還教他學俄語，輔導他讀書。他指望這個有天分的孩子將來能有更大的發展，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賓雁晚年說，他童年最美好的記憶，是在距哈爾濱約 200 公里遠的珠河县（现改称尚志县）一面坡鎮生活的那些日子。那裡是賓雁外祖父的家，也是中東鐵路局選中的夏季休养地，蘇俄職員經常到那裡度夏，賓雁的父親隨蘇俄人到那裡作過翻譯工作，全家也曾跟隨着來到外祖父家。那個小鎮掩映在綠樹叢中，建了很多俄式別墅，街道也清幽而整潔。蚂蜒河从青山下流过，河水清澈见底。賓雁和姐姐常隨舅父去河邊钓鱼，看舅父下水游泳。他们還常到野外採集草莓，给外祖父經營的菜園捉蔬菜上的蟲子，或者去果園摇動外祖父的杏樹、李樹，揀拾摇下來的果子……在風景如畫的大自然中無憂無慮地盡興玩樂，是每個孩子最開心的時刻，在當時的中國，能有機會享受如此歡樂的孩子是不多的。賓雁在他 80 歲華誕的聚會上回憶自己的一生，說：“一個 80 歲的人只有八年是自由的”，指的就是在張學良時代的這個童年。後來，劉賓雁被打成“右派”以後，也曾有些年到山西、山東和北京郊區的農村中勞動和生活過，但是，那種失去自由的“類囚犯”生活和童年的這段日子卻有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了。

但是，好夢易碎。這種在亂世中偶得的世外桃園式生活，瞬息即逝，而且在劉賓雁的一生中再也沒有重現。

先是在 1928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皇姑屯事件，被北伐軍打敗的張作霖乘坐火車專列從北京返回沈陽，在皇姑屯被事先安放的炸藥炸翻，這位東北地區和北方中國政府的統治者受了重傷，當天死

在沈陽的官邸中。過去的史書上都說是日本的關東軍策劃了這個陰謀，如今又有一個說法，是蘇聯人幹的。無論真相如何，這在當時的東北可是個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張作霖這個亂世梟雄曾當過土匪（東北人叫“鬍子”），發跡於日俄戰爭之際的亂局中，善於在“紅白兩個帝國之間”（孫中山臨終對張學良語）縱橫捭闔，對交戰的日俄雙方亦打亦拉，乘機在夾縫中壯大自己，也先後得罪了日俄雙方。其實他骨子裡是個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主政東北並控制北洋政府後，這位“張大帥（入主北洋政府後自封為大元帥）”和日俄兩國都拉開距離，保持警覺，軟硬兼施，勉力週旋，以維護中國的主權，成為“北極熊”和“東海狼”實現併吞中國東北陰謀的最大絆腳石。直到多年後，東北人還津津樂道“張大帥”，不是沒有道理的，那個廣為流傳的為日本人題字留念，下署“張作霖手黑（墨）”的故事，就活畫了他的強悍和狡黠。因此，無論皇姑屯暗殺是日俄中哪一個幹的，均有可能，都標誌著三方的平衡被打破，更大的變局就要到來，東北危矣。劉賓雁一家當時就住在離皇姑屯不遠的地方，雖然那時賓雁才三四歲，但他已經從大人們驚恐的議論中感受到不祥的氣氛，並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儘管當時他並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一直把張大帥的“專車”理解為“磚車”，直到十幾歲時才糾正過來。

緊接著，1929 年又發生了“中東路事件”。在張作霖死後，繼承人張學良降下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接受了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承認了南方民國政府在全國的領導地位，並和蔣介石結拜為兄弟，結束了南北對立的格局。這位血氣方剛但又城府欠深的“少帥”對蘇聯並未認真執行《奉俄協定》早就耿耿於懷，一朝權在手，

就著手解決中東路的問題。他先是下令強行收回中東電話權，接著又收回了中東鐵路哈爾濱氣象觀測站，5月27日，他根據蔣介石的密令，派軍警搜查了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繳獲了在領事館地下室召開的“共產國際宣傳大會”文件（這顯然是違反國際外交慣例和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在這一過程中，扣押了蘇聯在中東路沿線建立的工會組織人員、蘇聯商船局、遠東煤油局和遠東國家貿易局等機構的負責人共39人，強令中東路管理局的蘇方正副局長停職，由中方局長主管，還封閉了哈爾濱、齊齊哈爾和海拉爾等地的蘇聯領事館。這是“中東路事件”的開端。張學良按照兩國協定的條文，回收本應屬於中國主權的行動，得到了民國中央政府和蔣介石的支持。

“中東路事件”是世界一戰到二戰期間中國歷屆政府廢除或修改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的長期鬥爭中一個突出的事件。多年來，中共官修的歷史教科書中一提起民國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總冠以“賣國政府”的惡銜。其實，清王朝末期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就是在這一期間被逐漸廢除的。

例如，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德奧宣戰，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行列，北洋政府的《宣戰報告》中就宣布：“所有以前我國與德、奧兩國訂立之條約，及其它國際條款、國際協議屬中德、中奧之關係者，悉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

戰後，1921年5月20日簽訂的《中德協約》就完全廢止了德國的領事裁判權，收復了中國的關稅主權，同時還獲得了戰爭賠款八千四百萬元，連同收回德租界、停付庚子賠款等項，中國從德國共獲得2.5億元的賠償和利益，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戰勝國的

資格收到戰爭賠償。

1922 年，經美國的積極斡旋，中日兩國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日本將戰時從德國手中奪取的膠濟鐵路租借地歸還中國，並從山東撤出所有軍隊，把青島海關、膠濟鐵路及其所有財產移交中國。

1925 年 10 月 26 日，關稅特別會議在北京居仁堂開幕，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在開幕詞中宣布了中國堅持“關稅自主”的立場。11 月 19 日，美、意、荷、葡、丹、比等國一致同意中國的“關稅自主”，並決定關稅定率條例於 192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926 年北洋政府與比利時談判修改舊約，談判破裂後，北洋政府毅然宣布廢除《中比條約》，無條件收回天津的比利時租界。

1927 年，設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高舉“收回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旗幟，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並於 7 月 7 日發表《關於重訂條約宣言》，當月即與美國簽訂了《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條約承認了中國關稅的完全自主權，決定兩國間實行平等的互惠待遇。 在美國榜樣的帶動下，德、挪、比、意、丹、荷、葡、英、瑞（典）、法、西、波、希、捷等 14 國先後與中國簽約，承認中國收回關稅自主權。 關稅主權收回後，中國關稅收入大幅增加，1928 年收入只有八千兩白銀，1929 年達到 1.15 萬兩，1931 年激增到 2.46 萬兩。

二戰期間，中國國民政府一邊對日作戰，一邊繼續與盟國交涉，努力收回國家主權。1941 年，中國外長郭泰祺與美國國務卿赫爾會晤，赫爾明確表示希望中國恢復完全主權。1943 年 1 月，《中美平等新約》和《中英平等新約》相繼簽訂，美英兩國放棄外籍稅務司

制度，把稅務主權歸還了中國。 接著，另有九個西方國家也先後與中國簽訂了新約，至此，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大部分均宣告結束。

這些內容在中共的歷史教課書中隻字未提，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劉賓雁在內，多年對此一無所知，這就給人造成了一個印象，似乎所有不平等條約都是在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以後才廢除的。 這種篡改和刪除歷史以蒙蔽天下的老伎倆至今還在有效地發揮著作用。

所以，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在 1929 年支持張學良收回中東鐵路主權就毫不奇怪而順理成章了，那是中國人“收回國權”鬥爭的一部分。 帝俄政權覆滅之後，中國北洋政府曾經一度派兵收回過中東鐵路，並單方面廢止了《中俄蒙協定》，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還於 1918 年至 1919 年出兵外蒙，撤銷外蒙自治，並收復了位於外蒙以北的中國領土唐奴烏梁海（這塊土地北依薩彥嶺，南抵唐努山，有七萬平方公里，唐代已經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歸安北都護府管轄。元代屬岭北行省，稱益蘭州。 清代稱為唐奴烏梁海，在此設置了五旗 46 佐領，歸烏里雅蘇台將軍管轄。 按理說，即使外蒙古“獨立”後，這片土地也還應該是中國的飛地，現在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屬於俄羅斯聯邦的圖瓦共和國），但由於蘇聯出兵外蒙，這次回收行動失敗。 但是，俄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和俄國在中國的租界在 1920 年就已經被北洋政府廢除了。 張學良收回中東鐵路是這場鬥爭的延續。

7 月 13 日，蘇聯政府就“中東路事件”向南京政府發出了限期三日的“最後通牒”，宣布斷絕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封閉了中蘇邊

界，停止了蘇中之間的交通和郵政，停運了中東鐵路貨車，同時通過共產國際，命令下屬的中國共產黨在全國掀起“武裝保衛蘇聯”的暴動。 而中共中央就奉命於 1929 年 7 月 12 日緊急發布了《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7 月 24 日又發布了《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的 42 号通告，宣布擁護和保衛蘇聯是“全黨的中心任務”，部署在全國運用飛行集會、示威、罷工和遊行等形式，來宣傳發動群眾，還指令當時已有的蘇區紅軍改變遊擊方式，進軍大城市（如長沙、武漢等），奪取一些重要城市，在那裡建立起蘇維埃政權。

“中東路事件”最後導致了一場規模不小的邊界戰爭。 蘇軍調集了用飛機、坦克、重炮和內河艦隊武裝起來的數萬軍隊，以特別遠東軍司令員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维奇·布柳赫尔元帅（此人是蘇聯最早任命的五位元帥之一，曾任中國北伐軍的軍事總顧問，當時在華用的名字是加倫將軍。1938 年 11 月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處決，罪名是“日本間諜”）為總指揮，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沿線分東西兩路入侵中國，對中國守軍開戰。 結果可想而知：由於雙方力量對比懸殊，加之國民政府忙於應付共產黨發動的全國暴亂，無力支援遠在東北邊界苦戰的東北守軍，致使東北軍損兵折將，遭到慘敗。 中方戰死和被俘人員達九千餘人，滿洲里、海拉爾和富錦等邊境城鎮一度被蘇軍佔領。1929 年 11 月 6 日，張學良被迫在屈辱的《中蘇伯力草約》上簽字，把剛剛收歸中方所有的中東鐵路管轄權又交還了蘇方，這次收回主權的鬥爭以失敗告終。

中共建政後，在天安門前豎立了一通“人民英雄紀念碑”，毛澤東親撰的碑文中有一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

為了反對內外敵人，争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不知其中是否包括在中東路事件中流血犧牲的東北軍將士們？如果當時對蘇作戰而犧牲的東北軍將士算是烈士，那麼在全國掀起暴動來“武裝保衛蘇聯”的中共又該是什麼角色呢？

順便說一下：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交匯處的黑瞎子島（面積約327平方公里，相當於香港的四分之一）就是在“中東路事件”中被蘇聯強行佔領的。1929年夏天邊界戰爭開始後，蘇軍就渡江登上以前並無爭議的中國領土黑瞎子島，從此就沒有撤離。直到將近80年以後的2008年10月14日，根據江澤民與葉利欽1999年底簽訂的《中俄邊界議定書》和江澤民與普京2001年7月簽訂的《中俄友好條約》，在黑瞎子島上舉行了“中俄界碑揭牌儀式”，黑瞎子島的一半領土才歸還了中國，而另外一半則永遠歸俄羅斯了——東半個黑瞎子島地勢較高，有居民區、東正教教堂、農場和軍港，經濟價值和軍事價值高，歸俄罗斯所有；而歸還中國的西半個島則是地勢低洼的沼澤地帶，不宜居住和開發，如今只是個供一日遊的“濕地公園”。此外，還有個苛刻的附加條件：中國在島上不得大量駐軍。至於1900年在黑龍江上游黑河對岸被俄國搶佔的“江東六十四屯”，以及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喪失的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以外，以及新疆塔城以外的總共144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相當於40個台灣，海參崴和庫頁島、千島群島均在其中。詳見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則寸土未歸。可悲的是，中國的宣傳機器還為這個打了五折的黑瞎子島“回歸”敲鑼打鼓地歡慶一番，其目的是想讓中國人民漠視這樣一個嚴酷的事實：隨著這次簽約劃押，中國將永

遠失去向俄羅斯討還被佔領土的法律依據了——詭異的是，這些新的領土條約簽訂後至今還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正式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而且對全國人民保密。

史載，在“中東路事件”發生的過程中，鐵路管理局受到了劇烈的衝擊，曾發生過蘇籍員工罷工、鐵路停運、蘇聯在局內的職工會、共青團、俱樂部等組織被取締封閉，和多達 200 餘人被關押等事件，劉鳳鳴作為中東鐵路的職工，工作和生活肯定受到極大影響。但是劉賓雁當時才四歲，對這個直接影響他們家生活的大事件幾乎沒有任何記憶。 他的自傳中只隱隱約約寫著，記得小時曾經有跟著父親“逃難”的經歷，但逃什麼難，為何逃難，他一概無所知。 這應該就是中東路事件在他記憶中留下的影子了。 這也難怪，他當時太小了，無法理解和記憶那些他根本不懂的事情。

可是，後來他長大了並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以後，對這個他幼年肯定曾經親歷的大事件，他也所知甚少，未見提及，這就另有原因了。 因為對中共來說，當年在國家領土和主權受到外來的軍事侵略時，卻遵奉共產國際的大鬍子們之命，上演了“武裝保衛蘇聯”的鬧劇，這實在不是什麼光彩事。 所以官方的黨史和公開的歷史書上很少提及，即使提到了，也只是承認當時的中共中央犯了“左傾”錯誤，把責任推到當時的領導者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和周恩來等人身上，而迴避了問題的要害：這是地地道道的受“國外反華勢力”的操縱，對民族和國家的叛賣行為。 因此，在劉賓雁的同代人以及後代的大陸人的記憶和話語中，這一頁成了被刪除的空白，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 儘管劉賓雁在同代人中是個喜歡學習、讀書很多的人，但是在他的知識構成中還是有若干盲點，其中包括對中國近

現代史中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的空白，這主要是由於“黨文化”的禁錮和黨所精心構製的謊言所造成的，而要穿越這堵無形的“精神柏林牆”，賓雁和他的同代人不得不付出終身的努力。

在劉賓雁的自傳中，他說，他童年跟著父親在中東鐵路的那些時光，“是張學良元帥開明統治的最後日子。一切都是寧靜而秩序井然的。”這應該是他真實的感受。人的記憶，特別是幼年的記憶，總是籠罩在玫瑰色中，誰也無法要求一個三四歲的孩子能理解和記住他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一切啊。

徹底擊碎他童年美夢的，是 1931 年的“九一八”。沈陽北大營的隆隆槍炮聲，和接著發生的日本侵略軍佔領整個東北時，他已經六七歲了，在沈陽上了小學。對此，他有終生難忘的記憶。

賓雁記得一個生動的細節：事變發生後，東北軍奉張學良之命放棄抵抗，倉皇逃散（張學良 1991 年 5 月在紐約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沒有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所謂蔣介石的“不抵抗令”純屬子虛烏有），遍地都扔著被丟棄的帶有青天白日徽號的軍帽。他還記得，剛懂事的他還和同學們一起，把家中所有的日貨——如三角尺、膠鞋等，拿到校園，扔到火堆中焚燒，以示對日軍侵略的抗議。這是他最早參加的政治活動，此後，還到街頭奔走呼號為內地水災災民募捐。這都預示了他在今後日本佔領的 14 年中的基本立場和態度。

日軍全部佔領包括南滿和北滿在內的東北全境以後不久，就於 1935 年對老對手蘇俄的勢力範圍下手了。他們以極低的價格，強行“收購”了中東鐵路。那些蘇俄人被掃地出門，限期離境回國。

東北的老人們都記得，當時，大街上到處是蘇俄人擺的地攤，他們在最後的時間裡匆忙拍賣自己無法帶走的家具和物品，然後溜之大吉了——而十年之後的 1945 年“老毛子”在出兵對日作戰後，又用大肆洗劫東北的方式百倍地報復了當年的“一箭之仇”。

劉賓雁的父親就在這時被趕出了中東鐵路，失業了。在日本和蘇俄兩大巨輪的劇烈碰撞和傾軋中，劉賓雁一家的生活像夾在當中的一個小核桃一樣被碾得粉碎。他們家的災變是中華民族命運的一個小小縮影。

這對他們一家是個災難性的變化。原來相對富足和穩定的生活結束了，貧困的陰影籠罩了全家，這不僅粉碎了賓雁的童年美夢，還給他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有一次，學校規定參加活動必須穿黑色皮鞋，劉賓雁只好穿上母親的女鞋去上學，受到同學們的奚落。他最難以忍受的是，他最愛最敬的姐姐，不得不在 16 歲時到酒店去當女侍，這使他感到十分難過和屈辱。同樣的命運很快也落到他自己身上，家境淪落到無法為他交學費的地步，他不得不輟學到街頭去賣瓜果了……坐在街頭的瓜果攤前，賓雁的眼中第一次冒出了仇恨的怒火：童年的幻想、長大要幹一番大事業的理想，似乎在一夜之間化成了泡影。“亡國之恨”對他來說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是一種銘骨椎心的切膚之痛。個人、家庭的命運就是這樣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這是“劉賓雁時代”的基本底色。

造成這一切災難的罪魁是誰？是日本人！家境的淪落，個人命運的巨變，以及耳聞目睹的殘酷現實，使幼年的劉賓雁很自然地就成了一個小小的反日分子，這是他後來走上“革命”之路的前因和基礎。

從這時起，直到賓雁 80 歲的晚年，那首悲愴的抗戰歌曲《松花江上》總能讓他熱淚橫流。 當然，在他晚年流亡美國的 18 年中，他聽這首歌時的感受已經有了新的含義和詮釋，造成他終生流亡的罪魁已經不僅僅是日本侵略者了。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網上史料：918 前的東北
何新：918 事变前东北的工业革命
郭俊勝主编：中東路與中東路事件
信力建：誰廢除了不平等條約

第二章　精神籍貫

劉賓雁有幸生在俄羅斯文化影响最强的東北地區，又生在一个深受俄羅斯文化熏陶的家庭，這是他成長的最主要的文化來源和精神家園。……這種“思想籍貫”和文化傳承就注定了他一生的命運——雖不能保證他會留下多少列入世界文化聖殿的巨著，但肯定會使他成為經受多重苦難的尋道者和殉道者，帶刺的荊冠是他唯一能指望的獎賞

哈爾濱道外北三道街上的劉賓雁故居。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

劉賓雁故居顯露出歲月滄桑。

哈爾濱建築充滿異域風情。

劉賓雁在這裡度過小學到中學的十年。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故鄉”是個沉甸甸的詞。幾千年的農耕生活使人們對世代生存和繁衍的土地產生了難捨難分、不棄不離的特殊感情。熱土難離、葉落歸根、狐死首丘、愼終追遠成了中國人和中華文化特殊的精神符號之一。

劉賓雁的精神故鄉是哪裡？

他的祖籍是山東省臨沂縣（現屬臨沂市下屬的沂南縣），這個地方最近因為出了個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而聞名海內外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劉賓雁的祖籍也是這裡——那裡人的血液和基因有何特異，何以總要不時生出幾條如此出類拔萃的鐵血漢子呢？

20 世紀初，劉賓雁的祖父領著全家離開了這塊世代生活的熱土，渡過渤海灣去“闖關東”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劉賓雁終生只到過沂南一次，那是在文革劫難剛剛結束的 1980 年，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又恢復了新聞記者的身份，根據大量的群眾舉報材料，他和另外一個同事李春光以《人民日報》特約記者的身份，一同到那裡採訪當地掌權者繼續堅持“文革”路線，抵制改革開放的嚴重情況，並發出報導《尚未愈合的創傷》。這次故鄉之旅給賓雁留下了惡劣的印象，他不但沒有找到“重返祖居故土”的欣喜，反而受到當地黨政官員的瘋狂攻擊。他前腳剛剛離開沂南，當地的告狀信就跟著進了北京，用語之惡毒，氣焰之囂張，均令人震驚。劉賓雁痛心地發現，他的祖居之地不但是“文革”的重災區，而且在“文革”結束後依然籠罩在濃雲密霧之中。如今，賓雁的老鄉陳光誠奇跡般地從沂南突破嚴密的非法監禁來到了美國，再一次證明了賓雁當年的判斷。可惜賓雁已經不在了，如果他還活著，一定會去見見這位老鄉，兩代專制制度的叛逆者和挑戰者，“同是天涯淪

落人”，如能相見，一定會對自己家鄉的現狀感嘆唏噓不已——這只是曾經留下他先祖足跡的地方，而絕不是他思念向往的精神故鄉。

劉賓雁一生漂泊過很多地方，但真正給他故鄉感覺的地方是哈爾濱。那是他人生起步的地方。

1932 年，七歲的賓雁跟著全家住進了哈爾濱，住在道外正陽北三道街。經過幾年自學後，他於 1935 年到道外太古街初級小學插班到四年級（他在沈陽開始上小學），後來又到位於道外正陽十六街的北新高級小學讀書。高小畢業後，他考上哈爾濱市立一中——當時叫“國民高等學校”，這是日本人對中學的稱呼，“滿洲國”效法之。

上世紀前半期的哈爾濱是中國最有特色的城市之一，也是排在上海之後的亞洲第二個國際大都市，在 30 年代，這裡就有 34 家外資銀行。當時內地發往國外的電報都要從這裡中轉。這個主要由黑土地拓荒者及其後代建起的城市，充滿異國風情。由華美的巴洛克風格建築組成的中央大街，使人恍然覺得是到了歐洲；有洋蔥頭圓頂的拜占庭式聖索菲亞大教堂，則是亞洲最大的東正教教堂，以自己的恢弘無聲地宣揚著俄羅斯文化的影響，而教堂前的廣場是市民最喜歡來逛的地方；除此之外，當時在哈爾濱還有十幾座俄國人建的教堂，有拜占庭式的，也有哥特式的，都是建築的精品。可惜如今大多被拆毀了，蹤影全無。松花江心的太陽島則是夏季避暑、冬季溜冰的好去處。哈爾濱人酷愛這些西式的運動，幾乎所有人從小就學會了穿上冰鞋去溜冰。以“大列巴（俄式麵包）”和俄式香腸（現在叫“哈爾濱紅腸”）和酸黃瓜為代表的俄

式食品加入了人們日常的食譜，每天都有麵包坊的夥計把剛烤好的“大列巴”熱騰騰地送到居民的窗下，住在樓上的客户只要打开窗子，用繩子垂下一个吊籃就可以取回面包，这也成了哈爾濱日常生活的一景。

當時，這裡的居民中有 12 萬俄國人，佔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多數是“十月革命”後逃離蘇俄的貴族、軍官、商人和知識分子，被人稱為“白俄”。俄語在這裡是漢語之外的第二語言，連商店的售貨員都會說上幾句。那些在街頭行駛的由高頭大馬牽引的四輪馬車，是典型的歐洲式樣，冬天在雪地上奔馳的俄式馬拉雪橇更是中國內地見不到的奇景。不要小看那些反穿羊皮襖的馬車夫和雪橇手，說不定他就是一個被“十月革命”剝奪了一切財產的前貴族呢。這一切，都在少年的劉賓雁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對那些“白俄”，劉賓雁有良好的印象，說他們大多都有淵博的知识，高雅的修養，和深刻的思想，其中一些人還成了他的好朋友。

俄國人給中國帶來的不僅是世紀性的災難——包括連續幾個世紀對領土的蠶食和鯨吞，也包括那“一聲炮響”帶來的至今還沒有解除的赤色魔咒和血腥浩劫，同時也帶來了一種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其最優秀的精華則為中國文化的涅槃注入了重要的外來因素。

從剛剛學會俄文時起，劉賓雁就是俄羅斯文學的狂熱讀者。他很快就從俄語入門的“這是桌子”，“那是老師”跳過，生吞活剝地開始讀普希金、屠格涅夫和高爾基了。雖然半懂不懂，但卻津津有味。這個愛好伴隨了他的一生，不僅使他精通了一門外語（他後

來還學會了日語和英語，最好的還是俄語），像他父親一樣多了一份學習和謀生的工具，更重要的是為他走進世界文明殿堂打開了大門。

俄羅斯文化中一直存在著兩個互相關聯又尖銳對立的傳統，一個是統治者信奉和倡導的偏執狂妄、野心勃勃，富於侵略性的大俄羅斯主義，一個是在知識界普遍流行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它們又都派生於獨特的俄羅斯“救世主義”彌賽亞意識。

大俄羅斯主義的來源可追溯到他們剛剛立國的基輔羅斯和韃靼羅斯時代。古羅斯的第一任都主教伊拉里昂就說過，第一個接近上帝的是猶太人，而最後一個受上帝青睞的是羅斯人。他們這個“神選”的民族繼承了羅馬和拜占庭的宗教中心地位，承擔了上帝賦予的拯救全人類的神聖使命。這種來自基督教的彌塞亞救世意識和來自蒙古征服者的軍事帝國主義思想相混搭，就成了所謂“神聖俄羅斯”理論的來源。這種結合在“俄羅斯”的讀音上也留下了痕跡：羅斯（ROS）一詞用漢語音譯應為“羅斯”或“羅剎”（《明史》中就稱為“羅剎”），但用蒙古語讀前面需加上了一個元音 O，就變成了“俄羅斯”（OROS），《元史》中稱之為“斡羅斯”或“鄂羅斯”。在這個“神聖俄羅斯”理論和蒙古軍事征服傳統的指引下，幾個世紀以來，血液中至少擁有一半蒙古征服者基因的俄國人北上南下，東擴西進，不斷地擴張領土，通過“馬前懸人頭，馬後載婦女”的野蠻征戰，才經營成了今天世界上版圖最大的國家，而這都被說成是在“替天行道”，執行著上帝拯救人類的意志。這種根深蒂固的民族沙文主義傳統，顯然帶有野蠻而血腥的韃靼軍

事帝國主義的遺傳，不但讓人深惡痛絕，也始終是懸在中華民族頭上的一柄達莫克利斯劍。

蘇聯也是沙俄時代大俄羅斯主義的繼承者，他們從來沒有放棄過征服世界的彼得大帝之夢（彼得自認為是古羅馬和拜占庭的繼承者，“大帝”的稱號是從古羅馬的凱撒那裡剽竊來的），只不過以前高舉的是“拯救世界”的彌賽亞神聖十字架，而蘇聯時代則換成了在全球“實現共產主義”和“解放全人類”的革命紅旗。一直沒有得以實現的莫斯科羅斯時期的“第三羅馬”期許，和聖彼得堡羅斯時期彼得大帝的“第四羅馬”雄圖，最後居然在蘇聯的“第三國際”中得以實現。他們內心仍自詡為“神選的超級民族”，是“世界的燈塔”，要用克里姆林宮頂的紅星照耀世界。而終極目標依然是成為世界的中心和人類的救主。直到現在，在蘇共垮台、蘇聯解體後，彼得大帝之夢似乎還在“普京大帝”的腦海裡縈繞不散，這已經成了俄羅斯人無法擺脫的遺傳基因（甚至連索爾仁尼琴這樣的反蘇“聖人”也還是個大俄羅斯主義者），也是全世界特別是中國人無法迴避的可怕夢魘。歷史已經證明，野心勃勃、侵略成性、擴張上癮的俄羅斯是強迫中國簽下不平等條約最多的國家（共 17 個，其中最重要的是 1689 年的《尼布楚條約》、1858 年的《璦琿條約》、1860 年的《北京條約》和 1864 年的中俄《勘分西北邊界約記》），是吞併中國領土最多的侵略者（總面積達 144 萬平方公里，如果加上蘇聯策動和支持的“外蒙獨立”從中國割走的 150 萬平方公里土地，則總數將近 300 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中國現在殘存土地面積的將近三分之一）。中國人對這個劣跡斑斑的“北方鄰居”每次抱有不切實際的善良幻想，總是免不了要吃虧上當受

傷害，這些歷史的教訓如不記取，遲早還要吃大虧。 如今某些人的“中國夢”中仍然還包含著在國際上“聯俄反美”的幻想，其結果很可能是個世紀噩夢的延續。

在歐洲文藝復興的影響下，俄羅斯的彌賽亞救世意識出現了一個新的發展路徑，那就是從十九世紀初葉開始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方向。 其特點是關注民間苦難，追求靈魂救贖，核心思想是高揚人的解放和反對極權專制主義，這又形成了俄羅斯文化的另一個傳統。 中国人对他們的大俄羅斯主義一貫厭惡，但是對這種反對專制制度的人道、民主、自由主義傳統卻高山仰止，十分欣賞。 從普希金赞颂 1825 年起义者的《致 12 月黨人的妻子們》，到托爾斯泰 1905 年反对屠殺革命者的《我不能沉默》，俄羅斯文學以其高度入世的態度，批判現實的力度、解剖人性的深度、關注世界的廣度，以及大悲憫情懷和自我完善的道德追求，啟蒙了幾代中國人。 而俄羅斯知識分子身上所傳承的那种人格獨立、思想自由、鄙視權貴，追求真理，勇於獻身的十二月黨人式的真正貴族精神，又打動了幾代中國知識人。 在俄國這一傳統一直薪火相傳，没有中斷，即使在最殘酷血腥的斯大林時代，也不時放射出燦爛的異彩。 他们曾沉入過苦難的深潭，但是在血汙的泥沼中居然綻放出像《古拉格群岛》那样絢麗而永恒的荷花。 這讓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感到羞愧——我们承受的苦難可能不比他們少，付出的鮮血和生命肯定比他们還多，但是我们只有用沉默來忍受，用屈服來自存，用遺忘來療傷，用犬儒來自欺，甚至用頌聖來賣身，連痛苦的呻吟都很少發出。 直到现在，還沒有一部與我們承受的苦難相稱的作品問世（鄭義的《紅色紀念碑》、楊繼繩的《墓碑》和

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庶幾近之）。俄羅斯文化的這些精華，歷來是中國人仰望的星斗和最切近的範本。

劉賓雁有幸生在俄羅斯文化影响最强的東北地區，又生在一个深受俄羅斯文化熏陶的家庭，這是他成長的最主要的文化來源和精神家園。他說過，“闖關東”使他們離開了故土，也割斷了與宗法制度相連的臍帶，蠻荒的土地使他們的生命力得以釋放，而俄羅斯文化中最優秀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精華，為他們開闊了視野和新的天地。他承認，少年時代對俄羅斯文化的熱愛，對他有終生的影響。賓雁喜歡別爾嘉耶夫的著作，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靈魂》中指出：“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與其说是國家制度的擁護者，不如說是人道主義者。”賓雁骨子裡就是這樣一個自由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為人民的苦難而憂傷痛苦的靈魂，這才是賓雁人格的生發之地。所以，後來他最好的朋友趙越勝說，“賓雁，你仿佛是一個俄羅斯的靈魂長在了一個中國人的身軀裡”。

而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則基本在他的閱讀範圍之外——這是後“五四”時代大陸上的幾代青年在知識構成上的共同點，其是非功過人們還在爭論。

說起貴族精神，這也是伴隨了賓雁一生的話題。從參加抗日鬥爭開始，直到中共建政後他走上新聞工作崗位，每到一地一單位，不管是讚揚還是批評，“有貴族氣”的評價總跟著他。儀表的端莊整潔，待人的寬厚仁和，對金錢和權力的輕蔑漠視，對弱者的同情悲憫，對自我的謙卑低調，對原則問題的堅持執著，對責任和苦難的勇敢擔當，以及對婦女的溫文禮貌和對孩子的由衷喜愛，是大家對他一致的評價。俄羅斯 12 月黨人那種高貴的精神，已經融入他

的人格。這些品格與他從中國文化精華中繼承來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之傳統和悲天憫人的“尚民”、“為民”思想，以及“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見《史記·遊俠列傳》）等俠士作風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劉賓雁性格。

小時候他的頭顱就比別的孩子大，理髮師經常抱怨他不應享受兒童半價的待遇，同學們也因此送他個“劉大頭”的外號。這個綽號也有兩個互相矛盾的含義：一是說他頭腦聰明，記憶力好，理解力強，知識淵博，善於學習；二是說他心直口快，內心坦白，城府不深，不會耍心眼弄權術——這在一些人看來，就是有點“傻”，在東北話中，“大頭”就有“蠢笨”的意思。他當上全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後，還因此得到個“笨人劉老大”的外號。

這種“思想籍貫”和文化傳承就注定了他一生的命運——雖不能保證他會留下多少列入世界文化聖殿的巨著，但肯定會使他成為經受多重苦難的尋道者和殉道者，帶刺的荊冠是他唯一能指望的獎賞。

用句中國老話來說，他“命該如此”。賓雁小時候曾有會看“手相”的人看過他的手掌，預言說：“這孩子將來操心的事要比常人多得多。”

家境的衰落，生活的貧困，和“皇軍”刺刀下的亡國奴生活，使少年的劉賓雁變得沉默、靦覥和多思。他天生是個讀書胚子，學習對他來說不是什麼艱難的事，他幾乎是不費力地就取得了各科成績的優秀。即使他並不喜歡的日語，也在小學畢業時獲得高分。

日式的學校教育引起他的強烈反感。中學的第一課居然是學枯燥的珠算，每個學生抱著一個算盤，聽著錄音機放出來的日語口令，不停地加減乘除。接著上的是所謂“國民道德”課，而內容居然是《論語》和《孝經》（有意思的是，如今這也是時髦，被稱為“國學”，看來所謂“國學”也能為殖民者所用）。賓雁後來說：“教人循規蹈矩、安份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說教，从形式到内容都令我感到窒息。”他經常在課堂上，偷偷拿出《俄語津梁》來看，這是父親教他俄語的入門課本。後來乾脆拿出高爾基的小說《三人》來讀。

最讓他難以接受的是，學生還要在日本教官的指揮下進行軍訓。人人都穿上一身“準軍裝”，雉髮光頭，在日語的號令下挺身踢腿，反復走正步，刻板枯燥而勞累，還美其名曰是在培養“尚武精神”。

劉賓雁記得，有一次，穿著軍服，留著仁丹鬍的日本校長吉田在例行的訓話時，發現賓雁的站姿不規範，竟下令讓他走到台前，跪在校長錚亮的皮靴下——賓雁平生唯此一跪，當時冷汗發背沾衣，過後奇恥終生難忘！

上了中學以後，劉賓雁的大腦袋裡開始關注中外新聞了，緊接著就出現了一大串問號：

世界上的人們，為什麼要有貧富之分呢？為什麼一個民族，比如日本要征服和奴役另外一些民族呢？世界上為什麼要有這麼多戰爭呢？蘇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可為何會和希特勒德國一起瓜分波蘭呢？他們又為何要侵略芬蘭，社會主義也欺凌弱小民族？

為了找到這越來越多的問號的答案，他省下午飯錢到書店去

租書、買書，買不起新書，就到舊紙店去買廉價的報刊。有一次，在太古街的舊紙店，他掏出自己所有的錢，以兩三分錢一斤的價格，買了半麻袋舊報刊，因為他發現其中有違禁的抗日報刊！

回到家裡，等家人入睡後，他在小油燈昏暗的光亮下打開了麻袋。裡面居然有關內共產黨編印的《救亡日報》，國民黨的《國聞週刊》，還有東北抗日聯軍印行的《告同胞書》……聞所未聞的信息，慷慨激昂的文字，急切的民族危亡吶喊，使他激動不已，熱淚縱橫，一連幾個晚上，他徹夜不眠，貪婪地讀著這些違禁文字。這些文字點燃了他，使他原來已有的朦朧感受變成了清晰的思想。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享受“雪夜燈下讀禁文”的快感。後來，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包括在白色恐怖下和紅色恐怖下的日子裡，冒著風險讀禁書成了一種難改的積習和難得的享受。凡在專制制度下生活過的人對此應該都有相同的體驗。

劉賓雁說，就他的體驗來說，日本統治下的東北，文網還不算是最嚴密的。到 1938 年，小學課本基本上還是張學良時代的，日文書店裡一直公開擺放著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在書架上還有一本名為《抗日論》的厚書，裡面收有中國政治人物如蔣介石等關於反對日本侵略的演說和文章。當然，宣揚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書充斥了書架，但持相反論點的書刊也還能找到。至於“五四”以來中國作家的新文學運動作品，如巴金的《春》、《秋》、《家》等，居然還可在“滿洲國”印行出版。而在電影院裡，上海三十年代出品的進步電影還可以看到，內地的電影明星蝴蝶、白楊、趙丹、王丹鳳等也是東北青少年影迷的偶像，美國電影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前還可以放映，如《人猿泰山》等好萊塢影片長演不衰，到日

美戰爭開始後才被禁演。在美國電影被禁後，法國等國的電影還照演不誤。法國根據俄國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拍的電影，劉賓雁就是那時看到的。他分析說，看來，日本人是把直接威脅他們統治的政治言論和一般不同的意識形態加以區分，分別對待的，這遠不如後來大陸上實行的文字獄嚴苛和徹底，还不算是登峰造極。

在日本統治下的“滿洲國”學校裡，劉賓雁學到的東西除了日語之外真沒有多少，他的知識和思想大多來自課外閱讀。就在那時，他成了個文學愛好者，不只讀書，還交了些作家當朋友。當時哈爾濱有個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關沐南，他在郵局工作，但業餘經常寫點短篇小說，在報紙上發表。賓雁讀了後，很是仰慕，就通過另外一個文友溫成鈞介紹，登門求教。在關沐南那裡，他讀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書籍，並加入了關主持的由左翼青年作家和詩人組成的讀書會。後來他才知道，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外圍組織。

在這些朋友的啟發和鼓勵下，劉賓雁開始試著進行文學創作了。一開始是給兒童文學副刊寫點習作性質的小散文，如寫拾煤渣的孩子的生活等。他第一篇見報的短篇小說是《母心》，講一個年輕的人力車夫不慎走上邪道，在賭場輸光了所有的錢，只好去搶劫，但又因殺人而被捕。因此使撫養他長大、又指望他生活的寡母陷入絕境的故事。發表時用的筆名是“劉靈”。這篇小說是他放學回來，以一個小凳子為書桌，在昏暗的燈光下寫出來的。文稿寄出後，居然在當時哈爾濱的《大北新報》上發表了，還被評為徵文的三等獎。20 元的稿費是小事，從此劉賓雁和文學結了緣，這影

響了他的一生——當時他才只有 14 歲。

從這個作品中可以看到，劉賓雁走上文學道路的第一天，他的同情和關注就是指向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的，這是他一生不變的基本方向。俄羅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代表作 D 大調弦樂四重奏《如歌的行板》，曾讓老托爾斯泰聽得淚流滿面，他說這首曲子“接觸到苦難人民的靈魂深處”。而這如泣如訴的旋律始終是賓雁一生的背景音樂。賓雁後來成為一名記者和作家後，始終把為底層民眾的苦難歌哭和呼喊當成自己的第一責任，而反對“為藝術而藝術”或為自己而藝術，更反對把文學變成向權力獻媚的貢品。他的文學觀可謂深得俄羅斯進步文學之精髓。

處女作的發表，使賓雁有了底氣，一條文學之路似乎在他眼前展開。而在日本人統治的學校裡再學下去，已經讓他感到厭惡和不可容忍。於是，在 1940 年底，他決定邁出一大步——退學（初中二年級），離開哈爾濱，到北平去，和他同時退學的還有三四個志同道合的同學。

1937 年的“七七事變”以後，北平也已經在日本人的鐵蹄佔領下了。但是劉賓雁覺得那裡是中國北方的文化中心，學校的質量要好一些，說不定會為自己提供一個更大的發展天地。湊巧，那時，比他大三歲的姐姐劉放已經結婚，嫁給北平一個從日本歸來的留學生。她慷慨地同意，支持和贊助賓雁來北平繼續求學。於是，賓雁就告別了生活了十來年的哈爾濱，也告別了自己的少年時代，到這個中國元、明、清三代的古都來迎接自己的青年時代了。

太陽旗下的北平，一副破敗景象。一些著名的學校，如北大、清華、燕京等，已經遷到中國西南的“大後方”去了，大批不願意在

日本刺刀下生活的知識分子也離開了古城。街道古老而破落，滿眼是一片讓人沮喪和壓抑的灰牆，尤其是冬天，狂風刮過，塵土飛揚，天昏地暗，比天藍水清的哈爾濱差遠了。賓雁一生在北平（後來叫北京）生活的時間不短，但是他從來沒有喜歡過這個暮氣沉沉的古都。當時，這裡市場蕭條，市民生活艱難。新婚的姐姐雖然全心願意幫助新來的弟弟，但是，她要維持自己的小家，還要不時接濟自己的父母，負擔已經夠重的了。懂事的賓雁儘量少給姐姐添麻煩，只是在北京私立大同中學上初三時在姐姐家住了三個月，後來考上輔仁大學附中（高中）以後，就沒有住在姐姐家，而是到學校去寄宿，只等星期天去看看姐姐。他變成了一個孤獨的漂泊者。

上學要交學費，自己還要每天到街頭馬路牙子上的小吃攤去吃飯，愛讀書的賓雁還總想買點自己喜歡的書，於是，只能從牙縫裡擠了。這時他正在長身體，開始一頓要吃 12 兩炒餅才能飽，後來為了省出買書錢，就只吃半斤。到夜裡肚子餓得咕咕叫，他才第一次領略到飢餓的滋味。姐姐看到弟弟餓瘦了，心疼不已，不時煮好麵條，用罐子裝著送到學校來，讓賓雁十分感動。

就這樣，他在輔仁大學附中堅持了一年半。他看姐姐實在拿不出自己的學費了，就休學回到姐姐家，在客廳裡劃出一個角落當自己的課堂，每天嚴格按時上課，繼續自學俄語，還開始學英語，學習之餘，他就讀書——讀書，是劉賓雁終生的愛好，也是他生活中須臾不可缺的要素。不僅閒時讀，忙時也要讀；就是後來當了“右派”的 20 多年裡，他都沒有停止讀書。晚年在流亡中，讀書更是他生活中的第一件要務。直到臨終前他還慨嘆“有那麼多該讀的書沒有讀”。而他的美國好友林培瑞教授回憶說，他到大學

圖書館裡為劉賓雁借的書比為自己借的書還要多。

20 世紀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有三大思潮：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三方面的書賓雁都讀，而且對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自由主義思想雖然產生較早，在歐洲文藝復興時就有了，但形成風靡歐洲並影響世界的強大思潮是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從本性來說，劉賓雁對這種主張“人的解放”的自由主義更加親近，人格的獨立，思想的自由和人生價值的自我實現是他畢生的不懈追求和核心理念，這不僅是一種個人的追求，而且實行普遍的“人權”還成為當今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理想和政治訴求。從賓雁一生的所言所行來看，他毫無疑問是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和人權鬥士；

民族主義雖然也早已有之，但隨著“民族國家”思想和理論的誕生，這種思潮也對世界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好的方面來看，“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曾經在一百多年內形成強大潮流，直接造成了現代的世界版圖；但從壞的方面來看，這種“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思想使人類的分裂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動亂的重要的根源之一。作為一個國破家亡的“亡國奴”，賓雁產生過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民族解放的熱切向往，這是他走上抗日愛國道路的思想動因。但更廣泛的思想文化來源決定了他從來就不是個狹隘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倒像是個胸懷寬闊的世界主義者；

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最激進的社會理想對年輕的賓雁無疑有更大的吸引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熱血青年很少不是個天生的社會主義者，這是他一生沒有改變的基本信仰，但是，他這一信仰的

核心是追求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是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這與後來佔統治地位的極權專制式的“社會主義”有根本的區別。社會主義對劉賓雁，與其說是理性的選擇不如說是感情的歸屬。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是建立在對人間苦難的痛苦體驗之上的。著名文學評論家，也是賓雁的朋友劉再復曾如是評價劉賓雁：“我認識的作家不少，但從未見過一個像他如此滿身負荷，如此沉重地擔當人間苦痛。他彷彿沒有暢快地呼吸過，一聽到冤情就坐立不安，嘆息不已。這是一個特別的人，一個以嘆息代替呼吸的人，一個靈魂被苦難緊緊抓住的人，一個被上帝罰作肩挑精神重擔爬山越岭的人，一個傻到底，傻到總是赤膊上陣而完全不懂披一點甲、拐一點彎的人。”這段話很深刻，其中“以嘆息代替呼吸的人”一句格外精彩傳神，活畫了賓雁的思想和人格。這種深入骨髓的人道主義是他走向社會主義的根本動力。晚年的劉賓雁曾說過，他是帶著一個很大的問題來到美國的，這個問題就是“當年選擇社會主義是否做錯了？”顯然，社會主義從空想的理念到世界範圍的血腥實踐使他對這個主義產生了懷疑。這個問題一直纏繞著他，但至死也沒有找到答案，然而，“那不是我所希望的社會主義”，這一點是明確無誤的。

在北京“漂流”期間，賓雁已經開始比較系統地讀馬克思主義的書了。至於他那時為何會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他後來反省道，在國恨家愁交織、個人又苦於尋找不到出路的青少年時代，“越是主張激烈、徹底、變革的思想，便越是富於吸引力”。這似乎與現代的“憤青”如出一轍。但是，賓雁和“憤青”們在思想起點上就有所不同，他一生追求的核心價值是人的“自由”，而不是某個流派

的意識形態和被奉為絕對真理的某個“主義”，更不是對某個領袖人物的迷狂追逐。這種源於俄羅斯文化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是他後來與成為官方“顯學”，並取得“獨尊”地位的馬列主義、毛澤東主義不斷抵牾的思想根源。

劉賓雁思想的研究者一平先生曾公允地指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理想，其實是個烏托邦。它的社會批判功能和理想主義追求對西方社會並非沒有合理性和積極意義，但它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則給魔鬼的出入留下了一個通道，導致了20世紀一場全球性的災難。而劉賓雁從來就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更不是一個篡改和扭曲了馬克思理論但又以此為相標榜的列寧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和毛澤東主義者，這個標籤遠遠不能涵蓋他精神活動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他的視野要廣闊得多，精神來源要豐富得多，思考也要深入得多。成熟期的賓雁汲取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人道主義遺產，但摒棄了暴力革命、階級專政和領袖專政等專斷理論，主張“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要關心的，應該是人的解放……即使思想分歧已經轉化為政治鬥爭，也不要忘記把一個人當作人來看待”。這種以“人道”和“民主”界定的馬克思主義與曾流行一時的“列寧牌馬克思主義”有著原則性的區別，更與“山寨版”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當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中國的以一串連續不斷的血腥悲劇變成現實時，他又從懷疑和思考者逐漸成為一個批判和抗議者。縱觀賓雁的一生，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才是他思想的核心，接受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動搖和改變他的這個思想核心，相反，他是用這些思想來解讀和詮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是他一生悲劇的

思想理論根源。賓雁一生的思想經歷過漫長的演變，但是這個思想核心是一以貫之，始終不變的。他晚年的好朋友，也是他的研究者北明說得好："他的一致不是主義的一致，是道德的一致，人格的一致。這種一致，是一個人，一個民族在最深重的苦難中也不会倒下的前提。"

他後來說過"我自幼理論興趣很高"，但後來發現，"共產黨一經掌權，理論的使命就降低為解釋領袖的一本著作或一篇論文，從不提出新問題，很少有作者獨立見解了。貧乏的內容和枯燥的詞句令我厭倦。"他還說："當我確認只有革命領袖方能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有所貢獻，而我們一般人只有學習它和牢記它時，更覺得索然無味了。"他是把讀書當作幫助獨立思考和探尋真理的必要階梯，但厭惡只有少數幾個領袖壟斷真理話語權這種思想專制現象——他是這樣來讀馬克思主義的。把握這一點對瞭解和研究賓雁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是某個現成的主義的信奉者和禮拜者，而是真理的不倦探尋者，給他貼上任何主義的標籤，然後加以評判，都是不得要領的。賓雁用自己的一生證明，離真理最近的，絕不是那些聲稱自己已經真理在握的人，而是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尋求真理的人，而對真理的追求和探尋是個永無終結的過程。誰宣稱自己已經找到了終極真理，就一定是遠離了真理，或者乾脆就是一個騙子。

和在哈爾濱一樣，他在北平很快也建立了自己的交際圈——大都是些有進步思想的年輕人，其中多是文學青年。只有在這個圈子裡，他才能找到自我，找到可以交流的朋友，也找到生活的意義。這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已經變成了全面戰爭，中國的抗日衛

國戰爭已經開始並進入最艱苦的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也先後爆發了，整個世界沉浸在火海硝煙之中，還是個大孩子的賓雁在這一大背景下，很自然地成了一個關注中國與世界命運的人，密切地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後來有人責備中國人太政治化了，也有人指責劉賓雁的作品離政治太近，離純文學太遠，其實，在國破家亡，危機重重的時候，哪個有良知的人會對關係家國命運的政治無動於衷，而躲進所謂“純文學”的象牙塔之中呢？無論是從價值理性的追求，還是從工具理性的認同，在賓雁心目中文學的中心始終都是對人的命運和世界命運的關心。

1941 年初，劉賓雁因為日語成績優秀，獲得了一个參加“華北學生訪日觀光團”的機會。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國。其實，那是日本侵略者對佔領地的人實行“同化”陰謀的一部分，目的是讓青年學生因此產生對日本“親善”的感情。但這對劉賓雁沒有產生什麼效用，短暫的一次旅行並未使他被“歸化”，只是增加了對日本這個敵國的瞭解和敵意。據那時參加過這類旅行的人回憶，每到一地，中國遊客都被領去參觀遍地皆是的神社，還要到東京的皇宮外面去遙拜日本天皇的住所，不但枯燥無味，而且目的可疑，讓人煩不勝煩。劉賓雁回憶說，在這次旅遊中他唯一感興趣的是逛書店。他說，日本的書店真多，書的品種也浩如煙海，這是當時在中國所看不到的。這次旅遊後來成了他的一個“歷史問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為此曾寫了無數的“交代”和“檢查”，“文革”中還被懷疑是“日本特務”。

訪日回來後，姐姐家的境況每況愈下，除了經濟拮據之外，姐姐與姐夫又夫妻失和，家庭的氣氛令人壓抑，姐姐客廳的小書桌越

來越不能安定了。作為一個七尺男兒，他不能總是寄人籬下，“漂”在社會上；作為一個熱血青年，他怎能對這場關係國家命運、民族危亡和世界前途的戰爭冷眼旁觀，只當一個看客呢？賓雁一生有個可貴的品質：他不只是個深刻的思想者和真理的探求者，更是個勇敢的踐行者。思想，是他的靈魂；而行動，永遠是他實現理想的主要方式。他注定不能成為一個書齋中的學者或單純的理論家和思想者。

怎麼辦？他漸漸生出一個心思：把抗日的思想變成抗日的行動，到北平城外的抗日根據地去（當時日本人雖然佔領了華北，但主要控制了大城市，周圍的農村已經大部分成了共產黨的天下），當一名抗日戰士！

1943 年 9 月，劉賓雁離開漂泊了三年的北平，來到渤海灣最大的商埠天津，原因是有人說能從那裡把他們帶入抗日根據地。和他同行的是從哈爾濱一起來闖北平的小學同學鄧邁。這一年，他 18 歲，從此就離開家庭和親人的監護，開始自己闖蕩天下了。

賓雁的這次離家，大有“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豪氣。當時他母親正好來到北平，親自送他上了火車，一直緊握他的手，淚眼盈盈，不忍離去，直到列車走出一站，才戀戀不捨地下了車——她好像知道這是生離死別，永不相見了。兩年後的 8 月 9 日，日本投降前幾天，賓雁在天津收到哈爾濱來的電報“母故速歸”，他除了大哭一場之外，已經沒有任何辦法面對母親的早逝——她才活了 45 歲。

到晚年，賓雁在流亡中對自己的一生千百次地回顧和反思，但是，對當初的這個選擇，他從來沒有後悔過——這是當時他唯一可

能的選擇。

從理論上來說，在人的一生中似乎有無窮多種選擇的可能。但是具體到一個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時代和環境裡，選擇的機會其實並不多，往往只有一個。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郭小麗：俄羅斯的彌賽亞意識
劉再復：緬懷傻到底的賓雁老大哥
余英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國昌：悼老同學劉賓雁

第三章　初入“毛廬”

這位“余先生”決定了劉賓雁的一生，包括他此後短暫的輝煌和連綿的苦難。從此他的一切都不再屬於自己，而屬於那個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黨”了。這就使他陷入一個悖論，他說過：“我參加革命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放自己，實現自我。”可是為了這個自我解放和自我實現，卻要以交出自我、消滅自我為代價。……一切走上這條路的人，都要終身面對這個荒唐

天津耀華中學。1945 年，劉賓雁曾在這裡當歷史課老師。

這是耀華中學地下黨的第一個校外活動點。

天津常德道 1 號。當年這是進步學生曾常寧的家，耀華中學地下黨活動點。

1946 年 6 月劉賓雁撤離耀華中學時給同事的信。

來到天津，他們投奔了一個叫做“天津抗日救國聯合會”的秘密結社，當時的會長康力也是個年輕人，只比劉賓雁大一歲。他原名劉樹桐，河北大城縣（今天津靜海縣）人，曾用化名劉耒、康振民、呂振、劉同、雷康等一大串，當時已是個職業革命家了。天津抗聯通過他與中共冀中軍區十分區建立了聯繫——他第一次去根據地的路上曾被日本憲兵抓住，但他機警地趁敵人不注意時逃了出來。劉賓雁和鄧邁與康力接上頭後，對這個已有相當經驗的革命家十分敬仰，原計劃通過他介紹，到冀中抗日根據地去參軍。但康力說，天津抗聯正在發展組織，工作繁多，亟缺人手，希望他們先留在天津，參加抗聯的工作。於是，賓雁和鄧邁就留下來，成了中共外圍的“地下工作者”了。

當時賓雁白天的公開身份是日本銀行儲蓄部的低級職員，以此為掩護，夜晚和假日就進行秘密的抗日宣傳工作。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秘密工作”，對愛幻想、喜冒險的賓雁很有吸引力，也為他施展自己的聰明才華提供了舞台。他以滿腔熱情投入了工作：刻鋼版、印傳單（內容當然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類的了），然後到天津最高的建築勸業商場頂上當空撒下，或者塞到公交有軌電車的座位上，投到居民的信箱和門縫中……他還利用自己精通日文的才能，專門寫印了日文傳單，親自一張張塞進日本僑民家。他也學習康力的榜樣，給自己起了化名：先叫“申明”，後叫“劉克”和“劉子安”……

這種“秘密工作”有巨大的風險。如果被當場抓住，後果不堪設想，有殺頭的危險。但是，對他那個年齡的年輕人來說，正因為有巨大的風險，才有格外的誘惑力。赤手空拳向掛在刺刀上的血

腥太陽旗挑戰，這不僅狂放地抒發了他鬱積在心的國恨家仇，又是那樣富有浪漫情調的詩意狂歡！通過這種對強權和暴力的叛逆與反抗，他終於擺脫了多年的心靈苦悶和庸俗生活的陰影，奏響了莊嚴神聖的英雄主義樂章。這種英雄主義才是劉賓雁的真面目，是他一生沒有消退的真色——假如他生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俄羅斯，一定會投身到 12 月黨人的隊伍中；生在巴黎公社時期的法國，一定會站在最後一個街壘的最高處，他天生就是一個屢挫屢奮、永不屈服的鬥士，也永遠是一代代青年叛逆和反抗者的天然同情者和支持者。劉賓雁晚年的摯友作家鄭義說他“有一種難以抑制的熱情：讚頌叛逆者”，1957 年他迎著羅網的奮翼而飛和 1989 年在“六四”屠城後他的拍案而起，絕非偶然。

劉賓雁的熱血肝膽和出眾才華，很快就在天津抗聯中得到關注和重視。不久，天津抗聯就成立了一個“直屬分會”，賓雁成了分會的主任。1944 年 7 月，劉賓雁（當時的化名是申明）跟著康力、楚雲（原名李家輝）、辛冬（原名陳子政）等天津抗聯的領導人一行四人，在聯絡員田英的帶領下，離開天津，來到位於文安縣韓家地大葦塘的中共冀中軍區十分區司令部，向分區司令員劉秉彥和政治部主任李孔亮等匯報工作，正式接受十分區的領導。賓雁是第一次見到共產黨的高級領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這位劉秉彥司令員後來當了河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六四”時他說：“我親眼看到北京人民用行動阻擋軍隊進城，那不是少數人，是大多數人哪。40 年前，我們是第一批進城的，那時北京人民那麼熱烈地歡迎我們；40 年後卻成了這樣，說明我們站到老百姓對立面去了。如果黨內有民主，一定不會作出這樣決策的。這是為什麼？因為太腐敗了！”）。

然後，由十分區派人護送，賓雁他們一行到了太行山中的平山縣西柏坡村（三年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延安遷到這裡，因此被列入“革命聖地”的行列），晉見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領導，中央分局城工部兼敵工部部長劉仁（當時中共北方“地下工作”的最高領導，1949 年後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文革”中被視為劉少奇、彭真的死黨，被捕入獄，1973 年死於共產黨的獄中）接見了他們。

當時，劉賓雁還沒有明確的入黨要求，他以為同行的三人早就是共產黨員了，而自覺還差得遠。後來才知道，他們三人就是這次在平山才履行了入黨手續，還成立了中共天津抗聯黨總支，楚雲任書記，康力任委員兼天津抗聯主任。他們一直在等待著劉賓雁也有這個“覺悟”。受他們啟發，賓雁才提出了入黨申請，在其他三人返津後的一個晚上，劉仁為劉賓雁單獨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給賓雁印象最深的是，誓詞中有一句“永不叛黨”。劉仁還與劉賓雁單獨談話，瞭解他在東北的情況，計劃派他回東北去工作，但考慮到他正是被“滿洲國”徵兵的年齡，回去後就會被徵入僞軍，因此這個計劃就放棄了。回到天津後，劉賓雁向先期返津的黨組織領導說了一句暗語“我是余先生派來的”，这標誌著他已經是个中共黨員了。

這位“余先生”決定了劉賓雁的一生，包括他此後短暫的輝煌和連綿的苦難。從此他的一切都不再屬於自己，而屬於那個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黨”了。這就使他陷入一個悖論，他說過：“我參加革命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放自己，實現自我。”可是為了這個自我解放和自我實現，卻要以交出自我、消滅自我為代價，這就等於說，“為了活得好，就要死掉”一樣，豈不荒唐？一切走上

這條路的人，都要終身面對這個荒唐。要求追隨者犧牲自我，這在殘酷的戰爭年代似乎還有道理，但到建立政權後的和平年代仍然如此要求，不給人的個性發展留有任何餘地，這就遠離了當初標榜的革命目標了。

這也不能怪年輕的劉賓雁，毛澤東 1945 年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說過：“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這是不對的，因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幾萬萬人民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這是何等漂亮的許諾啊，對劉賓雁那樣的年輕人具有多大的誘惑力呀。1986 年賓雁回憶道：“千千萬萬的人，包括我個人在內，都是在自由幸福的感召下參加共產黨、參加革命的……我們在天津唱的一首歌是《毛澤東之歌》，第一句是‘密雲籠罩著海洋，海燕呼喚暴風雨’，最後一句是‘建設一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像他這樣懷著自由主義之夢走進“毛澤東之廬”的年輕人可不在少數。比賓雁還要早就投身革命的老共產黨員李銳在 96 歲時沉痛地說道：“我們黨革命勝利，也是靠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統治，宣揚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獲得的。可是執政之後，卻走上了一條與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禍國，直到‘文革’十年，嗚呼哀哉……”

這些天真的知識分子當時根本無法知道毛澤東的真實想法。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對知識分子充滿刻骨仇恨，為了奪取天下，他也曾把知識分子當成可以利用的力量，但是骨子裡的仇恨一天也沒有消弭。到他在槍桿子的簇擁下進了京城，座穩大位以後，他對知識分子的腔調就完全變了。1958 年 3 月 22 日他在成都會議的講話中就說：“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

有，鄙視、藐視、蔑視……”1966 年“文革”前夕，他在 4 月 24 日的一個批語中說：“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 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除了幹反革命，搞資本主義復辟，培養修正主義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到了 1970 年 12 月 18 日他對美國人斯諾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師呵，全部用國民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以上引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的這些肺腑之言公開說出來之日，賓雁和所有投奔革命的知識分子將一批接著一批成了政治運動的祭旗犧牲，到那時，他們才會發覺當年毛澤東關於自由民主幸福的甜蜜許諾只是陷阱的誘餌而已，可惜明白時已後悔晚矣。

回憶起這次太行之行，劉賓雁說印象最深的是那裡充滿了神秘氣氛。 在平山西柏坡，人人要帶上口罩，不得隨便來往交談，以防從各地秘密來“朝聖”的人互相認識和產生非組織的聯繫。 劉賓雁在一個小樹林中偶遇初到天津時認識的雷文（此人參加天津抗聯比賓雁還早，後來因所謂“生活作風問題”被抗聯除名驅逐，又回北京找到關係重新加入了組織），驚喜萬分，兩人說了話。 回來後受到康力的嚴厲批評，說他違反了保密紀律。 這使劉賓雁第一次領教了共產黨紀律的厲害。 賓雁的這個遭遇還不算是最慘的，比他早一點在天津參加革命的何家棟帶著十幾個中學生到冀東根據地投奔共產黨時，曾因“來歷可疑”而被戴上手銬吊在屋梁上，手腕被勒得露出了骨頭（見何家棟的文章《劉賓雁與共產黨》）。

這位嚴厲的領導康力結局很慘，“文化大革命”時任天津市科學技術協會秘書長，就因為他有曾被日本憲兵抓住而又逃脫的經歷，被打成了“叛徒”，慘遭迫害，於 1967 年 5 月死亡，時年僅 43 歲。“文革”中，天津的康力專案組曾找到劉賓雁，要求他證明康力的叛徒問題，賓雁講了他所聽到的康力遇險脫逃的故事，，賓雁講了他所聽到的康力遇險脫逃的故事，說自己沒發現他有什麼問題。至於康力的故事是真是假，他因不在場所以無法提供證明。

當時劉賓雁無法知道，康力的悲慘下場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中共黨內軍隊出身的幹部和“地下黨”之間的矛盾。黨內有一個多年流行的觀念：從根據地和軍隊出來的幹部是“大兒子”，而在敵區工作的“地下黨”則是“小兒子”，或者乾脆就是“後娘養的”。對敵鬥爭時“地下黨”的工作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16 個字。當大軍進城後，軍隊幹部和原“地下黨”的矛盾爆發出來，毛澤東又制定了一個關於處理“地下黨”幹部的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個新的 16 字方針導致大批當年在敵後做秘密工作的幹部受到歧視，並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一批批清洗和淘汰。中共華東局城工部長沙文漢、中共南京工作部部長陳修良這對夫婦的命運就是典型。他們為解放南京立下殊勛——策反了守衛南京的國民黨軍隊，讓渡江的解放軍兵不血刃地進入了一座空城（“百萬雄獅過大江”的戰爭場面是虛構的）。但他們旋即被調離南京，異地降級安排，1955 年沙文漢任浙江省省長，陳修良則任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到 1957 年，他們夫妻雙雙被打成“極右分子”，沙文漢 1964 年蒙冤死去，而陳修良則接受了 22 年的勞動改造（見發表在《炎黃春秋》上唐寶林的

文章《南京解放前後的陳修良》)。 他們的遭遇不是個別的特例,而是當年“地下黨”的共同命運,例如,劉賓雁的老上級、入黨儀式主持人、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兼敵工部部長劉仁就是在“文革”中死於獄中的。 由此看來,賓雁的“革命資歷”也並非一塊硬招牌,在靠槍桿子起家的中共看來他只是個“後娘養的”,他後來被打成“右派”也是“控制使用,逐步淘汰”方針的必然結果,這種黑暗是“初入毛廬”的賓雁所無法想象的。

1944 年 6 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敵佔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決定》。 賓雁從平山返津後,於 1945 年初奉命到天津有名的耀華中學去發展組織和開展學運工作。 為此,只有初中學歷的賓雁,靠組織上為他僞造的一張南京中央大學畢業證書,用劉子安的名字(年齡也虛報了六歲)到耀華中學去謀取了一個高中地理教師的職位。 而他實際上的領導者、天津抗聯的會長康力,則到這所學校考上了高中一年級的“插班生”。 領導者扮演學生,而被領導者扮演了老師,他們的身份在公開場合來了個有點喜劇色彩的大顛倒。 他們上下聯手把耀華中學變成了共產黨的重要據點。 一年以後,耀華中學的共產地下黨員已經發展到十幾個人,而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也發展到一百多個成員了。 他們的工作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令人驚訝的是,賓雁扮演大學畢業的地理教師角色居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魁梧的身材,碩大的頭顱,深沉穩健的作派,使他完全不像只有二十歲;而廣博的知識、高雅的談吐,和令人心儀的風度,則得益於他多年的閱讀、刻苦的學習和充分自信的性格。 當然,這也靠每堂課前的精心備課,他實際上是自己頭天學會了第二天就

開講。 當時耀華中學高二的女生、也是抗聯骨幹的劉保端在 2011 夏天年回憶說，當時的“劉子安老師”儀表堂堂，知識淵博，口才一流，講課和演講深受學生們喜愛和崇拜，很多人都是他的“粉絲（她用了當時還沒有的這個網絡新詞）”，沒人懷疑這個學識淵博的傑出老師是個冒牌的大孩子。 而宾雁為了使自己显得更成熟和老练，还试着叼起烟卷，结果从此上了瘾。

劉賓雁後來說，就是在耀華中學，他才發現了自己原來有演說的天賦。 不管聽眾是一個班，還是全校的學生，他走上講台後，能一下子成為所有人關注的焦點，他的每一局話都能從聽眾的臉上和眼睛裡得到共鳴。 而沒有這種共鳴和互動，他一分鐘也講不下去。演講時任何一個人的喧嘩和走動，都會破壞他的心情，使演講中斷。這種感覺伴隨了他一生，上世紀 80 年代，他曾在全國各地舉行過上百次大型演講，為改革開放鼓吹呼籲，有時聽眾成千上萬，他總能講得會場上鴉雀無聲或掌聲雷動。 他曾不無自負地開玩笑說過，自己說得比寫得好，是天生的演說家。 他的這種才能和對這種才能重要性的認識，在民主世界裡並不稀奇，那裡的每個人都從小受到演講的訓練，尤其是政治家，幾乎人人都是出色的演說家；但是在中國，在共產黨的官場，這卻是少見的奇跡，不信你就對比一下紅色官僚們照著秘書寫就的文稿，用南腔北調，結結巴巴，枯燥無味地宣讀的那些充斥著套話、空話、大話和假話的“重要講話”吧。由此判斷，劉賓雁怎麼看也像是個鶴立雞群、行不由徑的“異類”。

劉賓雁的演說才能得益於他在少年時代曾迷戀過戲劇表演，十二三歲在哈爾濱時，就經常鑽進離家不遠的“新舞台”劇場（當時最有名的舞台之一）——沒錢買票就混進去——到後台去看演員

們是如何演出的，琢磨他們在舞台上何以會產生那樣令人神魂顛倒的魅力，也曾幻想過自己將來成為一名聲震全國的京劇表演藝術家，甚至還具體地夢想過演出成功後漫天的花瓣向自己頭頂灑下，而漂亮的女演員則是他最早夢寐的佳偶。他很早就無師自通地悟到，演說也是一種表演，關鍵是不僅要有廣博的知識、銳利的思想，還要善於建立與觀眾的心靈互通與交流，把話說到人們的心裡去。時代終於沒有給他提供藝術表演的舞台，而相似的機會，卻出現在教室和演講廳裡。在殘酷而又浪漫的抗日地下鬥爭中，他終於找到了發揮自己表演天賦的舞台，儘管並沒有漫天的花瓣當空灑下。

當時劉賓雁的中國地理和世界地理課，在傳授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知識的同時，經常放言大講進步的思想和革命的理論，把枯燥的地理知識課變成了令人興致盎然而富有啟發性的思想大餐，使學生們耳目一新。有一次在講陝西省的地理時，他在陝北畫了個大大的方框（這一般是首都的標誌），然後寫上“延安”兩字，暗示那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講到蘇聯時，他就強調那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真正公平的社會。下課後學生們議論紛紛，說這個老師膽子真大！當年的學生們至今還誇他是個好老師。其實這並非組織上交給他的額定任務，而是他天性所致：學生們信服而真誠的目光感動和激發了他，使他不由得要把世界的真相和自己剛剛找到的“真理”訴之於眾，讓大家分享。這也說明了他當時的不成熟——他不相信那些凝神停課的學生們中間會有特務和漢奸，因此把自己的思想和立場無意中公開化了。這使他挨了組織的又一次批評，後來，只讓他做教師的工作，不讓他做學生工作了。為此，賓雁有好一陣子不痛快。

校內抗聯的秘密會議常在賓雁的宿舍中召開，有時還到“七七事變”前的天津市警察局長曾延毅家中舉行——日本人來了他就下野了，他的兩個兒子曾常寧、曾亞寧都在耀華中學讀書，思想進步，傾向共產黨，參加了抗聯的活動，他們的父親願意為他們的抗日活動提供掩護。抗聯的同志湊了一些進步書籍，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薛暮橋的《政治經濟學》、茅盾的《路》等，成立了個“魯迅圖書館”，就設在曾家，他們經常以讀書會的名義在這裡活動。在秘密會議上，賓雁和戰友們（多數的身份是學生）一起分析形勢、傳達指示、討論問題，分配任務，他總能成為話語的中心。會議休息時，賓雁和康力還教大家唱進步歌曲，如《流亡三部曲》、《黃水謠》、《保衛黃河》、《王二小放牛郎》和《游擊隊歌》等。賓雁嗓子不錯，唱歌動聽，很受歡迎。有一次，大家問起根據地的“扭秧歌”是什麼樣的，康力和賓雁還當場表演起來——這是他們在西柏坡學會的。

和這些學生兼戰友在一起，是他最開心的時刻，但會議一結束，走出門外，他又要收斂自己的興奮，裝成一個持重可敬的老師，在行動中有意和學生們拉開距離，不得輕易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例如，學生們在抗戰勝利後舉行“反甄審”（日本投降後中央政府開始對日偽學校的漢奸學生進行甄別審查，中共在各地組織了反對甄審的學生運動）請願示威時，他就跟著遊行隊伍，但走在馬路的另一邊，似乎是個旁觀的行人。這對生性坦誠率真，不會裝假的賓雁來說很有點難度。但是賓雁明白，不這樣做，暴露了自己是小事，牽連了組織和同志可就是大事了。要知道，當時耀華中學的形勢很複雜，不僅有日本憲兵的細作、親日漢奸的耳目，還有國民黨的地下

組織，傾向共產黨的學生和教師是少數派。

革命，永遠是年輕人最有浪漫詩情的盛大狂歡節，也是展示人格魅力與才華的最好舞台，無論哪個國度、哪個時代似乎都是如此（想想 1989 年天安門廣場上那些浪漫的婚禮吧）——在人們還沒有看到革命所帶來的血腥、汙穢和死亡之前。伴隨著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鏗鏘樂章，劉賓雁走上了革命之路，也走上了布滿荊棘的苦難之途，雖然他當時並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其實，有些似乎微小的信號已經在預示：他所踏上的並非坦途。在西柏坡未經批准就擅自和雷文見面交談，使剛剛入黨的賓雁第一次受到組織的懲處——嚴厲批評，這雖然是最輕微的懲處，但對自尊心極強，且正在興頭上的劉賓雁卻有很大震動。與此同時，他的另一個缺點也第一次被指出來：身上有非無產階級的“貴族氣”。他開始發現自己在價值觀上與那個強大而專橫的“組織”並非協調一致。

雷文是他到天津後最早認識的同志和上司之一。當時他們是一個工作小組，雷文是組長。一開始，他們四個在天津沒有家的年輕人就寄宿到一個有進步思想的中學生楊昌炎家中。他的父親是天津的大鹽商，出於對兒子的溺愛，對兒子的選擇未加干涉。幾個大小伙子，長達半年的時間裡在楊家白住白吃，還把這裡當成了活動據點，經常有北京和外地的“同志”到這裡聚會，多時有一二十人，開完會還經常留下“蹭飯”，這在抗日戰爭末期的天津，是個不小的負擔，主人儘管心中不快，但也寬容地接受了。問題是來來往往的青年，都是些學生打扮的抗日分子，經常身帶禁書、反日傳單和各種宣傳品，離楊家住處不遠的地方就是日偽警察局，風險極大。後

來，主人實在忍不住了，就通過他們的兒子，婉轉地下了逐客令。這一下，惹惱了抗聯的志士們，他們不但立即撤出，還把楊昌炎從抗聯隊伍裡掃地出門，宣布他已“叛變革命”，從此形同路人，再不來往。對這件事，劉賓雁從心底裡不贊同，人與人之間要有寬容、理解和感恩之心，怎能對善待自己半年之久的主人如此絕情？但他是剛入伙的新人，還無權多說，心想這也許是革命的需要吧。他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犯了“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的毛病。

十年後，這些當年的抗聯志士們都成了革命的勝利者，當上了大小不一的官員，而楊昌炎已是一名中學校長，以統戰對象的身份被封為區政協委員。他曾經在家中設宴招待過當年絕情而去的革命食客們，席間沒有一個人向他道歉，反而有人繼續嘲笑他當年由於“立場不穩”、“意志不堅”，而放過了參加革命、從而進入當今“主流社會”的大好機會……只有賓雁在自己的自傳中用文字向他表示了真誠的歉意。

他們離開楊家後，在同一條街的路口租了一間小木樓住下，四個光棍一間屋，戲稱“光棍屋”。但是不久，“光棍屋”裡增加了一個女人——一個姓蔣的舞女，也引起了一場風波。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四個小伙子認識了無家可歸的蔣姓舞女。原來她是個苦命人，自幼被拐賣到上海，受盡欺凌；後來流落到天津，以伴舞為生，好不容易找到個商人子弟結了婚，但因出身低微不被婆家接受，最後被趕出家門，流落街頭……四個人出於義憤和同情，把她帶回了“光棍屋”，在屋子的一角掛起一張床單當隔斷，為她提供了住處。出於感激，她勤快地為幾個光棍洗衣、做飯、打掃房間，儼然成了小家的主婦，相處還算和諧。但是，有段時間，雷文生病了，其他三人外出

工作，只留他在家，蔣某盡心地給他端茶倒水，做飯喂藥，使雷文由感動而生愛心，他們墜入了愛河……

這件事在劉賓雁看來，既不悖情悖理，也不下流骯髒。在他讀過的那些國內外文學名著中，革命和愛情從來就是密不可分的永恆主題，哪個革命者沒有驚天動地的愛情？哪個革命的愛情故事不讓人肝腸寸斷、熱血沸騰？他甚至以欣賞的態度看待發生在身邊的這個革命加愛情的故事——但是，事情出他意料地急轉直下：雷文因此被“組織”革出教門，趕出抗聯，逐離天津；蔣某也重新消失在街頭……

在西柏坡與雷文不期而遇，賓雁關心的是雷文後來的遭遇。知道他身無分文隻身被趕出天津後，好不容易回到北平，又千方百計尋找地下黨，最後居然被北平地下黨辦的華北聯大收留，終於重新歸隊，賓雁這才懸心落地，略感欣慰——沒想到自己卻因此“犯了錯誤”。

對敵鬥爭可以無情，但是，難道對自己的同志戰友也要殘酷絕情嗎？從楊昌炎，到雷文，難道非要如此處理嗎？革命和人道主義，革命和人性，革命和人情，革命和愛情，難道真的是如此水火不相容嗎？莫非只有心如鐵石，殘酷無情，絕情棄友，大義滅親而面不改色，才算是革命的“徹底和堅定”嗎……一連串的問題在心頭升起。這是劉賓雁入黨後第一次對黨的決定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其實質是人性和所謂“黨性”的衝突。他儘管已經入了黨，但卻始終沒有忘記自己還是個“人”，這成了後來他與這個黨不斷發生衝突的根本原因。

在走上流亡之路的晚年，他曾經說過：“我在天津參加地下抗

日運動，主要是出於一種民族意識，但是有一種比抗日民族意識還要強烈的社會意識，就是要改變社會的不公平……在革命熱情中也包含了強烈的爭取個人自由和發展的慾望。”他還說：“幾乎從我接觸中國共產黨的那一時刻開始，它對於個人、個人自由的近似殘酷的壓抑，便使我感到格格不入了。”

當時他只能把這些問號埋在了心底：還想：說不定是自己錯了，這興許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劣根性”的表現呢？賓雁當時並沒有預料到，這樣的問號是不能用深埋來解決的，在以後的日子裡，類似的問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觸目驚心，越來越無法迴避，直到有一天會爆炸開來，把他對這個黨、這個主義，以及這個制度的信仰和信心炸得粉碎，也把他自己炸進地獄之門！那一天遲早會到來的，而且並不遙遠。

為了深入瞭解賓雁在天津時期的情況，2011 年夏天，筆者訪問了老年的雷文。 這位年齡略大於賓雁的老幹部最後的職務是北京第二外語大學”（當時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代理黨委書記（1983–1984）。“二外”在“文革”中是個有名的重災區，這裡是“外事口”兩派鬥爭的焦點，那個後來波及全國的“五一六”組織最早就是在這裡發現的。 可以想象，身在漩渦中心的雷文那時一定有過死去活來的經歷。 但是，這次採訪很艱難，所得有限。 這位將近 90 歲的老人已經思維遲鈍了，很多事情都已忘卻——也許是他根本就不願意回憶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提起賓雁這個老戰友和老朋友的名字來，他臉上才露出真誠的笑容，反復地說“那是個好人，好人……”

我驚訝地發現，他對劉賓雁的記憶竟然停留在上世紀 80 年代

中期，那是賓雁在國內的最後幾年，也是他最輝煌的時候。雷文離休後，似乎和不少人一樣厭倦了他終身攪在其中的政治，從此就斷絕了與外界的一切來往和聯繫，把自己屏蔽在家中，在長達 20 多年的時間裡，真的做到了“兩耳不聞窗外事”，成了“避世金馬門”的“大隱”了。賓雁 1987 年第二次被開除黨籍，到美國後不能回國，流亡了 18 年，最後客死於異國他鄉——這些曾轟動一時的新聞，雷文居然一無所知！當我把這些告訴他時，老人不斷地搖頭，不停地嘆息，只說：好像依稀聽人說過賓雁出事了，但是什麼事，什麼結果，他一點也不知道。他覺得這一切都不可思議……看得出，這個賓雁的同代人在經過漫長而坎坷的歲月後依然活著，而且活在帝都北京，住處離賓雁家不超過五公里，但他早已遠離了滾滾紅塵，也遠離了他曾經親歷的那些驚心動魄而又充滿難言之隱的歷史，這也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活法，也許是不少中國人都選擇的一種最簡便的“無痛活法”吧——可惜，這種活法對賓雁並不適用。

賓雁是在耀華中學迎來抗戰勝利的消息的。歡慶勝利的鑼鼓還沒停止，國共兩黨的爭鬥就日益激化了。學校裡三青團組織打出了旗幟，賓雁宿舍的窗子多次被石頭打破，一個姓薛的特務學生公然把手槍擺到課桌上，在課堂上擦槍。賓雁當時就嚴詞斥責道：“這裡是學校，你不應該把槍帶進來，請立即收起來。”衆目睽睽之下，那個人只好快快地收起了槍。後來，這個姓薛的三青團頭頭還經常率幾個人提著木棍圍著賓雁示威——他的共產黨身份顯然已經暴露了。

1946 年夏天，兩黨內戰眼看就要全面爆發。6 月 21 日，賓雁接到康力的緊急通知：大逮捕迫在眉睫，他在第一批逮捕的名單上，

必須立即撤離。接到通知後，他立即丟掉了一切財產，只來得及帶上兩本托爾斯泰小說的英譯本，就匆匆離開了學校，暫時躲到進步學生曾常寧家中的閣樓裡，等待組織上的新指示。當天晚上，他給同事的生物教師孫養林寫了一封短信，信中賓雁委託孫老師替自己去領取當月的工資，並代他歸還向另一個同事的借款。最後寫道：“環境雖是惡劣的，只要堅忍不拔地幹，成功也一定是必然的。願你不因周圍之黑暗而悲觀失望。”可見在危險來臨時他的心態，這位“有貴族氣”的青年，逃亡中還沒有忘記歸還對朋友的欠款，還以自己的信念來鼓勵別人。這封信孫養林一直珍藏著，直到 1988 年聽說賓雁再次蒙難，才把把複印件給賓雁送來，以示不忘他們的友誼。

賓雁寫的自傳中說，就在避難的閣樓上，他經歷了自己的初戀。一個早已對他心儀的進步女學生向他傾訴了愛戀之情，賓雁也報以激情的話語，兩人在窗前對著明月約定：不管要等多久，日後一定要再次相會——他說，這次落難中的初戀僅止於此，沒有擁抱，沒有親吻，只有一個約言。

這個女學生是誰？賓雁沒說，後來他們是否再見過？也沒了下文。筆者採訪過一些當時賓雁的朋友和戰友，也沒人知道（或不願意透露）這段柏拉圖式戀情的底細。賓雁和他的朋友們這樣做，肯定有充分的理由。他一生寫了那麼多真實而非虛構的報告文學，揭露了許多隱秘的黑幕，但是有一個禁區他從來沒有突破，那就是絕不去侵犯別人的隱私。純潔的初戀，是每個人都有的秘密，是心底裡最美好的黃金記憶，也是外人不可輕易碰觸的禁臠。絕大多數的初戀都是沒有結果的花，雖然無聲凋落，但讓這段美好的回憶永

遠埋藏在兩人的心底，永遠“保鮮”，卻是每個人擁有的神聖權利。人們會充分理解賓雁的“欲說還休”，他絕不去傷害自己初戀的對象，這也是“貴族氣”的一種。

有一份當時天津抗聯參加者的名單，上面總共有 60 多人，其中女性有十幾個，有好幾個就是耀華中學的學生，這位賓雁的初戀對象大約應是其中之一吧——由於世事蒼黃，人生多難，他們最終沒有走到一起，但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在避難的小閣樓上，窗前月下的純情傾訴，這美好的記憶應是兩人終生秘藏的珍寶，好奇的追索也就到此為止吧。 我們寧願相信這樣一個假設——也許，在北京妙峰山下的賓雁墓前，曾出現過這位當年女學生的身影。 她能在白髮紛披的垂暮之年，為劉賓雁的無字碑獻上一束鮮花，灑下一掬清淚——倘能如此，這個故事也應該算是有一個圓滿的詩意結局了。

幾天之後，康力的通知來了：讓賓雁再異地躲避一段時間，兩個月後再回天津。 當時，華北的黨組織對國共談判還抱有希望，甚至已經準備了和國民黨競選天津市長的人選。 那樣的話，還需要很多人手，還有大量的工作等著賓雁呢。 說實話，這也是賓雁當時的心態：剛剛結束了血流成河的八年抗戰（如果從“九一八”算起則是 14 年），中國人還有幾個願意再打一場更殘酷血腥的內戰呢？國共兩黨在重慶談判中許諾的民主建國，和平發展，可是絕大多數民眾的願望啊——然而，決定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會是這些善良的願望嗎？一場將導致千百萬生靈塗炭的慘烈內戰其實已經在劫難逃了。

賓雁決定，利用這段時間給自己放個探親假，回到哈爾濱去，與久別的父親和姐姐團聚（他們在母親去世後已經趕回哈爾濱了），

也去祭奠一下母親的新墳，順便親身體驗一下“解放區”的生活。兩天以後他來到北平，躲在學生黨員金永清家。他想取道共產黨佔領的張家口繞回東北，但在南口列車被攔截，只好又回到天津。7月8日，他登上了開往沈陽的火車，下車後又步行、乘馬車穿過了國共兩軍的戰線，再登上從江北開往哈爾濱的火車，五天後終於輾轉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哈爾濱——當時已經在共產黨佔領下，是北滿根據地的中心。

原來他準備兩個月就返回天津，但國共兩黨內戰的全面爆發阻斷了交通，使他無法回來了，他革命的第二站又轉回到了他所熟悉的東北黑土地上。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天津抗聯老同志聯誼會：懷念康力
楚雲：中共天津地下組織領導的“抗聯”“青委”的概況
劉保端：劉賓雁在耀華學校
唐寶林：南京解放前後的陳修良
亞衣：民眾永遠是力之所在
劉賓雁：為《紅色紀念碑》所寫的序言

第四章　前車之鑒

東北的《文化報》事件是延安整風以後，共產黨在全國建政前夕發生的最重要的一次“文字獄”，是劉賓雁第一次親歷的政治風暴，也給他補上了“延安整風”的一課。……這次劉賓雁雖然沒有直接被捲進去，但是，如同一個墜地閃電擊中了身邊的人一樣，無疑給了他巨大的震撼

1946 年秋，青年俱樂部部分成員合影。 左二為劉賓雁。

1946 年 9 月—12 月，哈爾濱市政府把前省特別區地方法院的三層小樓撥給民青總部作辦公樓。 一樓是活動場所，二、三樓是宿舍，有 150 多名民青盟員住在這裡，稱聯合宿舍。短短三個多月，這裏是全市青年活動的中心。 劉賓雁與郭永澤、姜洪、張玉琛共住一屋。

1946 年暑假，中共在哈爾濱松花江北岸太陽島舉辦大中學生暑期夏令營，定名為“青年之家”。 青年之家的活動安排豐富多彩，除組織政治時事學習外，還有生動活潑的體育和文娛活動。 它在解放戰爭時期哈爾濱青年運動史上獨佔一頁。 劉賓雁在這裡開始了他在哈爾濱的青年工作。1984 年，哈爾濱團市委請胡耀邦題詞刻石留念。

共產黨的規矩，一個黨員到了一個地方，首先要找到“組織”。賓雁遵守了這個規矩，到了哈爾濱以後，他就積極和當地黨組織聯繫。

當時，哈爾濱正在太陽島搞大型學生暑期活動“青年之家”。賓雁就來到太陽島，認識了組織活動的哈爾濱市學生工作委員會的共產黨員張玉琛、張震。自稱是北京的大學生，暑假回到這裡，要求參加工作，受到他們的歡迎和接納。8 月中旬，成立了“哈爾濱市民主青年聯盟”，劉賓雁黨的關係還沒轉來，被選為副主席。第二年 4 月，“民青”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改稱為“東北民主青年聯盟”，領導北滿和部分南滿地區的青年運動。劉賓雁任主席。他已經成了中共東北青年工作的骨幹了。

賓雁到達哈爾濱的一週後，國共兩黨內戰就爆發了，而且規模不斷擴大，共產黨所佔領的城市張家口、延安和安東（現在叫丹東）相繼失守，哈爾濱成了唯一在共黨手中的大城市，而從滇緬戰場調回的國民黨精銳部隊新一軍已經開始北上進攻松花江，戰火一度燒到離哈爾濱只有 60 公里的雙城縣，哈爾濱實行了森嚴的軍事管制，中共東北局和林彪的部隊已經三次準備退到山區林海中去打遊擊，甚至做好了退到蘇軍佔領下的朝鮮去的打算（當時朝鮮是東北共軍的後勤基地和運轉站），而哈爾濱也人心惶惶，一些商店也開始拒收共產黨所發行的紙幣了。賓雁知道在這種形勢下返回天津已無可能，就向張震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委託他們和天津地下黨聯繫，但沒聯繫上。10 月，當時東北局的青委書記蔣南翔接見了劉賓雁，建議他先辦個臨時重新入黨手續，參加當地黨的工作，等將來和天津地下黨聯繫上了，再恢復原來的黨籍。就這樣，他正

式參加了哈爾濱的工作。

東北地區在長達 14 年的日本佔領時期，基本是國共兩黨的空白區。日本佔領初期，中共和蘇聯支持的“抗日聯軍”進行過一段抵抗，但失敗後大部分就退到蘇聯去編入蘇聯紅軍了，朝鮮的金日成當時就是抗聯周保中部下的一個營長，後來是蘇軍的一個中校，1945 年他是乘著蘇軍的坦克回到平壤的。日本投降後，東北又成了國共兩黨激烈爭奪的關鍵地區。當時東北的老百姓對國共兩黨的瞭解都不多，一般都認為“國軍”是中國合法政府的正統代表，把曾在抗日戰場上浴血奮戰的“國軍”看成是多年引頸期盼而終於盼來的“南師”。而在抗戰中籍籍無名，沒打過一個像樣戰役的共產黨要取得群眾的瞭解和支持，則需要做很多工作。這是劉賓雁當時在青年中的主要工作任務。

工作中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東北群眾對蘇聯紅軍的印象很壞，因此對共產黨也不信任。蘇聯紅軍出兵東北後，雖然只用了十來天的時間就打敗了已成強弩之末的日軍，但軍隊風紀很差，在東北不僅瘋狂拆運工廠機器設備，還在民間到處洗劫財物，強姦婦女，以至東北人提起“老毛子”無不切齒痛恨。賓雁剛一回到哈爾濱就聽到這種說法，開始他不相信，認為是國民黨造謠，在各種場合為同是共產黨領導的蘇軍辯護，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不可能幹壞事。但是，聽到越來越多的群眾控訴，還有人向他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這就讓他不能不相信了。他知道僅僅否認是無效的，於是就說那是蘇軍中的不良分子所為，因為蘇聯戰時兵源缺乏，只好把監獄中的罪犯放出來參軍，壞事都是這些罪犯幹的……其實連他自己也明白，這樣的解釋是很蒼白

無力的，即使他出色的口才也無法使之有說服力。但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只能這樣說——這是他一生中說的為數不多的謊話之一。他在晚年曾有一部未來得及完成的回憶錄《千年泥濘》，其中說到這件事，說自己當時是在為“一件不可能辯護的事件進行辯護”，說了“出於真誠”的謊言。為此，他飲恨終生，並從中記取了教訓——以後永遠不要再說謊話。

如今，真相已經越來越多地被揭露出來了。二戰結束前幾天，蘇軍出兵中國東北其實並沒有遇到多少抵抗，他們戰死的人員還沒有喝醉酒開車失事死的人多，而對中國平民犯下的燒殺搶掠罪行則罄竹難書。連中共二野的重要將領、曾與賀龍一起創建湘鄂川根據地的盧冬生將軍也是被搶劫的蘇軍殺死的（如果他能活到1955年大約能被授予上將銜了。中共“以大局為重”，沒敢聲張，稱其為“因公殉職”）。蘇軍在東歐和德國也犯下了令人髮指的嚴重戰爭罪行，光在德國，被蘇軍強姦和殺害的平民婦女就達幾百萬之多，德國前總統科爾說他的親屬就曾遭到過蘇軍的強暴。南斯拉夫與蘇共交惡的原因之一，就是鐵托和吉拉斯等南聯盟的領導人為了蘇軍的暴行向斯大林提出了抗議。共產主義的紅字招牌並沒有改變俄國人從韃靼金帳汗軍事帝國傳統中繼承下來的野蠻血液，無論是對內殺害幾千萬人的殘酷大清洗，還是對外野蠻的暴力征服和瘋狂掠奪，蘇維埃式的共產主義運動從出生就帶著中世紀的刺鼻馬糞臭和血腥味，鐵木耳的彎刀與狼牙棒才是鐮刀鐵錘標誌的本源。

而中國自從毛澤東宣布對蘇聯“一邊倒”以後，對“老毛子”的任何不敬，都在嚴厲禁止和殘酷打擊之列。直到1957年的反

右運動中，還有多少人只因為說了蘇軍當年的暴行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反右運動中，“反蘇”還是一大罪狀呢，只要有一句對蘇聯不敬的議論，肯定就會被帶上“右派”帽子。可沒過幾年，當毛澤東和鄧小平們從“以俄為師”一下子變成了“以俄為敵”，開始大張旗鼓地“反蘇”時，他們並沒想起來要給因“反蘇”而被他們打成“右派”的人們平反。“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邏輯在“反蘇”問題上貫徹始終。

1947 年初，劉賓雁先是在哈爾濱市學委的學生暑期補習班教務科工作，後到市二中當教導主任。五月，又調到市青年幹部學校當教務科副科長兼學生指導員。青年團成立後，兼任團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主要任務一直是青年思想工作。當時，由於戰場上國民黨軍還處於進攻強勢，學生思想工作很難做，擋不住大批青年向國統區投奔的勢頭。這種情況直到長春解放才扭轉過來。

當時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是非常艱苦的。為了收留無家可歸的流浪青年學生，市學委在原來的偽哈市法院辦了個“聯合宿舍”，免費為他們提供食宿，賓雁就住在那裡。住的是沒有取暖設備的冷房間，冬天裹著圍巾、戴著帽子睡覺，醒來臉上都結了冰霜；吃的是高粱米和清水煮白菜蘿蔔，很少會見到油星。但是，賓雁和他的戰友們工作起來仍然興致勃勃，因為他們心中充滿了希望——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就要誕生了，這是中國共產黨重複千遍的的莊嚴承諾。當時的中共黨報經常發表些鼓舞人心的社論，一方面批判國民黨的獨裁專制、一黨專政和貪汙腐敗；一方面向人民許諾，共產黨絕不會像國民黨一樣，絕不搞一黨專政，絕不會貪汙腐敗，一定要給人民一個自由的、民主的、繁榮的新時代。這個承

諾，博得了包括劉賓雁在內的廣大青年的歡迎，因此他們才忍受著那樣的艱辛，充滿希望地迎接著共產黨的勝利——他萬萬也沒料到這勝利來到後黨是如何兌現這些莊嚴承諾的，更不會料到匯集這些白紙黑字承諾的書《歷史的先聲》有一天會成為“禁書”——共產黨查禁自己當年說過的話，豈非大笑話？

這階段有件事給賓雁留下了教訓：一個姓田的失業青年，主動表示要靠近共產黨，賓雁就相信了他，把發展黨員用的小冊子給他看了，還推薦他到新華分社工作。後來發現他腳踩兩隻船，已經和國民黨特務暗地聯繫，新華分社就把他清除了。為此，劉賓雁在 1947 年的整黨中受到批判。他說，自己又犯了容易輕信人的錯誤——他總是把人往好處想，對人沒有提防之心。還好，這事並沒有釀成大禍。

賓雁晚年自我總結，說輕信人是自己一生沒有改掉的毛病，直到晚年流亡海外，還不只一次輕信了那些口頭激進，但別有所圖的人。不過——他說，他犯下的最大輕信錯誤不是對人，而是對這個黨。

當時，他曾跟著蔣南翔參加過哈爾濱市郊區的土改。一進村，他就被“暴力土改”的景象震住了：工作隊為了讓一個只有十幾畝土地的地主交出槍支和浮財，就把他吊起來毒打，直打得血肉模糊，也沒發現槍支和浮財，只搜出一堆破棉絮。這是賓雁第一次看到肉刑，感到驚心動魄，只好躲到一邊，不敢吭氣。後來才明白，每個村都要找出一個“鬥爭對象”，殺一儆百，以便“發動群眾”，這是共產黨的老辦法。

分浮財的時候，賓雁參加了。哪有什麼像樣的東西，只有一堆

日常的皮襖、被褥和農具，最值錢的是一個座鐘。發放時，農民們也沒什麼欣喜之色，而賓雁自己則心情沮喪，像是在做虧心事，感到無地自容。這就是“革命”？這就是“正義”？怎麼和他從小向往的那種神聖而純潔的革命有天壤之別？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但不應該是骯髒的啊。他發現自己真的缺少黨所提倡的那種“革命激情”和“階級感情”。

這種價值觀的衝突一直伴隨著他所參加的所有政治運動——土改只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的開始，在以後的 30 多年中，這樣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有五六十次，平均每年有兩次多。運動一來，總是周而復始地重複著這種暴行：瘋狂的煽動，蠻橫的批判，粗野的謾罵，無情的鬥爭，殘酷的肉刑，血腥的死亡，對人的尊嚴的蔑視，對生命的踐踏，這是他始終所無法接受和無動於衷的——直到他自己也變成了運動的對象。一般中國人對此似乎已經司空見慣，習慣性地麻木了，但劉賓雁的悲劇在於他總也不能對這種野蠻和血腥安之若素，更不能甘之如飴。

為了寫這部傳記，筆者採訪過當時和劉賓雁一起在哈爾濱團市委工作的郭永澤，劉賓雁任民主青年聯盟主席時，郭任副主席，他回憶那段經歷時說，賓雁那時就比別人更愛思考，經常把自己的困惑在私下裡探討，還和大家一起大量地讀書，希望在書中找到答案。他說，他們那時的思考和探索，最後導致了相同的結果——和賓雁思想接近的五六個人，在 1957 年都成了“右派分子”，無一例外。共產黨需要的是馴服的工具，而不是能獨立思考的人。凡是喜歡獨立思考的人，遲早都要成為異端，被黨的無情履帶碾碎。

劉賓雁在哈爾濱的同事和朋友有個共同的印象：他身上總有

些和別人不同的異樣色彩。比如，他喜歡穿整潔的西裝和色彩鮮艷的襯衣，喜歡邊走路邊唱歌，還喜歡捧著大部頭的俄文書看，這讓他在那些從延安過來的，穿著土布麻鞋的“老革命”們之中顯得格外刺眼，而他卻不以為過，依然故我；別人看不順眼，卻也無話可說。最多半開玩笑地說句“小資產階級情調”或“沒落貴族作風”。平時這些生活細節似乎也無傷大雅，但是運動一來，往往成了招禍之由——當時賓雁還沒嚐到這厲害。

心無芥蒂的賓雁對延安來的“老革命”們其實是蠻尊重的。抗戰結束後，為了搶佔東北，中共從華北、華東和西北根據地緊急調遣了二十萬軍政人員，日夜兼程、十萬火急地趕往東北。賓雁在哈爾濱接觸的大部分不是軍人，而是文職幹部，但這些文職幹部也已經習慣於軍事化的生活了。賓雁首先看到了他們身上那些優點：生活簡樸，兩袖清風，待人態度平易，沒有官架子，工作十分投入，和中國傳統的舊官場有巨大的反差，這些，他是由衷敬佩的。但是，對所有人都穿一樣的制服，操一個腔調說相同的話，按隊列條令站立行走，抹殺任何個性的斯巴達式“社會軍事化”，他又像對日本人的軍訓一樣，有一種本能的反感，因為這與他骨子裡的自由主義追求水火不容。賓雁在穿裝打扮和行為舉止上的特立獨行，雖然不是有意為之，但實際上是潛意識中的一種反抗。兩千多年前的屈原夫子“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就是一個先例。後來，賓雁對劉少奇在《修養》一書中提倡的“馴服工具論”和雷鋒提出的“螺絲釘論”，也同樣反感。沒有了個人的思想自由，還有人的尊嚴嗎？

真正使賓雁震驚的是“延安整風”的真相。由於入伙較晚，他

並沒有經歷這次黨內和根據地內的大運動，只是學習過一些重要的整風文獻，如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反對黨八股》和《改造我們的學習》之類。他以為，那次運動是和風細雨的學習和討論，是正常的思想教育。但是，和延安來的幹部相處時間長了，從他們的片言隻語和奇怪的行為方式上，他似乎看出了些門道：延安整風可絕不是溫馨的和風細雨，而是一場電閃雷鳴的狂暴颶風。

劉賓雁注意到，提起延安整風那些經歷過的人似乎都談虎色變、心有餘悸，往往是吞吞吐吐，說了半句就轉移話題。過後臉上總現出凝重的愁容，好像勾起了沉重的往事。從他們欲說還休的半句話中，賓雁聽到了“搶救運動”一類整風文獻中所沒有的名詞，還有“關牢房”、“槍斃”等恐怖的話頭。賓雁在圖書室裡經常看到一個奇怪的人，那是個從延安來的青年，比賓雁年齡大不了多少。他從不說話，來去都悄無聲息，如同飄過的鬼影。有一次，閱覽室已經過了關門的時間，可這個人仍然抱著報紙在看，絲毫沒有要走的意思。賓雁就上前勸他明天再來看。不料此人突然暴跳如雷，指著賓雁的鼻子大喝道：“你神氣什麼？亡國奴！”這才有人告訴賓雁，別跟他計較，此人在延安整風時被整成精神病了。整風後，這些已成廢人的包袱，被分散到各根據地，由各地自行消化……

這讓賓雁感到毛骨悚然，髮梢上指——怎麼會這樣？在革命隊伍裡，在革命同志之間，怎麼會有你死我活的“思想鬥爭”，怎麼會有冤獄、酷刑和殺戮？當時，沒有一個人敢把延安整風的全部真相告訴賓雁，他也還不知道作家王實味這株“野百合花”早已成了無頭冤鬼（和王實味同時在山西臨縣黃河邊被被邊區保衛處砍頭的

幹部有 100 多名），但他已經從那些“老延安”們身上依稀感受到“延安整風”的恐怖陰影。“延安整風”對他始終是個猜不透的謎。

當時，還有一個人特別吸引了賓雁的注意，那就是著名作家蕭軍。 在上個世紀 30 年代，中國左翼文壇上曾出現一個引人矚目的“東北作家群”，其領軍者就是蕭軍，麾下有蕭紅、端木蕻良、舒群、駱賓基等將近 20 名作家。 其中將近半數曾生活在哈爾濱。他們的作品關注底層人民的極端貧窮和苦難，具有濃郁的東北地方色彩，也反映了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對中國左翼作家運動產生過很大影響。 他們大都有一個共同點：深受俄羅斯進步文學的影響，把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理論作為自己的壓艙石。 在劉賓雁少年時代剛剛踏入文學之門時，他們已經是名滿全國的著名作家了，而賓雁只是他們的熱心讀者和仰慕者。

1946 年，當賓雁在哈爾濱民主青年聯盟工作時，驚喜地發現他從小崇拜的大作家蕭軍就在自己的身邊。 原來，“九一八”以後，蕭軍在東北參加過一段抗日反滿鬥爭，失敗後逃到了青島和上海，在那裡完成了他的名作《八月的鄉村》，受到魯迅和中共的文壇領袖周揚、胡喬木的讚揚（但是後來在批判“國防文學”時，又點名批判了他）。1940 年 6 月，蕭軍正式來到延安，在魯迅研究會工作，1946 年隨著搶佔東北的大軍回到了哈爾濱。 這時的蕭軍雖然已在延安整風中被剝了一層皮，但風采依舊，他因為堅持自由主義立場，曾與王實味一起在延安被當成重點批判的對象，但这位傲骨錚錚、頗有豪俠之氣的東北漢子卻沒有服氣認錯，還膽敢站上講台為

王實味辯護。

那是 1942 年 12 月 19 日的事，蕭軍在紀念魯迅逝世六週年的大會上為王實味鳴不平，遭到一群作家的圍攻，一直辯論到凌晨兩點，蕭軍感到累了，就說：“這樣吧，我先檢討檢討，99％算我的錯，行不行？那 1％呢，你們也想一想……”不料丁玲站起來說：“這 1％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 100％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少了你一個蕭軍，不過是九牛一毛。”蕭軍大怒，說：“那好吧，我這個毛絕不去依附你那個牛，你那個牛也別來沾我這個毛，今後咱們就他媽的拉蛋倒！”說完，他拂袖而去。 為此，蕭軍被罰停止吃“公糧”，他就自己去種了一小片地，始終沒有屈服。

這次讓他到東北來並非重用，而是像對那個精神病人一樣，交由地方“消化”。 鑒於他是著名作家，在東北廣有影響，對共產黨還有利用價值，當時給了他一個東北作家協會主席的名頭，讓他担任了东北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的院长，還由東北局撥出一筆專款，以他的名義辦了個“魯迅文化出版社”，讓他兼任《文化報》的主编。 名頭不少，但他其實沒有什麼實權，只能寫點文章，當個招牌而已。

賓雁當時也在主編一張小報《學生導報》，在蕭軍來到哈爾濱的歡迎會上見到了這位名作家，回來就寫信向蕭軍約稿，蕭軍爽快地答應了，並按時寫出來。 賓雁到“魯迅文化出版社”的小樓上取稿時終於有機會單獨會見了這位慕名已久的作家。 蕭軍回到哈爾濱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他還沒站穩腳，就應邀到學校、機關連續做了幾十次演講，受到熱烈歡迎。 文學青年們都希望親眼目睹這

位有傳奇色彩的大作家的風采，賓雁也是如此，為見到蕭軍而激動不已。他沒想到，蕭軍對他這個當時還無名的小青年十分熱情，一點也沒大作家的架子，讓賓雁感到非常親切，於是說起話來也就沒什麼拘束了。賓雁問起了在延安整風中他的遭遇，蕭軍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過去了，都過去了……”然後哈哈一笑，說他現在最關心的只是寫好自己的下一部作品……

直到 50 年後，賓雁讀了韋君宜的《思痛錄》和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劉賓雁對高華的這本書評價甚高，說“價值無量”）才算瞭解了延安整風的真實過程和全部真相，終於理解了蕭軍當時的困境和苦衷，也知道了那些延安整風的幸存者們何以會談虎色變，吞吞吐吐。1945 年底，從延安步行來到東北的 200 多名文化幹部中，有一多半人曾在“搶救運動”中被“搶救”過，並帶著“辮子”，不甚清白地離開了延安。

至於蕭軍所說的“過去了”，卻是個一廂情願的幻想——不到一年後就發生了驚動毛澤東、震動全國的《文化報》事件，使他再次蒙難遭劫。事實證明，延安整風並沒有結束，那只是一次小規模的預演，共產黨進城後，以延安整風為範本的政治運動一波接著一波，一浪高過一浪，規模越來越大，最後演變成 1957 年的“反右”和 1966 年的“文革”，覆蓋了整個國土，危及了全國人民，特別是所有知識分子。直到現在，“延安整風”還是共黨意識形態武庫裡的“殺手鐧”，隨時可以拿出來揮舞一下，以其寒光和殺機震懾人心。讓這一切都成為“過去了”，恐怕還遙遙無期呢！

1948 年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年。國共兩黨間的決戰（三大戰役）相繼展開，被蘇聯用繳獲的日本武庫武裝起來的中共大軍几

乎在一夜之間取得了壓倒優勢，林彪指揮的第四野戰軍在遼沈戰場首先告捷，整個東北成了共產黨的天下，這是內戰的轉折點。從此，共軍並以此為依托，迅速揮師南下，橫掃中國。攻克沈陽後，東北的政治中心從哈爾濱轉移到了沈陽。賓雁隨著中共東北局的機關乘專列南下來到戰火硝煙尚未散盡的沈陽。

在沈陽，他主持過“青年學團”，負責大戰後青年學生的安置和政治教育工作，後來又擔任了東北青年團委宣傳部的教育科長，兼職負責編輯《東北日報》的副刊《東北青年》。

很奇怪的是，在沈陽的團委中還有一個蘇聯人，姓斯維里扎克，他表面上的職務是負責保衛工作，主要是監視在東北的“白俄”，實際上顯然是個蘇聯情報局的間諜，任務包括對中共的監督。在哈爾濱時賓雁就和他打過交道，原因是當時蕭軍主編的《文化報》上曾發表過一篇短文，題目是《來而不往非禮也》，說的是一個小孩，路過俄國人的住宅，向裡面扔了一塊石頭，以報復俄國人的歧視。這篇小文誰也沒有在意，沒當回事，但是，這位斯維里扎克卻突然找到賓雁，認真地打聽這篇文章的“幕後背景”，顯然蘇聯人是懷疑中共有反蘇的苗頭了。而賓雁的回答是，他不知道，也看不出這篇小文章有什么深意和大背景。

劉賓雁沒想到，《文化報》上這篇小短文後來竟發展為一個大事件。導致東北作家協會主席兼《文化報》的主編蕭軍遭到五雷轟頂般的打擊。蕭軍的主要“罪狀”是他曾為該報寫的一篇社論中用的一個詞，全句如下：

今年的“八一五”就是標誌着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就要戰

勝我們內在的最兇殘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和他的匪幫的決定性的契機。同時也將是各色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最後從中國土地上撤回他們的血爪的時日。

這句話很難看出有什么毛病，但當時的报纸上突然刊出了東北局宣傳部的負責人親自署名批判蕭軍的文章，把矛头指向“各色帝國主義”一詞，说這暗指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而旁證就是那篇短文《來而不往非禮也》。大批判之後公布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和“東北文藝協會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給蕭軍的定性是“反蘇、反毛澤東、反人民”，將其撤職並逐出文壇，從此打入十八層地獄。這種斷章取義、毫無邏輯的構陷加罪方式讓劉賓雁震驚得目瞪口呆。而批判文章的署名人地位之高，又說明了來頭不小。後來傳出消息，這次大批判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袖毛澤東親自過問並批示了的。

蕭軍的“反蘇”就為那麼一個可作各種解釋的詞（十幾年後，說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可是中共的經典語言和正式用法），而“反毛澤東”則是個笑話。文人的狂放不羈，桀驁不馴在蕭軍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第一次路過延安是在 1938 年，當時丁玲向毛澤東報告說蕭軍來了，毛興衝衝地準備接見這位魯迅都敬重的全國著名作家，但得到的回答是淡淡的一句：“不見了，他挺忙的，我只是過路，住一兩個星期就走。”全無受寵若驚的媚態，這讓毛澤東很沒面子。他還說過一句“狂言”：“魯迅是我的父輩，毛澤東只能算是我的大哥。”對此，說蕭軍狂妄，賓雁尚可接受，但說這是“反毛”顯然過分了。由此賓雁第一次對毛澤東的人格產生了懷

疑。他推測，正在冉冉升起的“紅太陽”對蕭軍的輕蔑怕是早就耿耿於懷，忍無可忍了。所以延安整風時就重點收拾了蕭軍一次，但好像並沒解恨，這次在整風中找到了機會，自然要狠整他一下了。這還不算完，事隔十年後的 1958 年，《文藝報》還重炒剩飯，又搞了一次“再批判”，把已經打成“右派”的蕭軍與丁玲、艾青、羅烽、王實味、胡風等人綁在一起，重新鞭撻一番，這恐怕也是在為毛澤東出氣。“文革”中，蕭軍被關押獄中整整十年。然而，奇跡出現了：倔強剛烈的蕭軍雖然三番五次挨整，居然沒有被整死，也沒有被整服。他頑強地活到“文革”以後，終於等到了給他徹底平反的那一天。他的文人風骨成了一個可上《世說新語》，與阮籍、嵇康相媲美的現代傳奇。蕭軍在上海為維護魯迅的聲譽而怒打張春橋的俠肝義膽，敢於不亢不卑地平視毛澤東的人格尊嚴，和在哈爾濱對批判他的人說“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頓飯，少睡一個鐘頭覺，我都佩服你”的硬漢精神，一直被賓雁所景仰。這是他一生最敬重的文學先輩，也是他做人的楷模。

1988 年 6 月 22 日蕭軍在北京去世，享年 81 歲。這時，賓雁已經第二次被開除了黨籍，他是在法國和德國講學時聽到這個噩耗的，深為自己不能回去參加蕭軍的葬禮而遺憾——當時他並沒有想到自己已經永遠不能踏上自己國家的土地了。

東北的《文化報》事件是延安整風以後，共產黨在全國建政前夕發生的最重要的一次“文字獄”，是劉賓雁第一次親歷的政治風暴，也給他補上了“延安整風”的一課。這實際上是後來一系列以整肅知識分子為目標的政治運動（如批《武訓傳》、批“胡風集團”、批《紅樓夢研究》、批丁玲陳企霞集團、乃至“反右”運動和

“文化大革命”）的先聲和明確信號。這次劉賓雁雖然沒有直接被捲進去，但是，如同一個墜地閃電擊中了身邊的人一樣，無疑給了他巨大的震撼。

蕭軍事件很快就過去，並被人們淡忘了。人們的注意力被大軍南下頻傳的捷報和天安門前的開國大典所吸引。但是，在賓雁心頭一直有個問號：當時，在哈爾濱發生的這件事是如何會傳到遠在西柏坡的毛澤東的耳朵裡？無非是兩種可能：一是蘇聯間諜斯維里扎克的秘密報告通過斯大林轉交了毛澤東，二是毛澤東安插在蕭軍身邊的線人告的密狀。他想，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吧，否則不會引起毛澤東的如此震怒。

這樣一來，賓雁就比別人更早地接觸到了一個決定中國命運的大秘密：中蘇關係問題。單純用毛澤東和蕭軍的個人恩怨和思想分野來解釋《文化報》事件是遠遠不夠的。劉賓雁所認識的蘇聯間諜斯維里扎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使他無意中窺見了中蘇兩黨微妙關係之一斑——“老大哥”時刻在監視著“小兄弟”的一舉一動，毛澤東背後還有個留著八字鬍的大老闆，中國共產黨其實只是斯大林世界戰略中的一個棋子。斯大林皺皺眉頭，毛澤東當然要有所舉動，整肅蕭軍既是毛澤東的宿怨發作，更是給斯大林看的政治姿態。1948 年大張旗鼓地處理《文化報》事件，狠狠處理蕭軍，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一次效忠表演，其目的是要做出一個姿態，放出一個信號，讓斯大林知道自己的忠誠無二，以徹底打消斯大林的懷疑，並博得這位小鬍子“慈父”的信任。

這個發現對劉賓雁思想的發展有重大意義。整個 20 世紀中國的歷史有一個無法刪除也無法迴避的蘇俄背景，幾乎所有重大

的事件，如中共的建黨、國共合作、北伐戰爭、國共交惡，以及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戰後的國共內戰，直到中共建國建政和“抗美援朝”戰爭等等，背後都有蘇俄的龐大陰影，蘇俄始終是對中國命運發生最大影響的“境外反華力量”，而中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這股境外力量的工具。後來雖然中蘇兩黨翻臉了，但蘇聯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中國的影響一直都沒有消失。如今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了，但它的幽靈仍然在中國大地上徘徊，那個消失的紅色帝國在中國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替身。當今中共最喜歡用的詞是“具有中國特色”，然而仔細深究，這個所謂“中國特色”其實絕大多數是來自蘇俄模式的“山寨版”。誰要是離開了這一大背景研究中國問題，目光只局限在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事情，而不去追索境外的原因，就永遠也不能把中國現代史的來龍去脈說清楚。由於看上去是偶然的機緣，賓雁較早地接觸到了這個秘密，後來又不斷增加新的瞭解機會，這使他對中共和中國現代史的認識比一般人要早得多，深刻得多。

回憶起在沈陽的日子，賓雁只用一個字：忙。隨著戰爭勝利者的行列，回到自己小時曾生活過的城市，他似乎沒有多少機會享受勝利的歡樂，馬上就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了。而在蕭軍事件的陰影籠罩下，解放軍向全國大進軍的凱歌，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禮炮，似乎都沒有使他多麼興奮。他自我解釋說，這可能是因為他已久在解放區，沒有剛剛解放的那種新鮮感了。其實是有片陰雲藏在他的心底裡：他會不會重蹈蕭軍的覆轍呢，誰知道將來還有多少類似的政治風暴啊！

表面來看，賓雁的命運似乎順風順水，風光明麗：

1949 年 7 月，他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青年聯歡節。來往的途中都在莫斯科停留過，這是他一生四次訪蘇中的第一次。那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他就是在莫斯科聽到的。中國革命的高歌猛進使中國青年代表成了世界青年聯歡節的主角，中國代表團的出現總能引來熱烈的掌聲和經久不息的歡呼，賓雁也分享了一份榮耀。

但是，這次路過蘇聯，也使他發現了蘇聯當時的貧困：在列車的餐車上用餐時，他看到蘇聯乘客都被關在餐車之外，原來供應給他們的食品與給外國人的是不同的，蘇聯人只能得到三個雞蛋和一塊黃油，而外國人是不限制的。賓雁當時以為這是不久前剛結束的戰爭造成的。可是後來去得多了，他才知道這在蘇聯是常態，由於斯大林把戰爭所倚重的重工業放在首位，而把民生所依靠的輕工業放在末位，蘇聯人民的生活供應一直是短缺的。後來這種情況在全面複印蘇聯模式的中國也重演了。

他還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訪問中結識的人，不管相處多麼愉快，臨分手時是絕不留聯繫方式的。後來，他才明白這是為什麼——有國外聯繫是很危險的，即使和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人來往也不例外。渾身長滿眼睛的“克格勃”盯著每一個人，監視著他們的一言一行，使每一個笑臉背後藏著的都是恐懼，深入骨髓的恐懼，而中國在這方面很快也要變得有過之而無不及了，“有海外關係”這一條就足以使人被打入“另冊”，成為重點監控的對象和不得重用的可疑分子。

1950 年，天津把他的組織關係轉到了沈陽。新的工作崗位在

等待著他，這個當年失學無業的街頭漂泊者又要回到北京了，雖然他這時才剛剛邁入 26 歲，但身份已是參加革命七年、黨齡六年的高級幹部了。 在一般人看來，以他的年富力強、革命資歷和過人才華，應該在新建共和國的首都大顯身手。

但是，誰知道等著他的是什麼呢……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朱鴻召：延安文人

張毓茂：蕭軍與《文化報》事件

笑蜀：歷史的先聲

韋君宜：思痛錄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劉賓雁與朱洪的結婚照，攝於 1951 年 10 月。

第五章　風起青萍

顯微鏡下無偉大，打碎偶像的過程是從接近他開始的。只要離得足夠近，看得足夠多，再鐵杆的迷信者在瞭解了真相後，最終總會拋棄偶像的——劉賓雁其實已經踏上了這一過程。 當然，逆定理也成立：為了使偶像不被打碎，竅門就是要讓崇拜者永遠停留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距離，讓偶像立在高高的神秘雲端之上，一切偶像的製造者都精通此術，古今皆同

在斯大林出生的故居前，劉賓雁與朱洪沐浴著陽光，從心底溢出幸福的笑容。或許正是因為有過被騙的經歷，他才將追尋真相作為畢生的使命。

1956 年，劉賓雁和同事討論為《中國青年報》改刊設計版面。

1950 年冬，熱戀中的劉賓雁和朱洪在斯大林格勒的戰爭廢墟前合影。

在孩子們眼中，他是最好的爸爸。攝於 1955 年春。

劉賓雁（右）訪問蘇聯時和孩子們合影。

劉賓雁 50 年代翻譯的蘇聯青少年文學作品。

50 年代，劉賓雁翻譯的蘇聯青年工作經驗叢書。

如今已經公開的大量歷史資料說明，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中國的命運還有兩種選擇的可能：

一種選擇是在外交上以抗戰期間真正給予中國無私援助的美國繼續為友，融入戰後形成的國際大家庭：與戰時的盟國一起繼續發揮世界大國的作用，維護世界和平，並順章成理地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接替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地位；在國內兌現在抗戰中和國共兩黨談判期間許下的莊嚴諾言，實行憲政，實現民主，不搞一黨專政，走上自由、民主和法制的真正共和之路。這一選擇的國際條件當時已經出現，美國已經準備接受中共取得內戰勝利的現實，一直沒有撤回設在南京的大使館，大使司徒雷登等待著與勝利者接觸。在朝鮮戰爭爆發前，1950 年 1 月 5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說：“美國對台灣和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現在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打算動用其武裝力量干涉目前形勢。美國政府不會走一條導致其介入中國內部衝突的道路。美國同樣不會給福摩薩（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出謀劃策。”一周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於 1 月 12 日在宣布美國的亞洲政策時聲明：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防禦圈“不包括台灣和南韓”，甚至說：“事情顯然很清楚，沒有人能夠確保這些地區不遭受軍事進攻。”他們向剛剛成立三個月的中共新政權傳遞了明確的信號：即使解放軍渡海發動解放台灣戰役，美國也不準備干涉，而把這視為中國內政。與此同時，英國和法國都表示要承認中共政權，並準備建立外交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杜魯門和艾奇遜發表這些重要聲明的時候，毛澤東正在莫斯科和斯大林就結成戰略同盟關係舉行艱難的談判。這說明，當

時通往美國和西方的大門並沒有關閉，如果走了這條路，中國和世界後來的歷史會是另一個樣子，起碼中美建交不用等到 20 多年後。然而，一場朝鮮戰爭使這一切都改變了。

另一種選擇是與蘇聯結盟，加入剛剛形成的以蘇聯為盟主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已經開始的“冷戰”中完全倒向蘇聯，以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為敵，把中國綁在蘇聯的戰車上，準備通過第三次世界大戰實現斯大林的全球共產主義戰略——這不是妄猜，也不是秘密，斯大林 1946 年 2 月 9 日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就公開宣布了這一戰略，他說：“共產主義同資本主義是互不相容的，另一場戰爭不可避免。”他甚至預測這場大戰將在 20 世紀 50 年代爆發。他接著把臉轉向身邊的莫洛托夫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把一個國家從資本主義的奴役之下解放了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建立了社會主義體系，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永遠地消滅帝國主義。”在結語中，他再次“豪邁地”宣布：“我們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並結束它！”這些話語幾代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從小就不斷聽說過，直到現在還有人在重複，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版權屬於斯大林。斯大林的這個演講震驚了全世界，被稱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戰書”。在這以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1946 年 3 月 5 日丘吉爾針對斯大林的戰爭叫囂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這兩個針鋒相對的話語對抗被認為是將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時代的開始——而結束是以柏林牆倒塌為標誌。經過一段時間的猶豫和反復掂量，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終於選擇了這後一種方略。這是中共的思想、理論、組織淵源和長期依靠並追隨蘇共的歷史慣性所決定的必然，也是毛澤東個人的決策。

“一邊倒”的決定是毛澤東 1949 年 6 月 30 日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正式宣布的。這是一次私生子的“認祖歸宗”公告，也是一紙毫無廉恥的賣身宣言（在這一年的 12 月 21 日致斯大林 70 壽辰的賀電中，毛澤東乾脆把斯大林稱為“我們最偉大的慈父與導師”），等於無所遮掩地向世界宣告，中共和中國革命是蘇共和蘇聯共產革命的血緣嫡親和繼承人，從而杜絕了選擇其他發展道路的可能。這一決策使中國的歷史滑向了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直到今天還掙扎其中而不能自拔。

其實，斯大林和蘇聯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中共和毛澤東是有疑慮的，蘇聯派往延安的戰略特務、共產國際觀察員彼得·巴菲洛維奇·弗拉基米诺夫（在延安用了個中文化名“孫平”）一直向斯大林匯報，毛澤東是個“反共產國際的農民領袖，一個新興的獨裁者。他為了攫取權力，不擇手段，不受道德約束”。特別是在南斯拉夫的鐵托背離斯大林以後，更是懷疑毛澤東也是個民族主義者。弗拉基米諾夫的《延安日記》說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是民族主義者，兩人的區別在於“一個是在重慶公開這樣幹，但至少他還在抗拒外國侵略，而另一個卻根本不考慮自己國家的榮譽和苦難”。劉賓雁當年第一次隨訪問團去蘇聯，在火車上曾與一位蘇聯中年農婦聊天，那個婦女就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會不會成為第二個南斯拉夫？毛澤東是不是第二個鐵托？”賓雁當時大吃一驚。連一個農婦都這樣想，可見這種疑慮在蘇聯上下是多麼普遍。

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決定由 1950 年 2 月 14 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法律化了。據中蘇關係專家沈志華研究，這一結果也有不在場的美國因素在發揮

作用。原來谈判刚开始时斯大林提出了更為苛刻的條件，要維持蘇聯對中東鐵路的控制，要長期佔領通往太平洋的不凍港旅順、大連（這是俄羅斯人的百年夢想），這與中方能接受的條件相距甚遠。但在簽約前兩天，斯大林突然急劇轉變，對中方做出了較大讓步，同意交還中東鐵路和旅大港，其主要原因是美國這時發表了杜魯門和艾奇遜關於不介入中國內戰的重要講話，對中共表示了善意。斯大林怕一旦談判破裂，中國會接過美國投來的橄欖枝，和美國建立友好關係，那樣一來，斯大林的全球戰略就要破產了。這一條約的簽訂使斯大林的世界戰略在亞洲得到了一個重要的支點，也使中國徹底被綁上了蘇聯的戰車，從而失去了一個歷史性選擇的機遇。從此，中國國內開始了一場“全盤蘇化”運動，而在國際上則成為推行斯大林全球戰略的急先鋒——這年的 6 月 25 日，金日成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指揮朝鮮人民軍全線越過三八線向南韓進攻。關於朝鮮戰爭的起因，中國官方多年來一直堅持說是韓國軍隊在美國的支持下越過三八線北進引起的。到上個世紀 80 年代，官方說法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1986 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中關於朝鮮戰爭的注釋，說法已有所不同了，只說“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鮮戰爭爆發”，而不說戰爭是誰發動的。同年 10 月 25 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正式參戰。朝鮮戰爭的爆發和中國的參戰，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直接結果。斯大林並不相信條約的一紙空文，而要中國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入夥”的誠意，就像投奔水泊梁山要提著一個人頭當“見面禮”一樣，毛澤東中國加入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典，將以付出幾十萬“志願軍”的鮮血與生命，並賭上國家未來為代價。這

確實是毛澤東押上全部家當的一場豪賭，當中國人的鮮血在朝鮮土地上橫流時，斯大林對這個新入夥的嘍囉才算放心了。但這場陰謀結下的苦果（三代世襲的金家王朝只是其中之一）中國人至今還在品嚐。

中國的志願軍唱著“雄赳赳，氣昂昂”的戰歌跨過鴨綠江大橋的這一天，劉賓雁正在開往莫斯科的火車上。

劉賓雁奉召前往的原因，也和中國決定“一邊倒”有關，剛剛成立的團中央（當時還不叫“共產主義青年團”，而叫“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準備辦一份團報《中國青年報》，還要辦一份給少年兒童看的《中國少年報》，成立了一個籌備組。籌備工作的第一項要務就是到蘇聯去，學習“老大哥”辦青少年報紙的經驗。

毛澤東宣布的“一邊倒”不僅是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也是中國內政和社會發展路徑的選擇。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原來有一個設想，在取得政權後要經歷一個“新民主主義”時期，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實行“新資本主義”的政策，以恢復和發展經濟。這一方針以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成了建國初期的法定目標。但是，“倒向蘇聯”的選擇導致墨跡未乾的《共同綱領》被拋到一邊，在全中國出現了一個有點喜劇色彩的“全盤蘇化”的狂潮，這是那個時代的一大特色。

毛澤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目標，一下跳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模式了（這導致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理論分歧，劉還在不識時務地堅持七大決定的“新民主主義建國大綱”），一切均以蘇聯為範式照貓畫虎，不僅政治上要實行蘇聯式的一黨專政，經濟要全盤學蘇聯的“計劃經濟”，連形式上也跟著蘇聯亦步亦

趨：黨旗繼續沿用版權屬於蘇共的鐮刀鐵錘，國旗要和蘇聯一樣用血色染透，再在上端留下幾星帝王壟斷的明黃色——歷史將證明，這種色彩選擇頗有預言意味；軍裝是完全的仿蘇式，包括軍官的大蓋帽和士兵頭上歪戴的“牛比帽”，街頭時裝流行“列寧裝”，從蘇聯進口的俄羅斯圖案花布成了搶手貨，女人穿的俄式連衣裙直接從俄語音譯過來叫“布拉吉”，全國中學的外語課大多用俄語取代了英語，人們見面互稱“達瓦力士（俄語“同志”）”是一大時髦，名字若叫“卓婭”和“舒拉”，肯定是那時候生的。那時的中國青少年崇拜的偶像是卓婭、舒拉和馬特洛索夫等大鼻子的外國戰士，當時人們能讀到的外國讀物大多是俄羅斯和蘇聯的作品。賓雁所參加的中國青年代表團訪蘇回來不久，“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也學著蘇聯的樣子改名叫“共產主義青年團”了，至於 1954 年頒布的中共第一部憲法簡直就是蘇聯憲法的翻版——就差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改名為“最高蘇維埃”，因為那個俄文音譯的詞實在太令人費解了。

這就難怪後來胡錦濤以國家主席和黨的總書記身份訪問俄羅斯時對記者說，自己少年時代最喜愛的俄國文學作品是《卓婭與舒拉的故事》——嚴格地講，那根本不是“文學作品”，而是像《雷鋒的故事》一樣的政治宣傳小冊子，拿這種劣等宣傳品代表博大精深的俄羅斯文學，無疑是鬧了個大笑話，足以說明這位在 50 年代成長起來的黨魁在思想文化來源上是多麼單薄和可憐。新科總書記習某似乎比他有了點進步，首次訪俄時也說自己是俄羅斯文學的熱愛者，他還列舉了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訶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一系

列作家的作品，說得有模有樣，不過他把斯大林時期的政治宣傳樣板書——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算在其中，新華社在發稿時將奧斯特洛夫斯基刪掉了，這引起了一場小風波。由此，聯繫到他說蘇聯解體時“更無一人是男兒”，也露出了他深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馬腳。對此，網上有句很幽默的評論：“人家早就不保爾了，可我們還在柯察金。”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死後的安葬日，則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隆重的國喪日，筆者當時雖是小學生卻也記憶猶新：那天全國下半旗，所有汽笛（包括防空警報和行駛在路上的火車、港口的輪船）一齊拉響，聲震天地，久久迴盪。據報導，在朝鮮戰場上所有的中國大炮同時齊射，國內所有的人不管在幹什麼，都同時停止工作和行動，在路邊佇立誌哀，很多人都搥胸頓足，嚎啕大哭，痛不欲生，向那位遠在天邊、從未謀面的外國小鬍子“慈父”表達自己的孝心。其規模和隆重程度只有 1976 年毛澤東的葬禮可與之相比。

顯微鏡下無偉大，打碎偶像的過程是從接近他開始的。只要離得足夠近，看得足夠多，再鐵杆的迷信者在瞭解了真相後，最終總會拋棄偶像的——劉賓雁其實已經踏上了這一過程。當然，逆定理也成立：為了使偶像不被打碎，竅門就是要讓崇拜者永遠停留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距離，讓偶像立在高高的神秘雲端之上，一切偶像的製造者都精通此術，古今皆同。

中國青年代表團是中蘇結盟後派往蘇聯的第一個“民間”代表團。團長是時任團中央書記的馮文彬，此公從延安時期就主管青年工作，是團中央首任書記，比胡耀邦還早。胡耀邦當政時曾

讓他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但他只幹了三個月，就因犯了一個無法言說的錯誤而被免職了，那是後話；全團共 47 人，劉賓雁是其中之一。團中有幾個新聞工作者，張黎群是未來的《中國青年報》的首任總編輯，而兒童讀物編輯、上海姑娘朱洪則是《中國少年報》的主要籌備人。賓雁能列名其中，是因為在全國的青年團幹部中，有革命資歷，又精通俄語的人才很難找，而初露頭角的賓雁俄語不錯，有青少年工作經驗，還辦過報紙，就成了最佳人選之一，當時給他的任務是為中國青年代表團當俄語翻譯。這次訪蘇從 1950 年 10 月 20 日到來年 1 月 14 日，時間很長，旅途也很長。劉賓雁跟著張黎群和朱洪訪問了《共青團真理報》和《少年真理報》，詳細地瞭解蘇聯的共青團報紙是如何辦的。

像是為了證明劉賓雁與俄羅斯注定有不解之緣，此次蘇聯之行，為他定下了兩樁“終身大事”：一是決定了他回國後就調入《中國青年報》，從此成為終身的職業新聞人；二是通過和朱洪的親密接觸，雙雙墜入情網，當時賓雁 25 歲，朱洪 21 歲，不久他們就成了終生伴侶。

年輕的劉賓雁當時面臨著空前多的選擇機會，想當官的話，他已經擁有了進入“高幹”行列的革命資歷，青年團又明言是黨的後備軍和人才庫，再加上他有文化、懂外語、要文才有文才，要口才有口才，在以“大老粗”為主體的幹部隊伍中，可謂鳳毛麟角，出類拔萃。而共產黨剛剛進城，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到處都需要人才，以他這樣的條件，到哪裡都是搶手貨。他在地下黨時期的戰友和在東北時期的同事，很多都走上了仕途，後來有不少都飛黃騰達了。可他偏偏不想去當官，一門心思只想當個記者——13 級幹

部都可以當個司局級的官了，可13級的記者連一個人也指揮不了，只能指揮自己手中的筆——後來才知道，連這支筆也不由他當家。想當家的話，就隨時可能招來雷霆之禍。

這豈不是“誤入白虎堂”？好像是。然而不是緣於別人的誤導，而是他自己心甘情願的選擇。這是他從小的愛好，多年的夢想，一生的追求。即使後來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也至死未悔。理想主義者為理想而犧牲，本是文中之義啊。從蘇聯回國後，賓雁就調入新成立的《中國青年報》了，成為這家後來在中國政治生活和新聞事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報紙的“開報元老”之一。1951年4月27日，這份報紙正式創刊，賓雁擔任了該報的編委，兼任青工部主任。

“如魚得水”四個字可以形容賓雁當時的心情。幾十個年輕人聚在一起，共同創辦一份新的報紙，而這些人大都是青年知識分子，年齡相仿，多有搞過學生運動和青年運動的經歷。在他們當中，26歲的賓雁已經算年長的大哥了。相似的經歷，相同的愛好和共同的事業使這個團隊裡充滿了和諧的氣氛和蓬勃的朝氣，沒有政治壁壘，沒有爾虞我詐和互相防範，只有共同努力的工作——起碼一開始是這樣的。

就在這種蜜月般的政治氣氛中，賓雁也迎來了自己愛情的蜜月。

從蘇聯回國後，賓雁和朱洪的熱戀成了中青報大院中的美談，中青報的老人們現在還記得他們當年的故事。在那段時間裡，激情澎湃的賓雁不能一天看不到朱洪。他曾經拿著手抄的蘇聯兒童歌曲到《中國少年報》編輯部去找朱洪投稿，建議把歌曲登在

報上，其實只是為見朱洪找個藉口。他還不時拿著英語書去請教在上海教會學校畢業、精通英語的朱洪，多半也是為了和她多說幾句話。當戀情發展到高潮時，賓雁還經常站到少年報樓下的院子中，仰頭對著朱洪辦公室的窗戶用俄文高唱情歌。每當他那渾厚深情的歌聲響起時，人們都笑著說："羅米歐又來給朱麗葉唱歌了。"

戀愛中的賓雁真像個浪漫的騎士，而賓雁眼中的朱洪則像屠格涅夫筆下的俄羅斯女性，溫柔中包含著內在的堅韌，他沒有看錯。從此這位上海姑娘就像 12 月黨人的妻子一樣伴著他度過了危機重重的一生，他們相親相守 54 年，直到他流亡 18 年後在普林斯頓闔上雙眼時，朱洪還在他身邊。晚年的賓雁稱朱洪為自己的"護衛天使"。

這年 10 月，詩意的愛情終於迎來了歡樂的婚禮。第二年 12 月，他們生下了一個男孩。從朱洪的名字中取字，給孩子取名"劉大洪"。過了兩年，又生了個女孩，夫妻倆商定，就從賓雁的名字中取字，命名為"劉小雁"，子以母名，女繼父字。他們視這兩個孩子為自己生命的再生與延續。一個溫馨幸福的家庭就這樣形成了，從此承擔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風雨苦難。

驚斷蜜月的是政治運動。

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同時，國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北京城南的刑場上一次殺人就有百十人，一個一個槍斃太麻煩了，就用機關槍剿滅。這是劉賓雁從小厭惡的場面，他兩三歲時在沈陽就看過處決一個女土匪的場面，在哈爾濱還見過拉著一個壯年男子上刑場遊街的馬車，那男子五花大綁，背插

亡命旗，直立在馬車上呼叫謾罵，還唱著賓雁當時聽不懂的歌，似乎毫無懼色。從此，賓雁終生不願意再看這種野蠻血腥的殺人儀式。可他感到奇怪的是，中國人遇到殺人的日子總像過節一樣興奮，前呼後擁，爭睹為快。從明末搶食袁崇煥的骨肉，到清末爭食秋瑾的人血饅頭，乃至現代涌向刑場看熱鬧，似乎已成不變的傳統。到了 80 年代初，重新走上記者崗位的賓雁還曾採訪過張志新的事跡，但他終於一個字也沒寫——主要是因為有人已經寫了，也因為那割斷喉管的情節太殘忍、太血腥，讓他不忍下筆。而這“鎮反”運動全國一共殺了多少人？據統計，全國公開宣布判處死刑的有 71.2 萬人，而國外的研究數字是 280 萬（莫斯科電台的數字）到 300 萬之間（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的數字）。毛澤東說，“鎮壓反革命，殺 100 萬，極有必要”，這一句話就讓有百萬之眾的人頭落地。其中有不少是已經投降或起義的國民黨軍人和國民黨員，毛後來輕鬆地說了句：“可能有錯殺的。”

這種恐怖也發生在賓雁身邊。有一天，他突然發現自己對面的辦公桌空了，一個叫丁佛恩的編輯沒來上班。有人悄聲告訴他，丁被秘密逮捕了，聽說他是“托派”。從此，這個人就消失了。賓雁這才回憶起，丁平時工作努力，水平還不錯；但很少說話，常有憂郁的神情。

1952 年 3 月的一天，一輛當時罕見的蘇聯吉姆牌豪華轎車開進了團中央大院，車上下來一個身材苗條，笑容可掬的年輕女子，人們說，這就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各辦公室的人都涌出來，爭睹主席夫人的芳容，賓雁也在其中。江青微笑著揮了下手，就走進大樓，到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立群的辦公室去了——過了

不久人們就知道江青此行的目的了：批判電影《武訓傳》和《清宮秘史》的政治風暴挾著霹靂閃電開始了，江青是這場大戲的導演（當然，總導演是毛澤東），而許立群是批判文章的執筆人。此公雖然在批《武訓傳》時立了大功，但也難逃厄運，“文革”中被投入秦城監獄，長期坐單人牢房。改革开放後自殺了。這場大批判斷送了許多人的政治生命，也斷送了一大批編劇、導演和演員的藝術生命，更是中共建國後一系列以知識分子為整肅對象的政治運動的揭幕戰。戰火很快就燒到了賓雁的身邊，在批判《武訓傳》的餘波中，同在團中央大院上班的作家蕭也牧，因為一篇描寫老幹部進城後婚變的小說《我們夫妻之間》也受到批判。蕭在 1958 年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1970 年被迫害致死。

看了作為反面教材而放映的電影《武訓傳》之後，賓雁感到自己趕不上形勢了，他雖然沒覺得電影有多麼好，但也不覺得如批判中說得那樣反動。一個乞丐，用行乞得來的錢辦學堂，普及文化，雖然能不能救國救民值得商榷，但總不是什麼壞事，共產黨不是也正在掃盲嗎？武訓為了讓窮人的孩子能讀上書而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這種犧牲精神還是感動人的。後來的每次政治運動來臨時，賓雁總是重複這種被動，他永遠趕不上那種形勢。總是從觀望、懷疑和不理解，到不情願的反省、檢查和自責，他出了什麼毛病了，或者是這個黨出了什麼毛病了，二者必居其一。

1952 年的一天，在中青報的編委會上發生了一次有意義的討論。起因是有人提出來，一個黨員對服從黨的決定是否應有個限度，因為歷史證明，黨有時也會犯錯誤的。有人比喻：如果上級讓你去殺人，你也去殺嗎？這時有個延安時期的老幹部決然回答：

“也要去殺！”這聲斷吼讓賓雁聽得頭皮發麻：“鐵的紀律”有時是要這樣執行的。

除了對政治運動的不適應外，賓雁發現他對正常工作中的一些做法也不適應了。新創辦的中青報版面上都是些“好消息”：政治運動的深入發展，工農業生產的巨大成就，以及各路英雄模範的先進事跡……至於大家都看得到的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和實際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連一個字也不提。不光中青報，全國大小報紙皆然，絕無例外。其實不光是那時候，這一傳統一直持續到現在。即使在國家“已經面臨崩潰邊緣”的“文革”時期，報紙上依然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來越好”。這還有一套理論說詞，叫“正面報導為主”和“堅持正確輿論導向”。這讓劉賓雁感到困惑：迴避問題，不正視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是自信呢，還是缺乏自信的表現呢？不是什麼都學蘇聯嗎，在蘇聯考察時他曾看到，蘇聯報紙從來就有開放性的批評欄目，為什麼我們在開展批評和揭露官僚主義方面不學學蘇聯呢？

1951 年 7 月 1 日，在先農壇體育場召開的紀念中共成立 30 週年的大會會場上，賓雁第一次看到“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這條後來列為經典的大標語。他說，他當時心中咯噔了一下：這話讓別人去說多好，如此自誇豈不有點可笑？——如果有個人整天叨念自己如何光榮、偉大、正確，非讓人當成精神病不可……如今這條大標語依然到處懸掛，人們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像劉賓雁一樣能夠和敢於提出質疑的反而不多了。

在這樣恐怖的氣氛中，幹如此單調無聊的工作，讓劉賓雁初上新崗位、開創新事業的興頭很快就冷卻下來。他又變得沉默寡

言，開始默默地讀書了。

大“鎮反”的血跡未乾，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在“抗美援朝”的同時，國內又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不久，1955 年又來了一次大“肅反”，這期間在中共高層還發生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事件。“三反五反”倒是沒燒著他這個從不沾錢的人，而“高饒事件”是城門失火，還暫時沒有殃及他這一級的“池魚”，但“肅反”卻火燒眉毛了，而“肅反”的先聲是毛澤東親自部署的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

如果說“鎮反”是針對全社會的，那“肅反”卻是針對革命隊伍中“暗藏的敵人和階級異己分子”的。相輔的是一個在機關內部開展的所謂“忠誠老實”運動，每個參加革命的人都要在運動中剝一層皮，交代自己從小以來各個階段所犯的思想錯誤和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中的任何一個汙點。在黨這個長滿透視眼的神獸面前，所有的人都是裸體的，一絲不掛。

最先被雷電擊中的是劉賓雁的一個同事，青工部的編輯朱志焱。這個上海復旦大學的畢業生，家庭出身是反動軍官，其父是國民黨中將。領導上早就暗示劉賓雁，對此人不能重用，要保持警惕。但通過自己的觀察，賓雁覺得此人沒有政治野心，業務能力強，工作很認真，不像個壞人，就繼續正常使用他。“肅反”一開始，朱志焱被隔離審查了，關在賓雁當時所住的紅樓二樓，賓雁上下班都要從這個禁閉室的門前經過，知道審訊在不分日夜地連續進行著。賓雁反省，曾經派朱志焱到一機部去取過會議記者證，他順便捎回了一疊會議文件，這會不會是自己犯了警惕性不高的錯誤了？

過了不久，賓雁就發現自己也成了懷疑和審查的對象了。一些會議不讓他參加了，一些文件也不讓他看了。幾天後，報社秘書長找到賓雁，笑咪咪地對他說，因為工作需要，他的崗位要調一下，到總編室去上班，青工部主任的職務移交給另外一個人吧。賓雁報以同樣的微笑，說好吧。他明白這次調崗是為了讓他離開能接觸機密和決定報導內容的崗位，只到總編室幹技術性的報紙出版工作。

緊接著，在編委擴大會議上正面交鋒開始了。那些平日都和睦相處的同事們都板起了面孔，嚴肅地質問：你為什麼總是呼籲在報紙上揭露和批評我們黨的錯誤和缺點？這是不是仇視黨和社會主義？

到 8 月份的一個晚上，團中央組織部的部長來參加報社的會議了。他在總結會議時說了一番頗有分量的話：“根據幾個月來的審查，我們有根據提出一個問題：劉賓雁到底是一個什麼人？現在我們要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了。”

這天晚上，賓雁入睡比平時晚了一刻鐘。在單位的遭遇，他一點也沒向妻子透露。他相信，自己是經得住審查的，一切都會過去。

從那次會議後，對賓雁的揭發和批判又升級了。

樓道裡貼出了劉賓雁兩篇未獲准發表的文章的清樣，和一篇正在寫作中的初稿。上方醒目的大字標題是《請看劉賓雁的反黨思想》。文章中有些話被加上了紅線，以引人注意：

“果戈理的一個短篇裡寫過一個人清早上班時忽然發現他丟了鼻子。我們這裡，確實有人每天早晨上班時只帶了工作證，卻把

心遺忘在家裡。”賓雁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冷》，批評有些幹部對人民和國家利益的冷漠。

“多少次，我想起了這個人的眼光：他抬起泛紅的、激動的臉，閃光的眼睛像要吐出什麼東西。可是環視一下周圍的人，這雙眼睛又羞愧地垂下去了。這一剎那，我彷彿聽到一個聲音：不要搶先，別露鋒芒；別人未說，你又何必？就是這聲音，熄滅了那雙眼睛中的火光。”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新的聲音》，所指何物，一看就明。

賓雁的文稿還批評了一種人：“一張永遠是為別人微笑著的臉，眼睛謹慎地追隨著會議主席面部的表情而變化，嘴裡隨時準備著‘是啊！’‘對！’……”這樣的文字讓誰看了不舒服呢？

這些文字，尖銳犀利，會令某些人不快。但是說這就是“反黨”，怕太誇張了。賓雁有這個自信，他平靜地對待這些粗暴的批判。

真相逐漸露出了：原來是有人模仿賓雁的筆跡，寫了幾封匿名信，信中咒罵總理周恩來和團中央書記胡耀邦。還有一封信是推薦劉賓雁擔任《中國青年報》的總編輯。當作為物證的匿名信照片攤在桌子上讓大家看時，他一看就笑了：“儘管筆跡模仿得很像，但肯定不是我寫的。”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大約晚九點多，會議室的大門猛然被撞開，一個女人跌跌撞撞地衝進來，後面跟著兩個公安人員。賓雁一看，大吃一驚：是自己手下的一名編輯，報社原總編輯陳緒宗的夫人，叫金懷瑾。她是青工部的“肅反”工作負責人，平時受另外一條秘密體系指揮，部門主任根本無權過問。公安人員宣布，已

經查明，那些匿名信是金懷瑾模仿劉賓雁的筆跡寫的。

這位負責“肅反”工作的金懷瑾在報社模仿別人的筆跡寫了很多反動信件，受害者除了賓雁外還有朱志焱等十幾個人。由於她的被捕，這些人都得到了解脫。而她自己倒是犯了“反革命罪”，被判了八年徒刑。她最後敗露的原因是被蘇聯援華的筆跡鑒定專家鎖定後，又用左手寫了匿名信，讓家中的保姆到上海去投遞，結果當場被抓住了。

至於她為什麼要這樣幹，一直是個不解之謎。有人說，是因為她丈夫在“反胡風”時受到牽連（他們夫妻曾到胡風家做客），被免去總編輯職務，因此她懷恨在心，故以此報復。但法庭審判時說她從 1952 年起就開始這樣作案，而那時他丈夫還在職位上呢。唯一比較靠譜的解釋是，這是專制制度和特務政治陶冶訓練出來的一個怪物，製造案件，陷害別人，以彰顯自己的“戰績”和存在價值，這是她的職業病。

一場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雖然橫掃了整個報社，使那麼多人被審查、被隔離、被批判，可到頭來全都宣布解脫了——唯一真正的“反革命”就是那個負責“肅反”的特務金懷瑾。這像是個黑色幽默，但雨過天晴後賓雁無論如何也笑不出來——怎麼會這樣？人血不是水，人的政治生命也不是個玩具呀！據公安部長羅瑞卿工作報告公布的數字，整個“肅反”運動在 1800 萬幹部職工中，整了 140 多萬人，共逮捕了 21 萬 4470 人，判處死刑的 2 萬 1750 人，“非正常死亡（指自殺、刑訊逼供死亡或在監獄、勞改場死亡）”的有 5 萬 3230 人。而根據《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18 日胡喬木的文章《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提供的數字，這次運

動清查出了8萬1千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9萬多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還弄清楚了130多萬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即使按照他們提供的數字來計算，錯案率也超過94%。

事過之後，賓雁又恢復了原來的工作。他當時仍然相信，這是必然的結果，“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嘛。他甚至還等著組織上會派人來，因錯整他而道歉，但等來等去卻沒人說一句表示歉意的話。共產黨是從來不道歉的，錯整了但沒整死你，你應該感謝黨才是。“娘打兒兒不記仇”嘛！

這說明當時的賓雁還是太天真、太善良和太樂觀了。他還沒有看到，在極權專制體制下，特務政治和警察國家自有存在、生長和惡性發展的充分條件與自身規律。這套源於蘇聯“契卡”的秘密權力機構，有其自身的獨特利益和獨特邏輯，不斷地擴張他們的權力，從而也擴大他們所獲得的特權和利益，有其不竭的動力源泉。當時金懷瑾的行為還僅僅是個人行為，是特務政治的初級階段和偶然例外（金女士生不逢時啊）。按照規律，她所做的一切，遲早必然會變成機構行為和規定動作。到那時，像她一樣“演砸了”的機率會越來越小，而製造僞證、編織羅網、構陷好人、製造冤案的成功率會越來越高，最後必然會發展到凌駕於一切法律之上，橫行於黨紀國法之外，不受任何監督，甚至連黨和政府的監督有一天也會失去效力。到那時，這個法外的秘密權力，就會變成一群披著黑袍、長著獠牙的“吸血狼族”，成為國家和民族的噩夢。滲透到社會的各個細胞中，監視所有人的生活和思想，製造驚人數量的冤案，用刑殺和暗殺的手段任意草菅人命，將是它們的家常便飯。蘇聯的歷史和中國後來的歷史都證明了這一

點——賓雁沒活到親眼看到重慶“打黑唱紅”和“政法委”以“維穩”的名義權傾一切的時代，這是個遺憾，或者說是個幸運吧。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弗拉基米诺夫：延安日記（呂文鏡等譯）
沈志華、李濱等：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
錢文軍：朝鮮戰爭 50 年祭
胡喬木：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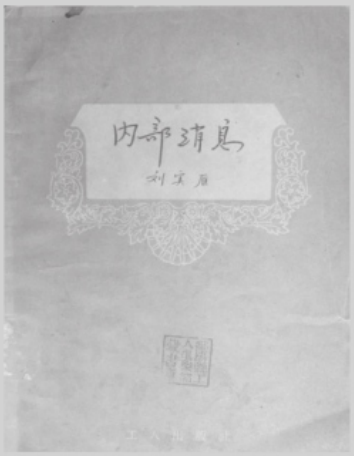
1954 年，日內瓦湖濱。

第六章　天際雷聲

這是一次自覺的思想站隊——讓思想跨出陰森的“鐵幕”，越過精神的“柏林牆”，站到全人類自由、民主和文明的陽光下來，這是在“反右”運動即將來臨前他最後的思想裝備更新。不必諱言，他是屬於“非斯大林化”的號角所喚醒的一代，也是中國思想“解凍”的先行者之一

1954 年，劉賓雁參加中國記者團，到瑞士採訪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

在 1956 年的這期《人民文學》雜誌上發表了劉賓雁的力作《本報內部消息》。



工人出版社 1956 年出版了劉賓雁《內部消息》。

工人出版社 1956 年還出版了劉賓雁《在橋梁工地上》。

20 世紀是幾個邪惡天才各顯神通，興風作浪的時代。 希特勒的生命力在於“進攻、進攻、不斷的進攻”，當他的進攻停下來時，他的末日就到了；而斯大林的訣竅是“清洗、清洗、再清洗”，直到把自己清洗成孤家寡人，發病倒地而無人過問為止；而毛澤東的治國術就是“運動、運動、還是運動”，到死還在唸叨著“過七八年再來一次”。 劉賓雁生活的 50 年代，是中國政治運動最密集的時期，平均每年有兩次以上的“運動”出台。 而“運動”之間的難得縫隙，才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可憐空間。

賓雁當時的工作除了在中青報正常的採訪編輯之外，還有一個額外的任務：不時被抽調去當俄語翻譯。1950 年，蘇聯青年代表團訪華期間，他就被派去擔任翻譯，陪著蘇聯人走遍了半個中國。1954 年春，他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隨行記者團成员，到日內瓦採訪了印度支那國際會議。 接著，應蘇聯《真理報》總編輯謝皮洛夫之邀，《人民日報》派團訪蘇，團長鄧拓就點名調賓雁去當翻譯。 而這年秋天，蘇聯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訪華，也是賓雁去當翻譯。1956 年 3 月，剛剛經過“肅反”風波的劉賓雁又被點名抽調去為中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團當翻譯，而點名的還是團長鄧拓。 這次的主要任務是到華沙去參加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的理事會，途徑莫斯科。

說實話，賓雁一直不喜歡當翻譯——這個工作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喜歡思考，喜歡提自己想提的問題，說自己想說的話，但是，翻譯只能重複別人的話，沒有他自己說話的空間，這讓他很感憋屈。可是，他精通俄語，特別是能熟練地掌握口語，又善於表達（這得益於他的演說才能），翻譯效果很好，所以，像鄧拓那樣的領導一旦

用過他之後，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凡需俄語翻譯的時候總是首先想到點他的名。

這個工作，使劉賓雁有機會經常接觸高層領導，比如，在《人民日報》訪蘇團中，除了報社的幾名編委以外，還有地方黨報的幾名總編輯參加，後來成了“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當時任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也在其中。在一般人看來，這可是個難得的良機，誰都知道，能行走在高層領導麾下，並趁機獲得他們的好印象，可是飛黃騰達的終南捷徑——這些年來，有多少高官的秘書和翻譯青雲直上啊。然而，對賓雁來說，這只是一項工作，而且是自己並不特別喜歡、也並不十分熱心的工作。在那些高官面前，他非但沒有受寵若驚，賣乖鑽營，反而總是保持一種不亢不卑、若即若離的尊嚴，從沒想到要給自己經營上進之階，或找個保護傘——性格使然，這也是“貴族氣”的一種吧。

在這些外事工作中，賓雁最大的收穫是結識了奧維奇金。

蘇聯記者、作家瓦連欽·奧維奇金是蘇聯文學史和新聞史上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也是上個世紀 50 年代對中國文學和新聞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之一，他是蘇聯文學新潮流“反對粉飾現實，大膽干預生活”的帶頭人。從 1952 年起，他在蘇聯的《真理報》和《新世界》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介於文學和新聞之間的“特寫”作品，如《區裡的日常生活》、《在前方》、《在同一區裡》和《親自動手》等，作品首次突破了只能高唱頌歌，不能接觸現實問題的禁區，深入地揭露了蘇聯基層政權領導者的思想工作作風和管理體制方面的嚴重問題，描寫了幹部和群眾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這些作品在當時的蘇聯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受到群眾的廣泛歡迎。他的創作高

潮是在斯大林死後的 1954 年，應視為預告堅冰開始消融，大地即將回春的“解凍文學”的先聲之一。

1954 年秋，奧維奇金作為一個當時蘇聯文壇最活躍的記者和作家，參加了蘇聯新聞工作者訪華團。劉賓雁作為翻譯陪同了他們訪問的全程。在這期間，賓雁不僅讀了奧維奇金的作品，而且通過親密交談，瞭解了他的思想和理論，並著手翻譯奧維奇金的《論特寫》（此書於 1955 年出版）。賓雁還寫了《和奧维奇金在一起的日子》一文，鄭重介绍了奧維奇金關於“干預生活”的文學主張：“不要害怕矛盾，不要害怕它那糾纏不清的外表。一層層剝下它的外衣，常常就会發現極其重要的問題。”

1956 年賓雁跟隨中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訪蘇時，又見到了奧維奇金。訪問日程結束後，《真理報》請鄧拓到莫斯科郊區去療養，賓雁則趁機接受奧維奇金的邀請，到他在庫爾斯克的家中去住了幾天。在奧維奇金家中，他看到每天都有紛紛寄來的讀者來信，在主人工作時，賓雁就一封封地讀這些來信。很多信是斯大林時代的冤案受難者傾訴自己悲慘遭遇的，還有不少是揭露農村和城市裡的黑暗現象，給奧維奇金提供採訪線索的。讀著這些用血淚寫成的信件，賓雁第一次明白了，一個與人民血肉相連的記者和作家應該是什麼樣的。

在和奧維奇金交談時，賓雁聽到這樣一個故事：1953 年蘇共中央召開九月全會，通過改革農村政策的重要決議時，總書記赫魯曉夫看到了《真理報》上刊登的奧維奇金的作品，驚奇地對參加會議的人說：“怪呀，這個人怎麼就像參加了我們的討論呢？他寫的這些，正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啊！”這個故事也讓賓雁明白了，一個

優秀的記者和作家，應該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他暗自下決心，自己也要當一個這樣的記者和作家——奧維奇金對劉賓雁的意義，不僅是給他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榜樣，更重要的是給他找到了一個衝破鐵網的突破口。而“寫真實”和“干預生活”就是合法而又合理的突破口

回國後，賓雁開始全力地宣傳奧維奇金的思想和理論，不僅寫文章在報刊上宣傳，還在中國青年報社內部向同事們反復宣講，以至鼓盪起了一個中青報的新聞改革浪潮。中青報在上個世紀 50 年代的改革曾對中國新聞界產生強烈的影響，其主要方向有兩個：一是突破團報只能管共青團和青年工作的樊籬，爭取有全國的視野和全方位的功能，真正成為一張覆蓋全國的大報；二是突破只能歌功頌德，不能涉及問題的禁區，直面社會真實，揭露社會矛盾，勇敢“干預生活”。可以看得出，這裡面顯然凝聚著劉賓雁的努力和心血。他還身體力行，在改革的實踐中走在前列，寫作和發表了奧維奇金式的報告文學作品《在橋梁工地上》。

《在橋梁工地上》發表在 1956 年 4 月號的《人民文學》上。而採訪和寫作是在 1955 年秋天，那是劉賓雁經歷了“肅反”風波，剛剛恢復自由以後的第一次外出採訪。當時他來到甘肅蘭州，採訪黃河上第一座國產鋼鐵大橋的工地。在這裡他發現了一個夢寐以求的絕好素材——建橋隊長羅立正，是個資歷老經驗豐富的老技術幹部，他居功守成，不思進取，凡事都要請示領導，沒有上級指示，有天大的危機自己也從不作主。寧可因請示上級浪費時間、錯過時機，造成損失，也絕不犯“組織錯誤”。1954 年秋天，黃河洪峰提前到來，他除了不斷地向上級請示之外，不採取任何應急措施，

結果使正在施工的橋墩被洪水沖垮，造成了巨大損失。和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三分隊的隊長、青年工程師曾剛，善獨立思考，有創造精神，對羅隊長的不思進取、坐待指示很不以為然，甚至寫信給上級，批評這位上司，因此引發了衝突。洪水突然到來時，他因為有所準備，自主地採取了防範措施，並及時決策，組織搶險，結果使自己主持的另一個橋墩得以安全度汛。然而，最後的結果卻讓人吃驚：保住橋墩的曾剛受到處分，罪名是“缺乏組織性紀律性”，他被調離橋梁隊，去水泥廠了；而坐待指示，貽誤戰機，無所作為，造成重大損失的羅立正隊長卻因“緊跟領導意圖”而受到表揚並保住了官位。

賓雁以此真實的故事為素材，滿懷激情，在春節期間只用了一個星期就寫出了這篇報告文學《在橋梁工地上》，以犀利的筆鋒尖銳地批評了壓抑人們的創造精神，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義作風。這篇作品在那個時代是打破沉寂的空谷足音，是對文學和新聞禁區的大膽突破，也是賓雁的思想在長期壓抑、深沉思考後一次火山式的爆發。這是賓雁從奧維奇金那裡竊得火種後第一次猛烈的燃燒，是“劉賓雁時代”禮炮的隆重奏響。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新聞史將寫下這輝煌的一頁。

當時的《人民文學》以突破常規的頭條、通欄、極其醒目的地位發表了這篇作品，副主編秦兆陽還為作品寫了簡短有力的編者按語：“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的、批評性和諷刺性的特寫已經很久了，希望從這篇《在橋梁工地上》發表以後，能夠更多地出現這樣的作品。”似乎如此還意猶未盡，秦兆陽還在編後記中寫道：“在現實生活裡，先進與落後、新與舊的鬥爭永遠是複雜而尖銳的，因

此我們就十分需要偵察兵式的特寫。我們應該像偵察兵一樣，勇敢地探索現實生活裡邊的問題，把它們揭示出來，給落後的事物以致命的打擊，以幫助新的事物的勝利。本刊這一期所刊登的《在橋梁工地上》就是這樣的特寫。像羅隊長這樣的人，像曾工程師這樣的人，像他們之間的鬥爭，在我們的生活裡難道是很少的嗎？我們怎麼可以對他們視而不見呢？怎麼可以看見了而不寫呢？”

作品發表以後引起了爆炸般的反響。文學界、新聞界奔走相告，爭相傳閱，而廣大讀者更是驚喜若狂，鼓掌歡迎。這種盛況在那個時代是空前的，而可与之媲美的也只有 20 多年後的《人妖之間》和《第二種忠誠》了，可作者依然是他——劉賓雁，沉寂了 22 年後復出的賓雁自己才是這個輝煌的續寫者。這是什麼樣的奇跡啊！

寄出這篇作品的文稿後，賓雁就跟著鄧拓出國了。當他返回北京時，受到從來沒有的特殊歡迎——中青報的兩名編輯在機場的出口等著他。一個叫樓靜波，一個是和賓雁一起在“肅反”中挨整的朱志焱。他們只為搶先在第一時間向賓雁報告《在橋梁工地上》轟動成功的喜訊……而這時的賓雁反倒臉紅著低下了頭，他在檢點自己的不足，也開始構思自己的下一篇作品了。

賓雁的“下一篇作品”是《本報內部消息》。這篇非紀實性特寫直指他長期以來最關心的新聞改革問題。作品中某城市的黨報是虛擬的，但是所揭露的問題卻是真實的：一個故步自封、唯領導之命是從，而又作風蠻橫的總編輯，一個未老先衰、明哲保身的總編室主任，一群試圖改變報紙辦報方針而慘遭失敗的年輕記者編輯，辦出一份遠離生活、套話連篇、索然無味，最終被讀者拋棄的

報紙——這個故事可以讓全國大多數報紙照見自己的影子。賓雁對新聞工作的現狀的尖銳批評和深刻剖析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其反響甚至超過了《在橋梁工地上》，因為這不僅指向基層幹部和一般領導作風問題，而是直接指向了一個更為敏感的黨對新聞工作的指導方針問題，實際上提出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思想，而這一直是最大的思想禁區——至今依然如此，所以這篇作品在新聞界和文學界引起特別關注是理所應當的。

賓雁點起的這把火熊熊地燃燒了。奧維奇金的思想和理論不僅在中國青年報有了回聲，在中國文學界也反響強烈。負有宣傳中共文藝政策和文藝導向使命的《文藝報》，在 1956 年 3 月發表了《勇敢地干預生活的激情》等一系列主張和讚揚“干預生活”的文章，高度評價了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連致死都堅持“毛左”立場的文壇左派領袖之一劉白羽，在那時候都出來為“干預生活”助陣。他在全國作協會議上發言說：“奧維奇金的特寫為什麼這兩年在蘇聯這麼突出？也是因為大膽揭示了生活中真實的東西，反對了生活中的官僚主義。”他還讚揚說，“奧維奇金像一個偵察兵一樣”揭露了“官僚主義者的靈魂深處”。而一大批著名作家都站出來擁護“干預生活”的理論和方向，例如馬烽發表文章《不能繞開矛盾走小路》，康濯發表文章《不要粉飾生活，迴避鬥爭》……可見，當時“干預生活”已經成了許多作家和批評家的文學共識。直到 1957 年 5 月，“反右”運動已經開始了，“干預生活”的理論已經作為一種異端理論受到批判時，《文藝報》第五期上仍然有署名“晨風”的文章，題目是《要不要“干預生活”？》繼續為這種文學主張辯護。然而，過了不久，這種文學主張就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同義語，受到舉國的口誅筆伐了。

如今，歷史早已翻過這一頁了。隔著世紀烟雲，我們重翻這一頁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個世紀那場“全盤蘇化”的鬧劇，確實沒給今天的中國留下多少好的遺產——負面的遺產倒比比皆是，如一黨專政、個人崇拜、計劃經濟、思想專制、特務政治等等，至今還禁錮著我們的手腳和思想。但是，奧維奇金及其“干預生活”的理論和實踐，卻是為數不多的正面遺產之一。中國文壇的“干預生活”概念確實直接來自蘇聯，但嚴格地說，這不是斯大林主義的遺產，而恰恰是反斯大林主義的產物，是蘇聯走出斯大林陰影的“解凍”過程放射到中國的一線曙光。而這一理論的根源，還植根於百劫不死、百死不僵的俄羅斯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文化傳統之上。賓雁對這一理論一見傾心、一拍即合，欣然接受，並主動充當了它在中國的傳道者和播火人，實出必然，且功不可沒。

有些文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說，無論如何“干預生活”的理論已經過時了，在當下中國已經失去了現實意義。其實恰恰相反，針對中國文壇和新聞界當下盛行的虛無主義、犬儒主義、娛樂至上和頌聖頹風等失血症及軟骨病，直面現實、干預生活的主張仍然不失為一劑良藥。劉賓雁的榜樣並沒有過時。

奧維奇金和劉賓雁之間的跨國友誼，是賓雁生命中的重要一章。在賓雁的眼中，這個俄國人質樸、直率、熱情而又有思想，外貌像個普通農夫，也深切關心農民的命運。在訪華期間，他最喜歡深入農村，和農民聊天。當發現中國農村實行記工分制度時，他如獲至寶，讓賓雁一句一句地翻譯，他一字一字地記下，還興奮地說：“這比蘇聯的集體農莊發固定工資好，那樣就幹多幹少、幹好幹壞

都一樣了，不利於發揮農民的積極性。”

在劉賓雁的記憶中，有這樣一個終生難忘的場景：1956 年賓雁到奧維奇金家做客幾天後終於要分別了，奧維奇金送了一程又一程，直送賓雁到了庫爾斯克火車站。 火車開來了，奧維奇金在站台上忽然緊緊地抱住賓雁，久久不肯放手，同時淚流滿面，悲傷得說不出話來。 賓雁是個輕易不流淚的漢子，這時不知為何也流下了眼淚。 兩人一直緊緊地擁抱著，任憑淚水縱橫流淌，直到站台上的電鈴響起，賓雁才不得不登上緩緩開動的列車。 從車窗探頭回望，只見奧維奇金依然站在那裡流淚，賓雁不停地向他招手，一直到列車加快速度駛離了庫爾斯克，奧維奇金的身影變成了一個看不清的小黑點，還是站在那裡一動不動，這是奧維奇金留在賓雁記憶中的最後影像，從此他們再也沒有機會見面了……

這位曾見證過斯大林時代的血雨腥風，深知“克格勃”和“古拉格”厲害的蘇聯人，在送別一個中國記者朋友的時候，為什麼如此憂傷？他是有什麼不詳的預感了？都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難道蘇聯昨天的苦難也將在今天的中國重演？他是不是已經猜到了中國也將要有那樣一場血雨腥風，像賓雁這樣正直的人也將要蒙難遭禍，在劫難逃？他是不是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分手便是永訣？

……不知道，奧維奇金沒有解釋。 但是歷史給了回答：蘇聯曾經發生過的慘劇，在中國一幕幕都重演了，而且更加慘烈。 一年以後賓雁果然真的被打成“右派”，墮入了人間地獄。 奧維奇金聞訊後十分焦急激憤，從遙遠的蘇聯寫信給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為賓雁鳴不平，力保他不是反黨分子，而是個優秀的記者和作家。 遺憾的

是，這封信不但沒有給賓雁幫上忙，反而給他添了罪——連外國人都替你說話，更可見你不是個好人！據說周恩來因此而勃然大怒，將此事通報了蘇共中央，使奧維奇金也挨了批評。

賓雁作為“右派”被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後，奧維奇金還給賓雁寄來過幾本書，囑咐他要繼續讀書，不要消沉，鼓勵他要為將來的寫作做好準備。但是，賓雁與奧維奇金的聯繫，又成了一條“不服改造”和“裡通外國”的新罪狀（“文革”中賓雁還因此被懷疑是“蘇修特務”），於是兩人聯繫就被迫中斷了。賓雁和奧維奇金的友誼像俄羅斯民歌《三套車》一樣，成了一曲憂傷的哀歌……

賓雁此次蘇聯東歐之行的另一大收穫是聞到了“解凍”的早春信息。他隨便走進華沙街頭的閱報室就驚奇地發現，報架上除公開擺放著西方國家共產黨的報紙（如法共的《人道報》）之外，還有《泰晤士報》、《先驅論壇報》等被我們視為“反動”的西方大報，讀者可以任意翻看。波蘭在對外開放方面已經邁出了大步。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

鄧拓確實是個中共官員中罕見的異類。通過幾次在外事活動中和鄧拓的相處，賓雁真的喜歡上這個博學多才而又正派耿直的老幹部了。在莫斯科的賓館裡賓雁找他去聊天，竟敢大著膽子問了他一個敏感問題：朝鮮戰爭究竟是誰發動的？是韓國還是北朝鮮？沒想到這位高官毫不遲疑地回答：“當然是金日成挑起的。”就是放到 60 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官場中人也沒有敢公開這樣說的。鄧拓還向賓雁訴說了自己的苦惱：作為黨中央報紙的社長兼總編，他無法決定報紙上登什麼、不登什麼，任何一個領導都可以寫條子來要求發表自己的東西，他無權拒絕。他的坦率和真誠讓賓雁十分

感動。 在莫斯科時，鄧拓還交給賓雁一個任務：讓他抽空到蘇聯和波蘭的書店去，收集一些西方新聞學的書籍，看看西方的新聞學理論和新聞實踐是什麼樣的，他很想瞭解這方面的情況。 賓雁就真的認真去尋找了，但結果是大大的失望——和中國一樣，蘇聯和東歐的書店裡這方面的書一本也沒有。

但是，賓雁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發現：蘇聯和波蘭的記者們正在神秘地傳閱一份厚厚的文件，並私下裡悄悄熱烈地議論著——後來賓雁才知道，他們傳閱和議論的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 從他們的議論中，賓雁大致知道了報告的內容，其中大清洗的真相讓他感到無比震駭。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我的一生中，再沒有第二個事件令我這樣震驚過！”

賓雁這時才想起 1950 年冬在第二次訪蘇時曾有過一次奇遇：在諾沃西比爾斯克，一個和中國代表團住在同一個公寓的老婦人非要拉賓雁到她家坐坐，她拿出一本相冊，給賓雁看裡面已經發黃的照片，她指著一位英俊軍人的照片，說這就是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是她丈夫的好友，但 1938 年在大肅反中被殺害了。 當時賓雁還不敢相信，以為老婦人是在胡扯，現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證明這居然是真的。

一尊至高無上的龐大偶像轟然倒地並被砸得粉碎了！原來，就在賓雁跟著鄧拓來到蘇聯和東歐前幾天，蘇共二十大剛剛舉行過。在會議的最後一天（1956 年 2 月 25 日）晚上，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做了個秘密報告，題為《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石破天驚地狠批了斯大林，揭露出他駭人聽聞的“七宗罪”：大搞“個人迷信”，大搞破壞法制的血腥清洗，在衛國戰爭中帶來嚴重

損失的錯誤指揮，在國內民族問題上的野蠻暴行，在對待南斯拉夫問題時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在領導經濟工作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在黨內踐踏民主，實行獨裁的惡劣作風等等，從而撕下了這位紅色獨裁者“一貫正確”的僞裝，為後來的“非斯大林化”進程打開了大門。

當然，赫魯曉夫的報告還遠沒有揭露斯大林罪惡的全部真相，後來有人——例如漢娜·阿倫特就認為他“為了掩蓋這個政權整體上的罪惡性”，而縮小了斯大林政權的巨大罪行，甚至“掩蓋多於揭露”，例如報告中就沒有包括對幾百名甚至幾千名著名政治人物和文學家的誣陷和謀殺……然而，可以理解和原諒的是，這個秘密報告出台之日，距斯大林的三週年忌辰還差八天時間。 也就是說，蘇聯人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就把這個不可一世的獨裁者拉下了神壇，並開始清算這個魔王的罪行了，這已經是個了不起的勇敢之舉了——對比一下中國，蘇聯人用三年時間辦到的事，我們三十多年還沒做完。 這是何等的氣魄，何等的決心，何等的效率啊。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的結尾處說：“我們現在能夠廣泛地提出克服敵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個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嚴重後果等問題，證明了我們黨有偉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劉賓雁不僅為斯大林的滔天罪行而震驚，也為蘇聯人的果決和膽略，即赫魯曉夫所說的“道德力量”而震撼——這才是真正好男兒的氣概，俄羅斯文化中固有的這種道德力量真令人肅然起敬。 他當時已經預感到，這件事的意義非同尋常，將是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來臨的報曉鐘聲。

其實，徹底否定斯大林並非如毛澤東後來所說，只是某個野心

家（比如赫魯曉夫）的陰謀，也不是偶然發生的事變，而是水到渠成的歷史必然。蘇聯解體後解密的大量文獻（如貝利亞之子的回憶錄）呈現了一幅讓人大跌眼鏡的歷史拼圖，它說明，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和血腥暴行，早已人神共怒，掀翻這個嗜血魔王的偶像已是當時一個迫在眉睫的歷史要求，也是斯大林死後的各派政治力量互相爭奪權力的一張王牌。在赫魯曉夫之前，當時蘇共的二把手貝利亞已經在斯大林嚥氣後最早提出了“反對個人迷信”的口號，開始着手平反歷史冤案（如斯大林捏造的“克里姆林宮反革命醫生案”），並在1953年搶先實行大赦，大規模釋放集中營中的勞改犯（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前已經放了100多萬人），而且開始調整和改變斯大林的經濟政策（減少軍事工業投入，發展為民生服務的輕工業），他還主張調整民族政策，擴大加盟共和國的權利，甚至還主張調整外交政策，支持東西德統一為一個中立的國家（他被槍斃前最後一次出訪就是到東德去，這為赫魯曉夫剷除他提供了機會）……赫魯曉夫等人下手除掉了貝利亞後，要幹的還是同樣的事。不同的是誰掌握了掀翻斯大林的主導話語權，誰就可以成為歷史的功臣，而把追隨斯大林作惡的“斯大林主義分子”的罪名推到自己政敵的身上（如貝利亞和後來的“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反過來，如果貝利亞成功了也會這樣幹。結論是，時辰一到，這報曉的鐘聲是必然要響起的，只看誰來掌握敲鐘的大錘了。蘇聯“非斯大林化”的過程是個饒有意味的先例，這報曉的鐘聲將在歷史的時空中久久迴響，終將在所有共產專制國家引起共鳴，導致一個個“小斯大林”被押上絞架或焚屍揚灰，不同的是結局來到的早晚先后而已。

一向貼枕就眠的賓雁在這報曉鐘聲中徹夜難眠了。那些日子，睡不著覺的恐怕不只是他一個人。

對兩年前還哭天搶地為斯大林嚎喪的中國人來說，這不啻是個晴天霹靂，官方的反應十分微妙。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團團長是朱德，會議結束後，三月初，代表團帶著這份秘密報告回到北京。據新華社記者戴煌回憶，根據中央的決定，新華社由《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進行了內部傳達，傳達者只能念，不得插話和解釋；所有的人只能聽，不准記，氣氛十分緊張，會場上連一聲咳嗽都沒有。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對普通黨員和群眾，這份秘密報告一直是個高度的國家機密。直到一年後，北京大學數學系的青年助教任大熊從圖書館借出刊有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名學生共同翻譯成中文，張貼在校園中，因而被打成“右派”——1970 年 3 月，在“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任大熊在山西被槍斃。胡耀邦的秘書曹治雄也因把秘密報告拿給當時的女朋友林希翎看，而成了“右派”，連胡耀邦也愛莫能助。賓雁因為是在國外，所以能較早地得知了這個重大信息。

對遵奉斯大林為“偉大的慈父”和“導師”的毛澤東來說，這是個十分矛盾和尷尬的時刻。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聽了秘密報告的匯報後，他一夜沒有睡覺，連著幾天都失眠。他的感受可謂“五味雜陳”：一方面，這似乎讓也曾受過斯大林的大黨大國沙文主義之害的中共出了一口氣，但是另一方面也威脅到正在中國不斷升溫的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在這方面，斯大林確實是毛澤東的導師和榜樣，當一個像斯大林一樣的中國革命領袖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是毛澤東的終極夢想。經過半個多月的思量，毛澤東終

於醒過味來：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批判不是也動搖了他自己的權威和權力基礎了嗎？他從斯大林的下場中看到了自己的結局，因而感到了巨大的恐懼——當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取得像後來那樣的絕對權力，黨內的有限民主對他還有相當的制衡力量。例如，劉少奇還能發出一些與他不同的聲音。在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績時，劉少奇就要求《中國青年報》去採訪報導各級幹部由於無知和官僚主義而鬧出的“笑話”。對各地發生的工人罷工事件，他以一個工人運動資深老領導的資格要求基層黨和工會幹部“應該和工人一起罷工”，因為這樣才能取得工人的信任……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傳來後，反對“個人迷信”的口號也在中共高層引起了共鳴。對毛澤東來說，這都是危險的信號。

於是，在這一年 3 月 19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對蘇共二十大和秘密報告定了調子：“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並提出了中共對斯大林問題的基本立場：“三七開”，從此中共就選擇了頑固維護“斯大林主義”的立場。這以後，連續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 年 4 月）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同年 12 月），公開站出來為這個嗜血暴君辯護，聲稱“如果一定要說什麼‘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公開了在對待斯大林問題上與蘇共的分歧。到 1963 年中蘇論戰中，又發表了《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進一步肯定了斯大林：“斯大林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這是中蘇兩黨分裂的最早原因之一，也是毛澤東此後一些重大決策的根源。

毛澤東的擔心並不是杞人憂天，在蘇共二十大的影響下，於1956年秋天召開的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中就寫進了“杜絕個人崇拜”的內容，由鄧小平主持的黨章修改還刪去了與“馬列主義”並列的“毛澤東思想”的字樣。這就如同給孫悟空戴上了緊箍咒一樣讓毛澤東頭痛不已，為此他曾氣得兩個月不肯起床，後來對此也一直耿耿於懷。有研究者認為，這是造成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矛盾的決定性原因。從此，像斯大林一樣被拉下神壇並焚屍揚灰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噩夢，而“警惕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成了他念念不忘的口頭禪，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對“八大”的總清算，是毛澤東企圖永遠祛除這一噩夢的瘋狂之舉。毛澤東甚至圖窮匕首見，赤裸裸地說出了“斯大林這把刀子不能丟”這句殺氣騰騰的話來。直到現在，在蘇共二十大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後，在蘇聯已經解體，蘇共已經崩潰20年以後，這仍是中共官方的經典說法，沒人出來正式更正。而斯大林的巨幅畫像也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畫像並列排在天安門前，一直掛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後來這四幅畫像一起悄悄地撤掉了，但一直沒人出來說明是為什麼）。如今，“斯大林這把刀子不能丟”後面又被加上了一句“毛澤東這把刀子也不能丟”，中共已經成了邪惡的“斯大林主義”在這個世界上僅存的最後堡壘了。

不僅官方如此，即使民間也受到這種說法的持續影響。例如，在當今對“反右運動”的歷史研究中，甚至在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們的回憶中，人們仍然在有意無意地迴避和淡化秘密報告對中國的影響，似乎還在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劃清界限”，羞於承認中國“五七”民主運動是促成共產專制主義“解凍”大潮的一部

分。

劉賓雁是中國最早接觸蘇共二十大文件，並近距離觀察了秘密報告發表後蘇聯、東歐社會發生變化的少數人之一。他走下飛機，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趕到報社機要室去，認真閱讀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文本——他剛剛被宣布是“13 級幹部”，這是所謂“高幹”的底線，因此他已有了閱讀保密文件的權利。他在回憶錄中說，“我讀著赫魯曉夫關於 20 年前那幾起大屠殺的敘述，激動得幾乎顫抖起來，我為那些無辜的革命元勛和將領的慘遭殺害，悲痛得流下了熱淚。”，他還說，“仔細讀了兩遍之後，我心中的很多事都改變了原來的樣子”。他當時就說過“我是站在赫魯曉夫一邊的”，是斯大林主義的堅決反對者。對後來的“反右”運動，他也一直堅持，不能迴避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對中國產生的巨大影響作用——這聲來自天際的晴天霹靂是中國民主思想的起床號，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催化劑，是“五七之春”的春風之源，深受斯大林主義之害的中國人是曾經認同並積極參加過反斯大林主義的世界潮流的。

這個“心中的很多事都改變了原來的樣子”，正是賓雁的思想發生具有實質性飛躍的概括說法。“我已非我”——他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毫不猶豫的“遵命者”和盲目的追隨著，而共產黨也不再是當年他所相信的那個永遠正確、永遠英明、永遠偉大的神聖了。他說過，當年投奔革命就是為了“解放自我”和“實現自我”，現在，這個因多年蒙蔽而沉睡的“自我”已經開始蘇醒過來了，要用自己的腦袋思考世界，用自己的嘴巴說自己想說的話了。這是一次自覺的思想站隊——讓思想跨出陰森的“鐵幕”，越過精神的“柏林

牆”，站到全人類自由、民主和文明的陽光下來，這是在“反右”運動即將來臨前他最後的思想裝備更新。不必諱言，他是屬於“非斯大林化”的號角所喚醒的一代，也是中國思想“解凍”的先行者之一。承認這一點並非恥辱而是光榮，是自覺加入普世文明大軍的豪壯之舉。

這時的劉賓雁在別人看來，正是春風得意之時。

13 級高幹的身份，連續出國的機遇，名噪全國的作品，如日中天的聲望，和中青報唯一的“高級知識分子”頭銜，全都集於這位剛過而立之年的年輕人身上，這一年，他這個出名的“自由主義分子”還在黨支部的民主選舉中意外地被選為支部書記，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擔任黨內職務。據他的女兒小雁回憶，1956 年是他們全家最幸福的日子。賓雁原來每月的工資是 130 多元，定為 13 級以後漲到 160 元左右（可惜只領了三四個月，反右以後只剩下每月 20 元的生活費了），再加上朱洪每月也收入 90 多元，全家總收入在 250 元左右。而當時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平均只有四、五十元，就要養活一家人。他們一家的收入大約等於普通工人的四五倍。這在北京肯定是上等的生活。

劉小雁印象最深的是，爸爸每次去蘇聯，回來時總要給哥哥大洪和她帶回幾樣俄羅斯的玩具，如充氣的橡膠長頸鹿，能上弦的彩色金屬陀螺等。當時家中還有輛很“拉風”的兒童車，高高的大車輪，彩色的裝飾，十分顯眼。爸爸媽媽只要不出差，星期天經常用這輛車推著兩個孩子到北海公園去玩，一路上都有人圍著看，因為這輛車比一般竹製小輪童車漂亮多了。雖然賓雁從來都對物質追求很淡漠，當上“高幹”了仍然只喝九毛錢一斤的散裝“老白乾”，

但是他特別喜愛孩子，對孩子他是格外上心的。朱洪生下大洪和小雁後沒有奶，賓雁就花錢請來奶媽給孩子餵奶，所以小雁說，我是媽媽生的，但是奶媽養大的。

在採訪賓雁的同事和朋友時，他們都眾口一詞，說他是個好丈夫、好父親，是個很有人情味，也熱烈擁抱生活的人。

賓雁自己也說過，1956 年是他生命中的“黃金年代”。當時朝鮮戰爭已經停戰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也開始實施，國家如果全力搞經濟建設，隨著生產的發展，人民的生活也會迅速改善，他自己也剛走出了“肅反”的恐怖陰影，而他鍾愛的文學事業也有了輝煌的揭幕，他正在登上一個新的更高更大的舞台。在蘇共二十大的影響下，中共八大也透出了一些新的健康聲音，無論國家和自己，都是充滿希望的……

這一年的秋天，賓雁為四歲的大洪買了一個大風箏，他想在來年春天選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領著兒子到天安門廣場去放風箏——這是他很久以來的心願，也是他承許孩子的諾言，整年地東奔西走忙於工作，他欠孩子們和這個家庭的情太多了。

然而，這風箏終於沒能放飛，成了賓雁終生的遺憾。1957 年春天的天安門廣場上空風雲詭異，瞬息萬變，絕不是放風箏的好日子，而賓雁在這個春天的疾風中也變成了一個斷線的風箏，飄向地獄的黑暗了。

因為貧窮和卑賤而揭竿起義，是受人的本能所驅使；但勇於放棄尊貴和舒適的生活而投身苦難，則是殉道聖徒和真正精神貴族的追求。

賓雁是在人生最美好的季節走向苦難深淵的。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

沈志華：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

謝戈爾·貝利亞：我的父親貝利亞

盛禹九：二十年漂泊喜重逢

50 年代，劉賓雁演講。

第七章　迎風而鳴

每個人都在用自己一生的行跡書寫著自己的人格,對此，“人在作，天在看”，億萬雙眼睛也在看著哪。 賓雁的人格不僅是在與苦難的抗爭中展現的，也是在與同遭厄運者的對比中彰顯的。“劉賓雁時代”不僅是他自己的慷慨悲歌，也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荒唐墮落年代裡千差萬別的眾生相

左二起: 舒展、唐飛虎、王蒙、劉賓雁。 攝於 50 年代。

劉賓雁和兒子大洪、女兒小雁分別合影。 那時他們還不知道，厄運已經逼近。

上海在沉思中

刘宾雁　陈伯鸿

这些天上海春雨蒙蒙。每天傍晚，总有十几万上海人在路上或家里翻开晚报，伴着淅瀝的雨声，思索这一天提出的許多令人深思的問題。

在連日举行的几十次集会上，各界人士向党市委領导提出的批評建議涉及人民生活各个領域中的大小矛盾。問題的中心是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应該怎样領导和平时期的城市生活。人們十分兴奋地看到，上海市党的領导人如此謙虛而細心地傾听群众意見，深思熟虑地准备改进工作。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艺术家提出的問題。当上海人民文化生活的需求空前高漲而艺术家的創作欲望也十分旺盛时，却出現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矛盾：在这号称中国話剧运动發源地的上海，一个人一年里买到一張話剧票竟被認为是件大幸事，而唯一的話剧团休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員們又閑得發慌；許多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名著無論新旧書店里都买不到，作家与翻譯家却又因出版社長期不印重版書而不滿；反动統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書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反而有点繁荣。

三个根本問題是党究竟应該怎样領导文学艺术？人們的指責是：过去党的領导忽視文化艺术以及創作活动的特点，因而未能創造出繁荣創作所必需的足够条件。作协、剧院变成机关，各种行政职位与迎往迎来的活动妨碍艺术家从事創作。某些領导机关把文化事業当作工商業来办，关心最多的是財务計划而不是人民的文化需要或艺术本身。往往是外行的行政干部在艺术問題上有着比艺术家更大的發言权，而行政干部是从管理上考虑問題的。上海越剧院曾想把艺术水平提高一步，文化局害怕其它越剧团不好領导而不准許。过分的整齐划一妨碍自由竞賽从而給艺术的繁荣造成損失。文艺界要求多办同人刊物，但在目前出版管理情况下是困难的。全国第一本同人刊物"收获"是中央出版局規定的价格——一元四角，編輯者認为可降低20%。出版社的过分專業化与集中造成它的壟断，編輯的疏忽可以埋沒一个作家。此外，音乐家需要有演奏机会，美术家也需要更广闊的市場。

要領导，就需要了解。党的領导人应該有一定的文化兴趣与艺术素养这个問題已提到日程上来。作曲家黎錦暉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是否黃色歌曲，对这一問題表示意見自然要比指导一个工厂的增产节約运动复杂得多。此間文艺界人士所以怀念陈毅同志，就因为他曾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并給以各种無微不至的支持。沒有一般的艺术兴趣与素养，要关心或指导文艺显然是困难的。一位作家說，假如党市委委員都看看小說，那就是作家荣幸的事了。

人們着重提出了过去缺乏艺术創作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空气問題。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風云不可一世。电影界在文匯报討論自己的問題被怀疑为想造反，巴金的一篇小杂文引起滿城風雨。即使艺术界与社会輿論的态度完全相反，个别領导人也可以把一种意見或一部作品置于死地。人們認为，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揚抗衡的魯迅，乃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傳部長的关系不同。

上海的放，仅仅是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人还不肯說話，有人尽管說了几次仍未暢所欲言，怕"釣魚"、怕彙报、怕檢討是主要顧虑，也有人仍然怀疑解决問題的可能性。党內干部有的比党外人士顧虑还多。这种沉默和另一种沉默是分不开的。人們注意着一些党內負責干部的动向，現在的印象是：他們参加会，不說話，沒表情，也不知打的是甚么主意！这种顧虑与过去党的領导某些反复無常表現是分不开的。去年的一放与秋后的一收，以及今年3月中的一放一收，人們記忆犹新。

到目前为止，文艺界还限于提出問題，对于如何解决这些复杂的矛盾探討較少。在業已提出的問題中，有一些是地方無力完全解决的，如話剧剧本創作日益衰退的危机，出版界与作家、讀者的矛盾，以及多办同人刊物的困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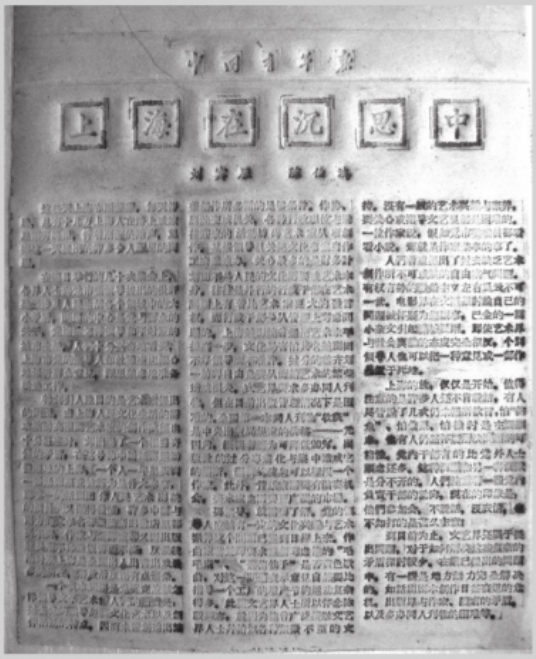
思想一日谈

十八世紀的英国作家綏夫特的"格列佛游記"，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在这本書里，作者托名为一个叫格列佛的航海家，以鋒利的文笔，写出了許多冒險故事，这是一本極有趣的書，大人們为它的逼真的描写和深刻的諷刺所感动，兒童們为它的幻誕迷人的故事所娛悅。这本書的第三部所写格列佛在勒普塔（浮島）所看到的一些情形，是很值得我們寻味的。

勒普塔人对数学的重視和爱好很特别，国王的宝座前經常擺滿着各色各样的数学仪器，御厨里也有各种数学仪器，厨師們就照着这些仪器的样子切好食物，端到国王的席上，他們把羊肉切成三角形，牛肉切成菱形，布丁切成擺綫形，面包也切成圓錐形、圓柱形、平行四边形等等。他們的观念也总是摆脫不了綫条和形体，比方說，他們要贊美一个女人的美丽，他們总是要用菱形、圓形、橢圓形、平行四边形等几何名詞来描繪一番。

勒普塔人对于数学既然是这样狂热地喜爱，照說，在应用上該是得心应手的了，其实不然。尽管他們在紙头上运用短尺、鉛笔和兩脚規都滿够精明，可是蓋起房子来永远錯誤百出，牆壁东歪西倒，相鄰的兩道牆总是形成

《中國青年報》1957 年 5 月 13 日刊發了劉賓雁和陳伯鴻的《上海在沈思中》。



《上海在沈思中》的鉛字紙板。

當“反右”的陰雲已經在頭頂聚集，一場空前的暴風雨就要來臨時，賓雁還在忙著工作，也在不停地觀察和思考著。

1956 年 7 月，他回到闊別幾年的哈爾濱去採訪，發現這個消費城市已經變成新興的工業中心了，但工人們並沒因此而多麼高興，因為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多少改善，而僵硬的體制和越來越嚴重的官僚主義壓抑著他們的積極性，幹群關係變得很緊張。

秋天，他又到湖南和湖北去採訪，廣泛接觸了從高層官員、城市工商業者，到恩施山區運輸隊的司機等社會各層次的人。 一方面，新建起的湖南省委大廈以其高大豪華讓他吃驚，一方面，底層工人的工資過低、生活困難的情況讓他難過。 他發現，在哈爾濱看到的情況在全國各地也普遍存在。

劉賓雁是個心裡存不住事的人。 看到的現象觸動了他的思想，他就要說出來。 這一年成了賓雁的“演講年”。 除了寫作之外，他還利用一切機會，到處向新聞同行宣講自己的新聞改革思想，講奧維奇金的“干預生活”理論，講他在波蘭看到的用新聞推動社會改革的實踐經驗，他從哈爾濱講到湖北恩施，一連講了幾十場，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演講才能，在全國新聞界掀起了一個想改革、議改革的“劉賓雁風暴”——當然也引起了激烈的反對意見。 但無論如何新聞界死水一潭的局面被打破了。

劉賓雁在繁忙的工作中迎來了他和全國知識分子的“五七之劫”。

整個“反右”運動分為前後兩段，前段是所謂“鳴放”階段，後段是所謂“反擊”階段。

“鳴放”階段的始作俑者是中共主席毛澤東。他於 1956 年 4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個《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個月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以此為題，向全國知識分子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這個“四大自由”的承諾使全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極為興奮，以為多年盼望的自由、民主新時代終於降臨了。接著，在這年 11 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正式決定在全國開展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黨內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於是，1957 年春天，各界人士群起響應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號召，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提出意見與建議，新聞媒體也刊出這些聲音，這就是史稱為“大鳴大放”的時期。

“反擊”階段的總決策者還是毛澤東，而前線總指揮者是當時任“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的鄧小平總書記。轉折的關鍵是 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澤東撰寫的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文章提出，要認清階級鬥爭的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第一次提出“資產階級右派”的概念。此文先是在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傳閱，後來發給 17 級以上幹部參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部署，6 月 8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運動正式進入“反擊”階段。前一階段“大鳴大放”出來的言論和說話的人都成了反擊的對象，經過半年左右的“反右”，運動以劃定了大批

“右派分子”而宣告“勝利結束”。至於在全國定了多少“右派分子”，至今說法不一，1979 年“改正”時官方承認的數字是 55 萬多（這 55 萬人當中能活著等到“改正”的僅有十萬人左右），而最近學者研究的結果是 317 萬 8470 人，兩個數字相差六倍左右（如果再加上定為“中右”的 143 萬 7562 人，總數應是 461 萬 6032 人，是官方“改正”時承認的數字的八倍多）。後一個數字的依據是 1958 年 5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的數字。（見羅冰文章《歷史解密：1957 年反右運動真相》）

對這場已經成為歷史的重大政治運動，官方至今仍然維持著 1981 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定性：“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為了證明這種“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是“嚴重擴大化”了的結論，對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只宣布“改正”而不予“平反”；還保留了幾名“右派”，不予“改正”，中央共點名保留五名“右派”，他們是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和陳仁炳。而地方各省市也效倣中央，指名保留若干“右派”不予“改正”，全國共 96 人。這就形成了一個荒唐的政治笑話：為了這區區不到百人的“真右派”，全國就打了三、四百萬之多的“假右派”，還要硬說這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其“正確率”還不到

萬分之0.3！其實，誰都看得出來，這是為當年一手主持了“反右”工作、後來又成了“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留下的一個梯子，以維護他“一貫正確”的神聖面孔。這一局面已經保持了30多年，直到今天，談論“反右”運動仍然是個思想和言論的“禁忌”，也是歷史研究的“禁區”。

至於兩個階段中間的180度轉折發生的原因，歷史的研究者中還存在著較大的分歧。“陽謀”論和“引蛇出洞”說似乎佔上風，根據是毛澤東在當年6月14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中所承認的發動“鳴放”的目的：“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他還不打自招地說了這段名言：“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還有一種說法，可以叫“被動反應”說，說毛澤東本來是真心要整風，聽取黨外的意見，矛頭原來是指向黨內的“右傾”派別的（如周恩來、鄧子恢等），但沒想到群眾的意見竟然那樣多、那樣大，而且很多都指向了他自己，這等於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於是，他就惱羞成怒，翻過手來，把“大鳴大放”打成了“右派進攻”，把黨內整風變成了一場涉及全社會的“反右”。這種說法的依據也是毛澤東的一個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30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台？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的批示）”

關於這個問題，還有個很重要的材料，是 1957 年 4 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華時與毛澤東的一段對話。伏問：“你們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是什麼意思？”毛答：“萬馬齊喑究可哀嘛。”伏說：“我們不理解，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允許報紙上發表那些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毛說：“先放麼。”“放出來我們才好駁嘛。”伏說：“可能會出亂子的……”毛答：“中國不是匈牙利，中國共產黨也和匈牙利共產黨的情況不完全一樣。”在一問一答中，已經透露出毛澤東的機心。

清代的皇帝經常調集王公貴族和八旗精銳在皇家獵苑“木蘭圍場”舉行盛大的圍獵，射殺的對象是麋鹿和兔子，其目的除了遊戲消遣之外還為了保持自己的戰鬥力；而新登大位的毛澤東則在 1957 年春天以全國大地為獵苑，以民族精英知識分子為靶標，以所謂的“人民”為鷹犬，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春狩”，“引蛇出洞”、“聚而殲滅”則是這次大圍獵的陰險毒計。這次“春狩”的真正目的是為新王朝實行絕對的思想專制舉行奠基禮。

兩種說法各有根據，但無論怎樣說，一個掌握國家政權的大黨，一個號稱“英明”的領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剛剛還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信誓旦旦地保證“言者無罪”，一翻過臉來，就大興文字獄和言論獄，給成百萬的人定罪，這不但違反中國傳統道德所推崇的信義準則，也是一種公然違憲侵權的國家犯罪行為（1954 年剛剛頒布的憲法中有關於信仰、思想、言論自由的規定）。而投餌釣魚、設阱陷人的做法對任何時代的統治者來說，都是一種卑鄙和邪惡的伎倆，為有尊嚴、有廉恥者所不齒，連清朝皇宮太和殿的寶座上還高懸“正大光明”四個字呢。“反

右運動”不僅是一樁國家罪行，也是道德罪行。而毛澤東在“反右”後的那段洋洋得意的狂言：“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然後記錄上是“大笑”（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嗜血本質和流氓嘴臉，這才是共產極權專制主義的“標準照”。

1957年的“反右”絕非毛澤東一怒之下，心血來潮的即興之作，其實早有蛛絲馬跡。

1947年10月20日，國共兩黨大決戰的前夕，有一份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黨內文件中有如下一句話：“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果然，到1949年籌備建國時，毛澤東就提出要像東歐各國一樣，把非共產黨人士一概排除，獨享政權。倒是斯大林否定了這一方案，理由是中國與東歐情況不同，這才導致了建政初期讓一批所謂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進入新政協和新政府的局面。過了八年以後，通過“反右”運動，毛澤東的“既定方針”終於得以實現了（見1992年由中央檔案館編、中央黨校出版社公開發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

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在京舉行。14日晚上，毛澤東提出臨時發言。他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

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劉少奇接著補充發言，說：“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是他個人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沒討論過，會議要備案。”毛澤東的這個發言是在決定開展整風運動時講的，明顯地把蘇共二十大所引起的東歐事變當成了大背景重提“階級鬥爭”，準備“反右”的殺機已露，只是反黨內之“右”，還是反社會之“右”，似乎還在未定之數。

1957 年中國的“反右”運動應該放到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背景下來看，才會有接近正確的看法和分析。

1956 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 20 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從興盛發展到沒落崩潰的轉折點，清算斯大林的滔天罪行和否定“斯大林主義”是歷史的主流，也是人類反對各種旗號的極權專制制度（包括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和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的偉大鬥爭的新篇章。蘇共二十大以後，“社會主義陣營”中出現了第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其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波蘭的波茲南工人運動（1956 年 6 月）和匈牙利的人民起義（1956 年 10 月），緊接著 1957 年春天發生在中國的“大鳴大放”實際上也是這波民主大潮的一部分，可稱之為“五七之春”。這是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就存在的自由民主要求在共產黨建政後的第一次集中表達。其遠源可上溯至五四運動，而其近因則顯然是對社會主義陣營內“非斯大林化”浪潮的積極回應。儘管當時民眾和知識分子並沒有打出獨立的旗號，而是在“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旗幟下，應共產黨之邀表達了蓄之既久的民主願望。而且其形式是和平、合法而理性的言說與文字，絕無非法的暴力行為，完全在憲法允許的範圍之內，不料卻遭到專制權力的非法違憲整

肅和殘酷鎮壓。

在這場世界範圍的反極權專制鬥爭中，中共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在鎮壓國內的所謂“右派”之前，中共的手上已經沾上了匈牙利人民的鮮血。賓雁在 2001 年寫下的文章《迷霧重重的中共 80 年》中就說過：

可以斷言，中共領導集團和中共反動派造下的罪孽，遠遠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們是逃不過總清算和大審判的。審判席上還將有外國人在場。因為毛澤東一夥手上不僅染著中國人的血。1956 年，蘇軍第一次進入布達佩斯後，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澤東派出中共特使劉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蘇聯才再次出兵，對匈牙利人民起義血腥鎮壓的。

“反右運動”的國際背景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共和毛澤東在國際共運中地位的上升。斯大林死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公認的領袖，蘇共二十大後，斯大林的形象被蘇共徹底掀翻，這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真空。而新上台的蘇共領導赫魯曉夫地位未穩，緊接著就發生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的未遂政變。赫魯曉夫鎮壓了政變後，急忙派米高揚到上海夜見毛澤東，報告粉碎政變的經過，要求中共表態支持赫魯曉夫。中共發了一封支持電後，各國共產黨跟著紛紛表態，赫魯曉夫的地位才得以穩固。1949 年，斯大林和劉少奇會談時曾做了一個分工：社會主義陣營的歐洲各國事務由蘇共管，亞洲事務由中共負責。可在 1956 年的波蘭、匈牙利動亂發生後，蘇共沒有解決好，還是由

中共插手後才得以鎮壓成功。這是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歐洲事務。這時的毛澤東意得志滿，興奮異常，他感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繼斯大林之後的領袖桂冠已經要落到自己頭上，而斯大林未竟的世界戰略宏圖就要由自己來繼承了。他曾經批評過蘇共在鎮壓匈牙利事件中的軟弱無能，力主要強力鎮壓；在中國國內出現民主運動時他這個強硬的“世界共運新領袖”當然不能手軟。這不僅決定了他的“反右”方針，也直接導致了後來的那場利令智昏的“大躍進”——赫魯曉夫曾謙讓地說過社會主義陣營應提“以蘇聯和中國為首”，但毛澤東回答說，你們有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和人造衛星，我們什麼也沒有，還是以你們為首吧。這就促使他急切地要用一場超常的“躍進”把中國的實力搞上去，以使自己早日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共運第一號領袖。

1957 年 11 月，“反右”基本結束後，毛澤東儼然以世界共運領袖的身份出現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聚的莫斯科會議上，他藉口腿疼拒絕離席走到演講台上去發言，而是大模大樣地坐在主席台中央，發表了即興演講。這個演講是以一個笑話開始的，他引用了《紅樓夢》中王熙鳳的話“現在是東風壓倒西風，而不是西風壓倒東風”，使全場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如墜五里霧中，紛紛交頭接耳：“王熙鳳是誰呀？沒聽說中共有個領導人叫王熙鳳啊！”但後來人們卻笑不出來了——毛澤東接著模仿著斯大林當年的腔調，發表了關於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以中國為主戰場，吸引美國二百萬軍隊登陸，然後讓蘇聯向中國戰場投擲原子彈，中國不惜犧牲三億人而徹底消滅美帝國主義的“豪言壯語”，這一震驚世界的狂妄講話是造成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大分裂的主要原因，也是毛澤東稱霸

國際共運野心的大發作。此時的毛澤東比 1949 年 10 月 1 日登上天安門時還要興奮，把“小小寰球”握在掌中，“把世界的事管起來”的感覺讓他已近癲狂。而中國人民將為他的狂妄野心付出慘重的代價，“右派”只是這一祭壇上的一道供品而已。

令人驚訝的是，毛澤東的這種狂妄野心和血腥計劃至今還為“毛左派”所津津樂道。前兩年，還有個叫朱成虎的將軍重複毛澤東的瘋話，叫囂要用核武器盪平美國，而中國不惜將“西安以東”的國土讓核武器炸成一片焦土，用一半以上人口的死亡換來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勝利……不要這種聲音只當成是幾個精神病人的狂言，實際上在中共統治集團裡確有一夥原教旨毛澤東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們至今仍有強大的影響力，中共建政 60 週年遊行中那個“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就顯示了他們的力量，而中共十八大前後“毛左派”的囂張氣焰也說明了死灰正在復燃，毛澤東的幽靈正在某些人的“中國夢”中手舞足蹈呢——他們將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何等災難，人們不可等閒視之！

現在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不應該只把 1957 年的“右派”們看成消極的受害者，僅僅強調被迫害者們的冤屈無辜和“上當受騙”，而忘記他們自由民主訴求的合理內核和偉大歷史意義——“五七之春”是共產黨建政後中國民主運動大潮的第一波，是世界反專制極權主義偉大鬥爭的一部分，也為後來的“四五運動”以及“八九之春”等民主運動開了先河，將來中國的自由民主祭壇上應該刻下這些先行者和犧牲者的名字。而劉賓雁的名字應刻在“五七祭壇”上的前三甲之列，不僅因為他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和知名度，更因為他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代表了“反右”受害者中最堅忍不屈、最有再

生戰鬥力的一支。

這年年初，賓雁從外地採訪回到北京後，有一件事在等著他：繼他的《在橋梁工地上》之後，青年作家王蒙也發表了一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生動地刻畫了一個革命意志衰退的官僚劉世吾，為中國當代文學畫廊增添了一個新的典型。這篇作品也引起了轟動——不全是讚揚的，其中夾雜著激烈的批判聲。針對這個作品，《中國青年報》編輯部在 1957 年 1 月召開了一次討論會，點名請劉賓雁參加。會前發的材料中除了王蒙的作品外，還有一篇王實味的文章《野百合花》——這意味深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意思。

會上的發言是一面倒的，報社的總編輯、出版社的社長、團中央的宣傳部長，還有北京東四區的區委副書記（王蒙就是東四區的團委副書記）都眾口一詞，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篇小說是在“向黨進攻”，是“挑撥和煽動群眾起來反黨”，“危害性超過了王實味，與蔣介石和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相近”……

有人還挑明了請賓雁來參加會議的目的：“《本報內部消息》也可以拿來討論討論嘛！”說這話的是中國青年報的總編室主任，他一直認為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中那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的總編室主任形象是影射他的。

在會上，劉賓雁只是聽著，聽著，面無表情，一言未發。

所有的眼睛都看著他。他是怕了？這來勢洶洶的討伐聲，讓他想起了什麼，看到了什麼？那些敲山震虎式的挑釁他不會聽不懂啊！可是他的回答依然是難測深淺的沉默。

如果他真的這樣沉默下去，便不是劉賓雁了。

他回答了，而且是用一種更公開、更勇敢、更莊嚴，也更負責任的形式——回去後他就寫了一篇長文，發表在 3 月號的《文藝學習》雜誌上，題目是《道是無情卻有情》，公然站出來為素不相識的王蒙辯護說：批評這個黨和這些社會弊端的人，並非是出於惡意和仇恨，而是出於愛，愛之愈深才責之愈切！

賓雁在文中說：“幾百年後，自然會有更多的人寫抒情詩，但一定也還有人寫諷刺作品。 不能說寫諷刺作品的人生來就跟某些人過不去。 與其埋怨作家擾亂了自己的安寧，還不如去責備那首先擾亂了作家安寧的東西。”文章最後滿懷激情地說：“好的文學作品總是叫我們感覺到這個時代，它發出新的聲音，叫我們更熱愛生活也更愛為它戰鬥！”

不知道昔日也曾飽歷滄桑，如今已經“告別崇高”、“修成正果”，自詡深通“老子”之道，被譽為“人情練達”已臻化境的退休部長王蒙先生，是否還記得當年劉賓雁為他兩肋插刀所寫下的這篇辯護詞？

當然，賓雁是絕不會希求被辯護者感謝和回報的。 賓雁為之辯護的，不是某一個朋友（或陌生人）的個人利益，而是公理和正義，是公民的思想權、批評權和表達權，這才是劉賓雁磊落的本色，就像王蒙之所以是王蒙一樣——他 2006 年在劉賓雁去世後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王蒙自述》，在書中專門用一章的篇幅來“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對“一位先生”（這是王蒙對賓雁的稱呼）及其作品的大方向“悍然爆彈”進行攻擊，頗有劃清界限、落井下石和“打死老虎”之嫌。 來自這位當年曾與劉賓雁齊名的“右派作家”的批判，似乎比鋪天蓋地的政治批判來得更“專業”、更有殺傷力，也更

無可辯駁——因為此時已經長眠海外的賓雁已經無法站起來為自己辯護了。

如果王蒙對劉賓雁及其作品早有意見，他是有充分的時間和機會來表達的。比如，在 80 年代《人妖之間》和《第二種忠誠》剛發表的時候，就曾有過熱烈的討論和爭議，王蒙完全可以在那時把自己的話說出來，賓雁當時還在國內，一度還擔任作家協會副主席的職務，王蒙如果那時批評賓雁作品的“大方向”，應視為正常的批評和商榷，賓雁當時還可能發聲為自己辯護。即使再晚一些，1987 年賓雁被第二次開除黨籍後，也曾經有過一個批判的高潮，王蒙也大有機會說出自己的話來，不會有任何人出來阻攔。但是，等到賓雁流亡 18 年，有國不能歸，在國內完全消聲，也不可能再說話的時候，王蒙才“勇敢地”站出來，對賓雁 20 多年前的作品大加鞭撻，這種類似“鞭屍”的行徑，到底有何奧妙，聰明無比、人情練達的退休部長先生是否可以明示一二？

與王蒙相比，賓雁的厚道反倒更令人感動。賓雁臨終前已經有人把王蒙對他的輕薄苛責轉告了他。他聽了沉默片刻，用平靜的話語為自己的“大方向”做了簡單的辯護：“我覺得文學如果不面對社會現實，就好像開車碰見了出車禍的人，不下去救，開車從邊上過去，我做不到。”然後說：“許多人批評王蒙油滑，但他們忘了‘六四’前慰問戒嚴部隊，各部委頭頭都去了，可王蒙住進醫院，沒去。開槍後王蒙辭去了文化部長職務，可見他還是有底線的。”——這種聖者的寬容襟懷與王蒙的尖酸刻薄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讓人感慨萬端。

每個人都在用自己一生的行跡書寫著自己的人格，對此，“人在

作，天在看”，億萬雙眼睛也在看著哪。賓雁的人格不僅是在與苦難的抗爭中展現的，也是在與同遭厄運者的對比中彰顯的。“劉賓雁時代”不僅是他自己的慷慨悲歌，也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荒唐墮落年代裡千差萬別的眾生相。劉賓雁和王蒙之間的關係是不能用“文人相輕”來簡單解釋的。

就拿王蒙來說吧，他之成為“右派”確有點蹊蹺。本來他是受到毛澤東賞識的一個，《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剛發表時，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 1957 年 2 月到 3 月間居然連續三次（一次是在 2 月 26 日的中南海頤年堂座談會上，一次是在 3 月 8 日的文藝界座談會上，一次是在 3 月 12 日的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站出來給他撐腰，說：“小說揭發了官僚主義，很好。揭發得不深刻，但很好。”“誰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對我。”還說，對王蒙“應該有批評，也應該有保護。”據王蒙自己說，毛澤東還說過：“王蒙有文才，有希望。”這些話一傳開，風向為之一變。如果整風沿著“反對官僚主義”一路發展下去，說不定王蒙會像評《紅樓夢研究》中的藍翎、李希凡一樣成為正面典型，一炮走紅呢。不料整風陡然變成了“反右”，開始時他還唱的是“紅臉”，在批判“神童作家”劉紹棠的大會上還義正詞嚴地積極發言。沒過幾天，他自己也胡里胡塗地挨了整。也加上他自己當時還不夠“練達”，居然把自己腦袋裡想過，但從未說出口的念頭交代了出來：“我曾經想過，像英國的海德公園那樣，誰有什麼主張，就拉過一個肥皂箱，站上去講出來，那多好，多自由啊！”這一下可把向往資產階級自由的“反動思想”坐實了，成了當“右派”的鐵證。不過，他雖然當了“右派”，但是卻被大鬍子王震弄到新疆保護起來了，這大概和毛

澤東當初表示對他要“保護”有關吧。

同是“右派”的作家從維熙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當了“右派”後的王蒙有段精彩的描寫：“他似乎什麼都知道，又好像什麼都不知道；他貌似在合眼睡覺，其實在睜眼看著四周，與其說他表現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說他對這個冷酷的世界有著相當的警覺。”看得出來，這一跤讓王蒙跌聰明了。從維熙分析說，“反右”以後，“許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種奇異的保護色，就像狡兔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黃，知了的皮和褐色樹皮同色一樣”。這些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但王蒙比這走得更遠，他似乎立地成佛，從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幹那些“崇高”的“傻事”了。全國幾百萬“右派”中有幾個能像他一樣復出後竟然爬上了文化部長的高位，而且還能在“六四”風波中明哲保身，平安著陸，這可真需要點功夫和本事。他有理由為自己的“成熟”和“練達”而得意了，但是，這種像稀粥一樣堅硬的品格，卻實在沒有資格指望得到人們的同情尊重和正眼相視，不管他多麼擅長像玩弄政治一樣地玩弄文字。

和這些人不同，賓雁執著地沿著自己選定的道路走向了“五七之難”。

“大鳴大放”開始後，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張黎群找到劉賓雁，交給他一個緊急任務：上海永大紗廠女工舉行了罷工，黨中央的副主席劉少奇批示，《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要派記者去報導。賓雁剛從東北採訪歸來，還沒來得及休息，聽到這個命令，二話沒說，就趕赴上海了。

一向要求新聞媒體歌功頌德的共產黨這次居然讓記者去採訪和報導工人的反抗，這個罕見的開明指示讓劉賓雁感到興奮和浮想

聯翩。除了任務的要求之外，他對這個題材也有濃厚的興趣：工人鬥爭過去的對象是資本家，而共產黨領導是工人階級鬥爭的先鋒隊，這次先鋒隊居然變成了工人鬥爭的對立面，這是怎麼回事？值得研究！

永大紗廠是個只有 200 多工人的小廠，1955 年實現了公私合營。當時，工人是敲鑼打鼓地歡迎黨的幹部作為公方代表進駐的。可僅僅兩年多的時間，工人就把幹部軟禁在廠裡當人質，全廠舉行了罷工。為什麼？只因為黨的幹部在廠裡專橫跋扈，目無工人，隨便任用各級官員，提拔自己看中的人，而不顧工人的意見；在待遇方面，工資、評級、獎勵、困難補助和競賽評比時都由領導說了算，根本沒有工人發言的機會；再加上管理上瞎指揮，鬧得生產下降，經營虧損，工人們怨聲載道，卻訴說無門。終於釀成了這次罷工。

可工廠黨總支卻把產生問題的原因歸咎於“國際形勢的影響”——真是一幫聰明的傢伙，他們簡直有黨中央的水平了。後來在總結“反右”時，黨中央不是也說了類似的話嗎？另一个原因是“有人傳播反動意識”（指民主思想），這後來也成了一個套路，凡“群體事件”總有“境外反華勢力”的影響和“一小撮別有用心者”出現，而多數參加者都是“不明真相的群眾”——這個套路至今還在使用，而且似乎永遠適用。

在調查永大紗廠事件的同時，賓雁繼續密切關注著全國“鳴放”的進展。他發現，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當時號召的“鳴放”，很多人還顧慮重重，害怕是“引蛇出洞”的釣餌；而一些領導幹部則持反對和消極態度，威脅和壓制批評意見。他把這些觀察和思考寫成一篇報導，題為《上海在沉思中》，發給報社了。

在上海期間，他還應上海電台青年記者王浣芳的邀請，到電台去和上百名編輯記者們開了個座談會，在會上他講了自己這幾年在工作中的經歷和思考的問題，也講了自己在波蘭瞭解到的新聞改革的情況。在回答聽眾的問題時，他越來越膽大，說了如下一些話：

“過去聽毛主席說黨內高幹十個有九個是反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還覺得可能是誇張。其實一細想，我們報紙幾年來遇到的阻力就是這些人。……最需要監督的人卻最不可能受到監督。”

“特權階級，從工廠到中央，已經形成。有人自己不願意成為特權階級分子，但把他往那個位置上一擺，他慢慢就變過去了。”

這些話不久就成為他當“右派”的罪狀了。

座談會中間，下面遞上一個條子：“看見你，我就想，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人……”寫條子的是著名文學評論家何滿子的夫人。散會後賓雁和她在咖啡館談了幾個小時，她傾訴了何滿子的不幸遭遇——1955 年被無辜地定為“胡風集團分子”坐了牢，放出來後又不給平反……賓雁愛莫能助，也只能安慰她，勸他繼續等待……幾個月後，他們夫婦雙雙被打成“右派”，而聽她訴苦的賓雁也殊途而同歸了。

這次到上海，賓雁見到了市委宣傳部的副部長周而復，他發現在談話時，周一直板著面孔，毫無表情；還見到評論家姚文元，賓雁問他上海文藝界鳴放的情況，姚守口如瓶，一言不發。話不投機，只覺掃興，但賓雁沒有多想是為什麼。這次與姚文元的不愉快會面，在“四人幫”被打倒後發表的批判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姚文元》中又被提出來，賓雁的名字仍被冠以“右派分子”的頭銜。

賓雁當時並不知道，就在他做這些的時候，他的命運已經被一

個在中國權力最大的人，用一行龍飛鳳舞的批文所決定了。

賓雁關於上海鳴放情況的第一篇報導《上海在沉思中》於 5 月 12 日見報了。毛澤東看了這篇報導，批示道："看來，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亂。"

這個"有的人"顯然首先指的是劉賓雁。而"想把事情搞亂"可不是個小罪名。在共產黨的字典裡，這個"搞亂"可以解釋為"動亂"，也可以解釋為"暴亂"，直到現在的"穩定壓倒一切"時代也是個嚇人的大罪。作家錢鋼認為，劉賓雁的這篇報導惹怒了毛澤東，是因為他無意中戳破了毛澤東正在玩的"引蛇出洞"的"陽謀"。

毛的這個批示比那個著名的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點《事情正在起變化》還要早三天。也就是說，在全國正式進入"反擊右派"階段的前三天，賓雁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他的"右派"已是"御賜"的鐵帽子了。

而這時的劉賓雁還對毛澤東抱有一線幻想，他還設想，毛澤東是支持"大鳴大放"的，而反對的只是下面的一股力量。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已經下發十天，"反右"即將公開化的時候，5 月 25 日晚，賓雁深夜難眠，還在駐地上海電台的地下室中寫下了一封致中共主席毛澤東的信：

中共中央辦公廳

請盡速轉交

敬愛的毛主席：

我是中共黨員，中國青年報記者。幾年來跑過東北、西北、中南各省市，黨內與社會生活中的不正常現象時常引起我的憂慮。我衷心擁

護擴大民主生活與整風的方針，對它寄予很大希望。一位古羅馬的哲人說過："為了取火，免不了生煙。聰明人滅煙取火，傻瓜則把火與煙一起撲滅。"這種傻瓜在我們黨內是大有人在的，至於連煮飯的火也是畏懼的，自然也不乏其人。您一定知道黨內那種保守勢力必然要對這一方針加以抵抗，希望您無論如何不要輕信這種人的意見以及他們所反映的情況，他們不僅不能代表群眾，甚至也遠遠不能代表黨。上海的情況固然有不健康的地方，但整個說來是非常好的。

請您注意：

一．黨內高級幹部中，一個特權階層已經形成。他們已完全脫離了黨組織與群眾的監督，成為新的貴族……

二．在多數工礦企業中，黨的組織出於渙散狀態。東北一些工廠中，黨員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機關中，黨內健康力量不得伸張，佔優勢的仍然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思想。有些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政治熱情衰退者竟達三分之一以上……

三．黨內比較高級的幹部中，存在"變色龍"。這種人劃不到三大主義的任何一類中去。他們永遠"正確"，十分安全，這次整風也未必整得到他們頭上。

關於黨與群眾關係的普遍惡化，就無須寫了。

送了這些您一定早已瞭解的情況，無非是出於一種憂慮：在上海和哈爾濱與一些負責幹部接觸中，深感某些人的感情與中央和群眾的感情之差異已到多麼危險的程度，而這些人在掌權，他們是"勢力"，他們有最大的發言權……黨組織與群眾的意見是非常非常難發生作用的。需要中央採取措施。

勇敢嗎？很勇敢；

尖銳嗎？很尖銳；

忠誠嗎？赤心可鑒；

天真嗎？以今日的目光看，天真得近乎可笑。

就在他寫信的時候，毛澤東的精神斷頭機已經隆隆啟動，鍘刀已高懸空中。這封信還沒來得及發出，“反右”的號角便刺耳地響起。而這封信的草稿也很快變成了劉賓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重要罪證了。

“我認為，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都不宜做官，即使有做官的機緣，也是做不長的。李銳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太正直，太善良，也太透明了，他做不到虛與委蛇、能屈能伸、在原則問題上違心權變、通融妥協。我認為你也一樣，你不適於參與實際政治，因為實際政治是所謂‘折衝樽俎’，是講價錢、做交易、玩弄權術，以實力為依歸，審時度勢，都是為了保存和發展自己，待機而動，有時不排除很見不得人的暗箱操作（黑暗處總是骯髒的），這你怎麼做得來呢？”這一段話是賓雁的老朋友、老難友、著名詩人和雜文家邵燕祥在 2001 年夏天寫給他的信中說的。當時，劉賓雁已經流亡美國 13 年了。

邵燕祥對賓雁的評價是中肯的。他和李銳老一樣，天生是對政治權術永不入門的外行漢，他們只問是非，不計利害，永遠不能像王蒙之流的政客文人一樣，把政治玩得得心應手，如魚得水。但這種天真，對思想家和文學家來說，倒是有所成就的必要條件。

還是那句老話：性格就是命運。賓雁的這種性格，就決定了他只能是這樣的命運。他就帶著這種無法改變的性格，向著自己命

定的災難迎頭而去了。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羅冰: 歷史解密: 1957 年反右運動真相

沈志華: 、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

王蒙: 王蒙自述

謝泳: 重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劉賓雁: 迷霧重重的中共 80 年

蕭鐸潔: 翻雲覆雨毛澤東

邵燕祥: 2011 年夏天給劉賓雁的信

第八章　在劫難逃

“鬥爭劉賓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後排靠窗戶的地方，已熱汗淋淋。 高個兒大鼻子的劉賓雁站在批鬥席上不斷地抹汗。……突然，坐在我前面幾排座位上的一個男人，離位站起。 當我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時，他猛然登上四樓窗台，像高台跳水運動員那樣，魚躍而下……”高尚與卑鄙，犧牲與叛賣，悲劇與醜劇，竟然在一個批判會上形成如此鮮明

“反右派”運動開始，中國青年報社在食堂舉行大會，劉賓雁作檢討。

劉賓雁被劃為“右派”之後，難得地與孩子在一起。

2012 年，《中國青年報》當年的老同事坐在一起回憶劉賓雁和那個驚心動魄的年代。

的對照——在整個“劉賓雁時代”，這樣色彩鮮明的對照比比皆是

1957 年 5 月的最後一天，劉賓雁坐在從上海返回北京的火車上，像每次出差結束時一樣，他有點想家了，特別是想兩個孩子。一年多來他忙於國外國內地到處跑，很少有機會在家和孩子們在一起。 他並不知道，這次採訪是他七年記者生涯的休止符，而下一次採訪將是在 22 年以後了。

火車向著北京跑，軟臥包廂中很寧靜，但賓雁的心情突然煩亂起來——剛剛翻開報紙，看到一條報導，讓他極度不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葛佩琦在鳴放中揚言“要殺共產黨”，這讓他萬分震驚。這段文字如下：

葛佩琦說：“我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是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

《人民日報》上白紙黑字這樣寫著，讓賓雁不能不相信。 他震驚於真的有人如此仇恨共產黨，震驚之餘又擔心由於這種聲音的出現，會引起激烈的反彈，導致各界群眾“鳴放”出來的大量正確意見都會被淹沒和歪曲。

賓雁當時並沒有意識到，他偶然看到的這則報導是一條精心策劃的假新聞。 這條假新聞是 1957 年全國所披露的大量“右派言論”中最惡毒、最猖狂和最反動的“極品”，也是中共利用新聞宣傳操縱輿論的“大手筆”，凡是研究中國新聞史的人都不能忽視它極其重要的意義。 它不僅直接影響到“反右”運動的發展和走向，也

影響了 22 年後對“反右”運動的總體評價。

22 年後，當重新評價“反右”運動提上日程時，當年的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後來的“第二代核心”鄧小平一錘定音，於 1980 年 3 月 19 日說了一段影響深遠的千鈞之言：“……這個時候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潮是不行的。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太大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 1957 年不存在反社會主義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他最後斬釘截鐵地說：“總之，1957 年反右本身沒有錯。”（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243–244 頁）

鄧小平所說的“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主要的依據就是這則假新聞。這則報導成了“反右本身沒有錯”，只是“擴大化”了，因此不能全盤否定的最重要論據。這則假新聞決定了幾百萬人的命運，和與之有關的上億人的一生。“輿論導向”真的可以禍國殃民啊。

其實，葛佩琦本人在見到這則報導以後，於 1957 年 6 月 9 日就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闢謠信，指出這個報導是捏造的，完全歪曲了他的發言。他還聲明，自己當時說的原話是：“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諸如“推翻共產黨”和“殺共產黨人”之類的話完全不是他說的，而是別人添加進去的。他要求《人民日報》予以更正。

然而，誰理會他的聲明呢？以這則僞造的假新聞為證據，葛佩

琦不僅被打成了“極右分子”，還被繩之以法，以“反革命罪”判處了無期徒刑。判決書中最顯赫的罪狀就是“該犯竟公然叫喊要殺共產黨人，要推翻人民政府”。他在山西監獄服刑 18 年，到 1975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全部予以“寬大釋放”時，他才得以釋放——他曾經有過“國民黨少將參事”的頭銜，其實那是他做共產黨秘密工作時的掩護身份。這位 1938 年就加入中共的地下黨員曾是“一二九”運動的骨幹，後來在秘密戰線立下過殊勛，他絕想不到自己會以委屈蒙冤的方式為證明“反右”運動的“正確性”而繼續做出了“特殊貢獻”，以至讓鄧小平 20 多年後還念念不忘。

出獄後的葛佩琦一直為自己的平反而奔走呼號。直到訴狀送到胡耀邦的桌上，胡耀邦才批示予以復查（這是胡耀邦批示的第 2001 號訴狀！），1980 年底，北京市人民法院才作出“葛佩琦無罪”的判決，1982 年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作出撤銷把他劃為“右派分子”的決定，1983 年 5 月北京市委組織部為他恢復了黨籍。1993 年 1 月 13 日葛佩琦因心臟病而逝世，終年 82 歲，這位被栽贓“要殺共產黨人”的老共產黨人走完了自己悲劇的一生。

翻閱 1957“反右”的歷史資料，人們會看到，真正“殺氣騰騰”的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毛澤東說了“我們坑了4 萬 6 千個儒”之後的惡魔式狂笑讓人毛骨悚然；而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工作報告》中，嚴厲斥責道：“現在還有一些同志，在反對黨內右派分子鬥爭中，表現了較嚴重的溫情主義，特別是對一些應該劃成右派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種情緒必須加以克服。”鄧小平這些話並非一般而說，而是確有所指的。

其中一個典型就是關於李愼之是否定為“右派”的爭論。這位曾任周恩來總理外交秘書的國際問題專家，時任新華社國際部負責人，在外事系統和新聞界人望極高，無論思想人品還是業務水平都得到公認，很多領導幹部都不同意把他打成“右派”。鄧小平卻力排眾議，堅決把他劃為“右派”。這位“反右”的總指揮比毛澤東還要極端，曾極力主張對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 64 個著名的“大右派”一律逮捕收監，後因毛澤東不同意而沒有實施。“反右”運動結束後，他在 1958 年又搞了次“反右補課”，一再強調不能“姑息養奸，養癰遺患”，對不少“漏網者”窮追嚴打，繼續擴大打擊面。事後他至死也不承認“反右”錯了，只承認問題是“擴大化”了，但從未向任何一個人道歉。在“右派改正”時，胡耀邦原打算給所有“右派”補發工資，但鄧小平堅決反對。宋慶齡代表海外華僑說：“你們如果真沒有錢，我可以建議華僑募捐，用以補發‘右派’的工資，我本人也可以從自己的財產中拿出錢來，如何？”鄧小平還是堅決反對。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沒有一點懺悔之心的，從來沒有心慈手軟過。

被軟禁中的趙紫陽曾評價鄧小平說：“經我和鄧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他認定了的問題不會改變。”他還回憶起在“鳴放”階段，鄧小平到廣東指揮和部署“反右”工作時，就指示要“放長線釣大魚”……鄧小平的這些話語與 1989 年他悍然決定大開殺戒時的講話異曲而同工，都是他鐵石心腸、鐵血手腕的明證。

這種邪惡詭計和冷血殘忍，是天真的劉賓雁當時所無法想象的。他是帶著對黨和國家的忡忡憂心回到北京的。他不知道，羅網正在他頭上落下。

1975 年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從監獄中死裡逃生後良心發現，曾披露了這樣一個秘密：“抓右派之前，（毛）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 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周揚說：“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毛澤東連延安的老賬都要算，劉賓雁在“鳴放”中的現行把柄“要把事情搞亂”他怎麼能輕易放過呢？毛澤東的“菜單”上絕對少不了他的名字，他篤定是周揚所說“在劫難逃”的一個了。

賓雁回到報社時，“鳴放”已接近尾聲。 作為報社編輯部第二黨支部的書記，他找到副書記（一位女編輯），瞭解了前段運動的情況。 兩人一致決定，既然黨中央還沒有宣布停止“鳴放”，那就應該繼續執行黨的指示。

然而，形勢已經急轉直下。6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兩天以後又發表了《工人階級說話了》，報紙上鋪天蓋地是各地工人召開座談會，“憤怒譴責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報導。 顯然，這一切都是按計劃和部署進行的，毛澤東已經開始收網了。

就在這個背景下，劉賓雁所主持的黨支部大會 6 月下旬在報社的大會議室頂風召開了，主題依然是“繼續鳴放”——這個“劉大頭”啊，還真是個“一根筋”。 這裡面有多少是對共產黨的忠誠和篤信，有多少是對公理和正義的執著追求，還真難以一句話說清，可能兩者都有吧。

會上發言並不踴躍，很多人都保持了觀望的沉默。 作為主持人的劉賓雁受到刺激，反而大膽起來，他說：“不必顧慮，我們是在按

毛主席的要求整風。我知道，黨內有人反對，有人害怕聽不同意見，而這正是我們必須整風的原因。再聽任官僚主義和特權現象發展下去，這個黨就危險了……”他把這些日子裡的思考一股腦地和盤托出了。

在賓雁的帶動下，會場上活躍起來了。黨員們一個接著一個發言，連平時最少說話的一個老黨員也談了對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意見。會後，賓雁還提議將會議發言寫成簡報張貼出去——明人不作暗事嘛。

這一下引起了更多關注。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聞訊親自來到報社，聆聽黨員們的意見。賓雁當著胡耀邦的面，又全面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一個黨員在黨面前有什麼不可說的呢？

賓雁一邊發言，一邊打量著胡耀邦的表情。只見他的臉色越來越陰沉，賓雁當時心裡還有點不以為然：你不高興我也要說，偏要說！難道當領導的只能聽好話，不能聽批評嗎？想到這裡，賓雁乾脆把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胡耀邦：“你們不瞭解群眾。耀邦同志，你住在深宅大院裡，知道老百姓一個月吃幾兩油嗎？你知道豬肉和雞蛋漲到多少錢一斤了嗎？你不知道。你們也不瞭解我們，老是不放心，怕知識分子造反，其實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國發生匈牙利那樣的動亂，我是不會上街反對共產黨的，但我也不會跟在工人後面盲目地只喊共產黨萬歲！”他的這最後一句話是針對《人民日報》剛剛發表的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他對用工人來壓知識分子的做法十分反感……

直到過了好多年以後，賓雁回憶起這一幕，才覺得自己當時恐怕是誤解胡耀邦了：他應該是早就知道毛澤東正在施展的“陽謀”，

看到一個年輕人往槍口上撞，往羅網內衝，他是在為自己擔心啊！

這就是劉賓雁。耿耿忠心，坦坦蕩蕩；有點英雄氣，又有點“傻氣”；什麼“察顏觀色”啊，“審時度勢”啊，“見風轉舵”啊，他似乎一點也不懂。

結果很快就來了。

7月8日晚，在大飯廳召開報社全體人員大會。賓雁像平時一樣搖著扇子進去了。黨委書記佘世光主持會議，團中央還來了一個書記處書記。佘世光的發言直奔主題：“有人說我們團中央系統，我們青年報社沒有右派。究竟有沒有呢？”全場靜得掉根針都能聽得到，這時他大聲宣布：“有！劉賓雁就是一個！”由於用力過猛，他的聲音有點撕裂。

全場愕然。

片刻肅靜後，幾個顯然事先安排的批判發言開始了。第二個發言的是個印刷廠的工人。他說：“劉賓雁這個人從來就不像個共產黨員，他的氣味不對。”賓雁有點吃驚，兩天前在街上遇到，他還熱情地非要給大洪拍張照片呢。有幾個前幾天還與賓雁看法一致的人，也站起來參加批判了。

最後，輪到賓雁說話了。他緩緩地站起來，全場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用儘量平緩的語調說：“這個會不僅對我，對很多人都很突然，因為大家平時並不認為我是那樣一個人……我有缺點和錯誤，但我會是個右派分子嗎？”接著他對前面的幾個批判發言的失實之處一一進行了辯駁……

這時，會場上響起了叫聲：“不要聽他的！不要上他的當！”

此刻，賓雁對那些噪音沒有多想，他關心的是，妻子朱洪也在

會場裡，如此場面，她能經受得住嗎？

朱洪在幾十年後回憶說，她當時完全被震呆了，腦子裡一片空白，連如何散會，如何回家，她都記不得了。而賓雁記得，走出會場時，朱洪站在門口，對賓雁說："不要擔心，一定會搞清楚的。"

當天晚上，賓雁就騎車找到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羅毅的家裡，此人曾在 1950 年和賓雁一起參加過中國青年訪蘇代表團，對賓雁有所瞭解，此時他是團中央"反右"工作的負責人。他說了幾句安慰話，如"要相信黨"之類。當賓雁深夜走出羅毅的家時，看到路燈下站著朱洪的身影，她一直在路邊等著他。見到賓雁，朱洪向他轉達了一個朋友的話：要冷靜，千萬不要走自絕的路……

賓雁聽了一笑：我才不會自殺呢——決不！

這只是個開始，後面緊接著是一連串大大小小的批判會。在會上，賓雁總是據理力爭，百般辯護，但評價總是"不老實"，"不坦白交代"和"抗拒運動"。中青報社的院子裡拉起了幾條繩子，上面掛滿了批判"右派分子劉賓雁"的大字報，《中國青年報》也連續多日從頭版頭題到後面各版發表點名批判他的文章，連賓雁當年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時拜為義母的一個不識字的老太太，也在《中國青年報》上批判他的文章上署名了，可見群眾"發動"得多麼充分和廣泛。劉賓雁幾天之內就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了。幸好，當時的"鬥爭水平"還不高，"革命群眾"還沒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樣，掌握"噴氣式飛機"、"掛大牌"、"戴高帽"等各式"先進"的體罰技術，賓雁回憶起來總感到慶幸。

真正使賓雁震動並給他留下終生記憶的，是在北京日報社四樓會議廳舉行的首都新聞界批判大會上發生的事件。

據賓雁回憶，他站上批鬥席接受批判，不一會，忽然會場上不知為何像刮過一陣風般騷動起來，會議暫時中斷了。後來才知道是賓雁的一個朋友戚學毅在這時突然站起來，衝向窗戶，一頭撞出去，跳樓自殺了。但是，由於所站的位置和角度，再加上賓雁當時低著頭，具體細節他沒看清楚。

而這一天最受驚嚇的是朱洪，她也去參加了了批判會，因為路上耽擱進場稍晚。進了會場就聽說有人剛剛跳樓了，她腦袋裡轟地一下，緊閉住雙眼：賓雁，你怎麼會走這一步！等慢慢地睜開眼，看到賓雁還站在批鬥席上，狂跳的心才漸漸平靜下來。接著聽說死者是戚學毅，淚水又涌出了眼眶——這是賓雁的好朋友，他們家中的常客。死者的一件外衣還留在賓雁家，一直掛在牆上，是前幾天他來看望賓雁時丟下的。

北京作家從維熙當時在台下，對這個驚人的場面看得比較清楚。他在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鬥爭劉賓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後排靠窗戶的地方，已熱汗淋淋。高個兒大鼻子的劉賓雁站在批鬥席上不斷地抹汗。（賓雁的）粗粗的男低音和（批判者的）尖利的女高音組成的討伐聲，正在大禮堂裡迴盪之時，突然，坐在我前面幾排座位上的一個男人，離位站起。當我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時，他猛然登上四樓窗台，像高台跳水運動員那樣，魚躍而下。麻線胡同一個挎著籃子買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墜的龐然大物嚇得坐倒在路旁……”

這些場景的記憶應該是不會錯的，但他說事情發生在６月份顯然有誤。因為報社第一次宣布賓雁是“右派”是在７月８日，到首都新聞界亮相應該在這以後。而另一位雖然因為年輕一點沒趕

上參加“反右”，後來卻與賓雁一家有過密切交往的詩人雷抒雁，在80年代寫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劉賓雁》中，認定這天恰好是中秋節（萬年曆顯示，那年的中秋是9月8日，星期日），他記下了這樣一個情節：事發當晚，朱洪對賓雁說起了當天上午自己的一場虛驚，賓雁望著窗外的明月說：“那不會是我。我記得今天是中秋節。我死了，你和孩子的這個團圓節該怎麼過啊！”這個細節可以印證戚學毅自殺的準確時間。

這位戚學毅是賓雁同部門的編輯和關係密切的朋友，早在學生時代就入了中共地下組織，但後來因為所謂“個人主義”而被開除黨籍。賓雁覺得他工作能力強，經常出好點子，是個不錯的編輯，一直在想辦法為他恢復黨籍。至於他為何自殺，人們有各種猜測，有的說是為了以死抗議對賓雁的迫害和批判，有的說是因為他自己也有問題，害怕了……而批判會的主持人在一陣慌亂後，馬上就鎮靜下來，當場就厲聲宣布，這是反動分子為干擾對劉賓雁的批判而做的“醜惡表演”，還說了些諸如“物以類聚”、“兔死狐悲”“自絕於人民”之類的話。戚學毅在死後也被補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了。

在“反右”和歷次政治運動中，自殺者多得不計其數，可以十萬百萬計，但像戚學毅這樣，選擇這樣的時間和場合，以這種示威方式自殺的，恐怕沒有幾個。如同“夷門自剄”為信陵君送行的古代義俠侯嬴一樣，中國人的賁張血性、俠腸義骨和生死之誼有時就會演绎出如此壯烈動人的篇章。從維熙的回憶錄《走向混沌》問世後，戚學毅的侄子曾從浙江寫信給作者，對作品披露了戚學毅之死的真相表示敬意。他也認為，以他對叔父的瞭解，戚學毅之死絕不

是因懼怕而怯懦地逃遁，也不僅僅是傳統的“士為知己者死”那麼簡單，而有著更重要的內涵——是以死對“反右”和整肅知識分子的暴行表示的莊嚴抗議和控訴。這顯然是一種悲壯的挑戰。他的死深深地震撼了賓雁的心，也刻在了許多目擊者的記憶中。

人們注意到，賓雁後來對這件驚心動魄的事很少提起，即使提到也语焉不詳。是他淡忘了？绝對不会，誰會忘記發生在自己眼前的如此慘烈的死亡——何況死者又是自己的好友，而死亡的原因還與自己有那樣密切的關係？正确的解释是，大痛無言，大悲無聲，這實在是太慘痛了，以至賓雁連回憶起來都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更難以用語言和文字來表達。

至於那位被死亡和鮮血打斷了發言的“女高音”批判者，是北京日報社的團委書記，一年前她多次主動找到賓雁，自稱是他的崇拜者，盛情邀請他到北京日報社去做報告。賓雁反復謝絕無效，最後只得去了。還是同一個人，卻像川劇的變臉一樣，這次她扯著高腔，聲嘶力竭地批判賓雁是“費盡心思尋找機會，到北京日報來向青年記者放毒”，這謊言讓賓雁十分反感，忍不住當場爭辯起來。不知這位當時還很年輕的女士如今安在，她後來是否曾為此懺悔過——多半不會，中國人似乎沒有這個習慣。

高尚與卑鄙，犧牲與叛賣，悲劇與醜劇，竟然在一個批判會上形成如此鮮明的對照——在整個“劉賓雁時代”，這樣色彩斑斕的對照比比皆是。

在這次批判會的休息時間，賓雁遇到了鄧拓。兩人只心照不宣地簡單問候了一下，沒有多說話。賓雁發現鄧拓的臉色灰暗，表情沉重。他當時並不知道，鄧拓剛剛遭到毛澤東的嚴厲訓斥，毛澤

東指著鄧拓的鼻子說，以前說你是“書生辦報”，現在看來你是“死人辦報”了。又說：“你要是漢元帝非亡國不可。”毛還用侮辱人格的流氓語言說：“你占著茅房不拉屎”……（見《炎黃春秋》2012 年第十二期陳泊微的文章《鄧拓被毛澤東訓斥後的反應》）5 月份在上海，賓雁曾給鄧拓寄去一篇訴說中國記者沒有充分權利的稿件，放到這時候，應該也算是個“罪證”了。鄧拓沒有採用，但也沒有上交，只是悄悄地退回給賓雁了。賓雁為此而默默地感謝他。這位中共官場中罕見的學者型領導人躲過了“反右”，但在當時有不凡的表現。在“鳴放”階段，他讓《人民日報》發表過不同意“大鳴大放”的文章，為知識分子發熱的頭腦潑點冷水——也許是他比別人更早地看清了“引蛇出洞”的“陽謀”，想以此來挽救一些人，但這得罪了毛澤東，讓毛澤東耿耿於懷。“反右”後他在巨大的壓力下被迫辭去了《人民日報》的領導職務，調到了北京市委，但如俗話所說，“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九年後的“文革”一開始，他就作為“三家村”的“黑店主”被揪出來，並於 1966 年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決定的“五一六通知”下達之後兩天）自殺身亡。這位老共產黨人和知識淵博的學者經過的政治運動太多了，他料到洶湧而來的“文革”將是空前的凶險，也知道毛澤東不會輕饒過自己，於是就選擇了這條“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絕路。他的死又佔了個“第一”，是全國因“文革”而自殺的第一人（繼他之後的第二個死者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田家英，死於 1966 年 5 月 23 日，比鄧拓晚 5 天。但他是自殺還是被殺的，至今還是個疑團）。在這之後自殺的人成千上萬，光文化界、知識界的著名人士就有一個長長的，似乎沒有盡頭的大名單。“反右”和“文革”成了毛澤東對世界上最偉

大的民族文化之一進行毀滅性大砍伐的瘋狂祭典，也是血洗中國知識精英的“巴托羅繆之夜”的教堂鐘聲——至今還餘音繞梁，久久不絕。

作為“文革”的第一个血祭者，鄧拓在臨死寫下的遺書是以這樣的字句結束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這不是他一個人的現象，很多“反右”乃至“文革”中的自殺者都是如此。對此，至今還有人爭議不止。有人說這是至死不悟的“愚忠”的表現，其實這樣的評價有點簡單化和表面化了。遺書中的幾個口號直接的意義顯然是對強加於他的罪名的否認，這本身就是對政治迫害的一種控訴和抗爭（儘管是消極和無力的）。此外，還必須考慮到，這是死者對家屬和親人們試圖進行最後保護的一種方式。否則就無法解釋在蘇聯大清洗中那麼多老布爾什維克何以都違心地承認明顯是荒唐的罪名（如“外國間諜”之類），甚至臨死還高呼“斯大林萬歲”了。蘇聯和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自殺者們這一反常的舉動，原因應該到共產極權制度的特別殘酷性中去尋找，而不能僅僅歸罪於死者的軟弱和愚昧。

當我們回顧這這些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以死抗爭”事件時，頭腦中的思維和手中的筆突然沉重而滯澀了：如今，採取這樣極端抗爭形式的不再只是像戚學毅那樣的先覺而絕望的知識分子的“專利”，而成了社會底層民眾表達自己反抗意志唯一可行的普遍選擇了，用跳樓、投河、上吊、服毒、割腕、臥軌、自焚，乃至“人肉炸彈”等極端形式拼死一搏的現象到處都頻頻發生（僅 2012 年在西

藏就發生了慘烈的自焚事件近百起），這意味著什麼呢？是社會的進步，還是社會斷裂與崩潰的標誌呢？什麼時候人們有了冤屈和不同意見，可以不必再付出如此血腥而悲慘的代價，而有了正當、和平、合法而文明的申訴與表達渠道呢？一個眼睜睜地看著這些慘劇到處發生卻無動於衷，甚至怡然自得，繼續高唱自我頌歌的政權，該有一副什麼樣的鐵石心腸啊……

報社的“反右”並沒有因為揪出了劉賓雁而停止。賓雁之後，又有 16 個人被打成了“右派”，佔所有採編人員的 15%，其中包括總編輯張黎群（張 1957 年由於胡耀邦出面找鄧小平力保而暫時過關，但在鄧小平主持的 1958 年“反右補課”中還是被打成了“右派”）、副總編輯鍾沛璋和陳模，加上青工部、文藝部、記者部、思想修養部四個部的主任，九名編委中“右派”佔了五個。主要領導和所有業務骨幹幾乎被一網打盡了。其中以賓雁的問題最為“嚴重”。有好幾個人的罪狀只是讚揚過劉賓雁的作品，而最後一個是畫家路西坤，他的罪狀是頑固地不服從到外地去工作的調令。

但批判會開了一個又一個，交待寫了一回又一回，劉賓雁的問題卻遲遲不能定案，這似乎有點奇怪。按說他的問題最透明，發表的文章都白紙黑字地放在那裡，到處的演說都聽者甚眾，不乏證明者，甚至連沒來得及發出的致毛澤東的信函草稿也被“繳獲”了，這些都足夠給他定案了。問題出在哪裡呢？

——問題在於還缺少一個言論和行動後面的“動機”。報社一位黨委副書記點明：“你應該交待反黨罪行後面的動機。”這成了一連串批鬥會的主題。直到 30 多年後，賓雁看到了“反右”的歷史文件，其中有個關於“右派分子”如何分類劃級的規定，而“有政

治野心”是定為“極右分子”的一個必要條件。賓雁這才恍然大悟：那位副書記是存心為把他定為“極右”在湊材料呢。

這位副書記對賓雁的作品《本報內部消息》懷恨已久，他認為文中的那個唯上是從、獨斷專行的總編輯馬文中是以他為原型寫的，所以一直對賓雁不依不饒，非置之死地不可。

“我的目的是企圖用自己的思想影響別人。”經過反復思量和字斟句酌，賓雁終於在最低限度上承認了自己的“政治野心”——這也是實話實說，誰寫作和演說不是為了影響他人呢。那位副書記雖然還不太滿意，但有了這句話也就夠了，他一拍桌子說：“對！這就是政治野心！”。

經過半年多的批鬥、交待和反復檢討，1958 年 3 月 5 日，一份關於劉賓雁右派問題的結論終於擺在他本人面前。這個文件共有 3000 多字，有六個小標題，分別是：“猖狂攻擊黨中央和黨的各級領導”，“否定黨領導的文化藝術事業成就”，“汙蔑肅反政策和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反對黨對報紙的領導”，“否定黨領導青年工作的成績”和“鳴放期間進行一系列猖狂反黨活動”。

結論：“劉是有政治野心的資產階級右派在黨內的代言人，是極右分子。”

處理意見：“開除黨籍，撤銷原有職務，實行留用察看。”

既定目的總算達到了，賓雁果然成了“極右分子”。

文件一式五份，下面均由劉賓雁自己一一簽字——這個簽字並不意味著他同意和接受這個結論，後來他說過：“把我打成右派分子有三條說不過去的情理：第一，是你號召我說話的；第二，我說的都是實話；第三，我說的全是為了你好。憑這三條，變成階級敵人，

怎能服氣？”（見劉再復的文章《緬懷傻到底的賓雁老大哥》）。然而在當時的情勢下，作為一個任人宰割的羔羊，他還能指望什麼樣的結果呢？

在自己的政治死亡書上簽字後，賓雁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心情格外平靜。斷頭機的鍘刀終於落下了，“咣”的一聲響後是一片寂靜——最可怕的不是死亡的來臨，而是對死亡的等待。

但是，接踵而來的消息讓他無法平靜了。他的姐姐劉放，因為替賓雁鳴不平，也被打成“右派”了，而且也是“極右分子”，對賓雁來說，這是比自己落難更大的打擊。民間有句俗話，叫“長姐如母”，這對賓雁不僅是個“說法”，而是事實。賓雁從小就跟姐姐形影不離，長大後來北京讀書，也是投奔的姐姐。多年來靠姐姐的拉扯撫養，一直到 18 歲離家參加革命。母親早逝後，姐姐成了他在這個世界上最親近的人。賓雁說過，姐姐給他的愛超過了父母。但姐姐的命很苦，結婚後家境每況愈下，和姐夫王英的關係也不和諧。1955 年在肅反運動中，王英自殺，撫養孩子的重擔全落在她一個人身上。幾年來，每月發了工資，賓雁都要拿出一些來資助姐姐。姐姐是因為替他說話而當上了“右派”的，這更讓賓雁心如刀絞……

從此，更沉重的負擔劈頭壓下，在當了“右派”後，每月一百五六十元的工資變成了 20 元的“生活費”，自己的兩個孩子全靠朱洪一人的工資來撫養。即使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他還要盡力幫助也成了“右派”的姐姐，甚至把兩個外甥女接到自己家來，和親生兒女一起撫養多年，直到她們高中畢業，這是後話。

筆者在採訪賓雁當年的同事和朋友時，大家都異口同聲稱讚賓雁，說“時窮節乃見”，由他對姐姐一家的情誼和擔當，足見他的

人品。有位女同事說，這才叫男子漢呢——當然，他們也說，由此也可知朱洪的品格，這個上海姑娘在賓雁落難後，不棄不離，擔起如此重擔，“她也真不容易”。

賓雁成了“右派”，不僅使家庭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把重擔全壓到朱洪瘦弱的肩膀上了，更重要的是給她個人的前途蒙上了沉重的陰影。她本來是《中國少年報》的創業元勛之一，正在積極要求入黨。一夜之間她成了一個全國著名的大“右派”的妻子，凡是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雖然表面上她還可以繼續上班工作，但“家庭成員”和“社會關係”一欄中填寫上劉賓雁的名字後（那時的人事登記表中還專門有一欄“家庭成員和社會關係中有無殺、關、管者”，而“右派”則是“被管制”的對象），她已入另冊，絕無上進的可能了。這以後又誕生了一個新詞叫“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中，“右派”位列第五，排在“壞分子”之後，凡沾邊的人，包括夫妻、子女和親戚，在即將來臨的文化大革命中都統稱為“黑五類”，是共產社會的“賤民”，隨時都可成為“專政對象”，賓雁的家屬當然也不能例外。

賓雁的愛女小雁當時還小，不懂事。有一天在幼兒園了看到有個身材高大的清潔工來打掃廁所，身影很熟悉，走近一看，原來是爸爸。她只覺得很奇怪：爸爸今天怎麼不寫稿子，而來幹這活了？儘管她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但她已本能地知道這不是什麼光彩事，所以不敢去問媽媽，從那時就有個陰影籠罩了她，使她知道自己和別的孩子不一樣……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反面是“一人墜地獄，全家成小鬼”，中國傳統的“株連法”和現代“階級鬥爭”結合出來了如此殘酷的

怪物，這是紅色恐怖比所有白色恐怖更可怕的地方。

賓雁在當了“右派”後的記憶中，最慘痛的不是自己所受的千般苦萬般罪，而是一件小事，一個無聲的細節：

在長時間離京到農村去“勞動改造”時，他在 1959 年底獲得了一次回家探親的機會。進了北京，他沒有直接回家，而是直奔幼兒園去看望兩個孩子——他日日夜夜想念著他們。可把兩個孩子叫出來，本想立刻抱在懷裡，狠狠地親一下，卻發現孩子一左一右地站在身邊，兩人都低著頭，眼睛望著別處，連一聲“爸爸”都沒叫。賓雁可以想象孩子們受到了多大的壓力，這時，他才覺得自己真的是個罪人了——只是在妻子孩兒面前。他的眼淚嘩地一下流了滿臉，這是他戴上“右派”帽子後第一次流淚……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這個鐵血硬漢也有最柔軟脆弱之處。但這個“阿基琉斯之踵”非但沒有使他傾頹，反而支撐他一直站立不倒，因為他心中還有愛，他愛生活，愛自己的家，愛這個世界，有愛就有生存的意義。

——可為了這次流淚，在回到“勞動改造”的農村後，他又受到了一次批判。一個當時在場的“右派”在“反省會”上揭發了他在兒女面前的無聲落淚，還裝作義憤填膺的樣子質問他：你哭什麼？這是什麼感情？是不是出於心裡對黨和“反右運動”有仇恨……

賓雁沒有回答，只是用他招牌式的動作——瞇縫著眼睛緊緊地盯著那個企圖靠檢舉告密來立功的人——很多熟悉賓雁的人都對他的目光印象深刻，有人還在他逝世後以此為題寫下悼念他的文章《賓雁先生永遠留下了他的目光》。他的眼睛是最有表情特點的器官，從不遊移閃爍，躲閃迴避，而是坦誠自信而明亮銳利，敢於與

任何人正眼相對。他八十歲重病時坐在藤椅在留下的最後一張照片上，這目光依然是那樣深沉犀利，具有穿透性。不同的場合下這凝視有不同的含義，有時是關切，是傾聽，是同情；有時是懷疑，是探尋，是緊張的思考；有時則是審視、是批判，是譴責和輕蔑……此時他不動聲色，甚至不發一聲，只是用那瞇縫的眼睛盯著告密人，這目光如炬如刀，直刺得那人轉過臉去，不敢正視。

賓雁後來說，這樣的事他經歷了很多，為了提前“摘帽”，不少“右派”都是這樣用豆萁相煎、同類相殘來“立功贖罪”，“改惡從善”的。如果說戚學毅悲壯的死曾使賓雁看到了人性中最美的光輝的話，這種來自“難友”的出賣和批判，則使他領教了人性中卑賤和醜陋的另一面。經歷過煉獄後的賓雁再也不像原來那樣天真了。

支撐著他的還有一個信念：以他的經驗，任何一次政治運動過後不久，總有一個糾偏、甄別和落實政策的階段，他深信，到那時他的問題就會澄清，各種枉加的罪名就會被撤銷，自由就會恢復。他還相信，這一天的到來不會等很久。在動身去山西平順的那天，團中央的秘書長來送行，說他們的勞動改造可能需要三至五年，當時賓雁的感覺是太長了，不會等那麼久吧。他不知道，這一天要等上“三至五年”的多少倍，是漫長的 22 年——為了毛澤東的無情殘忍，也為了鄧小平的厚顏“自尊”，還為了眾多劊子手們的白手套。況且 22 年後等來的還是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半吊子貨——不叫“平反”而叫“改正”，而且還不是全部。

他後來坦白地說過，如果當時就有人告訴他，要等 22 年之久，那他能不能堅持下來，就真是個問號了……

每天早晨睜開眼，就盼望著希望的太陽升起；而每天晚上入夢前都希望明天的太陽不一樣。他就在這希望中，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年又一年……

希望，是生命的原動力；而絕望，是死神的大鐮刀。

當年的“右派”中，有多少人都因為絕望而放棄了生命，而賓雁能在苦難中堅持活到重返社會的那一天，是因為他始終對自己的清白無罪堅信不移，也從來沒有放棄希望。

他為希望而活著，就像“六四”後很多人能活下來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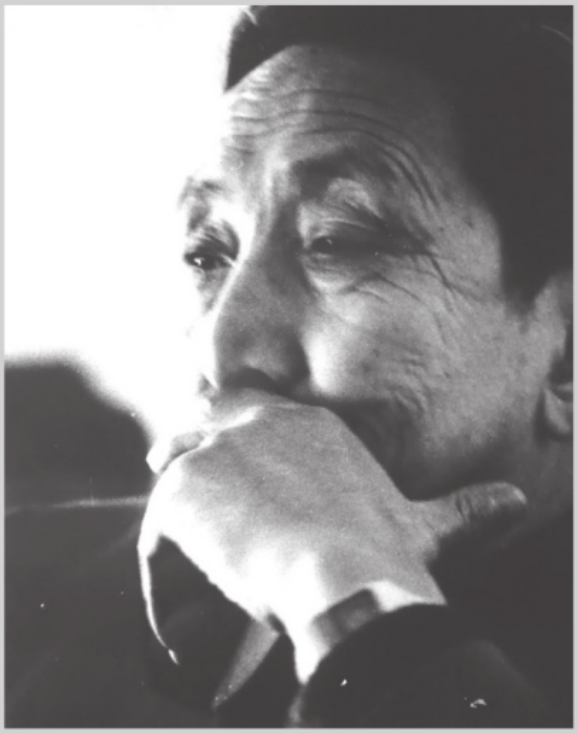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戴煌：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

郭羅基：周揚透露1957年文藝界反右派重要情節

從維熙：走向混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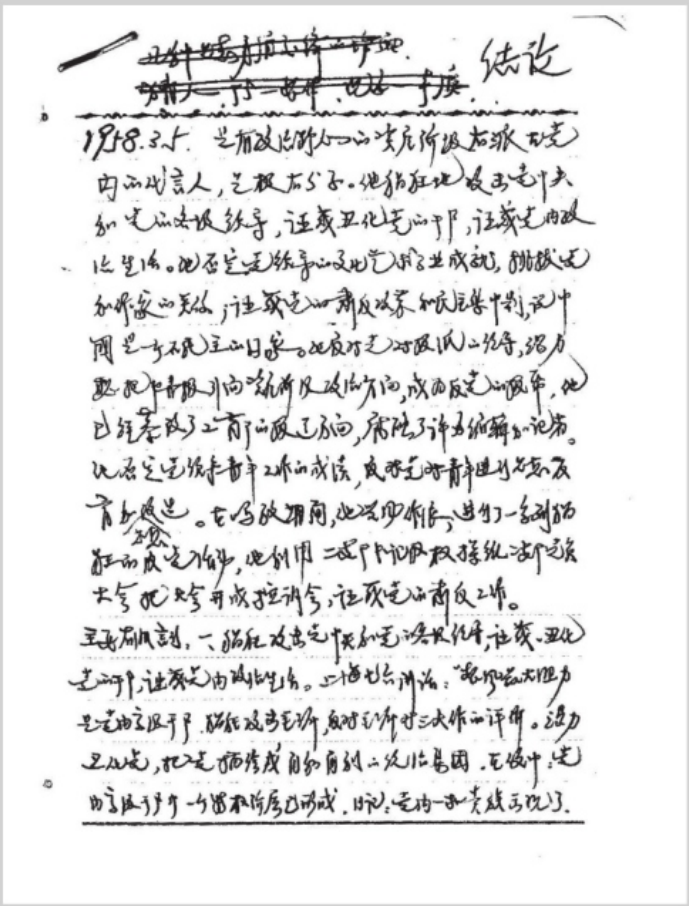
陳泊微：鄧拓被毛澤東訓斥後的反應



第九章　硫磺獄火

對一個從來襟懷坦白，說話率真的人，卻硬要逼迫他說出違心的假話，還有什麼比這更殘酷的了？雖然遠在境外，但胡適之先生果然眼明如炬，犀利如刀。他在接受曾虛白的訪問時，一語道破了大陸知識分子的可憐困境：“他們不是沒有‘說話的自由’，而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誠哉斯言，切中要害

劉賓雁一家從 1962 年至 1979 年，就居住這棟中國青年報社的宿舍。



結論

1958.3.5. 是有政治野心的資產階級右派，右党內的代言人，是极右分子。他猖狂地攻击党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诬蔑丑化党的干部，诬蔑党内政治生活。他否定党领导的文化艺术成就，挑拨党和作家的关系；诬蔑党的新反攻家和民主集中制，说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他反对党对报纸的经导，努力把中青报引向资产阶级政治方向，成为反党的报纸，他已经基改了工青的报道方向，屡陆了许多编辑的记者。他否定党领导青年工作的成绩，反对党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在鸣放期间，他发现作家，进行了一系列猖狂的反党活动，他利用二战部下记报权接纸，战部党员大会把大会开成控诉会，诬蔑党的新反工作。

主要右派言论：一、猖狂攻击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经导，诬蔑、丑化党的干部，诬蔑党内政治生活。二、海北长讲话："我们最大阻力是党内宗派干部，猖狂攻击毛泽，反对毛泽对三大作的评价。强力丑化党，把党插绘成自知自利的统治集团。在侵中：党内宗派干部一个黑板阶层已形成。日记：党内一和贵族出现了。

1965 年夏，劉賓雁祖孫三代在北京農展館前。 這也是他和父親最後的合影。

戴上“右派”帽子的劉賓雁從此走上了一條漫長的“勞動改造”之路。他的足跡大致如下：1958 年 3 月起，先是到農村勞動，由山西平順縣羊井底村，到山東省高唐縣和另一個縣的農村，歷時三年；從 1960 年春起，回到位於北京東郊 15 公里的團中央農場勞動，歷時兩年；1961 年底，回到報社，到國際部數據組當資料員，兼管借閱，直到 1966 年 3 月，他一度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在這一年的 8 月，他又被重新戴上這頂帽子，隨即被關進了“牛棚”再度失去了自由，每天在報社院內打掃衛生；1969 年 4 月，又到設在河南省潢川縣的團中央“五七幹校”繼續“勞動改造”，直到 1978 年底全國開始給“右派”“改正”。

當賓雁和一群“右派”像綁赴刑場的罪犯一樣板著面孔，坐著大卡車走上太行山時，他的心中充滿了感慨。13 年前，他第一次進到太行山，在西柏坡村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革命；13 年後，他又見到了太行山，但這時他已被開除了黨籍，還成了革命的敵人。他當時還無法預知，在這以後戴著“右派”帽子的 22 年中，他還將有 13 年是要在各地農村中“勞動改造”的。“13”這個數字果然不吉祥，命運就是如此捉弄人。

在這“勞改”期間，他也曾歷盡磨難，飽嚐了辛勞、飢餓、批鬥和長期離家之苦，但是和全國的幾百萬“右派”相比，他還算是幸運的了，沒有像甘肅酒泉夾邊溝的同類那樣成百上千地被餓死、累死，即使和北京其他單位的“右派”相比，他受到的“待遇”也還算“溫柔”——當時的北京市委領導人彭真在“反右”中極為嚴酷，例如 1957 年底他就指示北京大學在抓“右派”時，要“追加預算”，突破

毛澤東規定的5%的比例，按10%來抓，（實際上抓了15%），他後來被稱為與鄧小平齊名的“反右劊子手”。北京的很多“右派”被直接送進了監獄和勞改場（如從維熙就進了茶淀勞改場），還有些人被發配到遙遠的北大荒（如丁玲）和新疆（如王蒙），那裡的條件更艱苦，死亡率也很高。

為何賓雁相對幸運呢？

只因為他的主管單位是團中央，而團中央的第一書記是胡耀邦。

“鳴放”階段，胡耀邦曾親自到中青報社傾聽過劉賓雁的發言。開始打“右派”時，他正巧率團去出訪中東。回國時飛機落在烏魯木齊機場，一下飛機他就打電話給負責“反右”運動的團中央書記羅毅，問運動的情況。羅毅回答說，已經結束了，團中央系統共打了71名“右派”。耀邦又問：“中青報呢？”回答是：“17個。”胡耀邦當時的反應是驚叫一聲：“損失慘重啊！”

1958年2月，團中央的71名“右派”要到山西平順去勞動改造了。出發前一天的上午，胡耀邦在團中央大會議室接見了這些人的時候講了“兩個十分”：“一個是你們所犯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第二個是你們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前一個“十分”他只講了兩句話，而後一個“十分”他講了一個多小時。大意是，人哪有不摔跤的，摔了跤就要爬起來。你們都年輕，又有文化知識，還能為黨和人民工作，開除了黨籍還可以再入黨嘛……在談話中說起犯錯誤的原因，胡耀邦還專門提到劉賓雁：“比如劉賓雁，就是驕傲了嘛，尾巴翹得太高了嘛。”這話讓賓雁聽了心裡一熱，僅僅是“驕傲”，沒有說是“反動”，還是同志式的批評呀。

《中國青年報》原副總編輯陳模的回憶文章說，20 多年後，當年團中央系統的“右派”都得到“改正”時，耀邦見到了陳模，當眾向他鞠了三個躬，然後走上主席台，又向全場三鞠躬，為當年的“反右”隆重道歉。

有這樣一個充滿人性的領導人，就是團中央系統“右派”受到相對寬容待遇的原因，也是賓雁不幸中之大幸。 二十多年後，胡耀邦能成為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推手和改革開放的旗手，絕非偶然。 而賓雁後來的二次蒙難，與耀邦被非法顛覆更有直接關係，這也是賓雁一生中最大的不幸與大幸。

說起“右派”們的遭遇，如今“毛左派”們還振振有詞，說毛澤東比斯大林善良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只是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這顯示了他的“革命人道主義”情懷云云。2013 年春天，左派把持的中央理論刊物《红旗文稿》發表了中國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的文章《正確評價改革开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以解讀習近平講話為招牌，再次重複這一謊言。

這種說法無法面對這樣的事實：酒泉夾邊溝農場的三千“右派”在短短的兩三年中死亡就超過了兩千人，而甘肅省已知的“右派”總共是 1 萬 1 千多名（見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離重慶不遠的長壽湖勞改地 627 名“右派”到 1960 年也死了將近 100 人（見譚松的《長壽湖》）……這樣的事例正在越來越多地被揭露出來，完全可與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一比高下，誰能從這累累白骨中看到什麼“人道”的影子？

至於“一個不殺”也是謊言，全國的統計數字尚在保密中，但僅僅北京大學 716 名“右派”中被槍殺的已知就有八名，他們是哲學

系學生黃宗奇（1957）、中文系學生林昭（1968）、數力系助教任大熊（1970）、哲學系學生黃立眾（1970）、西語系學生顧文選（1970）、歷史系學生沈元（1970）、物理系學生吳思慧（1970）和化學系學生張錫錕（1976）。其中林昭被殺後還向家屬索要五分錢“子彈費”的情節尤其令人髮指，比斯大林時代的殘酷有過之而無不及。

應該承認，毛澤東的殘酷與斯大林相比，還是有自己的特色的。這源於他從秦始皇以來的極權專制主義“寶庫”中學來的心經。史稱“陰刻險狠”的清朝雍正皇帝有一大發明，在大興文字獄時，康熙僅止於對生命肉體的棄市、腰斬、凌遲和滿門抄斬，雍正則在抓住“逆賊”後並不簡單地斬首凌遲，而是以“思想批判”為先。例如，在呂留良“逆書”一案中，他除了對已死的呂留良掘墓鞭屍外，還親自審訊呂留良的學生曾靜、張熙，並把審訊筆錄整理成書，親自動手寫下“大批判文章”，編成一本《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印數空前；還“寬容大度”地赦免了曾、張二人死罪，讓他們手持此書，巡講全國，現身說法，到處去批判自己的“滔天罪行”，歌頌雍正的偉大英明．不過，雍正的這一決策並未貫徹始終，他死後乾隆繼位，登基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曾靜、張熙凌遲處死，還把雍正主編的《大義覺迷錄》宣布為禁書，全部收繳銷毀，以至此書在中國絕跡。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是從日本翻印過來的。

再例如，功臣年羹堯被誅後，錢名世因曾寫詩讚頌年羹堯而獲“頌揚奸惡”之罪，但雍正並沒有殺他，只將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個大字，刻成匾額，高掛於錢家大門之上招搖示眾——後來納粹讓猶太人戴“大衛之星”和“文革”中被批鬥者掛黑牌、“黑五類”人家插黑旗，“黑幫”高唱《牛鬼蛇神之歌》等精

神虐待術皆應以此為祖庭淵源，可列入中華文化之第五大發明；雍正還命滿朝文武大臣寫詩批判錢名世，親自一一過目，點評優劣，并從中精選“大批判詩”385 首，出版了《名教罪人詩》一書（這大概是最早的大批判詩集），頒發全國所有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詠讀——林彪事件後下發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和每打倒一人後必然下發的“某某反動言論匯編”，以及批林批孔中小靳莊首倡的“大批判詩歌”，君尚記否？

先於肉體絞殺的尊嚴絞殺，是共產極權專制的一大特色。斯大林讓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在大清洗法庭上“自認其罪”已開其端，毛澤東卻是集大成的高手和巨匠，連鄧小平也曾不得不有過“永不翻案”的信誓旦旦，無數受害者在“反右”和“文革”中的“檢查交代”，特別是曾響遍九州的文革奇曲《牛鬼蛇神之歌》（也叫《嚎歌》）是絞殺人類尊嚴的“極品”。這首歌分兩段，第一段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敵人。我有罪，我該死，我該死，人民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第二段是：“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頭認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實交代死路一條，死路一條。”曲譜上標明是“2/4 拍”，演唱風格是“哭喪地”。據楊尚昆夫人李伯釗回憶，詞作者據說是中央音樂學院一位指揮家在北京四中讀書的兒子，而曲作者是曾經譜寫過《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的作曲家、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總導演、出任過文化部代部長的周巍峙，他是在“牛棚”中被迫為該歌譜曲的。小提琴家盛中國回憶說，這首歌的第一個錄音範本是中央音樂學院的“牛鬼蛇神”教授們的大合唱，被剃了陰陽頭的大音樂家馬思聰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劉淑芳均在其中。這首歌被推廣後，末代皇帝溥儀曾被

強迫進行獨唱。

这是暴行中的暴行，比纳粹暴行更殘酷、更陰毒、也更高明的一招。相比之下，納粹法西斯讓管弦樂隊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毒氣室外演奏小夜曲和圆舞曲，則成了很人道的舉動。

毛澤東對這一招心領神會，深悟其妙，並匠心獨運，把這一陰損惡招融會貫通，發揚光大，鑄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思想統治利器“大批判”，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耍得風生水起，神怕鬼驚，造就了硫磺之火蒸騰的人間地獄。這種中國式的整人術，確比斯大林高明和惡毒多了，其間的文野之別、高下之分和利鈍之效讓專制主義的崇拜者們至今還津津樂道。但說這就是“人道主義”，怕也沾不上邊——這恰恰是最不人道、最沒人性的了。屠刀只能斬殺人的肉體，而“掛匾示眾”加上“自我批判”則是要摧毀人的靈魂，讓人墮入地獄的最底一層。後來，劉賓雁把這叫做“慢性槍斃”。

中國特色的極權專制還有一個更“高明”之處：斯大林式的“大清洗”主要是依靠專政機器來殺人，民眾的手基本上是乾淨的，所以在清算斯大林罪行的時候民眾並不難接受；而毛式的“群眾專政”和“大批判”則是讓人人手上都沾上血跡，甚至讓受害者本人也沾上些汙穢，一旦面臨歷史的審判，就可把罪責推給全體人民來承擔，這就更顯其陰毒了——當前“毛左派”依然死而不僵，尚有市場，甚至總想詐尸還陽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這裡。

拿賓雁來說吧，戴上“右派”帽時他是 32 歲，“改正”時已經 54 歲了。對一個作家和記者來說，這正是他創作的黃金年代，可這些年裡，他都寫了些什麼呢？對一個擅長演說的思想者來說，他都說了些什麼呢？

無論文學或新聞的作品，一篇也沒有；

關於思想和文化的演講，一次也沒有。

有的是堆積如山的“檢查”、“交待”和無數次的“自我批判”及“認罪發言”。

對一個從來襟懷坦白，說話率真的人，卻硬要逼迫他說出違心的假話，還有什麼比這更殘酷的了？雖然遠在境外，但胡適之先生果然眼明如炬，犀利如刀。他在接受曾虛白的訪問時，一語道破了大陸知識分子的可憐困境：“他們不是沒有‘說話的自由’，而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誠哉斯言，切中要害。

“沉默權”是言論自由的最底線。對不同意的東西，如果出於種種原因不便說出，就有權沉默。沉默，也是一種表達。

當政治運動來臨，“大批判”的矛頭指向你的眉心，全場高呼要你“老實交待”，“低頭認罪”時，你有權沉默嗎？沉默豈不是“默認罪行”？豈不是“心懷不滿”？豈不是“頑固對抗”？還有一條毛語錄在等著你呢：說你這是要“帶著花岡岩頭腦去見上帝”。你只有違心地“認罪”，裝作老實地“交待”，還要故作沉痛地“檢查”，最好還再當場扇自己兩個耳光——但你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劉賓雁當年寫下的無數“交待”和“檢查”我們今天都無由看到，但有幾份文件和草稿還在他家屬的手中。懷著沉重的心情，我們閱讀著這些文字，體會著賓雁當時的痛苦心境，也讀出了他是如何在困境中掙扎的。

在失去“不說話的自由”後，賓雁的這些“認罪文字”有如下特點：一是大帽子只管戴，什麼“猖狂攻擊”呀，“惡毒汙蔑”呀，“極端仇視”呀，隨你怎樣說，也不爭辯，看上去好像是認罪了；二是在

“錯誤事實”上，卻認真核實，反復說明，是自己說的就承認，歪曲了的就糾正，誤解的就說明，強加的就否認，在這方面絕不妥協。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有趣的格局：只看標題和“帽子”，似乎罪大惡極；可一看下面的事實，就發現“帽子”和事實、論點和論據很難匹配，他的文字和說法大多還是正確的，起碼是很有道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他本人簽字畫押的《劉賓雁 1957 年結論材料》。

例如，《材料》的第一條是“猖狂攻擊黨中央和黨的各級領導，汙蔑、醜化黨的幹部，汙蔑黨內政治生活”。“帽子”夠嚇人的了，但是，下面所舉他的“反動言論”是：“整風的最大阻力是黨內高級幹部”，“黨內高級幹部中，一個特權階層已經形成”，“黨內一批貴族出現了”（這種新的階級分析到如今已成共識，連官方也不能否認），“第一書記往往代表保守勢力，有不同程度的土皇帝思想”，對中央指示“總是行動遲緩，甚至陽奉陰違”（如今已演變為“政令不出中南海”了，而“土皇帝”如薄熙來者已敢公然對抗中央，問鼎朝廷了），說他們是“自身利益的保衛者”；以及“黨發展了大批不說話的黨員”，很多入黨者是“唯唯諾諾的傻瓜”……

第二條的“帽子”是“否定黨領導的文化藝術事業成就，惡毒挑撥黨和作家的關係”。而言論是：“解放前上海是出人出書出戲的地方，解放後反而有點蕭條了”（現在蕭條的何止是上海文化界），“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個 20 多年前膽敢與周揚抗衡的魯迅，乃是由於一個作家與黨委宣傳部長的關係不同了”……

第三條的“帽子”是“汙蔑肅反政策和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論據是賓雁曾說過“人權受到踐踏”，“人的尊嚴受到侮辱”，（“人

權”一詞現在終於收入中國的政治詞典了）說“中國不是民主國家”……

第四條是“反對黨對報紙的領導”。說他“要求擴大報紙權限”，要求允許報紙和記者“說實話”（“說實話”也成罪狀，至今亦然），“提出問題”和“干預生活”，“要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第五條是“否定黨領導青年工作的成績”，事實是利用特寫、座談會、在報紙上寫文章等形式廣泛向青年宣揚要“獨立思想”和“干預生活”（五四運動就主張“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到共黨掌權後反而成為罪狀了）……

第六條是“在鳴放期間興風作浪，進行一系列反黨活動”。把他作為一個黨員給毛泽东主席寫信說成是“狂妄地企圖以他的思想影響毛主席”，把他主持黨支部鳴放大會，說成是“煽動報社黨員和群眾向黨進攻”……

今天的讀者看了這些“反動言論”應該在會心一笑之餘，欽佩這位“右派”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有如此尖銳的眼光和如此勇敢的膽識；當年的人看了雖然不敢公開贊同，但多半也會暗暗點頭稱是。無論現代和當年的人，誰也不會贊同給這些言論加上那樣可怕的大“帽子”。

這種對“罪行”抽象承認、具體否認的做法，是賓雁在所有“檢查”、“交待”中用的主要方法，相信凡是那些年在政治運動中挨過整的人，對此都能心領而神會。這看上去是一種軟弱，但實際上也是一種柔中有剛的抗爭。

如果把包括賓雁的言論在內的當年最主要的“右派言論”集中展示出來，使人震驚的首先不是說話人的天真和幼稚，而是他們訴

求核心的合理性和超時空的預見性。對民主政治的熱烈期盼，對憲政法制的激聲呼喚，對“黨天下”和極權專制制度的大膽批判，以及對人權自由，特別是新聞自由的急切向往，構成了“右派”聲音的主調。很顯然，這是對共產主義世界興起的非斯大林化思潮的直接回應，也是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以後民主浪潮的第一個高潮。雖然這次“五七之春”民主運動還處於“初級階段”，尚無完整的理論體系，也沒有獨立的口號，但其開山啟蒙的意義不可小視。在當今中國，半個多世紀以前只屬於少數先知先覺者的思想，已經成了大多數民眾的共識，這個偉大的進步中迴響著被暴力扼殺的“五七”先賢們吹響的號角聲。

當然，在幾百萬“右派”中所發出的聲音從高音到低音形成了不同的層次。其中最高層次的號角是“聖女”林昭等少數真正的真理鬥士所發出的，她對所有罪名一概不認（在北大這是獨一份，不知在全國還有幾人），在鐵窗下依然大聲譴責批判極權專制主義及其魔王式的領袖，甚至用自己的鮮血寫下控訴書，直到生命結束。這才是“五七之春”旗幟性標誌。賓雁應屬於曾唱出民主高音的聲部，他雖然在高壓下違心地表示了“認罪”，但一直沒停止抗爭，更沒有突破做人的底線。在批判會上，他說過這樣的話：“希望黨不要因為一個人被定為右派，而無視他的合理批評，否則我擔心全國會出現普遍沉默的局面，後果不堪設想。”他還在為自己和其他“右派”的“合理批評”辯護，這就是後來的“第二種忠誠”的最早版本。

至於其他聲部發出的聲音，那就千差万別了。滄海橫流，方顯人格真色。判斷和評價賓雁的價值，應以這形形色色人等為背景，

這也是“劉賓雁時代”的意義所在。

不必諱言，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中像林昭那樣英勇決絕、寧死不屈的鬥士是少數，而多數的受害者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人格的軟弱性。就連“右派”的領軍主帥章伯鈞等人也沒有表現出應有的道德勇氣和獻身精神。甚至出現了同類相噬、親友反目、“五十步批百步”、大“右派”揭發小“右派”等可悲的現象，近年來還相繼爆出有些當年的“右派”充當“臥底線人”告密立功的醜聞。中國知識分子在“反右”中整體沉淪的原因，應該到中國極權專制制度的特別殘忍性和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文化基因的缺欠中去尋找。在這個大背景下，賓雁能守住道德底線和做人的操守已屬難能可貴，這與俄羅斯文學中高尚的貴族精神對他的浸潤熏陶不無關係。

賓雁離開北京，發配農村時，並沒有放棄希望。他的行李中，除了被褥和衣物外，最沉重的是書——不是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而是三本像磚頭一樣厚的俄文版《別林斯基全集》，四本同樣厚的《俄羅斯作家論文學勞動》，以及一本原版的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還有沉重的《英日詞典》。他還要讀書、學習、思考，還要學外語——他的理想从来不是當翻譯，而是要當個能懂七八種外語的“世界記者”，這是從走上新聞崗位以來他的最大“野心”。在平順羊井底村的一年裡，他居然利用田間地頭的休息時間，把《英日詞典》全都背下來了。有人一直擔心他會自殺，有如此雄心者會自尋短見嗎？

在農村，他並沒遭遇到來自社會底層的批判和歧視，相反，儘管生活艱苦，勞動繁重，卻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態，並不時感受到民間的溫情。他們下鄉後不久，“公社化”、“大躍進”和“總

路線”這“三面紅旗”所帶來的大飢荒就開始了。賓雁和飢餓的農民一起挑著沉重的擔子在田間掙扎，雖未像很多農民和夾邊溝農場的同類一樣化作路邊餓殍，但也曾餓得渾身浮腫，在勞動中也曾因工受傷，差點瞎了一隻眼睛。在他的記憶中，那些年在農村吃的最好的一頓飯，是過年時，羊井底村的房東孫二孩把缸底僅有的一點麵粉掃出來，給他包的羊肉胡蘿蔔餃子。善良的農民們並沒有把他當成“敵人”或“賤民”，而是對這些北京來的落難者注滿了同情。農民們在賓雁面前並不掩飾他們對共產黨的不滿，經常對政策大發牢騷，放肆譏諷，甚至還讓賓雁代筆，為他們寫告狀信——荒謬絕倫、值得告狀的事多著呢，例如，在地缺如金、水貴如油的黃土高原上，村中央卻要造個噴泉景觀；人都沒飯吃了，村裡卻要造個動物園，準備養獅子老虎；世世代代用汗水修的梯田要廢掉，改建成什麼“萬壽山”……這些可笑的計劃都是對毛澤東的“大躍進”狂想的呼應。通過代寫這些告狀信，賓雁真正瞭解了農民在想什麼，反對什麼，期盼什麼。賓雁在為自己命運嘆息的同時，又加上了為國家和人民所承受災難的沉重嘆息。

真正可怕的敵視目光不是來自農民，而是來自一同來“改造”的同類。毛澤東從雍正皇帝那裡學來的毒招很見效——黨許諾，根據表現，會逐漸給一些“右派”摘掉帽子。這讓人看到了一線希望，他們就拼命“表現”起來，最便捷的方法是對身邊的同類進行不留情的揭發和批判。賓雁作為團中央系統最著名的大“右派”，總是眾矢之的，他的一舉一動都是批判的素材。一開始，賓雁對此還有點震驚和不解，到後來，經歷得多了。他的心境漸趨平靜——他看透了，人們只不過是在演戲而已，別看會上聲色俱厲，義正詞

嚴，似乎不共戴天；可會後一起幹活時，又說說笑笑起來，像沒事一樣，似乎人人都成了川劇“變臉”的專家，有了幾張變換自如的臉孔。後來，同行的“右派”一個個摘了帽子，才發現這並不美妙——他們的政治面目依然是“摘帽右派”，還是另冊中人。毛澤東有話在先：“帽子拿在手裡，隨時可以再戴上。”

1961 年春天，報社的“右派”們從農村回來了，到北京東郊的報社農場繼續“改造”，好處是離家近了，偶爾可以回家看看。賓雁的任務是進城為農場拉肥料——就是大糞。他拖著架子車，往返 60 里路，到城裡的廁所裝滿大糞，再拉回農場，兩天一個來回，中間可以到家停一宿，或到學校去看看孩子——帶著滿身的糞便味，幸好妻子和孩子們似乎並不在乎。

借這個機會，賓雁逐漸瞭解了家中的情況：1957 年以前留下的 1000 多元存款已經告罄，現在只靠朱洪一個人的工資養活五口之家（兩個兒女、兩個外甥女，賓雁沒算在內），父親那裡也要不時接濟。朱洪已經杜絕了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生活還是十分拮據。四個孩子的衣服，必須不斷地從大改小，以舊翻新，朱洪下班後就成了裁縫，蹬著縫紉機每晚加班。至於工作，她雖然總是盡力做好，但仍得不到人們的承認——因為她是大“右派”的老婆！為此，朱洪經常在夜深人靜、孩子都睡著了的時候悄悄痛哭，哭得淚囊下都長出了小肉瘤……而這一切，賓雁知道了又有什麼用？他自身難保，還經常要挨批判呢。

1961 年底，他從農場回到報社，到資料室當資料員。

1962 年 12 月 31 日，這一年的最後一天，中國青年報社貼出一張不大的告示：團中央黨委決定，給中青報的一批“右派”摘掉

帽子。17 個“右派”中，有 16 個的名字都在上面，唯獨沒有劉賓雁。他找到一位報社領導問原因，那位領導猶豫半天才說出：你的問題不是報社能解決的，連團中央也決定不了，問題卡在中央書記處……

賓雁明白了，他是毛澤東欽點的“右派”，而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鄧小平又是“反右”的主要負責人，想為他“摘帽”，要過這兩關，難！

但是，不斷傳來的消息顯示，中國的政治局面和經濟形勢正在出現一線轉機：1962 年 2 月黨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不得不承認，他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大飢荒負有責任。陳毅副總理在廣州戲劇座談會上講話，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脫“資產階級”之帽，加“無產階級”之冕。這位口直心快的元帥還讜論“紅專關係”，尖銳批判“只紅不專”的“空頭政治”傾向。農村推行“三自一包”後，農業生產迅速復甦，市場供應也隨之明顯好轉，按票證供應的商品逐漸減少，幾年不見的炸油條大鍋又出現在街頭。《中國青年報》刊出了一篇“右派”作家方之寫的短篇小說《出山》，寫了因“右傾”而被整肅的農村幹部臨危受命，負重復出，一手扭轉了衰敗局面，恢復了農村生機的故事，這篇寓意深刻的小說在全國引起了巨大轟動……看來，堅冰似乎出現了裂痕，冰層下透露出“春江水暖”的信息。

但是，不同的聲音也隨之傳出：這年春節，中國戲劇家協會舉辦了一次春節舞會。一位敏感的政治作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告狀信，說這證明劇協已經“變修”了。每周都要到“養蜂夾道”（黨中央的高幹俱樂部）去抱著女文工團員跳舞的毛澤東大筆一揮，嚴厲訓斥“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最近幾年，竟然

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國際上，“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篇接著一篇重磅發出，中蘇兩黨的大論戰如火如荼，震動世界，一場“反修”戰役又打響了。 緊接著，毛澤東又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軍隊首先掀起了“學毛著”和“學雷鋒”的高潮，解放軍總政治部出版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很快就風靡全國，而“四清”運動也在農村分批展開，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到處傳達……剛剛出現在天際的一抹曙光立即被更濃重的“階級鬥爭”陰雲遮蔽了。

政治風雲瞬息萬變，希望和擔憂，輪番襲上賓雁的心頭，他這個沒有發言權的“右派”默默地觀察著，思考著……

在這風譎雲詭的背景下，賓雁的“摘帽”姍姍來遲，那已經是1966 年 3 月了。 報社黨委終於宣布：劉賓雁從“右派分子”變成了“摘帽右派”。 賓雁當時慶祝“摘帽”的方式是帶領全家到頤和園去玩了一天。

賓雁的處境似乎好了一點，但他並沒能高興幾天，因為這年春天的風太大了，批判“燕山夜話”的鑼鼓已經敲響，賓雁的老朋友、老領導鄧拓及“三家村”被揪出來了，兩個多月後“文化大革命”的颶風就挾著雷電呼嘯而來。

在“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那個月，賓雁又被傳到了報社的大辦公室，這是賓雁熟悉的地方，面對的還是熟悉的面孔。

審判席上一溜坐著七名法官，賓雁站到正中央。

隨著一聲拳頭砸在桌面上的巨響，一個粗厲的吼聲震動四壁：“劉賓雁！你必須脫去僞裝，老老實實交待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新

罪行！”

此人姓劉名祖禹，這個名字讀者應該記住。整整 40 年後，2006 年《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被整肅，賓雁在中青報的思想傳承人李大同、盧躍剛被撤職事件的始作俑者居然還是此人。他也是記者出身，後來當了新聞檢查官，最後的身份是中宣部新聞閱評组组长，他還有一部大作《新聞閱評學》，是新聞警犬的入門書。這是個幾十年堅持不懈作惡的“運動健將”，只要有風吹草動，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就一定會跳出来表演一番。劉祖禹們的存在意義在於，他們是中國極權專制制度最頑固、最瘋狂的“黨衛軍”，又是政治氣候的風向標和溫度計，凡是他們跳踉之日，就必定是國家和人民遭難之時。這個指示器很靈很準，比氣象台和地震局強多了。

所謂“新罪行”已經炮製好了。賓雁回到資料室工作後，每天晚上下班後，總有一個鬼影悄然無聲地飄進辦公室，到賓雁的辦公桌前停下來，打開抽屜，拿出賓雁放在裡面的日記（劉賓雁毫不設防，抽屜無鎖），一頁一頁地翻看，並記下點什麼東西。這個鬼影是個女人，共產黨員，她一直警惕地監視著賓雁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賓雁日記中關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及大飢荒的記錄，成了她“繳獲”的“新罪證”。

賓雁注意到，隨著劉祖禹的搥桌怒喊，其他幾個“法官”有樣學樣，說話前也一定要拍拍桌子。喊聲格外尖利的一位女子，她的丈夫也是“右派”。倒是一位從軍隊轉業不久的年輕女人態度比較平和——她的政治優勢在那兒擺著呢，似乎可以不必如此表演了。作為記者和作家的賓雁到這時還沒丟掉自己的職業習慣，還在用他

冷峻的目光認真的觀察和捉摸著人——研究政治運動中人的正常和反常。

賓雁重新戴上那剛剛摘去五個月的“右派”帽子，宣布地點還是當年給他戴上“右派”帽子的報社大飯廳，朱洪和13歲的兒子劉大洪站在人群中聆聽了這無情的決定。宣布後賓雁直接被押往“牛棚”，和“牛鬼蛇神”們關在一起了。與此同時，還有一彪人馬來到賓雁的家，把他所有的書信、日記和多年積攢的資料都抄走了。這次和他同時被剝奪自由的還有原中青報的副總編輯、後來的“右派”鍾沛璋。這也是位值得尊敬的新聞人。80年代當過中宣部的新聞局長，如今是《炎黃春秋》的編委。他把辦報理念概括為三句話：一、堅決不說假話；二、不主動說假話；三、一定要說假話時，絕不發明創造。

在一次批鬥會上，賓雁和胡耀邦見面了，他們並排站在台上，但無法交談。賓雁沒看到自己胸前的牌子上寫的是什麼，大約是“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吧，也沒看清胡耀邦的牌子上寫的是什麼。但是，批鬥會的內容是“揭露胡耀邦包庇右派分子劉賓雁”，這就把他們兩個人連在一起了。在讓劉賓雁交代的時候，他說沒有受過胡耀邦的包庇，收到了一陣劈頭蓋腦的口號聲。

這次失去自由，除了“右派”這個老罪名之外，又加上了“叛徒嫌疑”和“蘇修特務嫌疑”。在“牛棚”中，賓雁依然是“罪大惡極”者，他受到了“最高待遇”：白天接受批鬥，或打掃廁所；晚上住宿“牛棚”不准回家——有些人是“走讀生”，晚上可以回家。

和九年前不同的是，這次到“牛棚”來給賓雁送被褥的不僅有妻子朱洪，還有兒子大洪和女兒小雁。他們都十幾歲了，不像上次

那樣什麼都不懂。

“紅衛兵”興起時，大洪為了能戴上紅袖章，曾在同學的鼓動下，動手製作了一個上寫“右派分子劉賓雁”的黑胸章，準備給父親戴上。但走到跟前卻無論如何也拿不出手；而小雁倒是戴了幾天紅袖章，但是有一天賓雁看到她在默默地哭，一問才知，她的紅袖章被沒收了，因為她是“黑五類”；至於朱洪，在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在報社貼出一紙聲明，表示要和丈夫“劃清界限”……這就叫“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實際上讓所有的人都遭受了精神的酷刑。

現在一般的說法是，這些違背人性的倒行逆施只是“紅衛兵”幹的，但是人們似乎忘了，這是當時的“準法律”“公安六條”的規定。1967 年 1 月 13 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發布了一個紅頭文件《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這個法令文件並沒有按照憲法規定的程序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文革”中全國人大十年沒有開過會），是個“非法之法”和“法外之法”，更是個“荒唐惡法”。這個《若干規定》只有六條，其中最厲害的是第二條和第四條。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這一條後來被稱為“惡攻罪”，導致無數對“文革”和某些黨的領導人如毛澤東、林彪、江青等提出批評意見的黨員和群眾被逮捕和屠殺，如張志新、遇羅克、王申酉、李九蓮等等；而第四條將地、富、反、壞、右、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就業人員、歷史上有過汙點的人員及其家屬等 21

種人，都列為專政對象，規定他們“一律不准外出串聯，不許改換姓名，僞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准背後操縱煽動，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 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嚴辦。”這個規定公然剝奪了大批公民的合法權利，把他們置於法律的保護之外。 這個“公安六條”成了“文革”中的亂鬥、亂打、亂捕、濫殺的“法律依據”，釀成了北京大興血案、湖南道縣血案等無數的血腥慘案和覆蓋全國的紅色恐怖，這些罪行至今仍未得到認真的揭露和清算，而“公安六條”這個惡法雖然在 1979 年 2 月被撤銷了，但是其幽靈仍改頭換面，在當今的刑法中以“顛覆”或“煽動顛覆”等罪名隱現，依然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大敵。

賓雁和他的一家人在這種血色恐怖中度日如年，幸好沒過幾天，“造反派”自己打起來了。 報社的“革命群眾”分成兩派，高唱著“語錄歌”互相鬥得不可開交，沒人顧得上“牛棚”裡的“黑幫”了。 開始賓雁每天掃完廁所和樓道，還要被人押著去挨批鬥，這會兒批鬥會也越來越少了，有時他還可以在院子裡看看兩派貼出的大字報。 通過這個渠道，他瞭解了全國各地的紛紛亂相。

晚上，他站在“牛棚”所在的中國少年報社的小紅樓平台上，放眼東望，他的家就在那個方向。 可是，煙遮霧障，什麼也看不到，他的命運也在迷霧之中。 這些日子裡，賓雁吃不下飯，睡不好覺，身體極度虛弱，體重減了十幾公斤。 這時，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想到了死，像戚學毅一樣縱身一跳，不就什麼痛苦都沒有了嘛？

“生存還是毀滅”，哈姆雷特那個永恆的問題，幾乎所有政治運動的受難者都曾面對過。 與那些無邊苦難和精神折磨相比，死亡的確有巨大的誘惑力。

幾年後，賓雁對自己最好的朋友趙越勝講起了當時他沒有跳下去的原因：這時，他眼前分明出現了朱洪的身影，她正在陽台上晾小雁的一件花衣服，為了讓衣服平展，雙臂優雅地上下甩動著……這幻影是那樣真切，讓賓雁的淚水奪眶而出。他突然有了抗拒軟弱和死亡誘惑的力量。

賓雁在《自傳》裡說，這是多年來自己最軟弱的時刻。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郭羅基：哀沈元

宋永毅：“反右”運動中知識精英的醜陋和恥辱

謝泳：現代隨筆

陳模：在右派平反會上，胡耀邦向我們三鞠躬

錢鋼：從賓雁到“冰點”

第十章　盤馬彎弓

這是賓雁真正成熟的時期，也是他為即將到來的生命力大爆發盤馬彎弓，積蓄力量和蠡測方向的戰備階段——沒有這段時間的反復磨礪和理論準備，就沒有他 80 年代的輝煌連擊——他 70 年代末就已經從理論上站到了當時中國改革思想的最前沿

“右派”劉賓雁在中國青年報社的農場養豬。

1973 年，劉賓雁已“回到人民隊伍”，女兒小雁得以來幹校探望父母。

1983 年 4 月，在法國舊書攤上看書。

由於從運動一開始，賓雁就首當其衝，所以他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從一個特殊的角度來觀察的。

他發現，每次批鬥會站台挨鬥的人群在不斷擴大。有些人幾天前還在舉拳高呼口號，轉眼間就掛上牌子站到台上了；有些從 1957 年“反右”以來一直是運動積極分子，並靠這些“業績”成為“當權派”的人，這次也進了“牛棚”，和曾被他們批判的“右派”關到一起了，並且每天也要和賓雁一塊站在毛主席像前“請罪”。這讓賓雁心中難免有點快意，但快意之後又沉入了深思。

這在“文革”中並非個別案例，而是普遍現象。例如，在“反右”運動中，中國文化界的“巨匠”級人物，像茅盾、吳晗、翦伯贊、巴金、田漢、曹禺等，都是積極分子，《人民日報》曾連篇累牘地刊登他們批判“右派”的文章。但“文革”一來，他們也紛紛落馬，與“右派”們殊途而同歸，其中有的人，比如老舍沉湖而死，翦伯贊夫婦雙雙飲鴆而亡。用賓雁在農民中聽到的說法，是“犁不著的耙著了”，整個知識分子隊伍終於全軍覆沒，不但沒有“脫帽加冕”，反而共同戴上了個“臭老九”的帽子。看來，毛澤東的目標不是哪幾個知識分子，而是要把他們的全體分批分網打盡。

利用“派戰”開打，“黑幫”無人顧及的機會，賓雁也曾偷偷離開報社，騎著 1952 年分期付款買的那輛捷克的腳蹬閘式老自行車，跑到街上去看大字報和蒐集紅衛兵小報。他驚訝地發現，在那鋪天蓋地的“紅海洋”中，居然有零星而罕見的綠地，例如一個“右派”的兒子、青年工人遇羅克發表在中學紅衛兵小報上的文章《出身論》，竟然對共產黨的階級分析方法和階級鬥爭理論，以及當時甚囂塵上的“血統論”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提出振聾發聵

的挑戰，對這種理論勇氣和無畏精神，賓雁暗暗叫好；後來聽說這個青年被殺害了，賓雁又沉痛萬分。雖然身為一個被管制的“右派”他無權參加運動，但是密切地注視著運動的發展，認真地研究著各種人投入“文革”的動機和想法。他從感情上傾向於那些受到壓迫而後“造反”的人們，即“平民造反派”，甚至覺得他們的聲音裡有民主的訴求。當他聽說有些地方的“右派”們也行動起來，有的成立了組織，有的發表聲明要求平反，他雖然知道這種抗爭不會有好結果，但也為這種聲音的出現而高興。尤其使他眼前一亮的是，隨著大量黑暗現象被揭露，和中央秘密文件與毛澤東內部批示講話的公開，共產黨一貫正確的畫皮被撕開了，歷史真相一點一點顯現出來。他當時甚至產生一個樂觀的幻想，希望這種趨向最終能導致民主政治時代的來臨。

這種思想感情的傾斜不是偶然的現象，在批判“血統論”中崛起的“平民造反派”中有很多人把矛頭指向了“大躍進”和由此導致的大飢荒災難（例如在大飢荒中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和河南，當時的造反派就把矛頭指向了“西南王”李井泉和“信陽事件”的罪魁吳芝圃，這絕不是偶然的，人們對那場大災難還記憶猶新），實際上已經逼近了這一切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的主要責任人毛澤東。由此，在當今的“文革”研究中才出現了一種“兩個文革”和“人民文革”的理論，認為在當時的群眾運動中存在著對民主的朦朧訴求。然而，歷史的吊詭之處在於，這些當年曾經不自覺地接近了真理和真相的人，其劫後殘存者如今大多數反而成了“毛左派”的中堅，其中有些人為捍衛毛澤東的形象，甚至矢口否認大飢荒中餓死人的歷史事實。這種邏輯上的混亂和顛倒是當今“毛左派”的致命傷。

1969 年，對紅衛兵和造反派已經厭倦了的毛澤東又想出了一個新點子，讓紅衛兵和知識分子們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團中央的“五七幹校”在大別山麓的潢川縣，賓雁和朱洪都要離開北京，到那個在“信陽事件”中餓死人最多的窮鄉僻壤去。對此，賓雁無話可說，因為連團中央的第一書記胡耀邦也下到幹校了。兩人在地裡和街上碰了面也不敢說話，但都心照不宣。

大人都下鄉了，問題是孩子怎麼辦？小雁剛上中學，只能留守北京，而讓大洪也留下實在不放心，男孩子大了，沒人管教，要是學壞了多可怕，還是帶到幹校去吧，於是一家三口下潢川了——三口人在一趟列車上，但不能坐一個車廂，賓雁作為“專政對象”在“黑幫席”，而朱洪和大洪在另一節車廂。大洪因為去看爸爸還遭到一頓訓斥。

漫長的“幹校生活”沉悶而單調，值得回憶的事情不多。有兩件事情可以概括賓雁在這些年中的境況：

一件是寒假期間，有些在北京上學的孩子來到幹校探親，住在賓雁的宿舍中。幾個孩子惡作劇，把小貓放到爐子下面烤，賓雁見了，教訓他們：“要愛護生命，不要虐待動物！”沒想到這句話召來一次批鬥會。一個上過兩個大學的姜姓畫家主持了這次會議，質問賓雁：你說的“虐待”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說黨“虐待”了你？會後他還唆使孩子們在賓雁的蚊帳上用墨汁寫下“打倒”之類的標語。

另一件是有一天，賓雁一抖被子，從中掉出一張嶄新的拾元錢。本以為是朱洪放在那裡的，可一問，朱洪說不是她放的。這成了個賓雁終生沒有解開的謎：是誰以此來悄悄地對賓雁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賓雁到晚年還念念不忘這件事，對這個沒留名字的好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這兩件事是賓雁“幹校生活”的縮影。前一件展示了人性和環境的險惡，而後一件展示了生活中還不時透出的人性陽光。

在此期間，真正震動了劉賓雁思想，並給他帶來希望的是“九一三”事件和林彪的“折戟沉沙”，儘管由於當時的處境和身份，賓雁不可能瞭解這件事的真相（到四十年多後的現在人們還離這一事件的真相遠著呢），但是，毛澤東所指定的“接班人”和“副統帥”叛逃和死亡，無疑戳穿了毛澤東永遠英明和正確的神話，使人們的思想有了一次大解放。賓雁高度評價這次事件的影響，說：“以林彪之死為契機而擴散開來的那個否定毛澤東路線和 1949 年以來現行社會秩序的思潮，是中國人付出數以千萬計生命換來的一大覺醒，一大進步”（見賓雁 2000 年發表在《爭鳴》上的文章《為什麼是高行健》）。他認為這次大覺醒是毛澤東的意識形態開始破產，中共從思想到組織開始瓦解的標誌，為後來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當時，賓雁是在幹校聽的傳達，這個事件讓他失去了對毛澤東的最後一點尊意。他雖然口不能言，筆不能寫，但是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以至引來了一次警告。

直到 1972 年，軍代表在幹校才宣布了對賓雁的審查結果，既不是“叛徒”，也不是“日本特務”或“蘇修特務”，恢復了 1966 年 3 月的結論——但有些同事聲言劉賓雁對問題檢查得“不深刻”，堅決反對他從“牛棚”中解放出來。幹校中的人一批接著一批回到北京，賓雁成了最後一個被准許離開幹校的人。1975 年，賓雁獲准可以不時離開幹校，到北京去自行尋找工作的機會。

難忘的 1976 年來了，這年春天，賓雁回到北京找工作。

4 月 2 日，賓雁騎著自行車來到天安門廣場，那時“四五運動”

已漸進高潮，廣場上已是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堆滿了獻給周恩來的花圈，基座周圍貼滿了詩詞和散文，還有人在慷慨激昂地演講。賓雁站在人群中，感覺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年輕時代，雖然他也知道自己還沒有發言權。三天後，這場運動又被“工人民兵”的棍棒鎮壓下去了，賓雁在悲憤中離開了北京。

這年秋天，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傳來，賓雁是在潢川幹校聽到的。和幹校剩下來的人一起正襟危坐聽廣播，周圍有哭聲響起，但賓雁沒有落一滴淚。他心想：你可死了！你早該死了！你終於死了！你再不死中國就完了！此時的賓雁已不是30多年前那個“初入毛廬”，對毛澤東曾抱有幻想的小青年，而是個飽經磨難，已過“知天命”之年的劫後餘生，賓雁早就判定，毛澤東的死，是他所能為中國和世界做的唯一一件好事。

這種隨著毛澤東的生命終結而產生的希望，也反映了中國人一個可悲的無奈。物理學家普朗克在總結科學發展史時說：“一個新的科學真理取得勝利，並不是通過讓它的反對者們信服並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過這些反對者們最終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也就是說，當社會改革者和熱盼改革的民眾尚無權無力使社會變革向前推進時，人們不得不耗費很長的時間等待，等待死神之手把那些拼命反對改革的頑固派們一一收走，社會才能向前邁出一小步。這種以人的一生為尺度的進步速度真讓人等得焦急。這個“普朗克定律”是中國專制極權制度能夠長期存在，而社會進步如蝸牛爬行般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例如，康熙皇帝在位60年，乾隆皇帝在位61年，其間還夾著一個雍正的13年，這就意味著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很可能是呱呱墜地時睜眼看到的是這個皇帝，而成了60歲的垂

垂老翁時面對的還是同一個統治者，這真是“鐵打的江山”啊，這真能讓那個時代有變革願望的人絕望得發瘋，難怪中國文學中有那麼多消極遁世、頹廢潦倒的詩文作品。

幸虧劉賓雁看到了毛澤東沒有真的“萬歲”，而且在他被死神收走後不到一個月，緊接著“四人幫”倒台的消息又傳來，賓雁把目光投向將來——國家的將來和自己的將來。這回不僅是希望，而是堅信一切都要發生變化了。

但好事多磨，在批判“四人幫”高潮中，居然又一次點了劉賓雁的名——《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姚文元》中，把他 1957 年在上海見到姚文元的舊事重提，再次稱他為“右派分子劉賓雁”。這時離“反右”已經 20 年了，離賓雁在幹校最後宣布恢復維持 1966 年的“摘帽”結論已經五年，這個帽子在空中轉了一圈又落在他頭頂。直接的影響是他正在尋找的工作機會更渺茫了，誰敢用這個剛剛又被中央黨報點了名的“右派”呢？

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在毛澤東的淫威和陰影下掙扎，賓雁個人的命運也隨著政治運動的波濤浮沉，這一切都終於到達了一個臨界點。喜歡思考的賓雁明白了，問題並不決定於哪個人的善惡智愚，而是出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所送來的那個“主義”和按照這個理論所構建的體制上。在幹校生活的最後幾年，他從小對理論問題的熱情又被激發起來，讀書和思考成了他生活的最重要內容。

馬克思、恩格斯、黑格爾、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書，凡能找來的他一本接著一本地讀。在大別山腳下的這片貧瘠的土地上，在盛夏酷熱的夜晚，借著昏暗的燈光，賓雁拿著放大鏡（他的視力已開始變弱）對曾經信奉過的主義開始了重新的審視和批判，也對中國革命

的道路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國究竟是如何走上這條災難之路的？毛澤東的錯誤根源是什麼？馬克思主義的哪些漏洞為魔鬼留下了出入的通道？從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給人類規劃的是一條什麼道路？……古人說“四十而不惑”，可賓雁到了應該“知天命”的 50 歲左右卻百惑叢生，開始了一次獨立的路徑搜尋。這是賓雁真正成熟的時期，也是他為即將到來的生命力大爆發盤馬彎弓，積蓄力量和蠡測方向的備戰階段——沒有這段時間的反復磨礪和理論準備，就沒有他 80 年代的輝煌連擊。

在幹校，利用別人休息聊天的時間，賓雁還在昏暗的燈光下翻譯了蘇聯文學理論家格·尼·波斯彼洛夫的《論美和藝術》，為將來的文學創作進行了理論準備。這本書 1981 年正式出版，譯者署名為劉賓雁，他因此得到了 1957 年以後第一筆稿費，這筆錢用來給女兒買了一塊進口手錶。

1978 年初，賓雁費盡周折地尋找工作崗位終於有了結果，他被中國社科院《哲學譯叢》編輯部收留，原因是他有俄語、日語和英語的翻譯能力，對哲學理論有很高的興趣和相當的研究，這種人才在當時是稀缺的；還因為他是劉賓雁——儘管曾經是個全國聞名的大“右派”，但正因為如此，一些知識分子心底裡對他還有仰慕敬重之情。這個崗位可以大量接觸外國哲學理論的最新資料，對賓雁來說也是求之不得的。他一頭就撲進新的工作中去了。

據當時在哲學所從事研究工作的趙越勝先生回憶，賓雁高大魁梧的身影第一次悄悄出現在哲學所的時候，他是為了去尋找東歐國家的哲學動態資料。當越勝把資料目錄給他送去時，他看了非常高興，連連感謝，說大開眼界。問他要這些資料有什麼用，他的回答是：

“我想看看裡面有沒有解凍的苗頭。”這種公然希望“變天”的大膽表露讓年輕的趙越勝吃了一驚。

“解凍”這個詞是蘇聯作家愛倫堡 1954 年写的一本小說的題目，後來成了蘇聯走出斯大林主義陰影進程开始的代名詞。賓雁此時的眼界已經超出了國界，投向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消長，他要從中找到對中國未來的啟示。這時的賓雁還是老脾氣，對一個新結識的年輕人毫無戒心和防範，兩人一拍即合，就這個敏感的問題敞開心扉暢談起來。

這是當時少有的深層思想交流，趙越勝把馬爾庫塞的《蘇聯馬克思主義》介紹給賓雁，賓雁也把馬爾科維奇的《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介紹給越勝，還著重指出，他把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當作社會批判理論的核心。這讓專門研究哲學的趙越勝非常吃驚，因為“異化論”是用人道主義來解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當時在國內還很少有研究哲學的人注意。後來在 80 年代人們試圖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下找到新的理論突破口，才對這一概念和相關理論廣泛地關注起來。

“異化（Entfremdung）”無論在黑格爾、費爾巴哈，還是在馬克思那裡，都指主體外化為異己力量，都是“絕對觀念”和“歷史規律”中最重要的現象。後來，經過“文革”煉獄的周揚提出了應該重視對“異化”理論的研究，而哲學家王若水則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研究方向，結果是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仍然佔據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毛左”餘孽（如鄧力群、胡喬木等）把“異化”理論和“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理論當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哲學基礎，大加鞭笞，瘋狂討伐，這成了 80 年代理論鬥爭的一大焦點。

而賓雁在這場大辯論開始前很久就有了如此的眼光和理論高度，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驚訝。他的思想之敏銳、視野之開闊，由此可見一斑。他 70 年代末就已經從理論上站到當時中國改革思想的最前沿了。後來有人認為劉賓雁只是個敢衝敢打敢說話的魯莽武夫，他們根本就想不到他會有如此深厚的哲學功底和理論修養。

趙越勝評價說：“像古往今來一切大智慧的先知，你總是關注那些歌德所稱的‘公開的秘密’。在卡萊爾看來，這些‘公開的秘密是那種展示給所有的人，卻鮮有人能夠察覺’的‘事物的真實本性’。”

賓雁特別關注南斯拉夫的實踐派理論，著眼點是這樣幾個重大的問題：一是以人民名義行使統治權的黨政集團，怎樣異化為社會的壓迫者；二是馬克思的人道理想怎樣引出了無人性的社會制度；三是馬克思關於自由人的論述怎樣變質成了壓抑人的精神自由的意識形態。——這三個問題至今仍是中國官方理論界極力迴避、不敢正視的禁區，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異化”到如今這幅樣子的根本原因所在。

趙越勝當時有個認識，說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從理論上已由吉拉斯的《新階級》，文學上已由奧維爾的《1984》來完成了。賓雁搖搖頭，他指出，對列寧主義的批判還沒有完成。而列寧主義的產生是對馬克思主義決定性的轉折和背離，他的“階級 – 政黨 – 國家 – 領袖”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徹底變質的關鍵一環，斯大林主義的實踐和毛澤東思想的來源都在這裡。不對列寧主義徹底清算，蘇聯、東歐和中國的問題就無法得到真正解決——賓雁這個超前的洞見至今仍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從 1960 年 4 月 16 日為紀念列寧 90 週年誕辰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一文以

來，中共就成了列寧主義最忠實的信奉者和最後堡壘，如今在俄羅斯已經失去家園的列寧主義幽靈最後的寄居地只剩下當代中國了。

賓雁當時的這些思考記錄在他所編輯的《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一書中。由於當時他的“右派”問題還沒有最終解決，所以他為這本書寫的《編者的話》是匿名的。賓雁在這裡寫道：“人和人道主義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以及社會主義實踐中應佔據什麼地位？是像蘇聯歷史上那樣，把物和物質生活條件擺在第一位而較少考慮人的利益、人的權利和人的發展，把這一切放到遙遠的未來呢，還是應該自始就關心人的問題？”他申明了自己的觀點：“……人，應該佔據哲學思想的中心位置。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要關心的，應該是人的解放。”

這些話寫於 1978 年底，發表於 1979 年 3 月，與後來所說的“歷史性轉折”幾乎完全同步。許多“文革”受難者剛剛醒過來低頭打量自己身上的斑斑傷痕，而賓雁以“戴罪”之身，卻已經站到哲學理論的高度觀察、思考和總結中國乃至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走上迷途的總根源了，這是何等的歷史眼光、理論敏感和道德勇氣？

下面的一段話，放在那個時代就更是振聾發聵了：“社會主義社會中也有人的異化問題。在蘇聯式的國家集權主義體制下，工人無權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人民本應是政治主體，而實際上國家和以工人階級名義進行統治的黨卻成了主體，人民倒成了政治客體。”賓雁從 1957 年以來的痛苦思考終於在“異化”理論中找到了科學的總結和概括。

在中國最早關注“異化”問題的還有一個飽經苦難的哲學家，他叫張志揚，“文革”中他在武漢蹲了十年冤獄。在獄中無書可看，他

手頭只有一本馬克思的《1844 年哲學 – 經濟學手稿》，就像茨威格的小說《象棋的故事》一樣，把這本書讀了十年，對其中的思想和文字爛熟於胸。 和賓雁一樣，他對書中的 “異化” 概念極為重視，還以 “墨哲蘭” 的筆名寫了一篇論文《馬克思手稿中的異化範疇》寄到《哲學譯叢》編輯部。 趙越勝把這篇論文拿給賓雁看，賓雁讀了興奮異常，深為國內尚有知音者而高興。

在翻譯和出版《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的過程中，賓雁系統地梳理和厘清了自己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認識。 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和生命力大多包含在《1844 年哲學 – 經濟學手稿》中了。 那些最具哲學性和人道主義的內容，恰恰不容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有些後來詬病賓雁的思想、聲稱要 “與劉賓雁分道揚鑣” 的人，根本就不懂得賓雁是在什麼意義上認同馬克思主義的。

賓雁從來沒有以理論家自居，他總謙虛地說自己只是一個關心理論問題的實踐者。 但是，在改革開放的高潮來臨前，中國有幾個專業的理論家和思想家曾意識到這些理論和實踐問題的重要性了？賓雁終生對哲學一直懷有濃厚的興趣，當他離開哲學所後，還囑咐趙越勝要定期把《哲學動態》寄給他，說許多問題想研究，還有那麼多書要讀……和賓雁這個 “哲人” 相比，有些自以為高明的犬儒主義學者和只會在馬列經典中尋章摘句的所謂 “理論家”，終生也沒有這樣的情懷、這樣的眼光和達到這樣的高度，儘管他們在這個專制體制下可以混得如魚得水，優哉樂哉。

在這本書中，除了《編者的話》是匿名之外，所有賓雁翻譯的文章也都沒有署真名。 如果誰能找到這本書，會發現譯者的名字是 “劉子安” 或 “金大白”，前者是賓雁在做地下工作時的化名，寓意是在共

產黨的天下，自己又回到地下工作狀態了；而後者是“如今真相大白”的諧音縮寫，其挑戰意味甚明。在正式取得發言權以前，賓雁已經戰馬揚鬃，急不可待地要奮蹄出征了。

只有瞭解了賓雁在黎明前夜的這些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才能理解他何以在獲得自由後的那一瞬間就爆發出驚人的力量，發出了震撼全國文壇的黃鐘大呂之音。機遇只青睞那些有準備的頭腦和有追求的靈魂。

如今的人們總喜歡給人的思想貼上一個“某某主義”的標籤，可是任何現成的標籤都無法囊括成熟時期劉賓雁的思想。按一般的標準，他似乎應該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這個頭銜前面必須加上“人道主義”前綴，他是一個以人道主義哲學為前提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和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扭曲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有本質的區別；總之，與其說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還不如說他是個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研究者。

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是賓雁終生沒有棄離的，但是他所信奉的社會主義也必須加上“民主主義”的前綴，以區別於曾流行於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例如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社會主義”，勃列日涅夫的“發達的社會主義”，以及千奇百怪的“封建社會主義”、“皇家社會主義”等等，特別是列寧斯大林所發明、至今仍被中共奉為圭臬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在劉賓雁的心目中，社會主義的核心是公平公正和高度民主的社會正義，是人的解放和人權得到最大的保障。這與極權專制制度是水火不容的。他終生對“極權社會主義”採取嚴厲的批判態度，認為這種社會主義與納粹法西斯主義在政治結構、統治方

式上有血統關係。他所經歷的苦難和親眼目睹的以“社會主義”之名犯下的可怕罪行，使他質疑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誤讀和扭曲。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最初衝動發源於消除社會不公，人民的苦難，而現在社會仍然不公，人民依然受苦，怎么能將社會主義所經歷所制造的一切往歷史的檔案中一塞了事？”

他的至交哲學家趙越勝說，賓雁傾向於社會主義，其實是受俄國文學的影響。從十九世紀到 20 世紀初的俄國知識分子，很少不信仰社會主義的。賓雁最欽佩的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就是個社會主義者。要讀懂劉賓雁，恐怕要回溯到拉吉舍夫、赫爾岑、別林斯基直到別爾嘉耶夫這批思想家。他還認為，賓雁的社會主義理想和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更接近。

劉賓雁的思想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他永遠是現實社會和權力的批判者。他一生在中國生活了 63 年，在美國生活了 18 年，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他一直沒有放棄社會批判者的立場和姿態。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他是現實社會一個目光犀利的觀察者和直言不諱的批判者，為此兩度遭難而終不悔；到了美國，他並沒有一變成為一個對資本主義制度無保留擁護的“歌德派”，對那裡仍然存在的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現象依然持批判態度。包括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他從一開始就持批判立場，認為這場戰爭缺少站得住的理由，這與美國的反戰左派立場一致。賓雁這一點上與俄國的索爾仁尼琴有點相似（當然，兩人的立足點不同，賓雁是站在社會主義左派的立場，而索爾仁尼琴是站在傳統的大俄羅斯主義立場）。看到有些人來到美國後立馬成了美國制度狂熱的崇拜者和歌頌者，他很不以為然。他勸告這些思想方法簡單的人，“不要掉進毛澤東幽靈設

下的另一个陷阱：凡他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對；凡他反對的，我们就要擁護。”

這種永遠堅持獨立思考的批判精神是賓雁人格的重要方面，他的立場與波蘭的思想家和記者亚当·米奇尼克有很多共同點。米奇尼克曾充任“團結工會”的顧問，因此還住過監獄。後來在“團結工會”的瓦文薩執政期間，他一度出任國會議員，旋即辭職；从 1992 年起主编《选举日报》。他的報紙不僅批判共產極權制度，也批判執政的“團結工會”領導人、號稱“民主鬥士”的瓦文薩。他永遠不當權力的附庸，總是站在權力對面的監督者和批判者，而永遠是民眾的朋友、顧問和代言人。在他身上，真正體現出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和普世精神。他的名言：“那些運用暴力攻佔當代巴士底獄的人，很容易建造一個更悲慘的巴士底獄。”和他一樣，如何讓歷史擺脫以暴抗暴，再重建暴政的惡性循環，也是劉賓雁一直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經過煉獄硫磺火的磨礪，賓雁以更成熟的思想和更堅定的姿態等待著重返人間。萬事具備，只欠東風；劍拔弩張，只待號角。

給他帶來東風信息的還是好友趙越勝。1978 年初秋，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給“右派分子”“改正”的文件。越勝的父親拿了一份回家，遞給他說：“這個文件和老劉（賓雁）有關，你拿去給他看看。”趙越勝拿起紅頭文件，蹬上自行車飛奔到賓雁家，一進門就向賓雁報喜。賓雁也興奮異常，拿起文件就看。但看著看著，臉上的笑容就收斂了，他若有所失地說：“並不是全部平反……照這個文件，我是沒有希望的。”接著他詳細述說了自己被打成“右派”的經過，說只要還有幾個“右派”不“改正”，他這個毛澤東欽點的“右派”恐怕是必在其中。越勝聽了也覺得掃興，真所謂“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過了

幾天，賓雁也被“改正”的消息傳來，同時還傳出這是當時任中組部長的胡耀邦親自出面干預的結果。越勝聞訊又趕到賓雁家，看到賓雁已經面色赤紅，目光迷離——他喝醉了。見到越勝，他似乎清醒多了，說：“來祝賀的人太多了，你一杯，我一杯，就喝成這樣了……”

賓雁清楚地記得，他喝醉的那天是 1979 年 1 月 24 日。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賓雁為摘掉“右派”帽子而高興，但他並沒有像曲嘯和不少人那樣“感恩”——為什麼要感恩？向誰感恩？剝奪一個人的自然權利是錯的，把錯誤的剝奪改正過來是理所應當的，況且這個改正還並不徹底。如果你感恩，就說明這你承認這是個恩賜，而剝奪者和恩賜者又是同一種力量，你的感恩會變成對這種權力的臣服。而今天的恩賜者明天有可能再次成為強暴的剝奪者——這樣的事情將在八年後重演。

賓雁一開始想回到中國青年報社，繼續 22 年前中斷的工作。但人民日報社的社長兼總編輯胡績偉慧眼識英才，力邀賓雁去擔任“特約記者”——這是《人民日報》從來沒有過的榮譽職位。賓雁接受了胡績偉的盛情邀請。其實，他的這一選擇並非是為了榮譽，而是因為在歷史上《人民日報》是直屬黨中央的報紙，與中宣部平級，並不受中宣部的領導，因此具有相對較大的獨立性和報導空間。這有可能為他的採訪和寫作提供更好的條件（後來在 80 年代經過鄧力群、胡喬木對《人民日報》的打壓，特別是在趕走了胡績偉以後，這個報紙的管理權逐漸被中宣部奪去了）。

在與社科院哲學所告別時，趙越勝說了一句被後來的歷史證明了的不怎麼吉利的話：“別人當記者不過是個職業，你當記者卻要上刀山入火海啊！”賓雁的臉色也沉下來，半晌才回答：“我這是自找。”

他當時是否已經預料到這一“自找”的選擇，將是新的災難的開始？他是否知道這意味著他將踏上的是一條鋪滿荊棘、布滿陷阱的險惡之途？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他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善良而又單純的青年，而是個飽經磨難、死去活來的重生者了，他雖不能說已經煉就了火眼金睛，但對前途的艱險還是能預見到的。

16 世紀，卡斯特里奧挑戰高高在上的新教教主加爾文時自嘲是“蒼蠅撼大象”；20 世紀，索爾仁尼琴挑戰九頭怪獸般的蘇聯共產黨時自稱是“牛犢頂橡樹”。作家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力》中說：“我們多次看到這樣一個人，他除了道德上的正直之外，什麼權力也沒有，卻同一個嚴密的組織孤軍作戰，那是幾乎沒有成功希望的。一種教條一旦控制了國家機關，國家就會成為鎮壓的工具，並迅速建立恐怖統治。任何言論，只要是向無限權力挑戰，就必須予以鎮壓，還要扼住那持異議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

劉賓雁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挑戰大象的“蒼蠅”，一個試圖頂翻橡樹的“牛犢”。

无所準備、出乎預料地跌入陷阱裡，是“受害者”，如当年的“右派”们；

有所準備、自覺從容地踏入荊棘叢，是“聖鬥士”，如 22 年後的賓雁。

從苦難中走出來的“右派”們大體有三種姿態和路徑選擇：

一種是從“失足”的坎坷中爬起來，從此學“聰明”和“練達”了，再也不相信什麼“崇高”和“正義”，更不敢再和共產黨玩政治遊戲了。過去的苦難使他們心有餘悸，未來的風險使他們心有預悸，當百姓的從此安分守己，甘當順民，少言慎行，只求平安度日，以求壽終

正寢；當文人的從此只寫遠離政治的風花雪月和小橋流水，最多寫寫“堅硬的稀粥”式的敲邊鼓文字，原則是絕不越雷池半步，以免讓人再抓住把柄。這種與現體制實現和解和融合的人不在少數，有些在現體制下混得不錯，或者混上個一官半職，或者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對這種人，應該多一些憐憫、同情和寬容，因他們終究已經受過那麼多苦難了，想從此躲開風險以求平安，也是人之常情，誰也無權要求別人去當烈士或殉道者。每當政治風雲一起，這些人鑒於以往的教訓，早早地找個避風港躲起來，當個事不關己的看客，這雖不可敬卻可憐，因為人人都有自由選擇權嘛。但是，如果有的人躲在一邊看熱鬧時，還要對選擇抗爭和戰鬥的人來幾句冷嘲熱諷，說別人是“不識時務”、“不知機變”的“傻瓜”，唯獨自己才是明智和高明的“達人”，那就有點過分了。選擇怯懦是你的權利和自由，但終究不是值得誇耀的光榮。

應該受到譴責的是另一種人，他們脫離苦海後，改弦更張，徹底轉向，積極投靠到權力麾下，努力躋身於體制之中。有的用“左”得嚇人的姿態來證明自己當年被打成“右派”是多麼冤枉，例如在“批《苦戀》”、“清除精神汙染”和“反自由化”中的丁玲、姚雪垠等人，比傳統的“左派”還要“左”，對本是同根生的自由思想者大打出手。用僞歷史小說《李自成》讚頌毛澤東的姚雪垠公開了自己的權門警犬嘴臉，在延安就曾緊貼毛澤東的丁玲甚至主張要把對共產黨的忠誠變成宗教式的信仰，聲稱自己要永遠當“歌德派”。這一類中有些人還紅極一時，例如那個號稱是“牧馬人”原型的曲嘯教授，捂著傷口唱讚歌，以“挨打不記仇論”為貢品，居然成了官封的“青年思想導師”，在國內外大出風頭，成了報紙和電視上的明星。另一個典型是

曾經因為主張“教授治校”而成了“右派”的錢偉長，居然靠主動告密而立下大功，被“鄧核心”御賜“副國級”的頂戴花翎。“想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宋江為了歸降朝廷而拿李逵等兄弟的人頭當“見面禮”，幹了這種賣身賣友勾當的人，只配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真正能代表“五七民主運動”形象的是第三類人，地獄之火煅煉了他們的肉體，苦難之海焠礪了他們的精神，他們在 20 多年的靈魂苦旅中失去了青春和機遇，但得到了成熟和升華，成千上萬的屈死冤魂附著在他們身上，使這些後死者以令人驚訝的生命力和戰鬥力承擔起了摩西式的歷史的重任。 他們已不再是一個個脆弱孤單的肉體生命，而是一群不屈精神和不死生命的集合載體，一旦涉過冥河重返人間，他們就創造了一個奇觀：一群已經步入耄耋之年的高齡“右派老人”居然成了中國自由、民主、人權、憲政和社會進步大軍的擎旗手和司號員，儘管他們的行列在敵人炮火和歲月子彈的掃射下不斷凋零，但是，他們的思想和榜樣是把幾代中青年理想主義者集合成方陣的核心引力，影響力和號召力與日俱增。 他們的名字可以列成一個浩瀚夜空中的群星圖，其中亮度最高的“一等星”有李愼之、朱厚澤、李銳（1959 年廬山會議後被開除黨籍）、何家棟、顧準、方勵之、王若望、杜導正、鍾佩璋、戈揚、戴煌、吳祖光、黃萬里、張思之、邵燕祥……劉賓雁是其中一顆放射異彩、引人矚目的“火星”。 歷史唯一應該感謝“五七大陽謀”的是，它在毀滅了幾百萬民族精英的同時，總算還為中華民族的民主化進程保留和錘煉了這樣一批普羅米修斯般的播火人。 這也算是天不滅中華的證據吧。

沒有時間摩挲身上的累累傷痕，更沒有時間安享多年渴盼的自

由，在曙光乍現的時刻，銷聲匿跡 20 多年的劉賓雁又“復活”了。在正式到報紙上和讀者見面以前，他已經急不可待地拿起筆來了。

他復出後的第一篇作品是一份“內參”——這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新聞載體，一切都像是新聞，但不進入大眾傳播，只印刷極少的份數，送給主管黨政部門的領導人參閱，對廣大讀者則嚴格保密。這總算還保留了一個向上反映社會“負面情況”的細小渠道，但到了 2000 年以後的“維穩”年代，當權者大概對這種天天“報憂”的烏鴉叫聲聽夠了看煩了，就下令禁止大多數媒體發“內參”，很多媒體的“內參部”都應聲解散，發“內參”成了極少數幾家中央直屬媒體才有的特權，而且還提倡發所謂“正面內參”——這樣一來，不聞烏鴉呱呱叫，只聽喜鵲叫喳喳，領導人的耳根清靜多了，天下也似乎因此太平多了。如今，法院和信訪局成了陷阱，上訪告狀成了犯罪，網絡言論頻遭“跨省追究”，連“內參”也成為禁忌，“下情上達”的渠道被一一斬斷了。這像是“掩耳盜鈴”故事的最新版本，卻是中國嚴酷荒誕現實的寫照。

幸好賓雁復出時“內參”還沒取消。他的第一篇“內參”是寫一個比自己“受難更重更久”的人，他叫曹天予，1957 年時只是個初中學生，但成了個沒戴帽子的“小右派”；後來在北京大學又被打成“反動學生”，送進勞改營；“文革”中又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到 40 來歲還在“管制”中。這個比賓雁小一代的受難者天分極高，喜愛文學、攻讀美學、哲學，都有出色成績。後來自知以這種政治身份不宜再從事哲學和人文學科研究了，就在勞改營裡轉向學習研究高能物理，居然也有建樹。他自己無法以此為業，就用自己的知識輔導妹妹曹南薇自學高能物理，後來沒有正式學歷、全憑自學成才的曹南薇

竟然考上了中科院的研究生。《中國青年報》曾以《帶著鐐銬攀登的人》長篇報導了她的成才事跡，其中涉及了他那苦難深重而又才能超人的哥哥。賓雁經過艱苦調查，以寫《中國青年報》"內參"的形式介入了這個冤案的平反過程——這是一個漫長而又艱苦的過程，賓雁的"內參"發出後，曹天予的境況雖然有所改善，但直到賓雁去國，他的問題仍未得到徹底解決。後來，這位有天分的青年出國留學去了，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畢業後到美國波士頓大學任教，成了一名活躍在歐美各國和中國的"新左派"政治經濟學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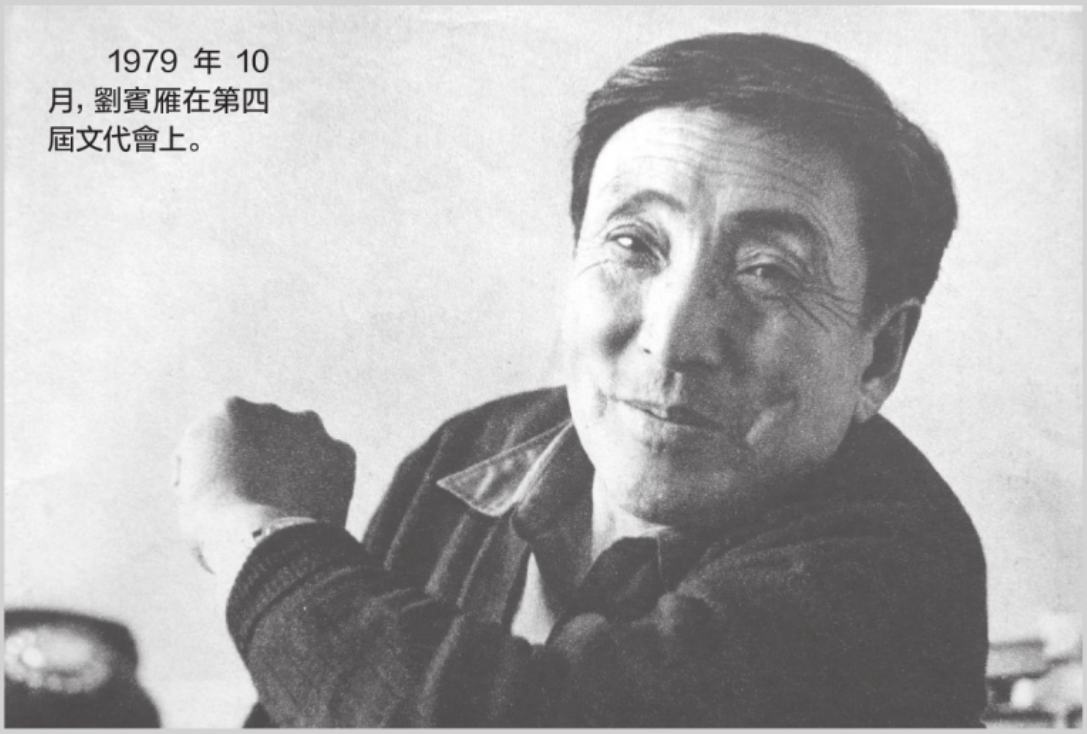
賓雁選擇這個報導作為"復出第一槍"有鮮明的象徵意義。他說："我注定將是這類人的代言人。"替無權而又無法發聲的苦難者說話，是他為自己設定的第一使命，他說過："我的力量不是在我自己身上，而是我背後的老百姓。我總感到是被人推著走，背後是人山人海。"他明明知道，這會給他帶來無窮的麻煩甚至新的災難。但非如此，他就不是劉賓雁了。

這第一槍打出以後，賓雁把自己也變成了一顆子彈，一發而不可收地射向了他所選定的方向，只有前進而永不回頭。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趙越勝：燃燈者

曹天予：後冷戰時代的中國民族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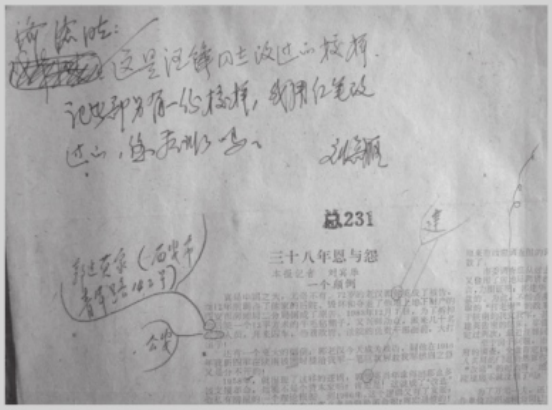
1979 年 10 月，劉賓雁在第四屆文代會上。

第十一章　盛世警鐘

他就像站在船頭的瞭望哨一樣，在泰坦尼克號巨輪的客廳裡正在舉行盛大舞會的時候，敲響了冰山臨近的警鐘。在十年“文革”剛剛落幕，人們普遍以為一個安定繁榮的盛世即將來臨的節日氣氛中，這警鐘聲似乎有點刺耳和大煞風景。但歷史將證明，在“風起於青萍之末”時就能敏銳地發現危險正在襲來，並發出了如此明白的預警信號，這是需要有歷史穿透力的眼光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的

當年的“右派”王蒙、劉賓雁、白樺，1979 年聚首了。

劉賓雁採訪周家傑，後來寫成《畢竟有聲勝無聲》。



劉賓雁《三十八年是與非》的文章校樣。

離開家和辦公室，劉賓雁找到一處安靜的地方寫稿。

剛剛恢復自由的賓雁就被號角聲吸引到“民主墻”下了。一連多日，他那魁梧的身影一直盤桓在西單路口的廣場上。一張一張地閱讀不斷貼出的大字報、小字報，凝神傾聽人們激昂的演講，還掏出筆記本認真地記錄著受害者的訴說，他毫無心理障礙地恢復了自己命定的角色。

1979 年的北京初春給中國人帶來了新的希望。夜幕已降，華燈初上，賓雁和趙越勝從西單騎車回家時，兴奋之情充塞胸臆，他忍不住忘情地在長安街上大聲喊道：“我看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伴著喊聲噴出的熱氣在冷風中飄散，這位 50 多歲大漢的豪氣引來了路人驚異的目光。

懷著如此的豪情和希望，賓雁重返了闊別多年的共產黨內和新聞第一線，開始了他對“刀山”的攀登和“火海”的涉渡。對此，賓雁在《自傳》中說過一句很重要也很豪邁的話：“在這個黨裡面，有許許多多我不能稱之為‘同志’的人，那我回到這個黨裡又有什麼意義呢？”他自問自答：“——改造它！”

但是，想要改造這個黨，談何容易。首先，它不想被改造，從毛澤東時代的“反修防修”，到鄧小平時代的“四項基本原則”，到江澤民時代的“防止和平演變”，直到現今的“五不搞”、“絕不走邪路”和“絕不改旗易幟”，決定這個黨命運的力量似乎已經鐵了心一條路走到黑了。

賓雁和體制內的改革者們顯然給自己提出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果一定要找出賓雁思想曾有的局限性，那這就是一個。由於看到“共產黨裡也有好人”，他在很長的時期裡對通過這些“好人”來改造這個黨還抱有幻想，而這個浸透著列寧主義、斯大林主

義和毛澤東主義毒素的極權專制主義集團的頑固性和殘忍性總是超出他們的想象力——每次對形勢的發展和最後結局的預測都要落空，可至今仍有人還要隨著每次權力更替、新貴上台，周而復始地做著“新政”的美夢，一次次失望而癡心不改。

好在賓雁是從來不會原地踏步的，隨著時代的步伐，特別是隨著一次次改革的失敗，以及這個集團終於圖窮匕首見，露出殺氣騰騰的本來面目，他早晚會認識到要改造這個黨的願望是多麼天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必須心中早有“人性”的種子，而這卻是這個集團的遺傳基因中先天的缺項。

當賓雁正式“復出”時，1979 年那短暫的“北京之春”已如曇花一現般結束了。隨著一場對越戰爭的炮聲，不管戰爭是勝是負，鄧小平的地位是穩固了，他用一場戰爭顯示了自己的力量。此時他已經不再需要民眾的輿論支持，曾經被他利用過的西單“民主牆”被封閉了，民辦的油印刊物被取締了，主張“五個現代化”的魏京生被判了重刑，民眾中剛剛抬頭的樂觀情緒煙消雲散，空氣又像“文革”時代一樣凝重起來，中國各派政治力量之間脆弱的暫時聯盟和共同的狂歡節結束了。

關於這個脆弱聯盟的破裂，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後來對改革中的兩個不同的路徑作了個簡明而準確的總結：“一個救黨，一個救民。在百廢待興的時候，這兩條路是重合的，但是很快就會分道揚鑣。”（見《動向》雜誌 2013 年 5 月號文章《後“六四”生態的中共轉型》）而分道的路口就在鄧小平坐穩了大位以後不久來臨了。

這年的 3 月 16 日，賓雁生平第一次走進了全國的最高殿堂人大會堂，親耳聆聽了鄧小平那個扭轉中國改革方向的重要講話：“堅

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刺耳的剎車聲響起，中國人的自由、民主之夢又一次被粗暴地打斷。“政左經右”的鄧氏路線正式出台，跛足的鄧氏改革時代開始了。

這個改革從一開始就被閹割了靈魂，故意模糊和歪曲了目標模式，刻意迴避了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只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打開了半扇門，用經濟發展的技術性指標代替了社会進步的本質性目的。曾給中國和世界造成巨大災難的罪魁禍首毛澤東被精心保護下來，就像當年毛澤東對斯大林“三七開”一樣，鄧小平也對毛澤東來了個“三七開”——用數學方法來進行善惡评定和功罪互抵，這也是毛澤東的一个獨特發明。他本来对數學一竅不通，只會扳著手指算賬（如“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之類），卻別出心裁地用這種方法來為魔鬼的罪惡辯護和開脫。說這是“獨特的發明”也不算誇張，要知道，善就是善，惡就是惡；功就是功，罪就是罪，它們無法混合計算，更不能互換相抵，就像不能把毒藥和營養液攪在一起論功效一樣。德國人並沒有對希特勒的功罪進行數學计算，俄國人也沒有分析斯大林的兩撇小鬍子哪半邊是屬於魔鬼，哪半邊是屬於馬克思的。只有經過這種獨特的不分善惡、混淆功罪的計算，毛澤東的畫像才能安然高掛天安門城樓，他的殭屍依舊橫陳紀念堂中，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這個“文革”時代的遺留文物，依然懸掛在中南海正門新華門東側的紅牆上。一年後，1980 年 8 月 21 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法拉奇提了一个十分尖銳的問題：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鄧回答：“永遠要要保留下去。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

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這是鄧上台後第一次對外公開保毛，他的這個說法成了一年後出台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調。

從政治制度層面來看，鄧小平實行的依然是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主義，或者說是在毛澤東幽靈籠罩下的鄧小平主義。事實證明，鄧小平是中共的“鐵血俾斯麥”，他從來就是個極權專制主義的狂熱信奉者和堅決捍衛者，毛澤東曾表揚他是“棉裡藏針”，在對付民主運動時，他確是“針針見血”：從“五七反右”直到“八九屠城”，他始終對民主懷有高度戒心和敵意，對鎮壓民眾的民主運動從來就不心慈手軟。他的“跛足”經濟改革不但沒有觸動共產極權制度的根本，反而成了這一禍根繼續苟延殘喘的強心劑。他的“四項基本原則”使中國又一次與改變歷史和命運的難得機遇擦肩而過，中國人民將要為此付出 30 多年的寶貴時間，還要向新生的權貴集團交納巨額的貢賦，以及無數的鮮血、生命與眼淚……至今能否走出這個陰影還在未知之天。

“刀山火海”已經如此清晰地展現在賓雁面前，以他的經歷和見識，他不可能看不到前途的艱難險惡。然而，面對繼毛澤東時代而來的鄧小平時代，他的選擇已是義無反顧。

劉賓雁是以一聲震動大地的驚雷而橫空復出的，那就是他的報告文學作品《人妖之間》。作品發表在《人民文學》1979 年第 9 期上——23 年前，他的《在橋梁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也是首發在這份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文學刊物上的，這該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

這是賓雁重新走上新聞崗位後第一次東北之行的結果。這年

五月，賓雁應邀到哈爾濱參加“黑龍江省青年創作積極分子會議”，其實就是青年作家會議，但在“文革”中，“成名成家”是個被批判的概念，“作家”只能叫做“創作積極分子”，由此一端就可看出當時東北人的思想還在“文革”陰影的籠罩之下。

自從被打成“右派”之後，賓雁已經 22 年沒有回到自己的精神故鄉了。這次回來，他感慨萬千。原來頗具異國情調的哈爾濱經過“大躍進”和“文革”的破壞，早已變得不倫不類，壯麗的俄式建築大多被拆毀了，取而代之的是粗糙、醜陋、大而不當的所謂“現代建築”，而人們的精神還帶著“文革”浩劫的創傷。

在這次會議上，賓雁獲得了自己復出後第一次當眾演講的機會。這位 40 年代東北青年運動的領導人、50 年代全國知名的記者作家和著名的大“右派”的演講吸引了眾多的聽眾。他以思想深刻和大膽的演講博得了熱烈的掌聲，也召來了一場政治風波。

當時，徹底否定“文革”的中央決議還沒有出台，而對毛澤東的評價還在激烈的爭論中。賓雁在演講中把文化大革命叫做“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巨大災難”和“嚴重倒退”，這讓很多人聽了極不舒服；而賓雁直接指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道主義的理論，是導致“巨大災難”的根源，這一觀點更是讓一些人聽了如坐針氈。演說剛結束，坐在主席台上的兩個團省委幹部就跑到省委去告狀，說劉賓雁的演說攻擊了毛主席，還攻擊了大慶——賓雁在演說中批判了一個源於大慶的口號“八小時之內拼命幹，八小時之外做貢獻”……黑龍江省委馬上就調去演講錄音，並直接送到北京去告狀了。

“出源便遇打頭風”，這次闊別 22 年後的故鄉之行成了一次

短兵相接的思想搏鬥，而劉賓雁對所有攻擊的最有力回答就是作品《人妖之間》。

距離哈爾濱 50 公里的賓縣當時已經爆出了一個大新聞：那裡 1978 年 8 月破獲了一起全國最大的集團貪汙案，主犯是個叫王守信的女人，同案在押 11 人全是共產黨員，涉案金額達 50 多萬元——這個數目在今天來看只是小菜一碟，但在當時卻是驚人的巨額。吸引賓雁注意力的是這樣一種傳聞：如今在賓縣此案的罪犯“王老太太”還不臭，而舉報者也不香——至今還不敢公開身份。這到底是為什麼？為什麼在長期的“階級鬥爭”後壞人反倒有了更大的膽量和更自由的天地？社會在這些年裡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1979 年 8 月，賓雁帶著很大的好奇心到賓縣進行了認真的調查。

展現在他面前的是這樣一幅社會圖景：土地改革後，人與人之間的封建依附關係似乎已經解除，但是在權力高度集中的“黨國體制”下又以新的形式借屍還魂了。少數握有幾乎是無限權力的當權者成了社會的核心，“計劃經濟”賦予他們掌管和支配國家財富和社會資源的特權，使他們周圍形成了蛛網式的權力網絡。頻繁的政治運動毒化了人與人之間正常的關係，使更多的人放棄了道德規範和“革命理想”，成了這個權力網絡的崇拜者和追隨者。“文革”不但沒有消滅這個網絡，反而使它借著新產生的派系而發達起來。王守信這個土匪姘頭、煤建公司小小的收款員，就在這個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網絡中日漸強大，成了賓縣事實上的統治者之一。她利用自己的權力和關係，控制了一些緊缺物資（主要是煤炭）的分配權，通過饋贈和行賄手段收買了各級官員，從而得到權力的保護傘，並在傘下任意地幹著違法的勾當。

賓雁發現，他在 1957 年所擔心的那個“黨內特權階層”已經在這個由權力、宗派、財富和交換的“關係網”中形成了一個控制社會的越來越強大的力量，使什麼社會主義、黨的領導等等“基本原則”正在變成一紙空文。賓雁從對這個中國社會的基本細胞的解剖中驗證了“異化”理論，並揭示出國家權力的“異化”乃是一切災變的根本原因。

這就是《人妖之間》要告訴人們的主要發現。這篇作品不僅揭露了當時“文革”餘毒還遠遠沒有肅清的現實，而且把目光指向了更深層——制度原因和社會原因對人性的扭曲，還及時向人們發出了警報：如果不解決這個深層的問題，那麼已經開始的國家權力“異化”和腐敗，將導致更嚴重的災難——包括黨的腐敗、權力的腐敗和社會的潰爛性腐敗也將接踵而至，而且愈演愈烈，最後會使人因貪婪的物欲和瘋狂的權欲惡性膨脹，“異化”為非人，最終人性盡失而成妖魔，使人間變成惡鬼橫行的地獄——當時對這篇作品的評論很多，但最早看到這一層深意並以“人妖之變”來解讀這篇作品的是日本評論家大簡秀夫，他說，這是一篇以“人性”和“人性的變異”為題材的作品。

在人類的歷史上，有為數不多的具有特異思想能力的人，他們能比別人更早地預知世界將要發生的事情，人們稱他們為“先知”。例如，被稱為“俄國共產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就是其中一個。他早在 1918 年，即蘇維埃政權剛剛誕生，斯大林獨裁體系還沒有建立的時候，就留下了一篇遺囑，預言了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的命運。他說：“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演變如下：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

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一旦實行民主和自由，他們就會喪失政權。除了恐怖、欺騙、威嚇和強制，他們別無道路可走。”他還預見蘇維埃政權將遇到的四種危機：“飢荒危機”、“經濟破壞的危機”、“國內戰爭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並且“很有把握地斷定：布爾什維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預言，布爾什維克政權將從內部解體，而解體將發生在第四個危機（意識形態危機）之後，解體的過程可能將拖過幾十年的時間……至於這一切為什麼會必然發生，他把原因歸結為列寧主義：“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他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什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他還英明地預見：“布爾什維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眾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 世紀是偉大發現的世紀，啟蒙和急劇人道化的世紀，將推翻並譴責布爾什維主義。”這篇《政治遺囑》由普列漢諾夫在病床上口授，由他的密友列·格·捷依奇筆錄，由尼·尼熱戈羅多夫收藏。按照普列漢諾夫的要求，當蘇共垮台、蘇聯解體後，這篇遺囑才能公布。1999 年，20 世紀的最後一年，這篇“先知”式的遺囑終於面世了。而公布之日，所有看到遺囑文字的人都臉色發白，震驚無比——後來的歷史不可思議、絲毫不爽地應驗了普列漢諾夫半個多世紀前發出的神奇預言。

劉賓雁當然無法和普列漢諾夫相比，但他在《人妖之間》裡關於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將走向“異化”和腐敗的擔憂卻是個“先知”式的預言。他就像站在船頭的瞭望哨一樣，在泰坦尼克號巨輪的客廳裡正在舉行盛大舞會的時候，敲響了冰山臨近的警鐘。在十年

“文革”剛剛落幕，人們普遍以為一個安定繁榮的盛世即將來臨的節日氣氛中，這警鐘聲似乎有點刺耳和大煞風景。但歷史將證明，在“風起於青萍之末”時就能敏銳地發現危險正在襲來，並發出了如此明白的預警信號，這是需要有歷史穿透力的眼光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的，而賓雁恰恰有這樣的眼光，也不缺少這樣的勇氣。

請看賓雁在《人妖之間》中所寫的如下文字：

“這種‘社會主義’交換，比起資本主義交換確實有相當大的‘優越性’：交換雙方個人不須擁有資本，不須支出任何私人財物，不冒任何虧損或破產的危險，而各有所得。事情非常明顯，每一次這種交換，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間接或直接給社會主義公有財產造成損害，或使黨紀國法失靈，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這最終就必定傷害社會主義制度，使黨的領導徒有虛名。而在這種反復不已的交換中，黨政幹部本身也就逐漸蛻化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會主義制度的蛀蟲，黨和群眾的關係也隨之惡化了。”

賓雁所描繪的這幅圖景，這種國家機器的“異化”和權力與金錢的交易不是作品發表後的 30 多年裡在中國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的事情嗎？

《人妖之間》的結尾並沒有像當時通常的文章那樣留下一個光明的尾巴，而是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王守信貪汙案是破獲了。但是，使王守信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那些社會條件，又有多少變化呢？不是還有大大小小的王守信在各個角落繼續蛀蝕著社會主義，繼續腐蝕著黨的肌體而又受不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懲罰嗎？人們啊，要警惕！現在還不是歡呼勝利的時候……”

對這個結尾，官方意識形態的掌門人卻無法容忍。作品發表

後，胡喬木曾專門找賓雁談了一次話，要求他把結尾改動一下，理由是："四人幫"已經倒台，腐敗的社會土壤已經不復存在了。賓雁拒絕了這一顯然荒唐的要求。後來的實事證明，中國政壇和社會的腐敗過程才剛剛開始，一個空前的大腐敗正在來臨。胡喬木們對大腐敗的氾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作者遇到了一個當年的中學生，三十多年後，他居然還能一字不差地把這個結尾背誦下來。可見這個警告在當時是多麼振聾發聵，使人印象深刻。要知道，"腐敗"和"反腐敗"這一對主題詞還要等到將近十年以後才進入社會生活和流行的話語體系（最早把這對詞喊響的是"八九民運"）。當時的官方話語還只是羞答答、半遮半掩地承認黨內和社會上有點"不正之風"而已，"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怎麼可能會"腐敗"呢？這個詞原來是屬於"萬惡舊社會"的專利啊！

如今，《人妖之間》所預告的"腐敗"已洶湧襲來並成了黨國絕症和當今社會的第一定語，當時王守信貪汙了50幾萬贓款就成了"全國最大案"，如果放到今天，則是人們司空見慣的小事一樁——中國的貪官們正在瘋狂地進行一場"貪賄大賽"，不斷地改寫貪汙受賄的"吉尼斯"記錄，從幾十萬元，到幾百萬元，到幾千萬元，乃至幾億、幾十億……幾乎每五年就要提升一個數量級，而因此被處以極刑的貪官則寥寥無幾，難怪有人要出來為王守信鳴冤叫屈了；而打著"人民"旗號的共和國，也已經"異化"為貪官汙吏的大餐桌和剝奪與鎮壓人民的暴力機器。"六四"屠城和接踵而來的公共財富大瓜分，以及空前規模的"暴力維穩"就是這一歷史災變的結果，"人妖之變"已經導致了"人間地獄之變"。

《人妖之間》刊出後所引起的地震海嘯般的反響，是當今的人們所無法想象的。最早刊出這篇報告文學的是《人民文學》1979年九月號，這是當時全國最大的文學刊物，期發行量達140萬份。文章刊出後，這期的刊物被一搶而空，每本刊物都傳閱多人，直到被讀破讀爛。再加上其他報刊紛紛轉載，電台爭相轉播，《人妖之間》成了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這比當年《在橋梁工地上》的反響還要強烈，當年的關注者主要是知識界，而這次幾乎全民都捲入了。賓雁的辦公室裡每天收到的讀者來信都成百上千，裝滿了一個個麻袋，這也成了中國文學史和新聞史上的一個奇觀。究其原因，主要是民眾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沒有聽到這種真實的聲音了，而作品提出的問題又是那麼切近的現實問題，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共鳴。很多來信都說，“作品說的是東北賓縣的事，可我們感到就像是說我們身邊的事一樣。同樣的現象在我們這裡也存在，而且更嚴重。”很多讀者向賓雁提供新聞線索，希望他前去採訪。甚至說：“你來了就住在我家，吃在我家，我們保護你。”

讀過《人妖之間》並在南昌聽過賓雁演講的盤古樂團樂手凌凌把他聽到賓雁演講稱為“一次如炸雷般的民主意識的衝擊”，他寫道：“那一天，我們知道了這個世界除了陽光，還有陽光下的黑暗；除了正義，還有那麼多不齒於人類的邪惡……那是我們將要踏上社會、走向未來之時最深刻的一次思想啟蒙。因為，從那時起，我們才能無愧地對自己說：我們正開始思考……”他的感受應該是有代表性的。

這種強烈的反響，是用任何文學理論也無法解釋的。美學家高爾泰評論說：“如果說西方美學的諸流派要比我們的文學評論更

科學些，那麼我願意指出，無論是唯美主義的佩特還是未來主義的馬里內蒂；是意識流派的詹姆斯還是表現主義的布萊希特；是超現實主義的布列東還是新小說派的葛利葉；是結構主義的弗拉亥還是語言學派的瑞恰茲，都不能說明，為什麼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以馬蒂斯式的粗線條而能如此以雷霆萬鈞的力量，震撼著億萬人的心靈。”

在這種山呼海嘯般的反響中，也夾雜著一些不諧的聲調，微弱但瘋狂，主要來自一些官方部門。 其中賓縣和黑龍江省委的反響尤為激烈，他們說《人妖之間》在他們那裡引起了比“文革”還要強烈的“政治地震”，使他們都“無法工作”了。 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30 多年，《人妖之間》引起的反響似乎並沒有完全平息。 王蒙先生還隔著時空對這篇歷史文獻的“大方向”進行為時已晚的討伐，這種另類的“繞梁餘音”似乎也在證明著賓雁及其作品的生命力。

其實，《人妖之間》報導的重點並不是王案本身，而是揭露王犯背後的保護傘和關係網，也就是王守信犯罪的社會背景和根源，矛頭直指制度性原因，這才是引起賓縣和黑龍江省委暴跳如雷的原因，也是導致維護舊制度的“極左派”們大事討伐的由頭。

《史記·滑稽列傳》中有個出名的典故：“此鳥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賓雁就是這樣一隻神鳥吧。 這隻大雁在隔了 22 年的沉默之後，引吭長鳴，一鳴而驚人；舉翅高飛，一飛而衝天，這是一次何等壯麗的復出，何等震撼的嘶鳴！

以此為開端，賓雁以成熟的思想者和堅強的人權鬥士的姿態，進入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 如果說以前他是個為捍衛共產革命理想的純潔性而鬥爭的“革命的良心”的話，從此他就自覺地升

華為“人民的良心”，把高於“黨性”的“人民性”當成了自己使命的核心。這種身份的轉換，是他在苦難中體驗和思索的結果，在漫長的時間裡落到被侮辱、被損害、被歧視和被踐踏的社會最底層的慘痛經歷，洗掉了他身上曾有的一切特權和優越感的影子，終於被“改造”成了社會最底層的一員，成了人民利益的捍衛者和人民心聲的代言人。

1979 年 10 月 30 日，與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同時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代表大會，是劉賓雁復出後參加的第一次重要會議。中國作協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是在 1953 年舉行的，隔了 26 年後才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其間經歷了“反右”、“大躍進”、“大飢荒”和十年“文革”等重大而慘烈的政治運動和社會災難。中國作家的隊伍在這四分之一世紀的苦海驚濤中受到重創，可謂損兵折將、滿目瘡痍、遍體鱗傷，這次大會像是劫後餘生者的聚會，因此帶有濃重的悲劇色彩。在這一期間新生的知名作家寥寥無幾，包括劉賓雁在內的一批復出的“右派”作家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一群。

意味深長的是，時任中宣部長的胡耀邦在大會上向與會者推薦了馬克思所寫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直接批判了幾十年來實行的文學作品審查制度，說：“過去都是少數人審查，甚至是一把手審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藝，是不是按藝術規律辦事。有的人像韓復榘辦案，抹臉就放人，瞪眼就法辦。”來自高層的這種人性和理性的聲音給了作家們巨大的鼓舞。

賓雁在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回顧歷史，直陳胸臆，說了許多真情畢露而大膽的話，但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結束語：“我提醒大家，幾千年的封建主義傳統、貧困和愚昧仍然是‘左’的路線的基

礎，而既得利益者仍然要頑固地反對變革，企圖把中國拉回到老路上去。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仍然是對於涉及人民命運的重大問題予以關注的文學。我決定在自己選定的道路上走下去。困難是有的，甚至還有危險，但我已經想過了：單是我今年發表的那篇論文（指發表在《上海文學》1979 年 3 月號上的文學論文《關於寫陰暗面和干預生活》），已經足夠打我一次右派了。寫一篇是打一次，寫一百篇也是打一次右派，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繼續寫下去呢？”這段話激起了全場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但是賓雁不是在說笑話，他是在宣誓。有個詞叫“毅然決然”，賓雁當時的態度只能用這個詞來形容。宋代大慧禪師所編的《禪宗雜毒海》中收有一首題為《逆流》的偈詩：“出源便遇打頭風，不與尋常逝水同。浩浩狂瀾翻到底，更無涓滴肯朝宗。”賓雁便是這樣一股不同尋常的“狂瀾”，他已鐵定決心，不管“打頭風”如何強勁，也要沿著自己選定的道路“翻到底”，絕不回到循市俗之規、蹈庸人之距的軌道上去。

這次大會後，一些謠言就傳遍全國，說這是個“右派翻天”的大會，劉賓雁被“隔離審查”了，被“逐出北京”了，被“開除黨籍”了……對這些謠言，賓雁一笑置之。但有個說法是時任中宣部長的胡耀邦點名批評了劉賓雁。這他不能不重視。經多方瞭解，後來賓雁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中宣部的一次會議上，高級黨校的一個女幹部告了劉賓雁一狀，說他在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時，公然為鄧小平點名不予糾正的“右派”林希翎鳴冤，還說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共產黨不如國民黨……胡耀邦當時沒有理睬這個人（胡耀邦本人就是極力主張為林希翎平反的），但在講話結束時說了如下

的話：“劉賓雁這個人我瞭解。1957 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給他改正，我是贊成的。 但是這個人也有毛病。”這哪裡是“批評”，分明是在保護他。

迎著強烈的“打頭風”，賓雁的報告文學作品像狂瀾出山般噴涌出來：

《尚未愈合的創傷》，這是賓雁與《人民日報》特約記者李春光共同寫作的報導，發表在 1980 年底的《新觀察》雜誌上。 這是他終生唯一的一次返回祖居故里山東省沂南縣留下的足跡。 內容是揭露沂南在“文革”結束後，依然是作惡累累的幫派分子掌權，瘋狂抵制改革的新政策，不准在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繼續對群眾進行鎮壓和迫害的罪行。 文章發表後，沂南的當權者在山東省後台的支持下，以匿名信的形式對劉賓雁進行了瘋狂的討伐，甚至攻擊正在興起的改革是“中國的納吉”和“復辟狂們”推行的“復辟倒退”路線，矛頭直指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 通過這次對祖居故鄉的採訪，賓雁體會到中國的改革之路是多麼漫長和坎坷，也看到了這片孔孟發祥之地是多麼黑暗——由此看來，此地出現“做鬼也幸福”的奴才文人毫不奇怪。

《好人啊，你不該這樣軟弱》，這是賓雁 1980 年夏天重返遼寧採訪調查後寫的一篇政論文章，發表於 1981 年第一期的《文匯月刊》上。 他本來的目的是深入瞭解張志新事件的背景，但在閱讀張志新的案卷時他發現，在殺害張志新的過程中犯有嚴重罪行的人，一個也沒有受到懲罰，而揭露張志新臨刑時被割斷喉管的人，卻遭到官方人士的咒罵和威脅。 在調查中他進一步發現，這個“四人幫”勢力盤根錯節的省份，依然佔據要害部門掌握重權的高官中

不少人在“文革”中都有嚴重罪行，而當年像張志新一樣因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人，現在仍然得不到平反，繼續受到壓制。如果說《人妖之間》主要是涉及經濟領域的黑暗關係網的話，這次遼寧調查則接觸到政治方面的一個巨大的黑色關係網。這兩個黑網互相重疊，導致濫用權力、非法侵佔國家財產和侵犯人權的事件大量發生，並以猖獗的勢頭惡性發展。賓雁還提出了一個過好多年後才引起人們警覺的問題：長此以往，經濟改革的成果能否真正為人民所有？

但是，就像“曲突徙薪”的成語故事一樣，提前預告危險的劉賓雁並沒有得到感謝和獎勵，反而受到懲罰和詛咒，當年的遼寧省委把他當成了洪水猛獸和死敵，告狀一直告到胡耀邦那裡，說他的報導“破壞了遼寧的安定團結”。賓雁關於遼寧省嚴重問題提前了將近 20 年的判斷和預警，被他去國後在 1999 年暴露出來的“慕綏新、馬向東大案”（僅沈陽市涉案官員就達 400 多人）所證實，可惜那時候發出預警信號的賓雁已經去國難歸，而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胡耀邦也被趕下台並含冤而逝了。

《艱難的起飛》，所寫的主人公是丹東市銳意改革、成效卓著的輕工局長李日升。按說這屬於“正面報導”，應該沒有什麼風險。但由於文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他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和阻力，結果又觸犯了一些權力者的神經。文章發表後，原來準備提拔重用的李日升反倒成了“審查對象”，文中所寫的工作成績被一個一個“調查組”所推翻，最後中共丹東市委否定了這個他們原來推出的改革典型。直到四年後，中央輕工部的一位副部長肯定了李日升的改革經驗，他才緩過勁來，擔任了遼寧省的輕工廳長。賓雁這才發現，

連自己的“正面報導”也是爭議之源，足以讓被報導者倒霉。

《在罪人背後》寫的是一個當今讀者所熟悉，而在當時則是罕見的事例：農村女青年王廣香因受到不公平對待，長期上訪無效，負有直接責任的官員非但不糾正錯誤，反而變本加利地對她進行迫害。走投無路的王廣香在極度絕望和憤怒時，走出了極端的一步：用一個炸藥包炸毀了那個官員房屋的一角。在這篇報導裡，賓雁又發出了一個預警：對受害者的長期壓制，有可能導致小矛盾變成對抗性的大衝突，使社會進入動盪之中，後患無窮。這篇報導成了《人民日報》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報導之一，發表後的幾天裡報社收到了8000多封讀者來信。30多年前的這篇報導是最早的“盛世危音”，如今，這樣的事情發生得太多了，以至人們因司空見慣都有點麻木了，但在那攔截不住的上訪洪流中，還將要出現多少個王廣香啊。可惜的是，賓雁發出的警世之音“有如東風射馬耳”，中國正在這種從上到下的整體麻木中走向深淵……

翻開賓雁著作的編年目錄，你會發現1980年之後的幾年，是賓雁創作的高峰期。這幾年他的雙腳在祖國大地上不停地奔走著，他的手在急匆匆地寫著，他的聲音像連珠炮般地響起。據統計，在這短短的幾年裡，他共發表了38篇報告文學，而他所寫的主人公絕大部分都來自社會底層。例如，《一個人和他的影子》中受了20年冤屈而成就卓著的鄭本重，《孤雁離失記》中忍辱負重而不向生活屈服的劉永江，《中國有個唐安華》中以自己的心血智慧為國苦鬥的唐安華，還有《畢竟有聲勝無聲》中那個裝了11年啞巴的周家傑……當然，他也寫了一些著名人物，如朱伯儒、張海迪、萬紹芬等，但是他心中的天平是傾斜向底層民眾的。而他幾乎每發表一篇作

品，就要得罪一個省市當局，樹立一群瘋狂的死敵，還引起一陣喧鬧和叫囂。作家理由曾開玩笑說，你只能寫 29 篇作品，寫一篇得罪一個省市，都得罪完了就寫不成了。而一直對賓雁冷眼相視的王蒙後來幸災樂禍地說，劉賓雁走到哪裡就寫到哪裡，“到處鬧得雞飛狗跳……”

其中最激烈的反應來自陝西。1984 年賓雁曾三下西安，原來的目標是採訪一位命運坎坷的 70 多歲老農民郭建英，但到西安後偶然舉手寫下的一篇小報導《白衣下的汙垢》卻震動了關中大地。這篇不長的通訊切口很小，寫西安一家醫院——這家醫院像是“文化大革命”留存下來的“文物”，一切都保留著“文革”的格局，當年“奪權”者依然掌權，當年打殘高級醫生的兇手依然囂張，而當年被“專政”的知識分子依然不得平反，正當權益未得恢復。賓雁和一位當地的業餘記者袁春幹共同採訪和寫作了這篇不在原計劃中的報導。

報導的反響始料未及：2 月 25 日《人民日報》刊出了這篇通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清晨播出了這篇通訊的摘要，西安街頭立即出現了搶購當天《人民日報》的熱潮，一份定價幾分錢的報紙被賣到兩塊五毛，有人還開動複印機，每份複印件賣到八角錢。人們奔走相告，似乎天上出現了什麼奇跡。而賓雁所駐的招待所外則排起了長龍，從普通群眾到省級幹部爭相要向他反映問題，以至他連到餐廳去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了，飯要送到房間裡，邊吃邊聽申訴……

後來賓雁才明白，他無意中觸發了一個大“地雷”：原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在的西安是個極左勢力的大本營，號稱“西北王”的原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從“文革”以前就一直執行一條極左路線。

1964 年擔任西北局第三書記兼陝西省委書記的胡耀邦曾因在“四清”運動中反對劉瀾濤的極左做法，而發生過一場“劉胡之爭”，結果是深得民心的胡耀邦被整得死去活來，最後因病重離職到北戴河休養去了，而西北對他的缺席批判一直沒有停止過。從那以後，劉瀾濤的勢力一直把持著西安和西北，“文化大革命”也沒有動搖這股勢力。賓雁的這篇小通訊被人們解讀為“中央要解決西北問題了”的信號，所以，長期被壓抑的民眾情緒才會如火山爆發般衝出地面。

緊接著，賓雁又根據對郭建英的採訪，發表了《三十八年是與非》一文。1946 年，李先念的部隊從大別山突圍北上陝南，被圍在山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只得求救於百姓。同情新四軍的郭建英多方借款，籌到法幣 1300 萬元，全數借給了新四軍五師。為此，郭建英因“接濟共匪”而受到國民黨的通緝。共產黨勝利後，郭建英因生活困難，無力還債，想要回這筆債，卻被扣上“向共產黨討債”的罪名，從 50 年代到“文革”一直挨整。“文革”結束後，郭家一直上訪告狀，直到 1983 年，國家主席李先念見到郭的狀子，想起了當年借款的事，就批示要求西安解決。但西安市委書記何承華硬是頂著不執行，還強佔了郭家的房屋，並對郭家人強行拘捕。郭建英走投無路，最後找到了劉賓雁。

這篇報導被《人民日報》編輯部壓了五個月後才見報，原因是估計到陝西方面會有激烈反應。果然，賓雁回到北京後聽到的第一個消息是，《三十八年是與非》激起的反對聲浪，已經使中共中央書記處無法正常工作了，胡耀邦首當其衝。繼黑龍江、山東、遼寧之後，陝西省也加入了對劉賓雁的討伐。局勢嚴重到如此地步，胡

耀邦也不得不出面批評一下劉賓雁了。書記處的常務書記習仲勛還為此找劉賓雁長談了一次。

《人民日報》編輯部傳達了總書記的這個批評：“劉賓雁沒有接受 1957 年的教訓。他不要當記者了，還是去當作家吧。”這個批評使編輯部裡一片嘩然，很多人質問：“誰應該接受反右運動的教訓，不是黨中央嗎？難道要受迫害 20 幾年的‘右派’來接受教訓？”《人民日報》當時的領導們並沒有執行這條指示，劉賓雁依然留在記者崗位上，報紙上還特意發出兩篇賓雁署名的報導，以顯示報社的立場。這時，幸虧當年接受郭建英借款的李先念出來證明賓雁的報導屬實，一場風波才算平息下來。但是，包括賓雁在內的每個人都知道，那些把他視為眼中釘的人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劉再復先生曾說過，在中國這片大森林裡，是需要一種名字叫“劉賓雁”的啄木鳥——至少需要 1000 隻。但現在只有一隻，而等待著他的至少有 10 萬支槍。這就是劉賓雁所面對的基本態勢，也是評價他時不能忘記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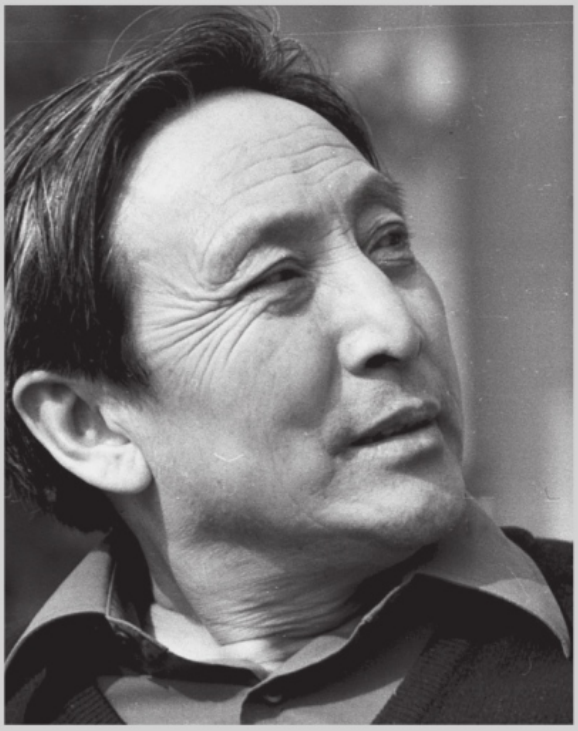
有位政治人物曾誇口說自己有“闖地雷陣”的勇氣，但他只是說說而已，並未去實行。而賓雁卻真是一步一個地雷蹚過來的。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

胡德華：後“六四”生態的中共轉型

敖博：回憶 80 年代劉賓雁先生的演講



第十二章　靈魂救贖

像戰馬聽到號角與炮聲就鬃毛抖動一樣，賓雁渾身的每個細胞都被激活了。每當發現了社會生活中的新問題、新動向、新秘密時，他都是這樣警覺和興奮。“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盼青雲睡眼開”，劉禹錫這兩句詩活畫了賓雁當時的狀態，這是一個天生優秀記者必不可少的素質

1985 年在第四次全國作家協會代表大會上，劉賓雁和巴金在一起。

八十年代，是劉賓雁寫作文章最多的時期。

上個世紀 80 年代，劉賓雁就在人民日報社宿舍 20 號樓二樓的這扇窗口內寫作。

賓雁像從奈何橋對岸走回人間的但丁一樣，用深沉的目光穿透這變化中的世界，用屈原式的憂憤之情關注著苦難的大地和大地上的人民，並以“九死而不悔”的決絕迎著風雨雷霆勇敢地揭示著社會真相，對“盛世”光環下潛藏的巨大危機發出了一連串震撼人心的警報，雖然這警報聲並沒有驚醒那些正沉迷於追逐權力和財富的當權者，但是卻喚醒了一代有良知和社會責任心的人們，並以自己的榜樣啟發了一大批新聞界和文學界的後來人。

賓雁的 38 篇報告文學，每一篇後面都有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都是一場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搏鬥。但是，時過境遷，物是人非，如今我們已很難逐一敘說這些故事了，這裡就以一篇賓雁的力作《千秋功罪》發表前後的經過為例，看看賓雁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如何思考和工作的。

1980 年底，四川省攀枝花市爆出了一個震驚全國的大貪汙案，攀枝花冶金礦山公司下屬的第三井巷工程公司年僅 28 歲的女會計青素瓊貪汙了 26 萬 2217 元——如果擱到現在這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蝦米，但在當時卻是全國個人貪汙的“單打冠軍”，在當時每月只有幾十元工資的人們看來，26 萬已經是個無法想象的天文數字了。不少人建議名震全國的大記者劉賓雁來根據這個案件寫個《人妖之間》的姊妹篇，他搖搖頭拒絕了——還是貪汙案，罪犯也是個女的，這與王守信案太雷同了，恐怕寫不出什麼新意。賓雁是不喜歡幹無所發現、無所創新的重複性工作的。

第二年夏天，賓雁從成都去昆明，中途在攀枝花下了車——是為了用一兩天時間到鋼鐵公司去看望自己所帶的兩個研究生，他們正在那裡實習和鍛煉（賓雁當時還兼任了人民日報新聞研究所的研

究生導師）。名滿全國的《人民日報》特約記者、《人妖之間》的作者到來的消息，在小小的山城不脛而走，成了一大新聞。當地領導十分重視，市委書記親自出面迎接，還準備了全市最高級招待所的豪華房間讓賓雁入住。但賓雁禮貌地拒絕了：到鋼鐵公司看學生，還是住在攀鋼招待所方便。這是賓雁的一貫作風，每到一地，他從不要求人家高規格接待，只要能住下能吃飯能工作就行。這次路過這裡，更不想給當地添麻煩，他並不像後來有人（如曹長青先生）所指責的那樣“處處享受特權”。

到了攀枝花，賓雁不斷聽人議論青素瓊案，兩個研究生也勸他寫寫這個案子。就在來到這裡的第三天晚上他約見了一直報導此案的當地日報記者余以太，想聽聽這個案子的情況。余以太一開口就吸引了賓雁的全部注意力——他沒有一般性地介紹案情，而是上來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當地百姓有一個疑問，青素瓊弄了那麼多錢，到底幹什麼用了？這個問題也引起了劉賓雁的興趣。

余以太的回答讓賓雁睜大了眼睛：“她用這些錢去‘買官’了！”

原來，青素瓊是個出身貧寒的農村姑娘，父親是村裡的“貧協主席”，除了長得“小乖小乖的”（當地土話，小巧玲瓏，善解人意）招人憐愛之外，還聰明伶俐，能說會道，善於察言觀色，見機行事，投人所好，有一副超出一般農村孩子的頭腦。從很早的時候起她就為自己設計了一條人生道路：絕不能一輩子困在貧窮封閉的農村，浪費自己的才華和青春。為了能進城當工人，她略施小計，就戰勝了自己的競爭對手。從農村招工進了企業之後，她先是個每天在工地上勞作的普通工人，但靠手勤嘴甜，投領導所好，得到了領導的青睞，她很快就調到食堂當上個廚工，不再受風吹日曬；過了不久就又

從食堂進了辦公樓，當上了財務科的會計。在這個崗位上，她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各級官員，也看懂了權力運作的內情。她發現，社會上的“不正之風”越刮越烈，幹什麼都要靠背景、關係和後門，這個聰明而有野心的小會計就重新檢點了自己的條件：出身农家，在這個城市和企业裡沒背景、沒後台，想靠“關係”往上爬，根本沒門；只有一條路：靠錢開路！她親見的大量事例证明，那些當官的都是見錢眼開的主——領導幹部來報銷時，她試著超標準給他們發放補助費，都是笑咪咪地接受了，沒有一個拒絕的，還誇她會辦事。這使她悟出一個道理：只要用錢摔，沒有打不開的關口，沒有放不倒的官員。然而，問題是她自己又沒有幾個錢，怎麼辦？看著整天經手的成千上萬的錢，她開竅了，只有一條路：貪汙。她給自己定了條規矩：弄到錢不要只是自己花，那太招眼了。要往那些用得著的官員身上扔，她剛學到一個新名詞叫“投資”，而投資總會有回報的。

於是，從 1972 年（她剛剛 20 歲）起她就開始在賬上作手腳，一筆一筆地貪汙起來。開始是試探著小貪，第一筆是僞造了兩個並不存在的人名，領出了 90 元，後來有經驗了，膽子也越來越大，貪得也越來越多。八年裡共貪了 26 萬多元。她拿這些錢幹什麼呢？

她幾乎全都用來賄賂當官的了——賄賂也要講技巧，一開始，她利用當官的家中有婚喪嫁娶、裝修房子、大人生病、孩子過生日、上學等機會去送錢，一般不見本人面，而是交給官員的家人。她總是幹得很隱蔽，很得體，師出有名，進退有據。到後來，看到沒有一個人拒絕這些巧妙的賄賂，她才敢直接往當官的手中大把送錢了。這種循序漸進的過程充分顯示了她的精明。她還在自己家中設了個牌局，有煙有茶，管飯管酒，成了公司官員經常聚會的社交場所和辦

公樓之外的公司決策中心。常來的二三十個人沒有一個不從她手中接受過賄賂的。她成了公司裡消息最靈通、在領導面前說話最有影響力的人。這期間她還取得了一個重要的進展：和擔任出納員的第四井巷公司副經理的夫人搞好了關係，得到她的完全信任。利用這位官太太不願上班管事的“懶病”，青素瓊把出納的職權也攬到自己手中，右手作賬左手拿錢，成了個“會計出納一肩挑”，這為她的貪汙創造了最方便的條件。

1980 年底被捉住時，她在家中專放贓款的保險櫃裡有 14 萬 6600 多元。銀行裡還有一萬多元的存款，家中準備向官員送禮用的高檔煙酒、高級衣料、人參、丙種球蛋白等高級消費品堆成了一個小山。用貪來的錢，她打通了各個關節，已經成功地讓自己那位喜歡舞文弄墨的丈夫從工人變成了幹部，還當上了公司的宣傳科長。

被捕以後，她交代了自己精心設計的“宏偉藍圖”：五年內要讓丈夫從科長升到處級，當上公司的宣傳處長；十年內要讓他進入冶金礦山公司黨委，成為副廳級以上的領導……而自己則要求不高，只要當上個財務科長就行——這是保證計劃能繼續實施的關鍵。而實現這個藍圖完全要靠錢來鋪路，她算了算，現在所貪的這點錢還遠遠不夠用……

青素瓊犯罪是在 1972 年到 1980 年間，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和改革開放的初期，是“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時候，而這個女犯那時就在大肆貪汙，並用贓款開始“買官”了！她貪汙數額最大的年份是 1978 年（6 萬 2000 餘元）和 1980 年（11 萬餘元），這都是在“四人幫”被打倒以後。她一次貪汙萬元以上共有九次，都是在這期間幹的。

劉賓雁被驚呆了。“買官”這個詞他知道，那是在歷史書上讀到的。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社會中，每一個王朝的後期都有這樣的敗亂之相。而在現代，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居然也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他早就知道這個社會已經開始“異化”，開始腐敗，但腐敗到如此程度，卻超乎他的想象——用錢可以直接買到權力！這是賓雁見到的第一起“買官”實例。對權力腐敗早就異常警覺的賓雁對這種腐敗的新形式和新發展，怎能不感到震驚？

這樣的事放到現在，隨便哪個人都不會感到驚訝了。如今，“買官賣官”已經成了官場上公開的秘密，權力早已直接進入了市場，各級官帽都有了供需雙方約定的價碼，別說科長處長級的小官，就連將軍的肩章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席位都有價格了。“要致富，動幹部”已經成了手握組織大權的官員們尋租的一個常規渠道。但是，在30年多前，這可真是個聞所未聞的新鮮事。青素瓊這個小女子真不簡單，她無師自通地開闢了一個腐敗的新領域，創造了一種腐敗的新形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她也算是個“開拓者”吧。

而且，劉賓雁看到，這個案例與王守信案確實有不同的特點。王守信是所謂“舊社會”留下的“餘孽”，當過土匪的姘頭，而青素瓊則是在“新社會”裡成長起來的，所謂“根正苗紅”的一代。這個“異化”了的貧協主席女兒走上了腐敗、犯罪之路的背景、動力和過程，更值得深思和研究。

像戰馬聽到號角與炮聲就鬃毛抖動一樣，賓雁渾身的每個細胞都被激活了。每當發現了社會生活中的新問題、新動向、新秘密時，他都是這樣警覺和興奮。“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盼青雲睡眼開”，劉禹錫這兩句詩活畫了賓雁當時的狀態，這是一個天生優秀記者必不

可少的素質。

當天晚上，賓雁留下余以太深談，一直談到凌晨三點。負責招待賓雁的市委宣傳部幹部進來下了逐客令，余以太才不得不離去。臨走時相約：第二天再接著談——賓雁這個黎明肯定沒有睡著覺。

第二天見面時，賓雁告訴余以太，他考慮了一夜，決定要寫這篇報導，並請余以太做他的合作者。日程也相應變動：留出幾天時間到青素瓊所在的冶金礦山公司和下屬的井巷工程公司去採訪。報導的主題初步確定為，青素瓊貪汙案的社會原因和土壤，特別是腐敗的根源——幹部路線和組織路線問題。他還拿出了一份採訪提綱。

賓雁決定，立即動身去採訪，為了工作方便，把住處從攀鋼招待所轉到冶金礦山公司招待所，他還做了分工，自己採訪冶礦公司，余以太直接到第三井巷公司去採訪。

賓雁日程的這個突變引起了當地黨政部門的警覺。顯然，這個本來只是過路的大記者是要插手青素瓊案了。本來官方對他的熱烈歡迎也來了個 180 度的大轉彎。

經過一天採訪後，余以太不放心，傍晚去看劉賓雁，卻發現情況不妙。招待所只給賓雁開了一個沒有衛生間的小客房，在夏日陽光下奔忙了一天的賓雁滿臉是汗，渾身是土，正在走廊頭裡的公共衛生間裡擦澡。下樓去吃飯，發現食堂已經大門緊鎖。好不容易敲開門，出來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伙夫，他厲聲宣布：關門了，下班了，沒有飯了！余以太向他介紹：“這是北京來的《人民日報》記者……”話還沒說完就被粗暴地打斷：“老天爺來了也沒飯了！”余以太被氣得大吵起來，賓雁卻把他推到一邊，心平氣靜地對伙夫說：“對不起，我

因為採訪回來晚了，打擾你休息了。我也不要菜了，你能否打兩個雞蛋給我炒點剩飯吃？”伙夫這才不情願地開了門，進到廚房去炒飯了。

這一天，賓雁只吃上了一碗蛋炒飯。

余以太按捺不住怒火，要找公司的領導和招待所的所長，告食堂的狀，並提出要給賓雁換個有衛生間的客房，但被賓雁阻止了。賓雁樂呵呵地說：“有地方住，能吃上飯，能工作，這就行了。比我當右派時強多了，別為這些小事提要求。”他真的一點也沒有生氣。

其實不僅是這一次，賓雁一直是這樣採訪和工作的。那些指責他是靠“特權”進行採訪的人，要麼是不瞭解情況，要麼是以什麼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吃完飯賓雁才告訴余以太，最困難的是採訪。白天他要採訪一個重要的人物、公司黨委的前組織處長劉長根——群眾反映，此人是個堅持原則的好幹部，因為反對號稱“霸王”的冶金礦山公司一把手任人唯親，胡亂提拔自己的親信，而被當成眼中釘。後來，這位在“文革”中被打斷了一根肋骨的好幹部在“清查四人幫”時差點被整得沒了命。他先是被“隔離審查”了132天，然後又讓他到礦上去“勞動改造”，整天搬石頭、打石頭。他的肝炎發作了，也不准休息，看病還不給報銷。直整得他死去活來。

這是個瞭解公司組織工作內幕的知情人，賓雁提出要採訪他。可公司宣傳處冷冰冰地回答：“此人在工地上勞動，離市區很遠。”

賓雁要求派車，回答是：“車都派出去了，家裡沒車。”

賓雁問有沒有交通車，回答是“你自己去找吧”。

倔強的賓雁決定自己步行去採訪，一打聽，有幾十公里遠。後

來，在路上看見一輛拉礦石的工程車，賓雁就拿出了《人民日報》的記者證，說明了自己要到礦上去採訪。司機一聽很驚訝：北京來的記者要坐我的大卡車？上來，上來！一路上司機不停地問這問那，很是興奮，這是他平生第一次拉記者。

和普通勞動者打交道可是劉賓雁的特長，這位作風簡樸態度平易的“高幹記者”對社會底層的百姓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平時那些來找他投訴的“冤民”總能受到他關切的接待，他還經常掏腰包給他們飯錢和路費，甚至安排他們到自己並不寬敞的家中住下。他能在幾分鐘內就得到來訪者的完全信任。嚴格地說，這不是一種採訪技巧，而是一種人文品格——22 年的煉獄生活練就了他的平民品格，平民立場、平民感情和平民話語。這次他能很快就和那個卡車司機成了朋友並不奇怪。

就這樣，賓雁一路顛顛簸簸地到了礦山。下車後只見到處是叮叮當當打石頭的工人，可哪個是劉長根啊？問了幾個人都說不知道。賓雁急了，就站在高崗上大聲喊起來：“劉長根！哪個叫劉長根？我有事要找你！”

喊了好久，才有個人走過來。冷漠地說：“我就是劉長根，有嘛子事呀。”

賓雁說：“我是《人民日報》的記者，要採訪你，向你瞭解情況。”

劉長根環顧左右，又死死地盯著賓雁說：“我不接受採訪。”然後就回去接著砸石頭了，再也不抬頭。

賓雁在驕陽下跑了半天路，但採訪以失敗告終。

然而就在這天夜裡，有人敲響了賓雁的門，是劉長根。他說，

拒絕了賓雁後，那個卡車司機找到他，說：“你傻了？整天打石頭把腦殼打壞了？來的是《人民日報》的大記者，名叫劉賓雁——就是寫《人妖之間》的那個人。這是你見天日的最好機會，可你怎麼放過了？”

於是，他敞開了心扉，把幾年來自己挨整受難的經過講述了一遍，還把自己所瞭解的公司領導任人唯親、突擊提幹的內幕原原本本地揭發出來……這些都成為賓雁後來寫作的重要素材。

在揭露黑暗的同時，為受壓挨整的好人呼喊，是賓雁最喜歡幹的事。這篇作品發表後，劉長根的處境也得以改善。他被重新啟用了，雖未恢復組織處長的原職，但被安排到下屬的機動公司當個副經理，總算結束了“勞改”。

當賓雁的採訪正在緊張進行的時候，報社又一次來電，要求他一周內返回北京——中國作協要組織一個訪問團去美國，名單中有他和丁玲。等他風風火火地趕回去以後，才知道他的名字又被取消了。當丁玲等人踏上美國的土地時，沒有人向賓雁解釋這是為什麼，而賓雁也沒有興趣去打聽——他一門心思要寫好這篇作品，這才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事。

離開攀枝花前，賓雁提出要見見那位大貪汙犯青素瓊。此時，她已經被判了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正在當地的看守所裡等待著送往服刑的監獄。

這次見面對青素瓊的一生有重大影響。在賓雁去看守所的那個清晨，青素瓊剛剛進行了一次自殺，趁同監的犯人出去洗衣服的空檔，她用一根自制的繩子上吊了。這個罪犯以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就是死刑，只不過要等兩年後才執行。早晚都是死，何苦再

在鐵窗下受兩年的煎熬呢，還不如早死了之。 由於被發現得早，她沒有死成，而被帶著出來見劉賓雁了。

坐在她面前的兩個人，有一個她認識，那是《攀枝花日報》的記者余以太，她丈夫當公司的宣傳科長，經常和報社打交道，還通過余以太在報紙上發表過不少報導。 而另外一個身材魁梧的人，她沒見過。 余以太向她介紹，這是從北京來的《人民日報》記者，但沒說名字。

中央來的記者，年紀大約有 50 多歲，慈眉善目，氣度不凡，說話聲音不大，但深沉有力，這是青素瓊對來人的第一印象。 再加上看守所幹部事先的警告：見面時好好回答問題，不准撒潑胡鬧……聰明的青素瓊明白了，這個人有來頭，不是個平常的記者。

賓雁的談話從早晨剛剛發生的自殺開始。 他認真地說明了“死緩”判決的意義：這是給她留了一條生路，只要服從改造，表現良好，兩年後死刑可以改判為徒刑，並非必死不可。 北京記者的這一解釋讓青素瓊鬆了一口氣，她說早知如此她就不自殺了。

接下來的談話就順暢多了，青素瓊坦率地講了自己貪汙的原因和經過，說目的是為了弄些錢來改變自己的地位和命運。 雖然因為犯罪她落到如此地步，但她還毫不遮掩地表達了對那些見錢眼開的官員們的鄙視和輕蔑。 她說，當面奉承著他們，用錢打發著他們，利用他們來實現自己的願望，但她從骨子裡看不起他們，認為他們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對這些壞東西大部分都逃脫了法律的懲罰，她憤憤不平……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最後，賓雁告訴青素瓊，到監獄裡要好好總結自己犯罪的教訓，認真改造思想，爭取早日重新做人，他最後的話是：“你還是有希望的。”他不知道這些話對青素瓊會有

多大影響。

從看守所出來，賓雁就匆匆地趕到火車站，離開了攀枝花。他臨走還囑咐余以太完成採訪，並請他寫出草稿。

幾個月後，余以太接到《十月》雜誌的邀請信，請他到北京去改稿。賓雁和雜誌社的編輯到機場迎接了他，賓雁還請他到為兒子大洪準備結婚的新房裡住下。讓以太十分感動的是，每天早晨上班前，賓雁都要趕到這裡，問寒問暖，安排生活。賓雁讓以太到人民日報社的食堂吃飯，把自己不多的大米票全部給了他——因為他是南方人，愛吃大米。賓雁還經常親自打開火，為以太燒上一壺水，泡上一杯茶。有一天，賓雁走後大約半小時，又匆匆趕回來。進門直奔廚房——他要確定煤氣灶的閥門已經關緊，然後才放心地上班去了……

事隔 30 多年了，賓雁已作古，如今談起當時的情景，余以太還是感動不已。他只是地方報的一個小記者，但卻受到賓雁如此熱誠的接待。更重要的是，賓雁還經常給他講報告文學應該如何寫，如何用思想來統帥材料，文章怎樣才能寫得有節奏，並具體指導他如何改稿，還親自設計了文章的總體結構“人——社會——人”……當年還是個小青年，如今已白髮蒼蒼的以太對筆者說，這輩子賓雁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一個人。

這篇報告文學最後還是由劉賓雁全部精心改寫一遍後才定稿的。題目定為《千秋功罪》，署名是劉賓雁和余以太兩人。文中所涉及的人物全用假名，如青素瓊叫“金青青”，青素瓊的丈夫羅尤金叫“黃文金”，劉長根叫“劉常庚”，冶金公司的那位“霸王”叫“何忠野”，還有與此案關係密切的第三井巷公司的頭頭等人都沒用真

實姓名。不過在題記上有這樣一句話：“本文所寫，全屬事實。但由於讀者可以理解的原因，全部隱去真實的地名和人名。”賓雁說，這樣做主要是為余以太考慮，一旦發表了他受的壓力一定最大，假如訴諸法律，這樣還有個迴旋餘地。發表前賓雁還多次問以太：“你怕不怕？對可能的壓力有沒有充分的準備？”

《千秋功罪》的主人公當然是青素瓊，但是作品中並沒有把這個大貪汙犯寫成青面獠牙、萬惡不赦的魔鬼，而是把她當成了一個像《紅與黑》中的于連一樣的有才能、有手段的小野心家；在寫出她的邪惡的同時，更著眼於造成她走上犯罪邪路的社會環境與土壤。全篇用大半篇幅寫了那些吃了青素瓊的贓款、重用她、保護她，甚至縱容她的的勢力和人物，這些人只有少數被青案牽連，成了青素瓊的同案犯，多數還逍遙法外，未受懲罰，甚至照樣升官不誤。例如那位在攀枝花冶金礦山公司權傾一切、劣跡多端的“霸王”後來已經升到國家煤炭部當司局長去了。

青素瓊案件曝光後，幾乎所有的報導都是一個調子：當地黨和政府明察秋毫、發現線索、高度重視、神速破案、嚴格執法、及時懲治犯罪，取得了一大勝利。而對那些利用青素瓊犯罪來發財，並包庇她、重用她，甚至打壓那些揭露和舉報犯罪的小人物，使罪犯在八年時間裡沒有受到任何清查……這一類嚴重問題在報導中隻字不提。把醜聞當成喜事來慶祝，這是官方新聞的一貫做法。而《千秋功罪》則勇敢地揭開了青素瓊案的真相，把聚光燈射向躲在貪汙犯身後的一群貪官汙吏和邪惡勢力，展示了權力腐敗的可怖鏡像，也敘述了一批堅持正義、揭露犯罪的小人物艱苦的鬥爭歷程。在官方媒體已經高唱讚歌、彈冠相慶的時候，這篇作品發出了病灶猶在、除

惡未盡、危險依舊的刺耳警報聲。這是一個關於社會正在發生癌變的現場報告，是一篇堪與《人妖之間》比肩的重磅炸彈。

《十月》雜誌在1982年第三期刊出了《千秋功罪》。接著，《新華文摘》、《中篇小說選刊》等雜誌相繼轉載，四川人民廣播電台收聽率最高的"長篇聯播"也發出預報準備全文播出（後奉命取消），長春電影製片廠也計劃改編成電影。

在攀枝花，這更成了一個轟動事件。廣大市民奔走相告，引頸期盼這一期的《十月》到來。然而，郵局接到市領導的指示，要把這一期的《十月》扣押下來，不准下發。禁令傳出，反而引起了一波搶購潮，人們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千方百計地找熟人拉關係，只求得到一本。結果是封存的雜誌幾乎全數從後門流出，但仍然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省會的書商看準了商機，在成都再版重印了這一期的《十月》，拉到攀枝花來高價銷售，每本從一元漲到十元。街頭還出現了複印件，價錢賣得更高。由於作品中人物用的是假名，在市民中就出現了一個猜謎熱，每個假名後面的真人是誰，成了街談巷議的話題。瞭解情況的人到處宣講，成了街頭茶館中的主角。難怪有人說，這篇報告文學在攀枝花引起了一場地震。

對《千秋功罪》的圍剿在北京、成都和攀枝花三個戰場同時展開。在北京是由已經從攀枝花調到煤炭部的那位"霸王"（此人的真名叫韓忠順）牽頭，通過煤炭部向中央施壓；在成都由四川省委出面，要求中宣部下令禁止這篇報告文學傳播；而在攀枝花則由市委組織，對作者之一余以太施壓，要求他寫出深刻檢查……

有充分思想準備的余以太堅決拒絕寫檢查。市裡就提出一個惡毒的替代方案，要求他寫一個"情況說明"，內容是在寫作過程中

他曾與劉賓雁“有原則分歧和激烈衝突”，最後定稿是劉賓雁單獨決定的，不能代表他的立場。余以太憤怒地拒絕了這個卑鄙的方案，大聲宣布：“我和劉賓雁的思想、立場完全一致。你們想把我這樣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變成一枚冷冰冰的炮彈，射向劉賓雁——我不幹！”因此在不久後開始的新聞職稱評定時余以太被取消了參評資格，理由是“政治上不合格”，還要把他調離新聞崗位。於是，以太一怒之下寫了封抗議信就離開報社出走了。

事隔五年，1987 年劉賓雁被第二次開除黨籍以後，余以太再次受到巨大壓力。在開除劉賓雁黨籍的決定中，說他的報告文學“借寫真實反黨”，其中點了兩篇作品，就是《人妖之間》和《千秋功罪》。四川省委派了一個由新華社分社、四川日報社組成的工作組進駐攀枝花，任務是要誘導和逼迫余以太寫一篇“揭露劉賓雁真面目”的批判文章，準備發表在《四川日報》上，並拿到北京去參加胡喬木主持的“全國新聞界批判劉賓雁大會”。但經過三天的“隔離談話”，余以太堅決不從，這個工作組一無所獲，失敗而歸。而余以太因此得到了一個“行政記大過”處分。

作品發表後的這些反響均在賓雁的預料之中，但是，有一個反響是他所沒有預料到的。

作品發表大約半年之後。賓雁突然收到來自宜賓監獄的一封信，打開一看，是青素瓊寫的。原來，她在監獄裡看到了《千秋功罪》，這才明白當時在看守所裡見到的北京記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劉賓雁。她雖然學歷不高，但也算是個文學愛好者，1979 年就讀過風靡全國的《人妖之間》。如今在重刑監獄裡回憶起賓雁當時對她所說的那句話：“你還是有希望的。”再仔細讀了以她的案件為素材寫

的《千秋功罪》，她受到巨大震撼。

最使青素瓊感動的是作品對她雖然有嚴厲的批判，但沒有醜化人格的人身攻擊和侮辱。“金青青”是個走上邪路、犯了罪的人，而不是一個魔鬼。 文中所寫的犯罪動機、經過都是實事求是的，沒有惡意的誇張和渲染；對她的思想、性格和作風的描寫也是準確的。一句話，對她的人格還是尊重的。 而這對一個囚徒來說是最寶貴的，為此這個已經受盡侮辱的女人感謝文章的作者。

作品深入地剖析了“金青青”犯罪的內因、外因，特別是分析了造成她犯罪的環境、條件和土壤，用大量篇幅揭露了那些躲在罪犯身後、掌握著巨大權力的黑暗勢力，這也得到青素瓊的高度認同——人是複雜的，雖然是個犯了嚴重罪行的人，但是她的心底裡對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還是有自己的判斷的。 她在犯罪的過程中，表面上奉承、伺候和賄賂著那些貪官汙吏，但心裡對他們的貪婪和下作一直是看不起的。

余以太講了這樣一件沒有寫進作品的事：有一次冶金礦山公司的那位“霸王”要到三井巷公司來“視察工作”了，這成了天大的事。三井巷公司的頭頭們聚在青素瓊家中開會，商量如何接待這位大人物。 他們打聽到“霸王”最愛吃狗肉，就派人四處去找。 但當地沒有賣狗肉的地方。 於是就派出一隊人馬，到村裡老鄉家去偷狗。 事先還做了周密的計劃，誰去用肉骨頭把狗引出家門，誰躲在村口捉狗，誰開車把狗運回來……結果是“霸王”吃了一頓狗肉後十分滿意，下面的嘍囉們也皆大歡喜。 從小就喜歡狗狗的青素瓊當時在場，冷冷地說了句：“你們這是踩著狗的屍體往上爬啊！”聽上去像是在說笑話，其實透露出了她內心的輕蔑和鄙視。 僅此一端，就說明在她

身上人性還並沒有完全泯滅。

劉賓雁在看守所裡的一席話，特別是《千秋功罪》這篇作品，對喚醒青素瓊的人性，啟發她回顧人生道路，總結犯罪的教訓，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從此賓雁和她書信來往，居然成了好朋友，青素瓊甚至把賓雁當成了自己再生靈魂的依托。她在信中向賓雁匯報了自己思想變化的歷程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決心。還告訴賓雁，她已經將在獄中的勞動所得全部捐獻給了非洲災民……過了幾年，她又報告了一個好消息：由於表現優秀，她已經獲得減刑——死緩改為徒刑 15 年了。

在一般人看來本應是對手和死敵的這兩個人之間的友誼似乎是個不可思議的奇跡。一次，賓雁收到青素瓊從獄中寄來的一個包裹，打開一看，是個手工雕刻的竹筆筒，材料雖然一般，但做工精細，顯然是下了大功夫的。這是她用休息時間精心製作的，其中蘊含的話語是：當你寫作累了的時候，就把你那如椽大筆放到這個筆筒中，去休息一下吧。這是一個罪人向你表達感謝的唯一方式……

不，這不是唯一的方式，她還有機會用一種更令人震驚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和激情——1987 年，劉賓雁被開除黨籍了，電視台、電台和報紙向全國、全世界發布了這個新聞。一場對劉賓雁的“大批判”撲天蓋地地襲來。這時發生了一個極不平凡的“一個人示威”事件，四川省公安廳對此發了通報：

正在服刑的罪犯青素瓊聽到劉賓雁被開除黨籍的消息後，突然跳出監房的鐵門，赤著腳在院中狂奔，口中不停地高喊：“我抗議！我抗議對劉賓雁的迫害！他是個好人，是個真正的好人哪……”那時

天正在下著大雨。

據我們所知，這是為賓雁被開除黨籍而發生的唯一一次示威遊行，參加者只有一人，地點在宜賓監獄的大院裡。結果是示威者青素瓊被戴上了手銬，投進了獄中之獄的“嚴管牢房”。

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場面，這是多麼撕心裂肺的呼喊！

流亡異國的賓雁，你聽到這勃發的人性聲音是否會感到一絲安慰？

千方百計迫害打擊賓雁的人們，你們聽到這吶喊不感到心驚膽戰嗎？

賓雁用自己的凜然正氣、悲憫情懷、人道精神和人格力量喚醒了一個罪犯的良知，讓她的靈魂重新回到了陽光之下。她曾因迷失人性的貪婪而受到懲罰，又因人性的回歸而發出正義的吶喊，自願地陪著賓雁一起再次受到嚴懲——賓雁啊，你何以竟有如此強大的的感召力！。

雖然賓雁不是一個基督教的信徒，但源於俄羅斯文學深刻的人道主義和大悲憫情懷已使他具有救贖人類靈魂的聖徒氣象，在這一點上，他遠遠地超越了那些只知煽動仇恨、製造階級鬥爭和對人性進行無情斬伐的所謂唯物主義者。

《千秋功罪》的合作者余以太，以及文中的主人公青素瓊用自己的行動見證了賓雁思想和人格的影響力。難怪胡喬木哀嘆“劉賓雁的影響最大，也最難批”。是啊，強權在人性和真理面前終究是色厲內荏的“銀樣蠟槍頭”。

時間又過去了 20 多年，為了採訪《千秋功罪》產生的經過和影響。筆者在 2013 年追隨賓雁當年的足跡來到了攀枝花。在這裡聽

說，青素瓊和她的丈夫都已經刑滿釋放了。如今她的丈夫承包了一家公司，她則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幫助丈夫管理這家企業。瞭解情況的人说，现在，他们诚實而尊严地工作着，低调而平静地生活着。他們在用一種新的方式證明著自己才賦和能力，並得到了人們的寬容和尊重，現在周围没有一個人愿意再提起他们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本来我们想重訪一下這對人生道路坎坷的夫妻，但深深地陷入了一个困惑：如果像《悲慘世界》裡的沙威警长闖入冉阿讓的平靜生活一樣，重新撕開他們心靈的創口，我們是否有這樣的權力？這種顯然殘酷的追問是否是道德的？猶豫再三，我和余以太最終決定：他們已經為過去的罪孽付出了足夠的代價，也用行動表明他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作為記者的我們也無權隨意拷問一個人的心靈，我們還是不要去打擾他們的新生活吧。賓雁如果還在，他大概也會同意我們的這種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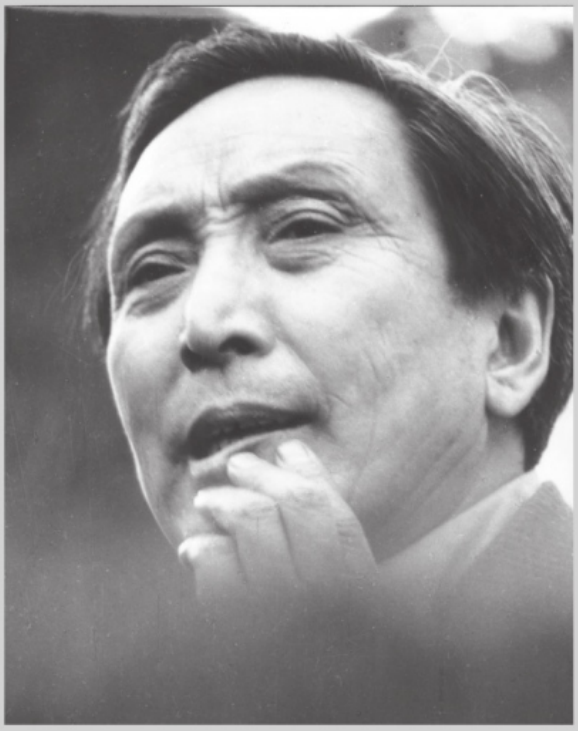
重要的是，賓雁所說的“你還是有希望的”如今已經變成了現實。青素瓊走過了如此曲折的道路，終於像《復活》中的瑪斯洛娃一樣得到了救贖，她一定不會再走上迷途了，因為賓雁的影子不會從她的心靈中消退。

這就夠了，足以告慰冥冥之中的賓雁了，阿門！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余以太：我與劉賓雁（尚未公開發表）

李克夫：他總是昂著高傲的頭顱



第十三章　風譎雲詭

賓雁親眼看著這場“清汙”的鬧劇風起風收，雲聚雲散，他從中升起一個希望：中國到底是發生變化了，歷史該不會重演了吧——他這個想法還是有點太天真了。是的，民心是在悄悄地發生重要的變化，但是邪惡的魔鬼絲毫也沒有因此變得善良一點啊！中國的事情的確有自己的特色，那個幾代人翹首盼望的歷史性轉折點還在遙遠的未來呢，在這個決定性的轉折來臨之前，還要有多少荒唐的鬧劇和血雨腥風的悲劇啊！

在上海海運學院採訪。

拜訪錢鍾書和楊絳夫婦。

1986 年，劉賓雁和作家戴厚英（右）交談。

如今很多回憶上個世紀 80 年代的文章都把那時當成陽光明媚、改革高歌猛進的黃金時代。其實，這是一種並不準確的選擇性記憶。中國改革的第一個十年，是改革與反改革兩種力量激烈搏鬥的十年，其間幾經反復，風雲驟變，改革力量為此付出了慘烈的代價，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書記先後被反改革力量顛覆下台，就是這一鬥爭的結果。而劉賓雁始終站在風口浪尖上，雖然並不能決定歷史的走向，卻是兩種力量消長變化的晴雨表。

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後，鬥爭的核心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中國要不要改革，保守派認為不需要什麼“改革”，所謂“正本清源，撥亂返正”就是只需要回到“文革”前 17 年的狀態就行了，那是“毛澤東正確思想”照耀下的輝煌年代，是中國共產黨的不二選擇和光明正道（這是陳雲的基本主張，當今的“老左派”即“毛左派”和所謂“新左派”依然這樣主張）；而改革派則主張必須改弦更張，起碼要進行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改革，走出毛澤東從斯大林那裡薑來的“計劃經濟”那一套模式，實行市場經濟，否則中國無法掙脫“貧窮社會主義”的泥潭。“攝政王”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站到改革派一邊，與胡耀邦總書記和趙紫陽總理組成了“鄧 – 胡 – 趙體制”，一度成為中國政壇的主流，領導了 80 年代的經濟改革。

第二個是要不要進行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改革，改革派認為“跛足”的經濟改革無法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治改革，雙軌齊動，才能保證改革列車的平穩前進，而進行這種整體改革，必須在意識形態上來一個大解放；保守派堅決反對威脅到“馬、恩、列、斯、毛”的“道統”和共產黨

“一黨專政”的“政統”的政治改革，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以“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為標誌，正式站到了保守派的立場上，並與保守派的陳雲、李先念、鄧力群等兩次聯手，先後出賣和廢黜了改革派領袖胡耀邦、趙紫陽，使十年改革前功盡棄。中共至今還頑固地堅持著這一立場。

圍繞這兩個問題，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發生了錯綜複雜縱的分裂組合與生死搏鬥，其間，雖然鄧小平信誓旦旦地保證過“不再搞政治運動”了，但是“政治運動”實際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一直以各種名目貫穿於 80 年代。有人總結說，在那十年裡，雙數年份是改革的聲音佔上風，而單數年份是反改革的聲音甚囂塵上，改革和反改革的纏鬥一直沒有停止過。

改革開放啟動後的第一波逆流是“批白樺”。那是 1981 年 4 月 20 日，由《解放軍報》首先發表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批判根據作家白樺的劇本《苦戀》拍的電影《太陽與人》（其實這部電影並沒有公演，人們至今還未看到是什麼樣子的，這是那個時代反思“文革”浩劫最深刻的作品之一）。這是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的老路數，表面上是批一個文藝作品，實際上是一場政治鬥爭的先聲，富有政治經驗的中國人都知道下面將上演的是什麼戲。再加上白樺曾經是個“右派”，其矛頭指向十分清楚。和以往的政治運動一樣，媒體上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軍報積極批判，而《人民日報》卻按兵不動，這種微妙的差異也被解讀為中央正在進行路線鬥爭。

賓雁瞪大眼睛注視著風譎雲詭的形勢變幻。他先是聽到了胡耀邦對批《苦戀》叫停，要求雙方都“冷一冷”；接著又看到鄧小平

支持批《苦戀》的講話，發現批白樺已經擴展到批王若水、郭羅基等理論界人士，7月間中南海召開了各省市負責意識形態的書記與宣傳部長的“思想戰線座談會”，北京的思想文化界名流也參加了，曾經也是“右派”的小說家姚雪垠的發言作為會議文件發給每一個與會者，這個發言在批判白樺時聲色俱厲，劍拔弩張，殺氣騰騰，比一些“老左派”們還要激烈。會上傳出了一個言之鑿鑿的說法：“第二次反右運動從10月份開始”一個針對賓雁的說法也流傳甚廣：“批白樺之後就是批劉賓雁，文章已經寫好了。”

其實，這次批判就是當年“反右”的前線總指揮鄧小平發動的，難怪手法是那樣相似。1981年3月27日他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當時軍委主席還是華國鋒）在與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人談話時，講到第八個問題時談到了《苦戀》；他强調：“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事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解放軍報》聞風而動，一個月後就推出了那篇評論員文章，連文章的題目都引用的是鄧小平的話。再過兩個月後華國鋒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迫辭去了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鄧小平以軍委主席的身份成了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他左右開弓，既用《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毛澤東發動和指揮的“文革”，又通過批判《苦戀》給了想要徹底否定毛澤東的黨內外自由派一個下馬威，他的“第二代核心”位置從此確立，而半身不遂的中國改革就沿著這條羊腸小道瘸瘸拐拐地蹣跚而行了。

鄧小平的最高地位正式確立以前，在黨內外和全社會要求進行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改革呼聲高漲的時候，他也曾講過一些關於政治制度和體制要改革的話，例如1980年8月18日他曾發表過《黨

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說過“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有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道理他似乎很明白，但是一朝權在手後，這樣的話他就越來越少講了，而與林彪的“四個念念不忘”相雷同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則成了他的口頭禪。這個實用主義的信奉者很認同“到什麼山唱什麼歌”的世俗智慧。

繼“批《苦戀》”之後，下一個政治運動是“清除精神汙染”，而“清汙”的前哨戰是一場關於“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的激烈爭論。這都是劉賓雁早在 70 年代後期就特別關注的哲學問題，並在他 1978 年為翻譯出版的《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所寫的《編者的話》中論述過的——這應該是在中國關於“異化”問題的最早論文。

1982 年 9 月，賓雁的好友《人民日報》副總編、哲學家王若水發表了《社會主義異化論》和《抽象的人道主義》兩篇論文，公開提出“社會主義也存在著異化現象”，人民把權力給一些人，有些人依仗這個權力，由人民公僕變成了人民的老爺，這就是“異化”。而人道主義不應該是資產階級的專利，而是一種把人和人的價值置於首位的觀念，是反對神道主義和獸道主義的武器。這兩篇論文如電光石火，從哲學的高度對“文革”和傳統的意識形態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在知識界激起了熱烈的反響。1983 年 3 月 7 日，為紀念馬克思逝世 100 週年，中國文聯主席周揚在中央黨校作了個報告，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其中也談到“社會主義異化論”和“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問題。據在現場的人回憶，周揚的報告過程中，全場鴉雀無聲，報告結束時，爆發出熱烈的

掌聲，經久不息。3月16日《人民日报》根據總編輯秦川的決定，用將近兩個版面發表了周揚的这篇講話，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當時，賓雁正在東北採訪，讀到這些文章後非常高興。特別是周揚這位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奉行極左思想路線，並在“文革”前一直扮演政治運動得力幹將的中共理論權威，經過了十年浩劫的血雨腥風和囹圄之災後終於翩然醒悟，華麗轉身，皈依了真理，這讓賓雁十分感動——儘管周揚曾經在“反右”中是賓雁的對頭（周揚1957年在作協黨組擴大會上說：“……這種提倡寫黑暗的老祖宗是王實味，第二是蕭軍，他們說太陽裡也有黑点，他们就專門看黑点。丁玲就實踐了這個理論，現在是劉賓雁……”），但是寬厚的賓雁是從來不記前嫌和個人恩怨的。

然而，與周揚原來同道而繼續堅持極左思想路線的“左王”鄧力群和胡喬木這時坐不住了，他們跳出來，向中央書記處呈報了《中宣部關於人民日報擅自全文發表周揚同志長篇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提出了三點處理意見：一是要全文發表對周揚報告“不同意見”的文章，組織力量對這一問題進行“馬列主義的闡述”（實際是發表大批判文章）；二是將王若水調離《人民日報》；三是對“周揚在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上不嚴肅、不負責的表現”提出批評，“希望他有所認識，表示正確態度”（實際是要求周低頭認錯）。

這個報告中央沒有下發，原因是新上任的總書記胡耀邦阻攔了。他提出要與被批評的人見面，要核對事實。3月21日（《鄧力群自述》中說是3月26日，他記錯了），在胡喬木的主持下召開了一個“見面會”，會上發生了一段饒有趣味的短兵相接。在場的秦川回憶（見楊繼繩的文章《從批“異化論”到清除精神汙染》）如下：

……周揚看完了，臉上氣色發生了變化，他想站起來說話，又坐了下去。突然，他舉起鄧力群寫的那個材料，擲在胡喬木面前，連聲說：“這樣做不正派，不正派，這樣做法不正派！”

胡喬木震驚：“你說什麼？說中央不正派？”

周揚憤怒了：“你們這樣不正派！”

胡喬木瞪大眼睛，聲色俱厲：“你這是反中央！”

周揚回答：“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對胡喬木這個具體的中央委員！”

胡喬木大聲說：“你這是反中央政治局！”

秦川看到雙方都劍拔弩張，就出來打個圓場：“你們都是我的老上級、老領導了，還是團結起來說吧。”

靜了片刻，胡喬木問周揚：“告訴你不要發表，你為什麼還要發表？”

周揚說：“你來我家時沒有說不讓發表，你只說異化部分要聯繫實際……既然大會都講了，講話稿也印發了，報紙為什麼不可以發表？”

《鄧力群自述》中寫的是，胡喬木說不讓在《人民日報》上發，修改後可發在《哲學研究》上。而周揚說根本就沒聽到這句話。

二人相持不下。賀敬之站出來說：“我相信中宣部的記錄是真實的。也相信周揚同志不會說假話。”這騎牆之論等於什麼也沒說。

鄧力群這時突然站起來，大聲說：“周揚同志，希望你認真學習小平同志在中顧委成立時的講話，不要干預中宣部的工作！”

周揚當時已由中宣部副部長轉任中宣部的顧問。這句話出自

鄧力群之口格外有諷刺意味。幾年後一群退休的老“顧委”們先後逼宮廢黜了胡耀邦和趙紫陽時真該有人重複一下這句話——據說只有習仲勛這樣說了。

會後，胡喬木發表署名文章批判了周揚的“異化論”和“人道主義”。有趣的是，在批判了一通之後，胡喬木還寫了一首詩送給“老朋友”周揚。詩云：

誰讓你逃出劍匣，
誰讓你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從他的手上流出，
也從我的心頭流出，
就在同時。
請原諒！可鋒利不是過失。
傷口會愈合，
友誼會保持。
雨後的陽光將照見大地更美了，
擁抱一對戰士。

說這段爭執“饒有趣味”，是因為從中可以看到“左派”們對“異化論”和“人道主義”是如何恐懼和仇恨的，也可看到林彪夫人葉群所說的“高級政治生活”是什麼樣子的。“反中央”、“反中央政治局”是他們爭論時常用的武器。連周揚這樣的“資深左派戰友”發表了不同意見也難逃“禁止發表”的命運，何談普通民眾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更有趣的是，詩中“逃出劍匣”的利劍指的

就是“異化論”。 胡喬木的贈詩展示的是他的良心發現，還是他可怕的殘忍和虛僞呢？人們可以自由地解讀。

這就是劉賓雁生活的時代中那些站在權力頂峰的人們偶然一露的真容。

這次“見面會”不歡而散，這個報告也終被胡耀邦擱置。 而周揚受了這次刺激後，郁郁寡歡，身染重病，在久臥病榻、成了植物人以後，終於在 1989 年 7 月含恨而終，結束了他從“左派”到“右派”戲劇性轉變的一生，而“一對戰士”終成“死敵”，到死也沒有“擁抱”在一起……

但是，“清除精神汙染”卻沒有停止，繼哲學的批判後，這股逆流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

1983 年 4 月以後，胡喬木把矛頭指向了文藝界。 在 4 月 31 日到 5 月 3 日的中宣部部務擴大會議上，不僅批了《苦戀》，還一口氣點了《在社會檔案裡》、《離離原上草》、《妙青》、《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時候》和《早晨 30 分鐘》等一系列作品，說這些作品“資產階級自由化相當嚴重”。

8 月 10 日，胡喬木找上海著名老作家王若望談話，警告他：“你就成了專門製造黨與群眾對立起來這樣作用的人……對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險的。”

8 月 11 日，他在審查“世界工藝美術展覽”時說：“這不是和平演變嗎？專讓青年看摟摟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者是慈禧太后古裝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嗎？我們掌握了國家機器，我們是執政黨，對這樣的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不是太可恥了嗎？”

8 月 20 日，他又給文化部長朱穆之寫信，說對演員“有獎無罰，

難以治天下”，還說“出版方面領導太弱，對西方現代派思想橫流，負有很大責任”。……

僅從日程表上看，這位主管意識形態的“思想沙皇”像是擰緊了發條，進入了高度緊張和亢奮狀態。人們預感到，一場大的政治風暴正在醞釀中。

接著，他又把槍口轉向了新聞界，準星對著《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的“人民性高於黨性”。這是胡績偉“文革”後的一貫觀點，鑒於歷次政治運動中黨報一直跟著犯了路線錯誤的黨中央進行錯誤宣傳，他提出了報紙應該獨立思考，以“人民性”為基準的觀點。在受到批評後，他把表述修改為“黨性來源於階級性和人民性，又高於人民性”。但胡喬木依然不放過，繼續把他當成是販賣“西方資產階級新聞思想”的典型進行批判。這年 10 月，胡績偉被迫提出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的申請，10 月 30 日上午，胡喬木和鄧力群來到人民日報社，代表中央書記處宣布接受了胡績偉的辭職申請，並決定將其調離報社，由原總編秦川擔任社長，李莊任總編輯。並宣布副總編輯王若水調離人民日報社，暫不安排工作。在宣布決定的同時，胡喬木還激動起來，帶著哭腔指責和批判了胡績偉的“黨性來源於人民性”觀點……

這個巨變對劉賓雁的命運有致命的影響，從此《人民日報》失去了它在最輝煌期一個卓越的領軍者，而賓雁也失去了一個看重他、支持他和保護他的領導，這意味著他的處境和環境更加惡化了。

當這一切正在北京發生時，賓雁正在東北進行長達三個月的採訪。去時穿著短褲短衫，回來時借了一身冬裝。回到北京已是肅殺的深秋。走進人民日報社更感寒氣逼人。大院裡的人都表情嚴

肅，如臨大敵，有人已經噤若寒蟬，什麼話都不敢說了。賓雁見到王若水，想安慰他幾句，但王若水無奈地說：“有什麼辦法，權力在人家手裡呀。”

10 月 30 日那個報社全體人員參加的會議劉賓雁趕上了。他坐在台下，一直注視著台上的胡喬木和鄧力群。他看到，鄧力群始終得意地微笑著，他的高興是有理由的。幾年來，胡績偉領導的《人民日報》是“左派”們的眼中釘，這回可算拔掉一個釘子了。胡喬木講完話後，居然有人鼓起掌來，賓雁冷然而視，一動也沒動，拒絕鼓掌。走出會場時，他覺得這是陰暗的一天，儘管這個星期日的天空是晴朗的。

這次“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源於鄧小平當年 10 月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講話。鄧小平說：“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常常標榜他們如何講人道主義，攻擊社會主義是反人道主義……”這些話讓胡喬木、鄧力群像得了上方寶劍和打了雞血一樣，張牙舞爪地四面出擊，甚至稱宣揚“異化論”的文章是“反革命文章”。胡喬木還想在人民日報社和整個新聞界掀起一場對胡績偉的大批判，但響應者寥寥，成不了氣候。他又覺得秦川也“不聽話”，想對人民日報來個大換血，調王忍之、盧之超等四人接管報社。但這一企圖被中央組織部的常務副部長李銳抵制了，李銳的意見得到習仲勛、喬石、宋任窮和中組部長陳野萍的支持，最後由總書記胡耀邦拍板，胡喬木、鄧力群的方案被否決了（見李銳的文章《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1983 年秋冬之交的京城，可謂風聲鶴唳，黑雲壓城。

10 月 15 日中顧委開會，擁護鄧小平的講話；

10 月 17 日中紀委開會，擁護“清除精神汙染”；

10 月 25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央黨校校長王震關於要“旗幟鮮明地站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前列”的文章；

10 月 31 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高舉社會主義文藝旗幟堅決防止和清除精神汙染》，新華社也罕見地發表評論員文章《向精神汙染作鬥爭》；

11 月 3 日《人民日報》發表哲學家邢賁思的談話，提出理論工作者要站在清除精神汙染鬥爭的前列；

11 月 3 日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王兆國號召各級團組織要站在清除精神汙染鬥爭的前列；

11 月 5 日，周揚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講話，就“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了自我批評，據說這是被迫的、違心的和痛苦的；

同日，中宣部副部長郁文在農村文明村（鎮）建設座談會上說，對農村精神汙染現象不能低估；

11 月 12 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清除精神汙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1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再次發表評論員文章《建設精神文明反對精神汙染》；

11 月 20 日文化部長朱穆之強調，防止精神汙染，當前主要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

密鑼緊鼓，角聲四起，似乎大戰將臨。 據《鄧力群自述》說：“有那麼幾天，每天都有三、四個省表態，當時確有些像 1978 年真理標準討論時的那種氣勢，誰不表態就落後了。 這樣一來，確實有

一點緊張氣氛。”

但是人們發現，從 11 月底開始，中共的宣傳機器突然開始變調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原因是胡耀邦和趙紫陽經過觀察和社會調查，發現“清汙”已經擴大到整個社會，到處都出現了如“文革”中“掃四舊”一樣的亂象，中外文學名著都在掃除之列，連人們穿衣打扮都受到“清除”，街頭已經有人拿著剪刀鉸喇叭褲了；更嚴重的是，剛剛起步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受到懷疑和衝擊，人心陷入混亂與不安。他們急忙找到鄧小平，匯報了這些動向，鄧大人也覺得大事不妙，於是不得不同意緊急剎車。但是，鄧小平作出這個決定是極不情願的，他後來說：“我不收回我的那個講話（指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將來编我的《文選》，我要原樣不改地收進我的《文選》裡面去。”這為後來的鬥爭打下了伏筆。

於是，在中共的宣傳機器上就出現了一個 180 度的戲劇性大轉彎：

11 月 28 日，中宣部長鄧力群說：“不能把經濟體制改革試點中不成功甚至失敗的東西說成是精神汙染。”

11 月 30 日，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說：“要嚴格掌握清理範圍和界限”，“要嚴格區分矛盾的性質”。

12 月 2 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清除精神汙染，劃清政治界限》的評論，說“對經濟改革中出現的或正在探討的問題，更不能當成精神汙染來批判。”

12 月 7 日，鄧力群說，中央已經決定，在農村不提清除精神汙染的口號。在他以前，萬里早就站出來說“農村改革沒有汙染問題”。

12月中下旬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宣布：“在自然科學技術工作中不提反對精神汙染。”

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電視部的領導人談話，他說：“清除精神汙染要繼續搞下去，但要防止兩種干擾。一種是左的思想干擾，一種是封建思想的干擾。”他還提出八條具體意見：不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裝異服”一詞，對沒有害處的抒情歌曲及輕音樂不要禁止，所有世界公認的文學名著不能禁止，電影、戲劇、曲藝等，凡是中央沒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要提倡集體舞，但也不要禁止交誼舞，美術、雕塑不要禁止人體美作品，學校要開人體衛生課等等。

12月20日，胡耀邦在書記處會議上說，由於我們自己的失誤，工作中出了漏洞，一是把清除精神汙染擴大到社會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後來我們剎車了，這個問題以後不要再提了。萬里在這裡插話：“我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麼是‘自由化’，說不清楚，以後提反對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腐蝕和反對封建主義的遺毒，就很夠了。”胡耀邦接著說：“我同意這個意見。‘精神汙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是也不要去批判這個提法，讓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胡耀邦後來還解釋過：“現在看来，‘清除精神汙染’這個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种精神汙染，就不能说清除。唯心主義能够清除嗎？個人主義能够清除嗎？還是反對或抵制精神汙染比較妥当。”（見《鄧力群自述》315頁）

一場眼看就要爆發的狂風暴雨霎時間就煙銷雲散了。這是總書記胡耀邦和總理趙紫陽聯手力挽狂瀾的結果。這場政治運動只

維持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有人計算是 28 天）就夭折了，創下了中共歷史上最短命政治運動的記錄。

胡耀邦逝世前於 1989 年 4 月 5 日在自己家裡同李锐有一次长谈，其中回憶了這段歷史，他说到：清除精神汙染時，胡喬木、鄧力群二人一直要批周揚、夏衍和巴金，說他們三人是“自由化”的頭頭。耀邦一直頂住，認為這三個人不能整。他還批評王兆國不該亂發言：“你又不知道周揚的歷史情況，發這個言幹什么？”當時胡喬木還拟了個文件，要發到全國，讓人人過關作檢查。耀邦給胡喬木打了電話，說不能這麼搞了，並且將原件退了回去。

賓雁在自己的採訪筆記上記下了一個事例：“清汙”一開始，黑龍江省牡丹江養馬場的一個女青年就服敵敵畏自殺了。原因是她好美，喜歡打扮，成了“精神汙染”的典型，受到了批判。短短 28 天的“清汙”就欠下了血債。幸虧及時剎車了，要是繼續搞下去，還要鬧到什麼地步呢？

賓雁親眼看著這場“清汙”的鬧劇風起風收，雲聚雲散，他從中升起一個希望：中國到底是發生變化了，歷史該不會重演了吧——他這個想法還是有點太天真了。是的，民心是在悄悄地發生重要的變化，但是邪惡的魔鬼絲毫也沒有因此變得善良一點啊！中國的事情的確有自己的特色，那個幾代人翹首盼望的歷史性轉折點還在遙遠的未來呢，在這個決定性的轉折來臨之前，還要有多少荒唐的鬧劇和血雨腥風的悲劇啊！

但是，鄧力群、胡喬木等“左派”們並不甘心，鄧小平也在心中劃上了深深的一道，他們在等待機會算總賬呢——這並不需要等多久，算賬的時間將在不遠的 1987 年 1 月和 1989 年春夏之交……

趙紫陽在他被軟禁以後的談話中說，他認為胡耀邦給“清汙”剎車，大大加深了與鄧小平之間的分歧，甚至認為這對鄧小平最後決定撤換胡耀邦“有著關鍵性的意義”。在“清汙”被剎車後半年，鄧小平曾於1984年6月28日單獨找胡啟立談過一次話，他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談耀邦的問題。耀邦不僅是在對待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望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一年後，1985年7月，鄧小平又找胡啟立、喬石談話，再次說：“當前值得注意的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這個問題。……有些人，鼓勵耀邦，打著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這話說得很重，實際上矛頭指向了胡耀邦。這已經透露出他要“換馬”，並事先向胡耀邦周圍的人放風交底的意思。

趙紫陽還認為，鄧小平對胡耀邦的不滿，與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有關。

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是1984年底召開的。劉賓雁參加了這次大會，並成為會上引人矚目的焦點人物。

這次大會是在“清汙”被剎車後一個月開幕的。會前鄧力群等人已經花一年的時間準備了一個作協新班子的候選名單。在向書記處匯報時，張光年問：“這個名單是指令性的，還是指導性的？”胡耀邦回答：“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導性，是無效性。作家還不會自己選嗎？”萬里也贊同這個意見。於是根據胡耀邦和萬里的意見，中央在對大會的致辭中，沒有提“清除精神汙染”，也沒有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作協的人事安排，也決定組織部不要干預，全憑代表的民主選舉，選上誰就是誰，同時在會上要強調創作的充

分自由。在這種指導思想下，這次大會開成了一次建國幾十年來最民主、最自由的會議。會上，在“清汙”中受到打擊和批判的人，自然要發洩自己的怨氣，而那些“清汙”的打手們則成了人們側目而視、繞道而行的對象。在選舉下屆領導班子時，出現了一個誰也沒有料到的結果：那些堅持極左思想、在“清汙”中大打出手的“左派”們幾乎全軍覆沒，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延安時期文藝思想代表賀敬之也落選了，而一些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作家則高票當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劉賓雁，他以僅次於主席巴金的第二位票數成為實際上的“第一副主席”（作為一項革新，這次選出的副主席沒有按姓氏筆畫，而是按得票數排列的）。這是賓雁一生中從官方獲得的最高頭銜，也是民眾和作家們對他多年來堅持的方向，以及發揮的歷史性作用所作出的肯定和支持。在從來沒有自由選舉制度的中國，僅僅在作協的一次會議上開了一個小口子，就選出了這樣令人瞠目結舌的結果，這真是個意味深長的“啟示錄”式的奇跡。難怪老作家和作協的老領導夏衍高興地說，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而在鄧力群等“左派”眼中這不啻一場文藝界的“造反”和“政變”，對此進行“秋後算賬”是不可避免的了。

對這個意外的結果，賓雁當然高興——他不是為自己所獲得的榮譽，而是為民主和自由的一次小小勝利而感到興奮。當然，他也明白，他將要為這次小小的勝利付出沉重的代價。

這個結果讓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左派大員”如鄧力群、胡喬木們感到難堪，也激起了一些“監國元老”們的憤怒，李先念從他的女婿劉亞洲那裡得知會議情況後說：“這個會實際上是一個反黨的會。”鄧小平當然也是如此看的。他認為這是中國作家們在胡耀邦

史文獻。

但是，胡喬木卻壓下這個文件，不讓下發。常務書記習仲勛幾次催促他下發，他也頂著不動。他還召來《人民日報》的總編輯秦川和副總編輯王若水，對他們說，胡耀邦的這個講話“與十二大精神沒有聯繫，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因此不宜發表。他還夥同姚依林把與鄧小平共同“監國”的另一個黨內“巨頭”陳雲搬出來（姚依林是主張“計劃經濟”的陳雲的主要助手和在中央的代理人），突然通知召開政治局和書記處聯席會議，讓陳雲來獨家發表長篇講話，系統地、尖銳地當面批判胡耀邦的講話。陳雲說：“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難道連‘一五’都要改？”——陳雲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政策和做法是“撥亂反正”的標準和改革的極限。他還指著胡啟立，實指胡耀邦說：“你們應該下放到財政部或國家計委去學習鍛煉……”

會後胡喬木假惺惺地對胡耀邦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好像胡耀邦的下台已成定局了。

這個胡喬木一直以胡耀邦為敵，除了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原因外，還有私人恩怨。1985 年，北京市的公安機關在追查一起經濟案件時涉及了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在得到胡耀邦的同意後，公安派出所的警車開進了中南海，搜查了胡喬木的家，當場搜出了 15 萬元贓款（這在當時已經是個天文數字了），並帶走了胡石英——這在中南海的歷史上是唯一的特例，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老規矩。當時胡喬木沒有在家，他得知後衝到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大聲咆哮，厲聲質問胡耀邦：“為什麼抄我的家？為什麼抓走我的兒子？”胡耀邦解釋：“是三個部門要求立案審查，我們不能干涉司法程序，

的縱容下對他的一次公然挑戰，是對他策動的“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次反攻。一向“棉裡藏針”、睚眦必報的鄧大人安能嚥得下這口氣？劉賓雁的名字就這樣在 1957 年以後再次進入了他的視野——這是兩年後劉賓雁和方勵之、王若望同列為“三君子”被整肅的前因。奉行極權專制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容忍靠民意而崛起的“道義領袖”的，後來的“第四代”領導人在“維穩”時特別強調“要警惕中國出現昂山素姬式的民意領袖”也是遵循著這條思路。賓雁的勝利使他成了“出頭的椽子”，其結果指日可待。

在中共的歷史上，其實並沒有純粹的意識形態之爭，凡是所謂的理論和口號論爭，背後都有權力爭奪的影子。這次夭折的“清汙”運動之前，已經發生過一次流產的宮廷政變。這是賓雁和普通百姓當時所無法知道的。曾任胡耀邦秘書的林牧生前留下了《習仲勛披露胡耀邦下台前後政治內幕》一文，其中記述了這次鮮為人知的宮廷政變的經過。

1983 年春天，在批“異化論”開始前，1 月 20 日，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提出了“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還提出了“三個有利於”：“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把這作為改革的標準。這個提法比鄧小平南巡講話早十多年，是最早的版本。這裡面顯然包含著政治改革的內容，是個十分重要的歷

等結果出來再說吧。”但胡喬木依然暴跳如雷。這時鄧小平進來了，問是怎麼回事，胡耀邦如實報告，鄧問：“這些是不是事實？”趙紫陽小心翼翼、首鼠兩端地回答：“是事實。但是，是不是應該這樣對待喬木同志？”鄧小平回答：“既然是事實，為什麼有意見？喬木平時對人家那麼嚴，怎麼對自己就另一个樣了呢？”一場風波這才平息。後來隨著胡耀邦的倒台，這個案件也不了了之（胡石英被“保外就醫”了，如今這個人又打著擁護習近平的旗號重現舞台，其中透露的信息令人深思），但胡喬木對胡耀邦的仇恨可想而知——觸犯了特權集團利益才是胡耀邦被趕下台和改革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

陳雲發表批胡講話後，鄧力群在《紅旗》雜誌聯絡員會議和新華社全國分社會議上擅自傳達了這個講話，而胡喬木則提出立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以“解決胡耀邦的問題”，並與姚依林一起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部門下發了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一場“倒胡”的政變眼看就要發生，而鄧力群要取代胡耀邦擔任總書記的傳言已經不脛而走。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萬里看到了開會通知，詢問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勛是怎麼一回事，習說不知道；二人又問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胡啟立，胡也不知道。在總書記、常務書記和中辦主任都不知情的情況下，竟然下發通知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而且議題是“解決胡耀邦的問題”，這太反常也太出格了。習仲勛和萬里看到嚴重的黨內危機迫在眉睫，連忙共同向鄧小平報告了情況，並提出了反對意見。鄧表態：“胡趙格局不能變。”這才使一場未遂政變流產了。

至於鄧小平為何會反對這次突然召開的會議，看來涉及到“黨內雙巨頭”鄧小平和陳雲之間的微妙關係。在整個 80 年代，中國的最高權力並非在鄧小平一個人手中，實際上是由這兩個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監國攝政王”共同掌握，他們之間有個默契，鄧小平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掌握著黨國大事的決定權，而陳雲先後以中紀委第一書記和中顧委主任的身份擁有一票否決權，他們之間這種既合作又鬥爭的脆弱平衡時時有打破的危險。已經大權在握的鄧小平當然不能容忍另一個“巨頭”陳雲借此機會篡奪最高位置人選的決定權——只有他才有這個權力，即使要撤換總書記也要由自己決定，而不能讓陳雲主導，所以在關鍵時刻讓陳雲及其心腹姚依林策劃的政變破產了。

“兩巨頭”之間這種神秘爭鬥的內幕是 80 年代改革幕後的最大機密，至今還遠沒有被揭開，但是從這次政變的流產，可大致看出點端倪。據當時曾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和中央辦公廳工作的吳稼祥在他的著作《中南海日記》透露，鄧陳之間的權力爭鬥有多個回合，這只是其中重要的一次。在他們聯手廢黜了胡耀邦以後，爭奪更加激烈，先後又交手幾個回合：鄧力群在陳雲的支持下差點取胡耀邦而代之登上總書記大位，但由於鄧小平的阻擊而沒有得逞；陳雲讓“計委派”的宋平出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計劃也因鄧小平否決而落空（趙紫陽在“兩巨頭”中間搞了個折衷，在書記處成立個幹部工作小組，由喬石牽頭，王兆國、宋平，尉健行參加）；陳雲企圖乘機恢復計劃經濟體制，成立一個“計劃出版社”，還為這個出版社題詞“傳播計劃工作經驗，服務四化建設”，矛頭直指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和經濟政策，也遭到中央新聞媒體的冷遇……然而這次

發動和參與政變陰謀的所有人都沒有受到應有的追究和懲罰，這在中共的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大概是鄧小平還不想和陳雲撕破臉皮，而鄧自己也已有心要撤換胡耀邦了吧。

所以，批“異化論”和“清除精神汙染”只是這場未遂政變的繼續，保守派的目標是顛覆改革派佔主導地位的最高權力，而理論之辯、口號之爭只是權力鬥爭的藉口而已。這就是中國的政治，變幻莫測的政治運動和暗室裡的權力角鬥，讓公眾和外界永遠都無法預料到正在發生著什麼和將要發生什麼。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場鬥爭並沒有隨著“清汙”被剎車而停止，反而即將翻開新的一頁。而劉賓雁在新的鬥爭中又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了。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楊繼繩：從批“異化論”到清除精神汙染
吳稼祥：中南海日記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
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滿妹：回憶父親

第十四章　挑戰教廷

新聞人劉賓雁說了些理論家應該說的話，這確是他“應該說的話”；

實踐家劉賓雁做了件思想家應該做的事，這確是他“應該做的事”。

在劉賓雁所有公開發表的作品中，《第二種忠誠》達到了他當時思想所能達到的，當時環境所允許公開表達的，也是當時民眾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最高點。不管會引起多少爭論、誤解和非議，單是這一問題的公開提出就功不可沒

1985 年，劉賓雁在上海體育館演講。

劉賓雁演講獲得人們的共鳴，結束後聽眾紛紛圍上來要求簽名。

和小記者們在一起。

1986 年 11 月，劉賓雁在天津南開大學演講。

1986 年在上海登門看望王若望。

劉賓雁夫婦和《蒼蠅是怎樣變成大象的》主人公謝誠（中）合影。

不管哪兒的老百姓的生活，劉賓雁都關心。1983 年 4 月訪問法國，執意要逛逛市場。

作為一名記者，當劉賓雁以憂鬱的目光密切關注著風雲變幻時，並沒有停下採訪的腳步，反而在危機感的催促下加速了自己的寫作。一種緊迫感壓迫著他，古樂府中有“上床與衣履相別”的詩句，說的是生命的無常；而賓雁卻深知中國政治風雲的無常，每一天都可能是他說話的最後機會，他要抓緊每一分鐘，說出自己該說的話和想說的話。

胡耀邦要他不要當記者，而去當一名作家的建議，他認真地思考過了。他明白這是對他的關心和保護而心存感激，講虛構的故事，總比寫真實的事件和人物要安全一點點（也非絕對安全，比如白樺），但是猶豫再三，他還是捨不得扔下手中這支新聞筆。與中國每天到處都在發生的原態真實相比，作家的任何奇思妙想和虛構故事都顯得蒼白無力和缺乏想象了。這是一片太豐饒的沃土和埋藏著奇珍異寶的礦床，讓每一個拓荒者和尋寶者都不忍離去。更何況真實的新聞比虛構的小說更能震撼人心，能直接干預並影響社會生活，這是他從 50 年代寫報告文學以來最深的體會，報告文學是他愛不釋手的武器。作為一個有改造社會理想的思想者和實幹家，他總要如後來為自己撰寫的墓誌銘所言，做“他應該做的事”，說“他應該說的話”。他寧願當一個為寫真實新聞而履危歷險的記者，也不願做一個遠離生活也避開風險的作家——當然並非所有作家都是如此，例如十九世紀末為德雷福斯冤案發出怒吼《我控訴》的左拉就不是，20 世紀中寫出《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仁尼琴也不是，因簽署“七七憲章”而身陷囹圄的哈維爾更不是。但是現代中國這樣的作家有幾個？正因為選擇這條路的人太少了，賓雁更不能知難而退。

當時和後來，加在賓雁頭上的罪名可謂多矣，其中“專寫陰暗面”的指責是最常用的一個。這是一種常見的誤讀，或者是有意的歪曲。其實發現和謳歌光明——不是“黨文化”中那種虛假的、空洞的、歌功頌德式的僞“光明”，而是真正的光明，人性中的光明，來自生活底層中的光明，這才是劉賓雁最感興趣的，也是他創作的第一動力。

早在 50 年代，賓雁在從事新聞工作的初期，就厭倦了那些從一個模子中複製出來的“英雄模範”和千篇一律的“好人好事”報導，這些充斥版面的文字是假話、空話、套話和大話的集成，千人一面，萬語一腔，唯獨沒有真實和人性。他一直在生活中和社會上細心地尋找有血有肉，有個性特點的真實的“當代英雄”，並用滿腔的熱情去歌頌這種光明。

第一個被他發現的這類人物是在沈陽。1954 年春，他到沈陽採訪。團市委的幹部在介紹了一連串的勞動模範事跡後，說：“有一個怪人，原來也是勞動模範，現在卻不是了。想聽一聽嗎？”這立刻引起了賓雁的興趣。

團市委介紹說，這個人叫楊有德，是個青年車工，常搞技術革新，多次受到獎勵。但是他有個“毛病”——愛管“閒事”。例如，下工後他還到別的車間轉悠，看到什麼還要指手畫腳。當時機械七廠正在為朝鮮前線生產一種坑道裡用的礦車，他看了以後說，輪子的圓度不夠，怕要出問題。可技術員不聽他的，繼續生產。過了不久，產品被退回來了，輪子都破碎了。廠裡生產風扇，他看了說“葉片的角度不對”，也沒人理他，不料又被他說中了。因此，他到處得罪人，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賓雁決定去採訪這個人。楊有德在廠部安全科辦公室接待了賓雁。這個文質彬彬的年輕人表情憂郁，說自己已經被調離了車間，原因是這樣就不能到處在車間裡挑毛病了，“這才讓幹部們放心。”在楊有德家的小屋裡，賓雁看到牆上、桌上到處放的都是書，其中居然還有外文書。床上放著一盆水，旁邊是沒疊好的被子。楊有德解釋說，他正在試驗搞一種消聲器，因為車間裡噪音太大，震耳欲聾。沒地方做實驗，就在家裡做：用水面的波動來觀察噪音的大小——沒人交給他這個任務，是他自己想要解決車間的噪音問題……

這次採訪後，賓雁寫了一篇通訊發表了。他很為自己的發現而高興：這不就是人才嗎？這不就是生活中被遮蔽的一線光明嗎？事業需要的就是這種有責任感，也有創新能力的人啊。這種人被埋沒和歧視，正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呀！但是，賓雁的這個報導終究沒有改變楊有德的處境，而賓雁自己則在不久後被打成“右派”，這不可避免地要株連到他所讚揚過的報導對象。

飽經滄桑的賓雁復出後，依然在生活中尋找著這樣的人性光明面。每當在社會底層發現有思想、有個性、有才能的人才時，他都像發現金礦一樣感到興奮，他總要為這樣的綠苗破土而出助一臂之力。

《傅貴沉浮記》就是賓雁在社會底層發現金子閃光的典型事例。1983 年夏天，黑龍江省委書記易人，那個因《人妖之間》一直和賓雁糾纏不清的楊易辰終因抵制改革而下台了。賓雁得以再次進入黑龍江省採訪。在東去牡丹江的路上，一個濃眉重鬚的彪形大漢吸引了他的注意。這人叫傅貴，是個普通農民，但有活力，有

智慧，也有魄力，是那種農村的“能人”。他曾經抵制毛澤東的農村合作化，認為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只會養懶人。在他被推上生產隊長的位置上以後，他以高超的組織才能和經營眼光，一年之內竟然使農民的收入增長了十倍！但也落下了個“搞資本主義”的惡名，直到被送進了監獄。出獄後，群眾再次把這個他們所信任的“能人”推上了生產大隊隊長的位置，他又在一年之內使幾個窮得出奇的村莊收入增加了幾倍。然而，新老對手仍然虎視眈眈地盯著他，隨時準備把他再次送進監獄……

賓雁喜歡傅貴粗獷豪放的性格，佩服他敢為天下先的膽識，欣賞他的過人聰明和才幹，也為他不得充分伸張的活力感到惋惜。這篇通訊要告訴人們，真正的“英雄”就在底層的民眾之中，他們是未被重視和開發的財富，只要把人民群眾中這無窮的活力釋放出來，改革才有光明的希望。

這是在“寫陰暗面”嗎？不，這是在發現光明，呼喚光明，歌頌光明！從本質上來看，賓雁是個光明使者。

說到“寫陰暗面”，這其實是說起來很複雜，實際上相當簡單的問題。首先，就像陽光下也有照不到的陰影一樣，生活中確實有陰暗面，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既然有，為什麼不能正視，不能寫？只准寫光明，不准寫陰影，甚至乾脆否認陰影的存在，這不僅是哲學上的荒謬，而且是對人們常識的侮辱。1985 年 6 月劉賓雁在江西南昌的演講中引用黑格爾的話“絕對的光明就是黑暗”，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真正的分歧在於，黨化新聞理論把新聞分為“正面報導”和“負面報導”的標準是對權力的態度，凡對權力歌功頌德的謂之“正面”，而對權力下的黑幕進行揭露和批評的謂之“負面”，

所謂“正確輿論導向”就是只容許對權力唱讚歌喊萬歲，即使有了明顯的失誤和罪錯，也要“為尊者諱”避而不見，或見而不言。這種“吾皇萬歲萬萬歲”式的“新聞觀”已經導演出多少荒唐可笑的鬧劇啊——從“大躍進”時報紙上一日三新的“爭放衛星”奇聞，到“文革”中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夢囈，已成一種固定格式。靠謊言與暴力生存的極權專制制度離開這些“皇帝新衣”式的讚歌伴奏就無法安然入眠，它們似乎注定要和騙人欺己的謊言共命運了，謊言失靈、意識形態破產之日，就是它們的生命結束之時，蘇共蘇聯已經如此了，它的衍生物也遲早難逃此命運。

其次，在“寫陰暗面”和對苦難的同情關注中也還有兩種不同的態度，或者說是有兩種不同的視角。一種是“外來人的視角”，一種是“切身的視角”。前者就像到地震、海嘯和世貿大廈的廢墟等災難現場拍照留影的遊客，把災難的現場當做一種與風景名勝無異的罕見“背景”，把自己的到場只當做一次難得的遊歷和日後酒宴上的談資。有不少記者和作家就是這樣的“外來人”，在表演了一場“慈善秀”或發表了一通“慈善文”後，他們可以心滿意足地整衣而去，因為他們已經“享受”了苦難，並且攢夠了寫苦難題材作品的素材，回去可以寫些“縱做鬼，也幸福”之類的賺稿費詩文了；而後者則像是災難中受害者的直系親屬，他們對災難所造成的痛苦感同身受，因為他們不是旅遊的看客，而是與受難者血肉相連、神經相通、息息相關的痛苦承受者，在他們眼中的災難才是真正的災難，而不是可以買門票進入觀光的龐貝廢墟。對劉賓雁來說，20 世紀的中國就是一個充滿革命、暴力和血腥的巨大災難現場，裡面到處飄蕩著無家可歸的遊魂，和他同命運的一切受苦受難的民眾都是他精

神和血肉相關的親人，他永遠以“切身的視角”來關注他們的苦難，和受難者一起內心顫栗，一起流淚，一起感受難言的痛苦，甚至由於對災難的深層根源有所瞭解和思考，會比一般的受難者親屬對痛苦有更深更強烈的體驗。

據賓雁的忘年摯友趙越勝回憶，有一次賓雁拿給他看一份《人民日報》的內參，寫的是陝西一些共黨村幹部吊打村民的調查。賓雁聲音低沉，反復說：“吊起來打，什麼傢伙都用上，吊起來往死裡打，無緣無故就吊起來打……”說的時候，他的表情是那樣悲憤，聲音也在顫抖，似乎每一下都打在自己身上。這是 22 年“賤民”生涯對他磨礪和改造的結果，也是俄羅斯 12 月黨人那種貴族精神在他身上的投影。他是真正的記者，也是有大悲憫情懷的聖徒和仁者，而不是到苦難中獵奇的高級“狗仔隊”和通常意義上的“扒糞者”。

“扒糞者”這個詞產生於美國新聞界，原本並無貶義，是“黑幕揭露者”的同義語。20 世紀初葉，以《麥克盧爾雜誌》為首的美國新聞界曾發起了一個“黑幕揭發運動”，一批優秀的記者和作家（林肯·斯蒂芬斯是其中的代表）經過深入的調查，連續發出一連串震撼全國的調查報告（據不完全統計，從 1900 年到 1915 年共發出這類報告兩千多篇），矛頭直指社會轉型期間出現的官商勾結、貧富懸殊、假貨氾濫等社會醜惡現象，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也遭到各大財團的憤怒反擊。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一次演說中輕蔑地稱這些記者和作家為“扒糞者”，因而得名。其實，揭露陰暗正是為了呼喚光明，“黑幕揭發運動”在美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導致了一系列法律的出台，促進了商業活動以及各方面的社會活動法制化和規範化，也推動了社會

的民主化，對形成現代美國社會和政治制度居功至偉。事實證明，“揭露陰暗面”是一個健康社會必不可少的清潔劑，而並非洪水猛獸——只有專制獨裁者才害怕它。

劉賓雁在1984年年底寫作的長篇報告文學力作《第二種忠誠》終於在第二年1月在《開拓》的創刊號上發表出來（增補版刊在《人世間》創刊號），這篇中國式的“黑幕揭發”作品至今仍是引起各種爭議的話題。

和一般“黑幕揭發”作品不同的是，這個作品不是單純的黑暗揭露，其中有耀眼的思想閃電，有滂沛的浩然正氣，也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文中的兩個主人公都是閃耀著人性光芒和思想光芒的正面形象，理應歸入“寫光明面”一類。賓雁的這篇作品在揭露人間黑暗的同時，還著力地表現了戰勝黑暗的精神力量，是理想主義的頌歌，不僅有對真理的認識意義，還有打動人心的審美價值。無論作為新聞作品還是作為文學作品，都是他最成功的代表作。

來自東北黑龍江的陳世忠是拿著一份為別人申冤的訴狀《人血不是水》走進劉賓雁的視野的，這在成千上萬的上訪人流中並不多見。這位剛剛走出冤獄的受難者奔走呼號，不是為自己的冤屈，而是為一個似乎非親非故的“無關者”：1970年4月在黑龍江省嫩江勞改農場發生了一起警衛士兵故意設局槍殺一名犯人李植榮的事件，同為勞改犯的陳世忠是在場的證人，他是在為這位屈死者鳴冤的。這種俠肝義膽的見義勇為給賓雁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他進一步瞭解了這個不平凡的上訪者。

陳世忠是共產黨建政後第一批送到蘇聯留學的青年學生，1960年以全優的成績結束了在蘇聯的留學，並獲得了外國留學生

中唯一的畢業論文獎。回國後的陳世忠關注著日益加劇的中蘇分裂和大論戰，1963 年 5 月居然連發兩封信給毛澤東，呼籲在國內外政策上要慎重從事，勿使親痛仇快。接著又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評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隻身跑到北京，想親自交給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結果是銀鐺入獄。

在獄中陳世忠也沒有停止思想，他寫下了幾十萬字的文字，其中寫於 1964 年的《諫黨》一文最有代表性。下面是這篇文章的幾段摘錄：

“我認為，中共中央近來在國內外路線、方針、政策方面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犯有一系列嚴重的錯誤，其中有一些屬於原則性方向性的錯誤……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或個人迷信……您老人家實質上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和錯誤，對於稍微尖銳一些的原則性批評，馬上翻臉，進行殘酷鬥爭和打擊……你口口聲聲說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但事實恰恰相反，遠的不說，1957 年到現在，哪一個‘批評’毛澤東的人有過什麼好的結局呢？”

“……我之所以認為對你的個人崇拜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最大禍害，完全是我根據客觀存在的嚴酷現實，自己獨立思考得出的結論。根據這些年的事態發展，我滿心憂慮地預感到，遲早總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董必武、彭真、劉伯承、李富春、陳毅……等等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但願我的預言不過是杞人憂天罷了，果如此，國家幸甚，人民幸甚！”（請注意，這話說在“文革”爆發前兩年。）

“……可怕的是你犯了錯誤，卻沒有人能夠幫助你糾正錯誤，久而久之，在你周圍就只有一群吹牛拍馬、阿諛奉承、一味察言觀色、迎合你的口味的小人得寵了，這中間有一部分人可能是貨真價實的野心家、陰謀家，……口口聲聲擁護你的未必都是你的親人，而反對你的某些錯誤主張的人也未必就是你的敵人。你千萬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轍。”

“……我看到你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但是我認為雷鋒並不是一個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著嚴重的甚至致命的缺點，他的美中不足就在於他唯上級之命是從，從不知抵制上級的錯誤決定。雷鋒有句流傳頗廣的名言：‘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我認為這句話是不準確不科學的，它孕育著連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巨大危險。……你想一想，如果全國人民、全體黨員都成了雷鋒，將會形成一種什麼局面呢？……一旦你說錯了話，代表中央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又有誰能夠出來幫助你們糾正呢？……也就是說，你們這樣下去，不錯則已，一犯錯誤就得錯到底，後患無窮……”

文章中還反復出現這樣的字句：

“敬愛的毛主席，趕快回頭吧，否則就太晚了！”

“現在我要學你的辦法，在你的背後猛擊一掌，大喝一聲：‘你有病呀！’”“丘比特，你發怒了，這就證明你錯了！”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呀！”

筆者在抄錄他的《諫黨》時，不由得想起了1957年5月劉賓雁寫給毛澤東的那封信。難怪他會惺惺惜惺惺，陳世忠正是賓雁多年來苦苦尋找的那種有獨立思想、有膽有識又有社會責任感的人。

結果是陳世忠被判八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另一個主人公來自黃埔江畔，叫倪育賢，他和陳世忠地隔南北，素昧平生，卻異曲而同工。1960 年，這位只有 18 歲、剛剛走進兵營的小列兵，在瞭解了“大躍進”已經在全國造成大飢荒的消息後，幾乎與陳世忠同時，也給毛澤東寫了封長達 30 多頁的“萬言書”，信中直指這場災難不是什麼“天災”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禍”。還把矛頭指向荒唐狂妄的“大躍進”，說：“任何離開具體客觀實際而企圖一步登天進入共產主義的做法，必定要遭到辯證法的無情報復。”甚至大膽地提出了一系列糾偏挽救的措施，如允許社員“包產到戶”、“開放自由貿易”、“增加自留地”、“取消國家對農民發展副業生產的限制”和“實行累進減稅辦法”等等，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儘快地挽救危局。

一個 18 歲的小兵居然有如此的見識和膽略，是因為他在上高中時就是個讀書迷、理論迷。小小的年紀，他已經博覽馬、恩、列、斯著作，並帶著現實問題和疑問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滿目蕭條、餓殍遍地的災難使他按耐不住了，所以才上了那封“萬言書”。結果可想而知：這位曾經的“五好戰士標兵”1964 年提著一紙箱經典著作離開了兵營。

1966 年，他作為上海海運學院的學生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參加了“炮打張春橋”的所謂“反革命逆流”，還自己編選了一本《列寧語錄》，以列寧的一些論述來對抗風行一時的毛語錄。這本語錄印行了一萬冊，他卻因此受到隔離審查，“一打三反”中還被開除了學籍。1975 年，當了工人的倪育賢還針對張春橋的《論無產階級全面專政》一文，寫了一篇《論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提出“沒有民主的專政只能導致法西斯主義”。1976 年“四五”事件

後他繼續為鄧小平的復出奔走呼號，還在上海國際飯店貼出了紀念天安門事件被鎮壓一週年的長詩，呼籲為“四五運動”平反，因此被逮捕入獄，被判處死刑。幸運的是他沒有和王申酉一起被處死，活到了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那一天。

劉賓雁把這兩個人物寫在一篇作品中，為這部作品起了個名字《第二種忠誠》。在文章的結尾處，賓雁為這個自己發明的概念做了如下詮釋：

忠誠，像美麗一樣，也有不同的品種。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老實聽話，從無異議，這是一種忠誠，本人在個人利益上也須做出或大或小的犧牲，但比較安全、順當，一般不致遭災惹禍；由於可愛，在仕途上往往可以步步高升。

第二種忠誠，像陳世忠和倪育賢身體力行的這種，就不大招人喜歡了，直至不久以前還要付出像自由、幸福直至生命這樣昂貴的代價。

然而相比之下，在我們的政治田野裡，第二種忠誠就貧弱而稀疏了。在乾旱而貧瘠的土壤裡，它們能夠生存下來而未絕種，已近乎奇跡。

劉賓雁後來在自己的自傳中說得更明白，所謂“第一種忠誠”，就是要“消滅人們頭腦中的理性，同時又把個人的自我意識、表達和發展自我以及改變世界的慾望，窒息在萌芽狀態中。這就是說，要創造出一種全無獨立思維、又無發展自我慾望的最易統治與駕馭的動物”。這是“第二種忠誠”所堅決反對的。

《第二種忠誠》把劉賓雁從在西柏坡宣誓入黨以來長期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公之於眾了，那就是：所謂“黨性”是否是凌駕於一

切之上的最高原則，如果一個時期黨的領導犯了錯誤（歷史證明這是經常發生的），黨員和黨的事業追隨者是否應該也無條件地跟著犯錯誤？當“黨性”背離了“人性”和“人民性”的時候，當黨的決定和指示背離了真理的時候，一個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的人應該服從哪一個？“忠於黨”和“忠於人民”、“忠於真理”是什麼關係？這一問題的提出對徹底解放思想的意義不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之下——“實踐標準”提出了真理的客觀尺度，而“第二種忠誠”則剝奪了“黨”這一強權對真理的壟斷，使人人都擁有對真理的探求權、判斷權和表達權。

自從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把經過列寧主義改造的馬克思主義送進中國以來，自從列寧關於階級、政黨、領袖和群眾的學說成為中共的建黨理論基礎以來，還很少有人如此公開、如此尖銳和用如此有震撼力的方式隆重提出這個問題，儘管很多人在實踐中早就對此產生過懷疑，並在私下裡悄悄議論了。 這個問題的提出，就像歐洲宗教改革運動對教廷擁有解釋聖經的絕對權威提出挑戰一樣，它所動搖的可不只是某一個領袖——例如毛澤東的至高無上、不可懷疑的至尊地位，而是把所有裝神扮仙，壟斷真理解釋權和思想裁判權的“教主”和“祭司”們都拉下了神壇，使他們還原為一個人，一個食人間煙火、有七情六欲，有缺點也會犯錯誤——甚至會犯罪的，沒有任何神聖色彩的普通人；與此同時，也把普通的黨員和民眾從“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奴隸，和工具化的“齒輪與螺絲釘”的地位中解放出來，賦予他們思想權、判斷權和自由表達權，從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平等的、有思想有人格的真正意義的人。

劉賓雁通過對共產黨的詞典中尚可使用的“忠誠”一詞的解

析，巧妙地移植了西方自由主義理念中“忠誠的反對”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西方民主政治運動的重要成果。與中國不同的是，在西方，是憲政確立，個人的自由得到保證以後，才有了這種獨立自由的輿論環境；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如劉賓雁），則是想通過“忠誠的反對”來爭取憲政、民主和自由秩序的建立。那些從“忠誠”一詞的字面意義上生發出來的批評和指責，完全是脫離了當時客觀實際的望文生義，不知所云。他們沒有看到，這個問題的實質，正是提出了人的解放和人權（思想自由、表達自由）的確立。這種“忠誠”恰恰是取消了“黨”對思想的至高無上的壟斷地位。對這種叛逆的意義，共黨教廷大祭司胡喬木們的反應似乎比來自另一極端的批判者們更敏銳。所以，與其指責賓雁的思想和話語還有“體制內”的局限性，倒不如充分肯定他在當時的話語環境所能容許的最大限度內巧妙地公開提出了這個命題，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和實踐突破。他的這個發明表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理論創新能力，為自由主義者爭取到了一個難得而寶貴的話語權。“第二種忠誠”公開提出後所產生的巨大震撼和歷史性影響，是時過境遷後來指責他的那些在理論上似乎更激進、更“徹底”人們所無法比擬的。

在評價劉賓雁的所謂“局限性”時應該時刻不忘這樣一個前提和尺度：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話語環境中，賓雁能公開說出的話是有限的，遠非他想說的全部，也許只是幾分之一。但是，重要的是他找到合法合理的話語，把話說出來了，公開發表了，還都是人所不能言或不敢言者，而且還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這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能落土發芽的種子才是最好的種子，能打得敵人呲牙咧嘴的子彈才是最有力的子彈呀！

新聞人劉賓雁說了些理論家應該說的話，這確是他“應該說的話”；

實踐家劉賓雁做了件思想家應該做的事，這確是他“應該做的事”。

在劉賓雁所有公開發表的作品中，《第二種忠誠》達到了他當時思想所能達到的，當時環境所允許公開表達的，也是當時民眾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最高點，其實質是在號召思想衝決牢籠，精神反叛權力。不管會引起多少爭論、誤解和非議，單是這一問題的公開提出就功不可沒，是一大勝利、一大成功。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否認劉賓雁思想受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局限，而是強調應該在當時話語背景下來評價他對共黨教廷的挑戰所產生的歷史性影響。

《第二種忠誠》在《開拓》雜誌上發表前還有一場爭論。雜誌的總編何家棟主張發，有人擔心一發了就準要出事。何家棟問：“能出什麼事？會把總編輯抓起來？”大家說那倒不會。“會開除黨籍？”大家說可能性也不大。“會罷官？”何家棟自己回答：“無非就是不幹了，反正我就對當官沒多大興趣。”於是他最後拍板說：“那就發吧！”

這篇報告文學成了劉賓雁引起爭議最大的作品。陳世忠所在的黑龍江倒沒什麼動靜，可倪育賢曾讀書的上海海運學院卻發出抗議，說作品對倪育賢的報導失實，還指責了倪在“文革”中的一些錯誤言行，指劉賓雁在採訪中沒有認真傾聽海運學院方面的意見。而最先發表這篇作品的刊物《開拓》受到主管部門全國總工會的巨大壓力，上海《文匯報》委員會則因六月份的《文匯月刊》發表了與此報導有關的劉賓雁的《我的日記》，於 1985 年 10 月在《文匯月

刊》上發表一則《啟事》，向海運學院道歉，說《我的日記》未經調查核實，有嚴重失實之處……一時間鬧得紛紛揚揚。

這期間還發生過一次所謂“劉賓雁退出文壇”風波。起因是賓雁在報社記者部的一次例會上說：“報告文學越來越難寫了。看來，我不得不停筆一時了。”不知怎地這話傳了出去。九月號的香港《鏡報》月刊封面刊出賓雁的大照片，輔以大標題《劉賓雁宣布退出文壇》，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這個新聞是假的，但賓雁面臨的困境卻是真的。

面對巨大壓力，劉賓雁於當年 4 月再下上海，經過調查，寫了《第二種忠誠》的續篇《未完成的埋葬》，繼續揭露海運學院的問題，回擊了對他所有的指責、汙蔑和攻擊。這個續篇在 1986 年 10 月的《報告文學》上刊出了——這離賓雁第二次被開除黨籍只有三個月了，可以說賓雁為此一直戰鬥到最後一刻。

可以想象，在賓雁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後，在那照例要鋪天蓋地洶湧而來的全國規模的“大批判”中，來自上海海運學院的喧囂聲會多麼刺耳，他們必然會得意忘形地彈冠相慶了。然而，賓雁所提出的那個超級重要的問題卻不會被這些喧囂鼓譟所淹沒，只會再次引起更多人們的關注和沉思——你忠誠於誰，忠誠於什麼？正如賓雁後來所言：“從根本上說，不是要不要哪一種忠誠的問題，而在於我突出地宣揚了陳世忠這種獨立的人格，而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一個人的人格有多大的獨立性，也就帶有同等的叛逆性。”

這些來自專制營壘和已成傳統的頑固思想的攻擊毫不令人意外，也不值得去再看一眼，如今，這些喧囂鼓譟都像海邊上的浪花和泡沫一樣消失了，留下的只有賓雁那如礁石一樣巋然不動的尊嚴。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特別是在賓雁辭世之後，來自另一方向的批判之浪又涌向了賓雁和他的《第二種忠誠》，其代表作是標榜“徹底反共”的曹長青先生所寫的另類悼念文章《與劉賓雁分道揚鑣》。不是說悼念文章就一定只能說好話，不能說否定性意見，而是這篇悼文實在有標本性的價值，所以值得一說。

曹先生為與劉賓雁“分道揚鑣”開列了一些理由：如劉“至死眷戀社會主義”、“認不清共產黨的狼性”、“不甘心社會主義失敗，和西方左派不謀而合”等等，一句話，他認為劉賓雁還是一個“錯到驚天動地，而自己全然不知”的“愚忠”者，而沒有像他一樣與共產黨實行徹底決裂。這些指責不承認賓雁的思想是一個不斷發展演進的過程（方勵之說這是“從屈原到但丁”的過程），不考慮《第二種忠誠》80 年代中期在大陸中國公開發表的環境條件，也脫離了當時的大陸讀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認識水平，還對賓雁的相關文字和話語進行了斷章取義的裁剪與超時空的拼接，對這些指責，鄭義、萬潤南等人都有精到的分析和駁論，這裡無須重複。郭羅基先生在論及這個問題時的一段話可謂切中要害：“‘第二種忠誠’不是勸人無條件地忠誠於共產黨，恰恰是為了制約共產黨的為所欲為，以此為槓桿將中國共產黨改造成為民主的政黨也不是沒有可能。”何家棟先生對此有更尖銳的評論。他說：“我看曹長青《和劉賓雁分道揚鑣》的文章，我覺得很可笑，他要和劉賓雁分道揚鑣，他們從來沒走到一條道上，曹長青和賓雁連同路人都不是……”

發人深思的是這樣一種現象：一些在“黨文化”的教育熏陶下長大的人，後來離開了大陸的思想和言論條件，在政治立場上發生了劇烈的轉變（這本無可指責），甚至成為共產黨激烈的反對者，但

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乃至使用的符號體系和話語邏輯還仍然是從“黨文化”中學來的那一套。看上去是從翹翹板的一端跳到了另一端，但中點的軸心並沒有變動，還是非紅即黑、非對即錯、非友即敵，“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二元思維，還是黨同伐異、滅此朝食，“越激進、越徹底就越正確”的價值觀，只不過把“唯我獨革（命）”變成“唯我獨反（革命）”了。這種用專制思維和專制作風來反對專制主義的現象在國內外都可以看到，在國外的流亡者中尤為多見。他們在享有絕對安全的言論自由環境中，對中國問題大發激進的空論，甚至號召革命式的暴動，動輒指責這個人“不徹底”，那個人“抱有幻想”，似乎唯有他們才是最正確的。這種“黨文化”的反面映像與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風格格不入，導致了民主陣營內部無窮的內訌和爭端。

這使人想起了賓雁晚年的忠告。他在生命的最後十幾年裡，多次提到要想真正結束專制統治，個人的道德反省是不可缺少的一課，政治生活不能非道德化；提出人人應警惕自己心中的“小毛澤東”——吃過“狼奶”的人要真正和“黨文化”深入骨髓的影響，和專制思維的立場、方法和話語方式決裂。沒有這樣的反省和決裂，人可以取得形式上的自由，但思想卻永遠不能走出專制牢籠，融進現代民主社會，成為一個真正自由的人。

舉個小例子：曹先生在指責《第二種忠誠》的同時，也順便指責了《人妖之間》。有趣的是，他站在“徹底反共”的一端所做的指責，與大陸站在另一端的王蒙先生竟然幾乎完全相同：他們都為王守信鳴冤叫屈，王蒙說“一位先生，1978 年才恢復工作，1979

年就發表了記述‘人妖之間’的作品，次年這篇報告文學的傳主王守信就被處決了。多麼厲害！這也是精神變物質，文學可以影響生死。”“我無意為王守信說多少話，我沒有調查研究，我也不是法學家。……我有懷疑，至少這篇作品裡的傳主絕無死罪，甚至不像壞人”（見《王蒙自述》第 16 章）。曹長青則說“即使王守信有腐敗行為，也絕不構成死罪”，他比王蒙走得更遠，乾脆說“王守信不死，可能是個大企業家”；他們都把王守信之死歸咎於“新聞殺人”，王蒙說這是“文學可以影響生死”的例子，而曹長青雖說留了點餘地，但指向還是清楚的：“王守信是在《人妖之間》發表 150 天之後被判死刑立即執行了，是否和那篇劉賓雁文章有關係？不知道。”此外他們還都對賓雁在作品描寫王守信的“粗俗”——動不動就“褲子脫下一半讓人看她肚子上的傷口”不滿，王蒙說這是“性歧視”，而曹長青說這是“渲染暗示王守信可能用色相交易”……

這些評論都是在《人妖之間》和《第二種忠誠》發表 20 多年後才出台的。《王蒙自述》和曹長青的“悼文”發表的時間很接近，都是在賓雁逝世後不久，一個在中國，一個在美國；一個是始終寄生於中共體制內的退休部長，一個是“徹底反共”的新入籍美國公民，其間相隔萬里但所論卻不謀而合，這種“巧合”應該很有意味，說明他們的思想方式是多麼雷同。

這個“新聞殺人說”特別值得注意。這個說法無視如下事實：1978 年夏季，賓縣展開“雙打（打擊貪汙盜竊，打擊投機倒把）運動”，縣委工作組進駐王守信所在的燃料公司開始調查王案。同年 11 月，松江地委聯合調查組進駐賓縣，並發出關於王案的調查報告。12 月，王守信在 30 萬人參加的廣播大會上被公開逮捕。在

劉賓雁介入調查並發表《人妖之間》以前，《人民日報》、《黑龍江日報》均公開發表了王案的調查報告和長篇通訊（《黑龍江日報》長篇通訊的題目是《十年浩劫的一個側影》，《人民日報》的題目是《觸目驚心，發人深省——大貪汙犯王守信為什麼有那麼大神通》），王早已被定性為特大貪汙犯（五十萬贓款在當時是全國第一大案），按當時的量刑標準已難逃死罪。 王守信被判處死刑是在 1979 年 10 月 20 日，被執行死刑是在 1980 年 2 月 8 日，這固然是在《人妖之間》發表之後，但並不能說明是這篇報導使然。 至於後來比王犯貪汙數額高百倍、千倍、萬倍的罪犯都沒判死刑，而獨獨王犯問了死罪，這一指責顯然不應指向賓雁，而應指向中國“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的法律現狀。 如果真想為王守信辯護，那麼前部長王蒙先生當然有權在當時或後來說出來，但他把王犯的死刑責任歸咎於劉賓雁的作品，歸咎於“新聞殺人”，這卻是一種怯懦的責任轉嫁——中國的新聞尚無起碼的自由，卻又被憑空加上了可以“殺人”的嚇人罪名，那豈不是還應更嚴厲地取消僅有的一點自由空間嗎？這顯然是向權力獻媚，要求徹底取消新聞自由的謬說。

如今，這個“新聞殺人說”已經寫進了一些高校新聞系的教材，有人還出版了一本書《第二種危險》，以另一個案例（1997 年夏天河南鄭州市的一位公安分局長張金柱交通肇事，致人死傷的事件被媒體報導後，依照當時中央四位領導人的批示決定判處死刑）為論據，把輿論影響法律說成是威脅中國法制的最大危險，這和王蒙、曹長青的“新聞殺人說”如出一轍，都成了反對新聞自由的一個重要藉口，在中國新聞事業的背後插上了一刀。 王蒙和曹長青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到底是在為誰說話，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其實，這些遲到的批判還有個另外的效用：一個人的作品能在發表二十多年後仍然得到來自不同的極端的批判，這本身就是個榮耀——人們至少還沒有忘記他，不管是他的擁護者還是反對者。在當局千方百計地想要讓人們忘記劉賓雁，把他的名字和作品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的時候，王蒙和曹長青們的批判和指責起到了喚起人們記憶的作用，這也應算是一份功德吧。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展江等：新聞輿論監督與全球政治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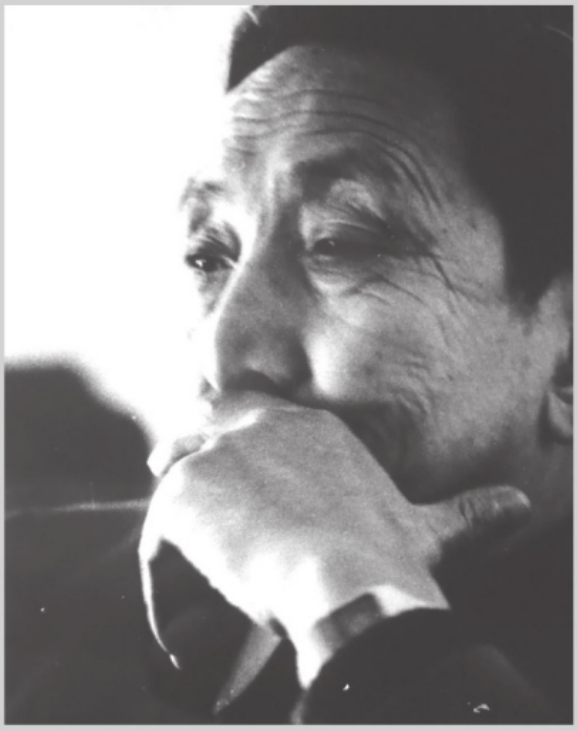
林肯·斯蒂芬斯：新聞與揭醜

何家棟：劉賓雁與共產黨

鄭義：曹長青《與劉賓雁分道揚鑣》嚴重失實

萬潤南：和共產黨分道揚鑣——懷念劉賓雁先生兼與曹長青先生商榷

陳世忠：回憶我和賓雁的交往



第十五章　求仁得仁

1月24日這個日子在賓雁的生命中就留下了雙重的烙印——1979年1月24日宣布給他摘掉“右派”帽子，恢復記者工作，1987年1月24日宣布再次開除他的黨籍，奪去他手中的新聞筆，其間是整整八年，命運對他真是太苛刻了，一天也不多給。這八年，佔他80歲生命的1/10，恰恰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黃金期，也成了賓雁生命的巔峰期。他就是這樣與國家、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

劉賓雁在第四屆全國文代會上和胡耀邦握手。

1986 年，劉賓雁夫婦和上訪被關押的王福綿的妻子（左）合影。

2012 年 8 月，許良英先生在賓雁墓前悼念老友。

方勵之在劉賓雁告別會上慰問朱洪。

先知式作家喬治·奧維爾曾在預言小說《1984》中設想過極權制度下人們生活的狀況。所有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老大哥”無處不在的眼睛監視之下，甚至每個人的思想都受到控制，想什麼和不准想什麼都要由“真理部”決定。劉賓雁和中國人在真實的 1984 年就生活在這種陰影下。全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上出現的一道閃電轉瞬即逝，映襯著更加濃重的背景黑暗。接踵而至的 1985 年對劉賓雁來說更是是沉悶的一年，在越來越沉重的高壓下，雖然《第二種忠誠》引起了巨大反響和爭議，但是賓雁很遺憾這篇力作沒能發表在他供職的《人民日報》上，一年中這份中國最大的報紙沒有發出過一篇他中意的報導。一道無形的繩索正在越勒越緊。

1985 年底，他突然獲得了應邀出訪西德的批准——這次訪問是《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親自與西德駐華大使為賓雁約定的，原定 5 月底成行，機票都訂好了，但報社突然通知取消行程，看來決定來自更高層。在拖延了半年之後，已經取消的訪問突然又得到批准，這顯然和不久前中宣部長易人有關——號稱“左王”的鄧力群 8 月份被受到胡耀邦青睞的朱厚澤所取代，而這位新部長雖然說話不多，但明顯有所不同。賓雁就抓住這次到德國短短兩週的時間，六個城市的行程，完成了一篇題為《他們不肯忘記》的採訪札記。為了寫這篇文章，他向見到的每個德國人都問同一個問題：你是如何看 1931 年至 1945 年那一段希特勒統治下的歷史的？而結論就是文章的題目：他們不肯忘記！這是獻給粉碎納粹德國 40 週年紀念日的禮物，也是對戈培爾的中國同僚們射出的一槍。儘管全文中沒有一處提到中國，可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說，我們讀懂了，這篇文章

句句都映射著當今的中國。站在美麗如畫的萊茵河畔，突破極權統治者者設置的思想藩籬向中國喊話，賓雁從中得到了巨大的啟發和孩子般的快意。

這篇報導不僅是豎起一面映照中國現實的鏡子，而且為人們思考中國問題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視野。20 世紀是極權專制主義從崛起到消亡的歷史，納粹極權主義和共產極權主義這兩頭惡龍並生於世，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災難。這是觀察和思考中國問題必不可缺的大背景，而納粹主義的崩潰和不久即將上演的蘇聯解體則給中國人提供了最好的參照系。

德意志人不愧是個理性的民族，這個曾經為世界貢獻過康德、黑格爾、馬克思、費爾巴哈、萊布尼茨、尼采、叔本華、海德格爾等一系列偉大哲學家的民族，被深刻的理性精神所浸透。在納粹時代終結後，他們一直沒有停止過對這段慘痛歷史的反思和懺悔。1970 年 12 月 7 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波蘭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世一跪震撼了世界，儘管他本人二戰期間早就離開了德國，還參加了反法西斯鬥爭，對希特勒德國的罪行並不負個人責任，但是，他還是代表德意志民族跪在受害亡靈面前了。這神聖而虔誠的一跪，驚天地泣鬼神，被評價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為此，他榮獲了 1971 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德國還在首都柏林的勃蘭登堡門附近建立了由 2700 根方柱組成的納粹大屠殺受害者紀念碑。德國人的認罪和懺悔並不止於這些象徵性的舉動，1956 年聯邦德國議會就通過了納粹受害者賠償法，全世界有 400 萬人在幾十年中獲得賠償，到 2002 年，賠償金額已達 1040 億美元。如今，他們每年還繼續向十萬名受害者提供 6.24 億

美元的養老金。而希特勒的後裔則決定永不結婚生育，讓那個罪惡的家族斷種絕根。

與納粹德國的罪行相比，共產極權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有過之而無不及，僅在歷次政治運動和人為造成的大飢荒中的死難者就達幾千萬之多，超過二戰期間全世界的死亡數字的總和。可是，哪有一個中共的領導人出來說了一句道歉和認罪的話了？他們依然標榜自己是“光榮、偉大、正確”的，依然在血泊和白骨上穩坐在權力的寶座上。

“控制過去就意味著控制現在和將來”，奧維爾發現的這條極權主義思想控制術的秘訣在中國得到了最徹底的貫徹。不但對現實生活中重大問題的報導在“正面報導為主”的方針下被嚴格禁止了，連歷史的回憶與研究也被劃出若干禁區，“反右”、“大躍進”與大飢荒，乃至“文化大革命”都在“向前看”的藉口下成了思想和話語的禁臠。當政者為了“控制現在和將來”，要把硝烟未尽、血跡未乾的歷史從人們的大腦中刪除淨盡，讓全國人都成為罹患失憶症的白痴。這項世界歷史上空前規模的“洗腦”工程正以 13 億隻“小白鼠”為對象全面展開。奧維爾的“真理部”在中國的化身“中宣部”則充当了這一手術的主刀手。

而“保持記憶，拒絕忘卻”則成了有人格尊嚴的中國人最後的思想街壘。這一街壘如果失守，中國人將變成一群沒有記憶、沒有思想、沒有真實的歷史，也沒有是非判斷能力的行屍走肉和任人宰割的羔羊。劉賓雁是堅守這最後街壘的一名火槍手。他用自己的作品表明，對剛剛經過的歷史和尚未結束的災難，中國人有權像德國人一樣響亮地喊出：“我們也不肯忘記！”

通讀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的劉賓雁作品，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時間差”：當“傷痕文學”風行一時，大批寫作者如清晨降臨噩夢初醒，忙於回憶和訴說剛剛過去的苦難時，賓雁卻沒有沉湎其中，因為他並不認為噩夢已經過去，前面盡是光明。他无暇摩挲自己身上的創傷疤痕，而是直接把筆锋指向了現實社會的矛盾和鬥爭，特別注重觀察和報告昔日的黑暗在今日生活中的投影，反復警告噩夢重演的可能危險。而當“傷痕文學”已在官方的打壓下被迫退潮，不少人識時務地主張要“向前看”而忘記過去的時候，他卻高舉起“拒絕忘卻，捍衛記憶”的旗幟，他確實是一股“不與尋常逝水同”的異樣狂瀾。這篇報導是賓雁即將展開的“記憶保衛戰”的序幕。

而一年後，1986 年 11 月 14 日，劉賓雁和天文學家方勵之夫婦到科學史專家許良英家中聚會，這幾個都當過“右派”的人共同商討了發起紀念“反右運動”30 週年的活動，就是這場保衛戰的重要戰役——這成了導致他們第二次被開除黨籍的直接導火索。他們計劃召開一次《反右運動 30 年歷史討論會》，由方勵之起草了會議通知，經許良英、劉賓雁修改後寄發給“可能的參加者”。

這個會議通知中說，“不瞭解反右運動，就不能全面地瞭解 30 年來的歷史，也就難以認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撥亂反正和推行改革的歷史性意義，也就很難深刻認識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我們社會中蘊藏的蓬勃生機。”為此，才發起了這次會議。然後，通知列舉了會議討論的主題，如“反右”的國內和國際背景以及歷史、社會根源，“反右”與“大躍進”、“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的關係，“反右”對政治道德的影響，“反右”與今天的開放、改革和現代化等等。真實的歷史記憶，嚴肅的學術研究，如此簡單的一個會

議計劃能有什麼問題？誰也想不到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收到會議邀請的清華大學教授、著名“右派”錢偉長卻把這份通知交給了中共中央，並附上這樣一個說明：“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但與他們是不同的。”顯然，錢某是在告密並借機邀功討賞。這個據說有點學問、但人格卑劣的教授這一寶押對了。當年“反右”的主要責任人鄧小平本來就不同意給“右派”平反，見到這封告密信後勃然大怒，認為紀念“反右”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觸犯了他不可觸犯的尊嚴，威脅了他不許懷疑的權威。

1986 年是中國改革和反改革兩種力量激烈交鋒的一年。已經聚集了几年的矛盾开始公開顯現，从上到下都瀰漫著動盪不安的氣氛和火藥味。年初，新任中宣部長朱厚澤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發出了令人鼓舞的新聲音：“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這個主張“寬容、寬厚、寬鬆”的“三寬”新思想一反中宣部多年來的極左腔調，讓人耳目一新。

這年夏天，又一個好消息傳來：改革派的大將、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在軟科學座談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主張黨和國家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說“政治決策，人民群眾也可以參加討論”。這可是前所未有的聲音，因為人們都記得，1980 年北京大學的郭羅基只因說“政治問題也可以討論”就被鄧小平點名批評，驅逐出北京。萬里的講話還沒有見報，就在北京的知識分子中傳開

了。萬里在講話中，一度離開講稿，說起劉賓雁的作品：“劉賓雁的文章《第二種忠誠》我最初沒有看到，聽說引起很多人反對，找來看了。我看很好嘛，我們就是需要第二種忠誠嘛。”這是來自高層對賓雁作品的第一次正面公開肯定。

幾天以後，萬里約劉賓雁到中南海裡他的寓所見面，萬里夫人、萬里的助手、著名農業專家吳象和萬里的一個兒子在座。賓雁對萬里心儀已久，但一直沒有機會單獨見面。1975 年他頂著“四人幫”的壓力，出任鐵道部長，大刀闊斧地整治津浦線和京廣線的亂象，排除了派性鬥爭的干擾，使鐵路幹線恢復了正常營運，使人心為之一振。“四人幫”覆滅以後，他又到安徽掃除幫派勢力，率先實行農村生產責任制，對恢復農業生產發揮了奇效，也為全國的農村改革衝開了一個缺口。當時，賓雁還沒摘掉“右派”帽子，但已經聽到了流傳的民謠“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對這位改革事業的開拓者和領導人充滿尊敬之心。後來，在“清除精神汙染”的邪風颳起的時候，萬里又站出來反對在農村“清汙”，給了“左派”們當頭一棒，賓雁早就把這位領導人視為能稱之為“同志”者中的一個了。

這次萬里一見到賓雁，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就是需要你寫的那種‘第二種忠誠’。一個黨，一旦聽不得不同意見，它就完了。無論是共產黨、國民黨或者社會黨、基督教民主聯盟，都一樣，只要聽不得批評，就必定垮台。”

萬里還提起魯迅的雜文《聰明人、傻子和奴才》，感嘆道：“中國現在是聰明人和奴才太多，而‘傻子’太少，很少人敢於直言，這是危險的。”賓雁後來才知道，萬里在“文革”被監禁期間，曾把《魯

迅全集》通讀兩遍。他為此感慨道：中共領導集團中，這樣有文化素養的人太少了！——如果賓雁看到這個一向重視意識形態的黨，如今竟然找不出一個有文化的人來主管宣傳，只好讓一個中專生來掌管文宣大權，又該如何感慨呢？

萬里還叮囑賓雁，他在北京市工作時的老戰友鄧拓和吳晗遭到毛澤東那樣殘酷的打擊，要好好寫寫他們。這種良知義憤和戰友之情也讓賓雁感動。

賓雁當場稱讚了萬里在軟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說知識分子們聽了都很振奮，希望這個講話能公開發表。萬里說，講稿已經送鄧小平、胡耀邦審閱去了，估計不會有多大改動。他讓秘書拿來一份，交給賓雁，委託他帶給《人民日報》社長，希望報社再組織幾篇文章，配合講話的發表。賓雁很高興地承擔了這個任務。幾天後，萬里的這篇重要講話在《人民日報》上全文發表了，這成了當年改革思想的最強音，也是迄今為止關於政治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理論的絕響。

賓雁一生接觸過鄧拓、萬里乃至胡耀邦等高級領導人，他知道，共產黨裡不是沒有好人，只是這些好人的命運都是悲劇——包括萬里在“六四”中的遭遇和後來的下場……這個黨至今仍被一個“逆淘汰定律”左右著，開明、正直而有人性的領導人總是要被那些保守、邪惡和反動的勢力所排擠與迫害，這是為什麼呢？這恐怕不是人性善惡的問題，答案應從它所遵從的理論，以及建立在這個理論之上的制度中去尋找。

在整個 80 年代，每個好消息後面總要跟著一個更壞的消息。當年夏天，在中央會議討論“建設精神文明”的決議時，“文革”中

首批打倒的“彭羅陸楊”之一、前中宣部長陸定一站起來，建議刪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字樣，理由是這個提法最早是蘇共在攻擊中共的“雙百方針”時提出來的，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概念統統劃歸“資產階級”，從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是有害的。萬里也發言對此表示支持和附議。當時會場上響起了長時間的掌聲，在場的李銳注意到來自中顧委席的掌聲尤為熱烈，可見陸定一的意見受到了普遍的支持。但是，這個正確的意見卻被鄧小平否決了。鄧小平針對陸定一的發言，用三個“我”開頭，蠻橫獨斷地說：“我提出來反自由化，我最堅決，我講的最多，至少還要反 20 年。不管這個話原來是從哪兒來的，都無關緊要。”——他的這三個“我”雖然暗合了凱撒大帝著名的“我來了，我看見了，我征服了”，但已經沒有了氣吞山河的豪邁，剩下的只是一股強橫暴戾、不由分說的霸氣，儼然是一言九鼎的帝王口吻。這就埋下了個禍根，在“清除精神汙染”草草收兵，無果而終後，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邪惡浪潮就要洶湧而來，將導致改革開放事業的大逆轉了。

消息傳來，許多人都憂心忡忡，賓雁也從希望的高點落入新的危機中了。和萬里的高度評價與支持針鋒相對的聲音接著傳出，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薄一波（這個指導委員會的主任是總書記胡耀邦，薄是實際負責人）在六省市整黨匯報會上，點名批判劉賓雁說：“都說劉賓雁敢講話。他敢講什麼話？我看他是到處胡說八道，他每到一處，就支持那裡的造反派，破壞安定團結。劉賓雁和王若望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這是第一次有人把劉賓雁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說這個話的薄一波是所謂“中共八老”之一，當時的地位與萬里相

當，但他背後的力量卻不可小覷，後台顯然是無冕之王鄧小平。這個薄一波在“文革”中曾作為“61人叛徒集團”的首犯被關進秦城監獄。是胡耀邦冒著巨大的壓力將他解放出來的。但他並不知感恩，在不久後非法罷黜胡耀邦的宮廷政變中充當了主要打手，那個在20多年後鬧得天翻地覆要為“文革”招魂的薄熙來則是他的政治繼承人——這父子倆還真是血脈相承。

薄一波的這次講話把對劉賓雁的打擊升級了，從否定他的某一個具體作品到整體上否定一個人，為後來將他和方勵之、王若望一起開除黨籍定了調子。濃雲又一次在他頭頂聚集，閃電隨時就要劈下來。這時的賓雁並不十分關心自己的命運，而是在為改革事業將要遭到的逆轉而憂慮。他看到，1957年時的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在“反右”中差點被打成“右派”，多虧胡耀邦全力保下來的項南，這時已成為全國最具改革思想和勇氣的福建省委書記，卻被所謂的“晉江假藥案”拉下馬了，在開發海南中立下殊勛的改革者雷宇也中箭落馬了，類似的消息不斷傳來，風向驟變，最讓他擔憂的是有關胡耀邦的不利消息也不時傳出，一場政治風暴似乎正在醞釀中。

高爾基的散文詩《海燕》曾寫過在暴風雨來臨前各種水鳥的不同反應。一般多是由於恐懼而驚慌失措，或畏縮地躲起來，只有海燕激昂地衝向雲端，高聲鳴叫：“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賓雁性格中的鬥士特質在這時顯露出來：他感到自己所餘的時間和機會不多了，不但沒有避退和收縮，反而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這一年，他馬不停蹄地跑了湖南、四川、江蘇、安徽、黑龍江、上海和福建七個省市，其中三個地方還去了兩次。每到一地，他不僅抓緊時間採訪、寫作，還利用一切機會到處演講，這一年裡，他一共在五個城市

中作了十幾場演講。

這個天生的演說家，一踏進演講大廳，就像從 60 歲回到了青年時代，融入了年輕人的海洋。他依然是那樣精神抖擻，思維敏銳和妙語迭出。他到處呼籲要落實憲法規定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推動政治體制的改革；鼓勵青年學生要關注社會現實和人民的命運，承擔起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

第一場演講是在南京大學，禮堂裡擠滿了學生，連走道裡也擠得水泄不通，人們肩並肩、胸貼背，靜靜地聽他的演講，然後用雷鳴般的掌聲回應了他的演講。結束時，他不得不借一個書包來裝學生們提問的紙條。

最後一場公開演講是在天津——他 40 年前走上革命路的故地，也是他平生第一次發表演講的地方，因此他對這場演講格外動情。別夢依稀 40 年，他的講壇從當年的耀華中學換到了天津的最高學府南開大學。面對的依然是新一代渴望真理的年輕學子，不同的是演講人已經飽經滄桑，臉上縱橫的皺紋和頭上的斑駁白髮無聲地訴說著時光的無情。會場的盛況更恍然如夢：學生們湧進會場，台下擠滿了人，外面等待進來的人流仍然持續不斷。賓雁和主持人商量，是不是讓學生們坐到台上來？話音未落，人潮已涌上舞台，把賓雁團團圍住，連他的腳邊都坐滿了人，賓雁成了人海漩渦的中心。他的心顫抖起來，眼睛也濕潤了——這一代青年，比 40 年前的那一代更愛自己的國家，更有追求真理的激情，可在當年的革命者、如今的當權者眼中，他們卻被視為洪水猛獸，是所謂的“社會不安定因素”了，這是多麼大的反差啊！而他自己，雖說還有一顆年輕人一樣火熱的心，但是在演講時卻不能像 40 年前那樣隨心所

欲地說出全部真話了，他知道，他的每次演講都有人躲在一邊悄悄地錄音和記錄，以作為今後整他時的“罪證”——革命的勝利反而讓他這個曾經呼喚革命的海燕失去了說真話的自由，這對他當年的“革命理想”是何等殘酷的諷刺啊！這種時空和角色的變換讓他無限感慨。告別天津時，他未免有點覺得凄涼和感傷，他似乎預感到，一場長達 40 年的人生演講，從這裡開始又要在這裡結束了。

在失去記者身份前的最後一年裡，他還在忙著採訪幾個重要的報導。

一個是黑龍江省伊春市的王福錦案，這已經讓賓雁牽掛了兩年多了。1984 年 3 月 14 日，這個 40 多歲的中年工人跑到北京，找到劉賓雁的家向他訴說了自己的冤情——他因為揭發伊春市委書記王斐的問題，受到了迫害。當天下午賓雁和他的談話還沒有結束，準備第二天陪著他到中紀委去反映情況，結果當天晚上，王福錦就被伊春的公安人員從 4000 公里外開車追到北京，“跨省”抓回伊春了。這讓賓雁十分惱怒，覺得王福錦就像是當著自己的面被抓走一樣。王福錦被抓走時逮捕證上寫的是“侮辱誹謗”的罪名，而審判時的罪名又換成了“擾亂社會秩序罪”，勉強判了他四年徒刑。這時，他所揭發的王斐已經高升為黑龍江省委的組織部長了。

這個明顯的冤案在賓雁心頭掛了兩年半，他一直想找機會解救王福錦。到了 1986 年秋天，賓雁終於有機會在《人民日報》的編委會上匯報了王福錦案的情況，並說明報社對這起冤案也有責任，因為審判王福錦案時，《人民日報》曾發過黑龍江省送來的稿子，汙蔑王是“文革”中的“三種人”。因此，報社應該為平反這起冤案負責到底。經報社正式批准，賓雁才得以再次介入此案。他和另外

兩名記者一同奔赴黑龍江省，繼續調查王福錦案的情況，並蒐集他所檢舉的王斐的罪行。

調查過程十分艱難，黑龍江省方面不予配合，百般拖延，案卷不給看，人也不准見。當賓雁向當局抗議採訪受到限制和監視時，伊春市一位宣傳部副部長笑著說：“沒有的事，你們會見了31個人，不是沒有受到阻攔嗎？”這不打自招地承認了他們受到了嚴密的監視。為了避開監視，賓雁和記者只得離開招待所，悄悄到不敢來見面的證人家中去採訪。經過反復的鬥爭，並聯繫北京的最高法院，記者最後才爭取到和王福錦見面的機會——此時的王福錦已經被關在省公安廳所屬的精神病管制醫院裡了！原因是王福錦不服判決，一直上訴，而省高等法院也覺得判決罪名和證據有問題，於是就想出了這個辦法繼續監禁他。把一個正常的好人關進精神病院，這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發明的惡法，中國也從“克格勃”那裡學來了。賓雁以前只聽說過，這是他親見的第一例，讓他十分震驚和憤怒——賓雁生前並不知道，如今這個惡法早已普及全國，成了專政機器迫害難以定罪的人常用的武器了。

劉賓雁和兩名記者在精神病院見到了王福錦，發現他雖然形容憔悴，身體虛弱，但思維完全正常，說話有條有理，還富有邏輯性，根本沒有病態。對賓雁能突破萬難，到監禁地前來探望，他極為感動，情感表達也完全正常。回到北京，賓雁和兩名記者聯名寫了王福錦一案以及王斐等人大量罪行的調查報告，送交胡耀邦和胡啟立，建議中央派出更有權威性的調查組，糾正這一冤案——然而，兩個月後，胡耀邦被迫辭職了，劉賓雁也被第二次開除了黨籍，王福錦案也就被無限期地擱置起來了……

1988 年春天，劉賓雁將要離國的前一天，前來送行者中間有一個特殊的客人，那是王福錦的妻子。 她千里迢迢從黑龍江趕來，為的就是向一直關心她丈夫命運的賓雁表示感謝。 她帶來了一個讓賓雁稍微寬心的消息，王福錦在被關四年後，已經從精神病院中回家了，他讓妻子捎話給賓雁，等賓雁將來再次恢復記者工作時——王福錦對此深信不疑——請他再來伊春，繼續為苦難的人們奔走呼號。 聽著王福錦妻子的哭訴，賓雁心裡猶如針刺刀攪一般，他久久地拉著王福錦妻子的手，心想：我還有機會報答人們的深情期待嗎？

賓雁一生的最後一次採訪是在 1986 年年底。 福建的武夷山有個叫陳建霖的天才藝術家和環保鬥士，他因為反對濫伐森林和破壞風景區受到壓制和迫害。 賓雁來到福建，見到省委書記陳光毅，匯報了陳建霖的事件，督促省委派出一個公正的有權威的調查組，邀請陳建霖也參加調查。 問題離正確解決只有一步之差——這時，賓雁接到北京的緊急電話，催他立即返京。 陳建霖的問題終於沒有得到解決，成了賓雁終生的遺憾……

賓雁對這次奉召返京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雖然他並不知道，這次他是要去迎接自己生命的又一次轉折……

“站好最後一班崗”，這是中國新聞報導英雄模範事跡用得濫俗的套話，讓人望而生厭，然而，賓雁真的是在新聞崗位上勤勉地工作到了最後一分鐘，直到他手中的筆被奪下為止。 回到北京後，賓雁還應邀到中國青年報社作了一次內部講話，內容還是講新聞改革。 在講話中，他以王福錦案為例，說明新聞記者的社會責任與道義擔當。 直到在流亡海外的晚年，賓雁還不時唸叨著王福錦、陳建霖的名字，對功敗垂成的最後採訪和報導無限遺憾。 能多解救一

個受難者，多保護一個好人，是他的最大夢想……

就在賓雁返京的路上，中國社會發生了震撼性的事件。地處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爆發了學生運動。大學生們走出校園，衝上大街，喊出了“反官倒，反特權”，“要民主，要自由，要改革”的口號。長期的壓抑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滯引起了強烈的反彈，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紛紛響應，一場學潮席捲了中國，也震撼了中南海。

在如何應對學潮的問題上，以胡耀邦為首的改革派與強大的保守勢力之間產生了巨大分歧。

胡耀邦在對待群眾民主運動的態度上早就與鄧小平有重大區別。在 1979 年西單民主牆出現後，他就強調要尊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主張通過加強群眾來訪來信工作，加快平反冤假錯案，加緊對集會遊行、上訪請願的立法等措施來化解矛盾，他說：“我們黨歷來都主張站在人民群眾之中而反對站在群眾之上。”還激動地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當發生了逮捕魏京生事件後，他又說：“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能抓人來關。大凡敢於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1986 年的學潮爆發後，胡耀邦仍想按“對話、溝通、協商”的方針來處理。後來，趙紫陽對處理 1989 年春夏之交的學生運動時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通過“和平對話”的方法化解危機的方針，與胡耀邦的這個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而在這一問題上站到保守派一邊的鄧小平，歷來是主張用鎮壓的方式解決群眾民主運動的。這位中國的“鐵血俾斯麥”在這方面有血腥的記錄。他對 1986 年學潮的回答是來一場大規模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而矛頭對準了黨的總書記胡耀邦，

強加給他的罪名是“處理學潮不力”和“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從而製造了一場違反黨紀國法的宮廷政變，把胡耀邦趕下了台。

劉賓雁回到北京時，這場關係到他命運的政變正在進行中。

這年的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和何東昌叫到自己家中來談話，當面嚴飭胡耀邦制止學潮不力。他還聲色俱厲地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下不了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請注意，他這時殺心已動，兩年後的“六四屠城”顯然不是偶然衝動下的決定，而是鄧小平對待群眾民主運動一貫方針的必然結果——這時，他想起了錢偉長交上的告密信，就氣哼哼地當場提出把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他記錯了，把許良英錯記為王若望）開除出黨，還表揚了錢偉長的告密，說應予重用。這樣一來，中共中央名義上的最高領導總書記胡耀邦以及三個黨員的命運就在鄧小平的家中決定了。

兩天以後，胡耀邦在這個漫天大雪的元旦被迫向鄧小平遞交了辭職信。接著，1987年1月8日至1月16日，中央召開了七天半的“老同志生活會”，對胡耀邦進行了文革式的“批鬥”。據當時的中宣部長朱厚澤回憶，“生活會”由薄一波主持，地點在中南海的懷仁堂，參加會的有二三十人，其中中顧委的老人有17人，佔大多數。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等幾位“大佬”安排了一切但沒有出面。一夥政治老人指著胡耀邦的鼻子對他在政治、經濟、外交、法制等方面的工作一齊發炮，其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軟弱”是主要罪狀。格外醒目的是幾年來一直與胡耀邦搗亂的“左王”鄧力群在會

上滔滔不絕地講了五六個小時，總書記的寶座似乎離他只有一步之遙了。這個名不正言不順的“老人會”決定了接受胡耀邦的辭職，同時決定開除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的黨籍，並決定全國立即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月10日胡耀邦在會上做了個言不由衷而又“上綱上線”的檢查，題為《我的表態》，他退出會場之後就失聲痛哭。這個一生從不整人的好人這次被整苦了。

按黨章規定，黨的總書記應由中央全會任命或罷免，可一群已經退休、只是普通黨員身份的老人卻在黨中央之外決定了總書記的命運，這真是歷史上的奇聞。在場的人中只有習仲勛一進會場看到這個陣勢，就大發雷霆，說：“這樣重要的會為什麼預先不告知！”當會上薄一波、彭真、王震等人要求胡耀邦辭職時，習仲勛忍無可忍，憤怒地說：“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嗎？”他還說：“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違反黨的原則。我堅決反對你們的做法！”（見劉鋮聲的著作《溫家寶全傳》）

“生活會”後，召開了一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來走一下程序，已經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雙巨頭”鄧小平、陳雲都出面了。會議一開始，鄧小平這個“普通黨員”就大言不慚地宣布：“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他規定，這個會上只宣布胡耀邦的免職公報，不許討論，薄一波按照鄧力群寫的講稿介紹了“生活會”的情況和對胡耀邦免職的決定，然後除了陳雲以外，沒有別人發言。早就想讓鄧力群取代胡耀邦的陳雲就所謂胡耀邦的“問題”講了一大通。他講完後，全場肅靜，所有人的目光都都集中在鄧小平身上。

但鄧似乎睡著了，半天沒有反應。直到薄一波用手在他眼前晃了一晃，他還沒有反應；第二次晃晃，他才如夢初醒，說：“我沒聽

見。”又說：“沒有意見，舉手通過。”然後就宣布散會了。（詳見《炎黃春秋》2012 年第五期發表的專訪朱厚澤的文章）

一次宮廷政變就這樣出籠並順利得逞了。

1987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下達，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式啟幕；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科技大學，免去管惟炎校長職務，撤銷方勵之副校長職務；

1 月 14 日，中共上海市委宣布開除王若望黨籍——將錯就錯，鄧小平的“金口玉言”是不可更改的；

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表公報，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

1 月 19 日，中共安徽省委宣布開除方勵之黨籍；

1 月 24 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開除劉賓雁黨籍的消息；

這樣一來，1 月 24 日這個日子在賓雁的生命中就留下了雙重的烙印——1979 年 1 月 24 日宣布給他摘掉“右派”帽子，恢復記者工作；1987 年 1 月 24 日宣布再次開除他的黨籍，奪去他手中的新聞筆，其間是整整八年，命運對他真是太苛刻了，一天也不多給。這八年，佔他 80 歲生命的 1/10，恰恰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黃金期，也成了賓雁生命的巔峰期。 他就是這樣與國家、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

賓雁的災星是“七”字，每到逢七的年份，他都要倒霉——1957 年他被打成“右派”；1967 年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中所列周揚的罪狀之一是讚賞“右派分子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作品；1977 年“四人幫”被打倒後，輪到姚文元挨批判了，可又把他“反

右”時在上海見“大右派劉賓雁”的往事拉出來；1987 年他又被第二次開除黨籍……每隔十年他的名字就要作為“反面教員”上一回《人民日報》，從這個奇怪的巧合中，人們可以看到中國政治的週期率，也看到“左”的頑症是如何根深蒂固。

作為這一事變的尾聲，不久後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出賣賓雁等人的告密者錢偉長居然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享受了“副國級”的待遇，這遠遠超出他告密時所期望的恢復清華副校長地位的要求，他應該喜出望外了，這是中國這些年來無數類似的臥底、告密者中得到獎賞最高的一個，比出賣耶穌的猶大所得的 30 塊錢多了無數倍。

《馬太福音》說，猶大看到耶穌要被處死，後悔了，把所得的 30 塊錢還給祭司長和長老，說：“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祭司長和長老說：“那與我們有何相干？你自己承擔吧！”猶大扔下錢，出去就上吊死了。中國的猶大可沒有這樣的懺悔之舉，他死後的骨灰至今還在八寶山的“高幹塔”上享受著黨國賜予的“榮耀”。這位智商不應該太低下的清華大教授怎麼就不知道，那可是個永恆的恥辱柱啊……

朱厚澤說得好：“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記歷史的組織，只能是一個愚蠢的組織；一個有意地磨滅歷史記憶的政權，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劃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失去記憶、忘記歷史的國家，不能不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

1986 年底到 1987 年初發生的宮廷政變，和在這一過程中發生的一切荒唐而醜惡的歷史應該永遠被人們記住。這就是“有中

國特色的”、“比美國好五倍”的民主和人權，這就是中共最重要決策的運作過程。在外人看來像是個鬧劇和笑話，可中國人應該哭，13 億人的命運就是這樣被決定的。如果沒有一場徹底的政治制度改革，這樣的醜劇還將繼續上演不停。

有的研究者認為，胡耀邦之所以被拿下馬，除了公開的理由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鄧小平一次與胡私下談話時，裝模作樣地表示自己要“全退”，胡耀邦沒有極力挽留說“老大不能走”，反而說“贊成”，並真誠地說自己也要退休，讓更年輕的同志來接班。這使鄧小平惱羞成怒，他後來問萬里：“為什麼讓我下？”萬里解釋：“可能是失言。”鄧說不是，“是要取而代之。”（見李銳的文章《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這使鄧小平下決心要先把胡耀邦拿下。有人對鄧小平做過心理分析，如果說他當年贊成改革還主要是為黨和國家的未來考慮的話，到了晚年他考慮的已經主要是自己生前的權力和自己身後子女的利益與地位了。

胡績偉也同意這種說法，認為胡耀邦在接受香港記者陸鏗採訪時天真而坦率地議論了鄧小平、陳雲、王震等人，觸怒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幫政治老人。他還指出，要扳倒胡耀邦的陰謀已非一日，早有一股力量處心極慮地尋找機會攻擊他。每當胡耀邦出國訪問不在家時，總有人要搞點名堂，例如他第一次出國時，就發生了批白樺的《苦戀》風波；第二次出國時，就搞起了“清除精神汙染”；而他第三次出國訪問澳大利亞，就有人拿他接受陸鏗採訪的講話大做文章——1985 年 6 月陸鏗發表的《胡耀邦採訪記》的確是倒胡的導火索。

胡績偉還認為，胡耀邦與鄧小平的根本分歧是，“他主張我們

的黨，我們的幹部，不僅要從‘四人幫’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且還要從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下解放出來；不僅要突破‘四人幫’和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而且反對樹立任何新的個人極權統治；不僅要糾正毛澤東那一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而且還要反對打著毛澤東旗號的任何變了花樣的假社會主義。這就越來越威脅到某些人的政治權威和理論權威。”這個分歧是如此深刻，以至胡耀邦成了鄧小平們推行新專制主義的政敵，甚至到了“誓不兩立”的地步，以致最後釀成了埋葬“鄧－胡體制”的宮廷政變發生，和不久後“鄧－趙體制”在群眾民主運動中的瓦解，最終斷送了中國改革。

古語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用於賓雁並不完全合適。準確地說，應是“城門失火，首當其衝”。因為他並非微不足道、毫無關係的“池魚”，而是這場正邪之戰中一個高舉真理之旗，衝鋒陷陣的猛士，犧牲是他命中注定的結局。對此，他早有準備，而且心甘情願，九死無悔。從決定闖“刀山火海”的那一天起他就等著這一天呢。而能與中國改革開放的主帥胡耀邦休戚與共，同臥沙場，則是一個戰士的無上榮耀。

如果說 1957 年賓雁的第一次蒙難還有些上當受騙、意外獲咎色彩的話，這次可真是他“自找”的——求仁得仁，又何怨焉！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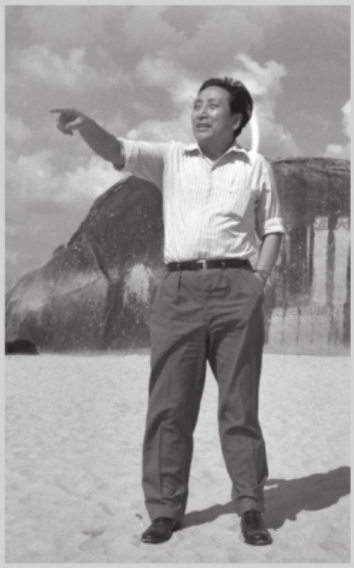
方勵之：關於許良英劉賓雁和我聯署的那封信

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

1986 年 12 月，劉賓雁最後一次出現在中國大舞台。

第十六章　花果飄零

所有中國改革的象徵性人物，沒有一個像戈爾巴喬夫一樣在決定關頭與體制決裂，更沒有一個像葉利欽一樣站到坦克上把鬥爭的內容訴諸民眾，把鬥爭勝負的決定權交給民眾，把體制內改革者和體制外改革者聯成一體，把改革變成一次全民的運動。 他們生於體制內，敗於體制內，死於體制內，到死還在乎那面覆蓋在他們遺體上的黨旗。……而恰恰在這一點上，賓雁走上了道德十字架的高端



1987 年初，劉賓雁來到蘇東坡流放過的地方——海南島天涯海角。

1988 年 3 月 18 日，劉賓雁訪美，親友到機場送別。

祖孫訣別之吻。劉賓雁與不滿週歲的外孫吻別。

1988 年 11 月 19 日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講演

1989 年夏，劉賓雁在香港接受採訪。

在中國歷史上，帝王接班人的立廢從來就是多事的關口，因為太子的立廢而引起的內亂屢見不鮮。中共這個極權專制朝廷也沒有逃脫這個規律，“太祖”毛澤東先後立廢過劉少奇、林彪兩個接班人，每次都伴隨著一場大動亂，最後選中的繼承人華國鋒在粉碎了“四人幫”的奪權陰謀後，還是被鄧小平取而代之了。“太宗”鄧小平在奪取大位後，也兩次“奪嫡”廢“太子”，胡耀邦是第一個犧牲品。他在被一場宮廷政變趕下台兩年後，突然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了。

1989 年 4 月 15 日清晨，劉賓雁在紐約的泛美飯店剛剛起床，就有人來向他報告：“胡耀邦去世了。”這個意外的噩耗讓他意識到，一個與他關係密切的領導人離開這個世界了。悲傷之餘他不禁為國家的命運擔心起來。

接著一個消息傳來，胡耀邦在去世前與李銳的最後一次長談中，對他在下台時的檢討中說了不利於劉賓雁的話表示懊悔。在這次談話中他還提到項南，胡耀邦沒後悔能保住他。賓雁曾先後五次聽到胡耀邦託人轉達的道歉，這是第一次。還有一次胡耀邦說：“我這一生對不起三個人，前兩個人是延安時期的事，第三個是劉賓雁。”最後一次是兩位胡耀邦的親戚來到美國，特地找到賓雁和朱洪，鄭重地代表胡耀邦表示歉意，請求得到諒解。

這很不平常。中共的黨魁們似乎從來就沒有認錯道歉的習慣和傳統，一個曾經在名義上登上過中國最高權力寶座的“大人物”，向一個普通的記者和作家反復多次表示道歉，這是為什麼？劉賓雁在自己的《自傳》中專門用一章《我與胡耀邦》說明了事情的原委。

劉賓雁和胡耀邦並沒有親密的個人關係，不是沒有機會，而是

賓雁一生有個“潔癖”，不願和權力高層的人物發生親密的接觸。作為一個有尊嚴的人，他厭惡在權門之下奔走的世俗惡習；作為一個新聞記者，他願意永遠做一個立在權力圈之外的觀察者和批判者；而作為一個作家，他永遠也不想放棄自己的思想自由，賣身給某一種勢力，當一名權力或金錢的家奴。新聞人的職業操守與作家的良知，和他身上那種來自俄羅斯文學的“貴族氣”，使他一直對權力懷有警戒之心，有意識地遠離權力，對權力者敬而遠之，或鄙而遠之。在當代中國的新聞界和作家群中，有如此風骨者可謂鳳毛麟角。

賓雁和胡耀邦之間主要是工作關係。他所就職的第一份報紙《中國青年報》是共青團中央所管轄的報紙，胡耀邦長期擔任團中央的第一書記，自然是他的上級；而他復出後就職的《人民日報》則是黨中央的機關報，而當時胡耀邦恰恰是中共中央的總書記，又是他的頂頭上司。在這中間的 20 多年時間裡，賓雁被打成“右派”並非胡耀邦所願——毛澤東的決定他無力阻止；而賓雁成了被管制的“右派分子”以後，仍歸團中央管轄，還在胡耀邦的視野之中。賓雁到山西農村去勞動改造時，胡耀邦曾為他們送行，鼓勵賓雁不要失去信心；“文革”中他倆曾站在一個“鬥鬼台”上挨鬥，後期又同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幹校勞動；賓雁的“右派”帽子能夠摘下，還多虧胡耀邦的大力幫助……所以胡耀邦說“劉賓雁這個人我是瞭解的”不是信口之言。而劉賓雁對胡耀邦的思想人品、優點缺點心裡也有數。他們之間雖然個人私下接觸不多，但彼此總能做到心心相印和心照不宣。“君子之交淡如水”用在他們之間最為恰當。

在整個 80 年代，劉賓雁是胡耀邦擔綱掛帥的改革事業不遺餘

力的追隨者和鼎力支持者，這從他的全部作品和大量演講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而胡耀邦則是劉賓雁事業默默的關注者和悄悄的保護者，這從他在劉賓雁成為“左派”們瘋狂攻擊的目標時，幾次站出來講的話中可以看出深意。可以說他們是改革大業的志同道合者。這種純粹而高尚的同袍之誼和知音之情非尋常朋友可比，也不是世俗所能理解的上下級關係。

在這期間，胡耀邦關於劉賓雁的表態有如下幾次：

第一次是 1979 年底，高級黨校一個女幹部在中宣部的會上告了劉賓雁一狀。時任中宣部長的胡耀邦說：“劉賓雁這個人我瞭解。1957 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給他改正，我是贊成的。但是這個人也有毛病。”

第二次是 1984 年秋，陝西省委因劉賓雁發表了《三十八年是與非》把狀告到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在壓力下說：“劉賓雁沒有接受 1957 年的教訓。他不要當記者了，還是去當作家吧。”

第三次是 1986 年 11 月，上海市委就《第二種忠誠》的續篇《未完成的埋葬》告狀，胡耀邦下台前最後一次視察上海時說：“劉賓雁的作品，我每篇都看。聽說有三篇文章失實。十一月中旬寫黑龍江的這一篇，又有人指責說失實，我讓人去瞭解一下，果然又失實了。”（這裡說的“讓人去瞭解一下”是向黑龍江省委瞭解，他們當然不會說賓雁的好話了。）

第四次是 1987 年 1 月，胡耀邦在決定他下台的那次“生活會”上以《我的表態》為題被迫檢討說：“劉賓雁過去在團中央工作。他給我寫過幾封信，我沒有見他。這個人右派立場根本沒有轉變。我多次對《人民日報》打招呼，說這個人不能當記者。”胡耀邦檢查

的全文在他下台半年後以“19 號文件”的形式向全黨傳達過。 後來，胡耀邦幾次託人向劉賓雁道歉主要就是為了這幾句話。 他反復申明，那幾句話是在極大政治壓力下不慎說出來的，並無加害之意，事後他非常懊悔。 在中國，不僅一般百姓終日生活在恐懼中，連總書記也不能例外。 這真與奧維爾的《1984》寫的一模一樣。

關於這件事還有一個重要的情節：胡耀邦被迫下台後，還保留了政治局委員的資格。1987 年 10 月在中共十三大的主席團會議上，胡耀邦當場嚴肅質問鄧力群（他是負責整理下發胡耀邦的檢查《我的表態》的書記處書記）：“當把我講話的錄音稿送我看的時候，我刪掉了這些話，你為什麼在 19 號文件上又恢復了？”鄧力群被問得張口結舌，十分狼狽——這個覬覦總書記寶座的“左王”在十三大上連續落選中央委員和中顧委常委，與此事廣泛傳播大有關係。他取而代之的美夢也就破碎難圓，從此一蹶不起。

除了這四次講話外，還有一封信。 是 1982 年遼寧、黑龍江兩個“諸侯”同時告狀，使胡耀邦不得不有所表示。 他於當年 7 月 6 日給中宣部的兩位副部長朱穆之、賀敬之，以及中國文聯主席周揚和《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劉賓雁同志這篇文章（指反映遼寧問題的報告文學《好人啊，你為什麼這樣軟弱》），是遼寧郭峰同志在座談會時當面交給我的。 交的時候，他當著省市書記的面聲言，劉在文章中所引舉的一些例子，很多不是事實，省委不同意劉在文章中有關遼寧工作的一些評論。 黑龍江楊易辰同志接著說，劉的《人妖之間》一文許多地方也不是事實，黑龍江省委對這篇作品得獎感到很不理解。

由於他們的意見，我把劉今年一月發表的這篇文章看了一遍。

首先，我覺得這篇文章並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一篇抨擊一個省的黨內政治生活的特寫。一個作家可不可以、有沒有權揭露黨內黑暗呢？當然可以，當然有權。但寫出來送給誰，是送給有關黨委、或哪個人還是徑直送給哪個報刊公開發表，這就要從有沒有利於問題確實得到正確解決來考慮。

一個報刊能不能徑直發表抨擊性和揭露性的作品呢？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考慮：為了向黨向人民負責，需要加以核實，需要向該地黨委和當事人加以核實，使自己發表的東西真正經得起檢驗。

現在這兩方面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好。我們說，我們對撥亂反正是堅決不動搖的，誰也不能誇口說，撥亂反正能夠比黨中央更堅決。但撥亂反正不能亂撥一氣，而且不能稍有疏忽。這樣的問題，我覺得我們有些同志並沒有弄清楚，說得不客氣一點，有點過於自信。

賓雁同志歷史上遭受過不公正的打擊，許多同志對他很同情，這是對的。現在，我們也要盡量尊重他，愛護他，這也是對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賓雁同志看待問題確有點情緒。我覺得這方面的意見我們也要聽一聽，並以同志式的態度，同劉交交心，請你們考慮。”

仔細分析胡耀邦幾次對劉賓雁的批評，特別是那封字斟句酌、用心良苦的信，是研究胡耀邦、劉賓雁所生活時代的政治生態，以及他們兩人的思想行為的重要材料。

首先，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所承受的壓力。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改革者——上從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的領袖人物，下到賓雁為代表主張改革的廣大幹部群眾，無不承

受著巨大的壓力。反對改革的勢力是那樣強大和頑固，雖然在某個時期和某些領域內改革似乎曾經佔了上風，但是從總體上看，維持舊體制舊思想舊路線和既得利益的頑固保守力量佔有相當的優勢，這種優勢並不來自民眾的支持，而是來自已經“異化”為人民對立物的權力，越到國家機器的上層這種反抗改革的力量越大。劉賓雁的每一篇作品發表，在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的同時，都會遭到來自保守陣營充滿仇恨的瘋狂反對，這種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上層的改革者中很少有人敢於像萬里那樣旗幟鮮明地支持他，而多數人只能像胡耀邦那樣小心翼翼、半遮半掩地給予有限的支持和保護。他的講話和信件表面上都包含著對賓雁的批評，目的顯然是用中立和公正的姿態力圖緩解敵對方面的攻擊力量，實際上給賓雁以保護。對此，賓雁是心領神會的。

儘管胡耀邦在《我的表態》中為洗脫自己說“他（指賓雁）給我寫過幾封信，我沒有見他。”其實賓雁和胡耀邦還是有交流的。胡每次批評賓雁，賓雁都給他寫過信，一方面表示接受耀邦的批評，一方面又對批評的不實之處做了解釋和說明。例如他看到 1983 年 7 月那封轉來的批評新就寫了回信。對胡耀邦說他對當年的“反右”還有“情緒”，他回答：“對於 1957 年被劃為右派的事，我早已想通了。這是無法避免的悲劇，不是毛澤東，也會有另一個別人來完成它。所以無論對毛主席、當年直接把我定為右派的人或共產黨，我都不抱埋怨情緒。有沒有埋怨情緒呢？有的，那是另一種情緒：當我聽到看到黨內為謀求私利而結黨為惡、違法亂紀、巧取豪奪之輩踐踏國法黨紀，殘害無辜一類行徑時，我常情不自禁地要去干預，恨不得立即把這些醜人醜事公之於眾。我的心情可能有些

偏激，工作方法可能失之粗糙，這才是我的問題。”胡耀邦看了回信，比較滿意。他想給賓雁回信，但是不敢——因為劉賓雁是個所謂的“爭議人物”，和他直接來往怕被人抓住小辮子。所以，他於當年 8 月 23 日寫了封信給周揚和賀敬之，再讓他們轉達給賓雁。以胡耀邦位置之尊，尚且如此謹小慎微，可見“高層政治生活”的氣氛是如何緊張。胡耀邦的覆信內容如下：

“周揚、敬之同志並績偉同志：賓雁同志這信，我今天才看到。現轉給你們。我相信他對自己的解剖是誠實的。任何一個同志只要善於總結經驗，都能為黨為人民發出更多的光和熱。個別地方我有點不同意見，在信上批了一點話。請績偉同志就便代我向他致意。”

其次，從中可以看到體制內改革派的弱點。

體制內改革派也可稱為黨內民主派，原本只是作為一種因子在黨內隱性存在，在粉碎“四人幫”以前並未形成一種顯性的力量（像張志新一樣明確提出民主要求的黨員只以個人身份出現，且大多遭到鎮壓），在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中，他們和社會上體制外的民主力量還只是作為潛在的背景力量發揮著作用。而粉碎“四人幫”是一次由黨內反對“文革”的保守派主導的宮廷政變（這從政變的主要決策者和參加者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王震等的名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們本身還基本上是毛澤東主義的信奉者），體制內的改革派和社會上的民主力量這時還隱藏在街頭敲鑼打鼓支持這次政變的民眾之中。體制內改革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其標誌是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問題大討論”，矛頭直指統治全黨 37 年（從 1942 年延安整風算起）、覆

蓋全國 30 年的“毛澤東思想”，而改革的旗手和設計師顯然是胡耀邦而非後來貪天之功為己有的鄧小平。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揭幕人，胡耀邦的歷史功績不可磨滅，但是從他提出的第一個口號“撥亂反正”中就留下了一個可做各種解釋的漏洞——粉碎“四人幫”後，尚未“解放”的胡耀邦向葉劍英獻上“隆中三策”：“中興偉業，人心為上。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深受葉帥賞識，這成了他不久受到重用的依據。後來這“三策”又加上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構成了“撥亂反正”的主要內容。“撥文化大革命之亂”固然不錯，也是黨內外各派力量的共識，但“反正”返到哪裡去，則大有文章和爭議。以陳雲為代表的黨內保守派主張，返回到“文革”前的 17 年去，即回到“毛澤東的正確思想路線”上去，這一派在黨內高層人數不少；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半保守派”則主張還要在經濟上突破蘇式的“計劃經濟”那一套，走“市場經濟”之路，但是在政治上卻要維護“黨領導一切”的“無產階級專政”架構，這就是後來的“四項基本原則”；胡耀邦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主張實行“全面的改革”，即不僅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還要同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這與體制外社會民主力量的要求（如魏京生的“五個現代化”）有了銜接點，這就埋下了與黨內以陳雲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半保守派相對抗的種子。

中國上世紀 80 年代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在目標模式上存在著重大分歧，這就注定了在粉碎“四人幫”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礎上實現的黨內各派與民眾的大聯合是非常脆弱和短暫的，上

下同聲、萬民同慶的“政治蜜月期”轉瞬即逝，而新的鬥爭將不可避免地到來，並隨時有發展為激烈對抗的可能。應該說，劉賓雁是沒有被“政治蜜月”的炫目光彩遮住眼睛，最早預感到這種危險的“先知”者之一，他堅定地選擇了站在體制內和體制外徹底改革派的立場上，迎險而上，與改革同存亡共命運，這是他見識高明之處和道德高尚之顯現。

而體制內的改革派並非都具有如此的道德準備。在不可避免的鬥爭與對抗來臨時，當改革事業面臨著逆轉的危險關頭，體制內改革派，特別是它的領袖們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道德勇氣和魚死網破的鬥爭精神。對此，賓雁晚年曾有深刻的反省。他在 2001 年寫過一篇文章《往事二十年，非夢亦非煙》，就說過：胡耀邦和趙紫陽“很少主動藉助社會的力量，甚至黨內知識分子的力量。不是由於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就是對敵對一方的力量估計過低了”。所有中國改革的象徵性人物，沒有一個像戈爾巴喬夫一樣在決定關頭與體制公然決裂，從而給民眾樹起一面可以擁護和追隨的旗幟；更沒有一個敢像葉利欽一樣站到坦克上把鬥爭的內容訴諸民眾，把鬥爭勝負的決定權交給民眾，把體制內改革者和體制外改革者聯成一體，把改革變成一次全民的運動。靠運動民眾起家的共產黨已經失去了他們的看家本領，就像清末的八旗子弟失去騎馬彎弓的能力一樣。即使是其中的精英，他們生於體制內，敗於體制內，死於體制內，到死還在乎那面覆蓋在他們遺體上的黨旗。胡耀邦臨下台幾天被迫交出的違心檢查《我的表態》，趙紫陽在屠城前夜的廣場上流下的無奈眼淚，有的是失敗者的軟弱和頹唐，缺少的是改革前輩譚嗣同那種“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豪邁和決絕。

曾經佔領過道德制高點，在戰場和刑場上獻出過那麼多為心目中的真理（且不論那是否是真理）而視死如歸的道德英雄的這個黨，何以會變得如此荏弱和卑瑣？看來，權力真的是腐蝕人的，不僅腐蝕了那些有功名利祿之心的凡夫俗子，也腐蝕了最優秀的精英。僅此一端，就證明了這個黨已經老矣，不復有年輕時代的熱血豪情和生命力了。

恰恰在這一點上，賓雁肩負著十字架走上了道德的高峰，他沒有重演 1957 年第一次蒙難時曾有過的軟弱，沒有寫一份虛假的檢查，沒有說一句違心的懺悔之詞，更沒有向強權低頭“認罪”，反而藉此機會，擺脫了使他精神和思想受到多年束縛的體制羈絆，恢復了他一直尋求的精神自由，終於在 18 年的流亡中實現了自我道德完善和心靈淨化。如今，在他的墓碑上沒有鐮刀鐵錘之旗的覆蓋，卻有民眾不斷獻上的鮮花，他不僅“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應該說的話”，而且總算回到了他“應該去的地方”——他所摯愛的人民中間了，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其實，中國改革失敗的主要教訓就在這裡，而改革要取得成功的秘訣也在這裡：“訴諸民眾”是改革的唯一出路。雖然並不存在一個民粹主義者所幻想的“永遠正確”和“眼睛永遠是雪亮”的“人民”，人民群眾身上也有歷史留下的創傷和烙印，他們也經常會受到欺騙和利誘，但是，由於現實中國的基本矛盾就是掌握國家權力和社會財富的權貴資本與廣大人民利益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所以戰勝這個邪魔的真正力量還只能是民眾——不斷覺醒起來，開始認識到自身權利並逐漸學會維護這一權利的人民。當然，這個過程必然是漫長的。中國民眾的民主運動也需要逐漸成長和成熟，在很

長時間裡這個運動一直依附於體制上，還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和旗幟，也在不斷犯一些不可避免的幼稚錯誤，1957 年是借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機會發聲，1966 年是在“奉旨造反”的旗號下曲線提出朦朧的民主訴求“巴黎公社原則”，1976 年是在悼念周恩來的葬禮上以中共不能否認的“四個現代化”為要求顯示民眾的力量，1979 年是在呼喚鄧小平復出的同時提出附加的民主口號“第五個現代化”，直到 1986 年的學潮還是希望共產黨通過改革而重返青春，即使 1989 年的學潮也還是以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下反對腐敗和呼籲改革開始的……只有到了“六四”屠城以後，民眾民主運動才有了自己獨立的綱領、口號和旗幟。 這個漫長的過程既說明了民主的種子一直沒有死滅，也說明了民眾覺醒的艱難。

體制內的改革力量固然重要，特別在他們是唯一有組織力量的時候，但教訓是，如果他們僅僅選擇“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徑，而不與“自下而上”的民間改革要求和改革力量結合起來的話，他們的改革是必然要失敗的，因為在既得利益的權力圈內他們永遠是少數的異類。 他們想要成為大力神安泰就只有立足於大地，否則只能像罕見的白烏鴉一樣被眾多的黑烏鴉啄死。 不能說胡耀邦對改革遭到逆轉的可能性完全沒有警惕。“文革”結束，改革初始，很多人就憂心忡忡地提出了一個問題：“文革”會不會捲土重來？“四人幫”一類政治野心家會不會再出現？當時，胡耀邦明確回答：“‘四人幫’捲土重來是不可能的，但借屍還魂還是可能的。”這句話成為當時流行的名言。 然而，如何防止這類“借屍還魂”的現象發生，他並沒有給出正確的答案。 他過於迷信“體制內的健康力量”，而沒有看到，這種危險恰恰是一黨專政的體制所產生的。 不受法律限制和

民眾監督的極權專制制度正是野心家、陰謀家和獨裁者叢生的沃土，只要這個體制繼續存在，中國就無法擺脫不斷發生彌散性腐敗和災難性動亂的厄運。唯一的解藥是從體制外汲取力量，把“公民權利”的大旗豎立起來，讓權力處於有責有權的“公民”的有效監督之下，通過群眾性的民主運動逐漸建立憲政民主制度，把權力裝進法制的籠子，從而終結惡的循環。

而胡耀邦和其他改革領袖儘管有民主思想和願望，但是卻沒有走出高牆融入民眾的決心與魄力。他們連自己身邊的改革力量都沒有能力或沒有盡力保護好，更不用說對下面要求改革和支持改革的普通幹部群眾了。例如胡耀邦在最終下台前前，曾眼睜睜地看著改革的理論家郭羅基（北大教授，哲學家，後被發配到南京與胡耀邦隔離）、阮銘（曾任胡耀邦的理論助手，後被開除黨籍）、李洪林（曾任中宣部理論局局長，後被禁止發聲）、胡績偉（《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後被趕出報社）和項南（福建省委書記，後被撤免）等人一個個被整肅，他卻手足無措，愛莫能助。劉賓雁曾痛心地說過：“胡耀邦很少能保護住他應該保護的人。”當他羽翼被剪光後，自己也難免要成為下一個整肅對象了。此時，他原本還有個最後的選擇，就是把一切分歧和鬥爭都公開在民眾面前，讓民眾來決定是非結果。但是，這需要一個勇敢而大膽的思想超越和對身家性命的捨棄，可惜的是，多年的體制內生存使他已經失去了實現這一超越的能力。他和後來的趙紫陽只能隔著中南海的高牆，望著牆外的洶湧人海而“望洋興嘆”，束手待斃了。

當然，這也不能完全怨胡趙個人，中共並沒有一套容忍不同思想派系存在和進行合法辯論鬥爭的民主性機制，反而有一整套專制

黨魁制定的進行所謂“路線鬥爭”的規則和潛規則，其中一條“鐵的紀律”就是嚴格禁止有不同意見的人到圈子外的民眾中去尋求支持，這是所謂“列寧主義建黨原則”所絕對不能容忍的“反黨”行為，來自民眾的支持往往只能使體制內的異見人士處境更加凶險，下場更加悲慘。朱厚澤後來評價：“胡耀邦是在傳統體制內試圖突破這個體制、但又不違背‘規則’的最后一人。”這是深刻而公允之論。體制內改革派的悲劇固然是因為保守派力量的強大和專制主義政黨的殘酷本性所決定的，但也和改革者自身的軟弱和脫離民眾的歷史局限性分不開。”

儘管胡耀邦的幾次批評曾經給劉賓雁帶來不小的壓力，但賓雁從來沒有埋怨過。他不僅設身處地理解耀邦處境的困難，還把每次對自己的批評當成蠡測中南海內政治動向的寒暑表。他知道，胡耀邦對他的批評並非出自本意，而是壓力的結果。每當耀邦不得不說幾句言不由衷的批評話，一定是保守派們大舉進攻之時。這兩個迴避私下接觸的朋友和戰友是遙相關注、心息相通的。這種在紅色恐怖下幾乎沒有公開表達機會的特殊情誼自有動人之處。

2005 年，胡耀邦 90 冥壽時，海外華人在紐約召開了一次名為“人民心中的胡耀邦”追思會，當時劉賓雁已經癌症轉移到肝臟，進入了生命的最後階段。會議的組織者請他寫一篇書面發言，但聽說病情後又收回了這個要求，讓他安心治療。沒想到開會時，竟然收到了劉賓雁一篇 6000 字的長文《孤獨的胡耀邦》。這是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小雁記錄的。這篇文章寫於 2005 年 10 月 30 日，是劉賓雁去世前的最後一篇文章。朱洪告訴大家，賓雁說：“別的東西可以不寫，這篇一定要寫！”他對胡耀邦的這種真摯感情讓大家

十分感動。

劉賓雁一生對胡耀邦有高度的評價，說他是中共體制內最有人道主義和民主思想的領導人，是少數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沒有整過人，雙手基本上是乾淨的好人，是中共領導人中最尊重知識分子的一個。他在平反冤假錯案、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啟動改革開放事業方面對歷史的貢獻不可磨滅。從來不願恭維權力的賓雁這些評價是真誠的。他不是沒有看到胡耀邦的缺點，但缺手斷腳的維納斯也仍然是美的極致啊。

而胡耀邦心底裡對劉賓雁的真實評價是："劉賓雁這個人能夠成為一個大作家。"他不止對一個人說過這句話，當然是在私下裡。可見他是知道賓雁的價值並從心底裡讚許賓雁的才華和勇氣的。（見胡績偉的文章《胡耀邦與劉賓雁》）

不管胡耀邦多麼小心謹慎，尋找一切機會攻擊他的保守派早就把劉賓雁和胡耀邦聯繫在一起了。1985 年 4 月，哈佛大學邀請賓雁前去講學，但未獲批准。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勛對賓雁解釋說："你不去美國，是我的意思。那個活動時間太長，你難免要在外面講話，報紙上給你一歪曲，國內那些人又要做文章了。你們這些人出點什麼事，他們都記到胡耀邦的賬上，他們認為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護傘。"果然，一年多以後胡耀邦被迫下台的最主要罪狀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和"保護自由化分子"，而劉賓雁終於成了胡耀邦下台的陪綁者之一。

每個人的人生都可用一個曲線來顯示，雖然不在一個平面上，但胡耀邦和劉賓雁在 1949 年以後的人生曲線基本上是重合的。胡耀邦的曲線在 50 年代上升時，劉賓雁正在中國新聞界和文學界

初露頭角；劉賓雁戴上“右派”帽子被打入谷底時，胡耀邦也在不久後遭到西北局劉瀾濤一夥的苦整；“文革”中他們一起挨鬥，一起下放幹校；粉碎“四人幫”後他們先後復出，都在 80 年代達到了人生的頂點；1987 年 1 月，他們又一起再次蒙難：一個被宮廷政變掀下台，一個被二次開除黨籍……這種命運的共同性決定了他們是真正的志同道合者。

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的命運曲線又和中華民族的曲線高度吻合，凡人民遭難時，他們也都蒙難：凡國家命運出現希望的曙光時，他們都迎著希望之光走上歷史大舞台的中心。他們都沒有在人民受難時飛黃騰達，沒有在群魔亂舞的年代同流合汙。直到最後，耀邦還用自己的生命喚起了一場空前規模的群眾民主運動，賓雁則用 18 年的流亡與人民共度了最黑暗的年月……他們的曲線都伴著歷史的波濤起舞，隨著人民的喜怒哀樂浮沉，這才叫“同呼吸共命運”。

任何葬禮上的悼詞都不如這條躍動的曲線更能證明他們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改革失敗了，他們也與改革一同走下舞台，並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道德的完善，成了悲劇英雄。這是體制內改革者所能得到的最好結局了。

1986 年 12 月 30 日上午鄧小平在自己家中召見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談話，狠批胡耀邦，並決定將劉賓雁等人開除黨籍的前兩天，劉賓雁剛好得到一個機會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

那是 12 月 28 日晚，中國作協在首都體育館舉行了一場名為《你們——我們》的作家與讀者聯歡晚會。這個晚會的總導演是作家張辛欣，一批著名的作家出台與讀者見面，並各自朗誦一段自己

的作品。這是個很新穎的創意，然而在當時卻顯得不合時宜，因為北京的這個年尾氣氛詭秘而恐怖，學潮還在各大學中蔓延，“胡耀邦要下台了”，“劉賓雁要被開除黨籍了”的傳言不脛而走，人人都感到有大事要發生。原來安排好要出台的作家中有人表示要退出，因為“這時候怎麼能和劉賓雁綁在一起？”總導演張辛欣發現現場也出現了異常情況，原來給作家準備的席位被一些著裝整齊的人佔領了，張辛欣憤怒地要求他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們卻動也不動，懶洋洋地回答：“你找我們師長說去。”原來這是一群便衣軍警，編制有整整一個師！而文學作品最重要的讀者大學生有很多被攔在入口外，准許入場的多是公安學校的學生。

張辛欣給劉賓雁安排的節目是朗誦報告文學《沒上銀幕的故事》中的一段，這是賓雁當年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作品，內容是寫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吳天明銳意改革的事跡。這是賓雁作品中比較溫和、不致激怒當局的一篇，是張辛欣精心挑選出來的。按照計劃書，賓雁的朗誦時間是 13 分鐘。他掐著手錶練習了幾次，就去找張辛欣，說實在無法在 13 分鐘內完成朗誦。張辛欣只是看著賓雁的眼睛，什麼也沒有說。

後來她在回憶錄中寫道，她當時沒說出來的話是：“賓雁啊賓雁，過完這個夜晚，到明天早上，這個土地上就再也沒有你的聲音了，誰在乎今晚你說多久？你願意說多久就說多久吧！”

轉身走進化妝室，悲憤的張辛欣一腳把門踹上，對著一群為演出報酬而吵吵鬧鬧的演員大發雷霆：“你們知道今天晚上是什麼日子？你們知道現在外面坐著什麼人？你們知道現場坐著一個師的警察嗎？觀眾席裡有大學生，演員裡有劉賓雁！”她加重語氣說：“坐

在觀眾席裡的一萬八千人，可能不認識你，不認識我，但是人人都知道劉賓雁！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這個秘密到明天早晨就不存在了。我要說的秘密是——劉賓雁就要被開除黨籍了，而這一點也許連他自己都還不知道呢！”說到這裡，她眼裡閃著淚光，接著說：“現在，我把門打開，不想幹的，現在你就可以走出去！……剩下來的，條條是好漢，為了這唯一的夜晚，讓咱們一起努力實現它吧！不要等到明天早上你再對自己說，我真後悔當時沒盡全力！”她的發怒讓那些演員面面相覷，頓時安靜下來。

就在這種悲壯的氣氛中，賓雁在整個晚會結束前最後一個出場了。這是晚會的壓軸戲，也是許多人來這裡的目的。

此時，場上淨空，燈光熄滅，音樂停止，全場在黑暗中一片肅靜；

音響中傳出鐘錶的滴答聲，上萬的觀眾凝神屏息，傾聽著時間在一秒一秒地過去；

當這聲音也停止時，場上靜得沒有一點聲音；

——這時，聚光燈驟然亮起，集中在體育館中央的一個焦點上，劉賓雁就出現在那裡。周圍是一片空曠，只有燈光追著他的身影；

他緩緩地開始朗誦，那渾厚的男低音在體育館中迴響。人們靜靜地聽著，不去思考台詞的內容，只是傾聽著這個男子漢的聲音，曾經響徹中國大地，卻即將在這片土地上永遠消失的聲音；

這時，有不少人眼中閃著瑩瑩淚光，還有低低的啜泣聲……

賓雁後來回憶這個“唯一的夜晚”時說，他當時真該喊一聲：“別了，我的讀者！”然而，讓張辛欣猜中了，那個四處風傳而即將

證實的消息當時只有他自己還不知道。

這是劉賓雁最後一次正式出現在中國大舞台上的身影，這是他向熱愛他作品的讀者們一次隆重的谢幕，也是他八年征戰的一個帶有濃重悲劇色彩的檢閱大典。感謝命運在執行政治死刑的前夜給了賓雁如此宏大的告別亮相機會，也感謝張辛欣冒著風險導演了這樣一幕動人的場景。賓雁從骨子裡就是個詩人，他用自己的整個生命寫下了一篇慷慨悲壯、氣壯山河的長詩，當然有資格得到這樣一個充滿詩意的輝煌告別式。

不是任何一個失敗的英雄都有機會享受到如此動人心魄的退場儀式的——中外傳統的死刑儀式上都給失敗者留有一個最後的表達機會，這是最不人道、最不文明的暴行中最人道、最文明的細節：基督耶穌在被釘上十字架時還可以發聲說出："上帝啊，原諒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聖女貞德在火刑柴堆點燃時還可以手持十字架進行最後的祈禱，中世紀的絞刑架前還允許受刑者發表臨終演說，法國大革命中的斷頭機前，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奈特因為踩了劊子手的腳還可以輕聲說一句："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而吉倫特派的沙龍主人羅曼夫人還可以說出寫進史冊的最後遺言："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即使在中國，曾經當過中共最高領導的瞿秋白在吃過豐盛的最後一餐（其中有他最喜歡吃的豆腐）後，劊子手還允許他自己挑選一塊綠色草坪當刑場，讓他盤腿坐在那裡從容地用俄文唱完一曲《國際歌》；就連阿Q在臨刑前的盛大遊行中還可以唱幾句"我手持鋼鞭將你打"，喊一聲"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唯有在當今中國的現代屠場上，才有勒緊喉嚨的細繩、撐滿口腔的彈簧和切斷喉管的附加

酷刑，以防止受刑人發出最後的聲音——勝利者並沒有道義上的自信，卻有超越古今中外的殘忍。

幾天以後，胡耀邦就下台了。他生前就沒有機會像賓雁一樣和他真心熱愛的人民舉行一次這樣隆重的告別式，官方對這位立下豐功偉績的改革英雄下台安排的是一場毫無人性的全國性批判和羞辱，他違心的檢查《我的表態》被印發全黨全國，以敗壞他的形象和聲譽——當然，在兩年以後，人民還是補償了這個遺憾，用天安門廣場上百萬人的盛大示威來為他做了最後的送行，但那畢竟是他無法親眼看到的，而那場告別式最後竟然演化為一場血流遍地的大屠殺了，耀邦如果英靈有知，該如何肝腸寸斷啊。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張辛欣：“1986 唯一的夜晚”中的劉賓雁

陳一諮：赤子之心——憶賓雁

劉賓雁：孤獨的胡耀邦

第十七章　黃鐘棄毀

中國人的歷史感往往不是來自對天際曙光的聯想，而是來自舊夢的反復重現。百年前“戊戌變法”時代的幽靈又浮現在人們眼前，斬斷殺伐的慈禧太后、瀛台被囚的光緒皇帝，以及慷慨捐軀的“六君子”似乎都在現實中找到了陰魂附體的替身，長安街上淋漓的鮮血也和百年前菜市口的碧血連成了一片，而包括賓雁在內長長的流亡隊伍似乎遙遙地跟在康有為、梁啟超之後……百年一個輪迴，這難道就是中國人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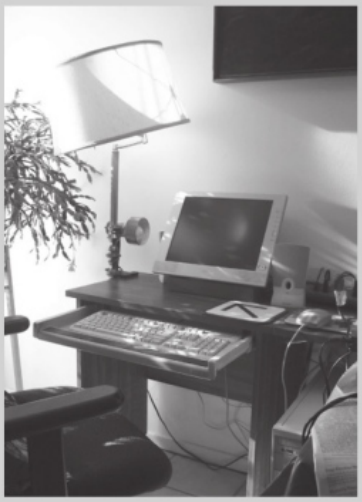
1990 年 5 月，美國三一學院授予賓雁博士學位。

劉賓雁曾經住在美國新澤西這個寧靜社區。

2001 年 4 月，劉賓雁搬了新家，終於有了自己的書房。

劉賓雁為自由亞洲電台做專欄節目所用的傳真機。

劉賓雁在美國新澤西東溫莎鎮這棟住宅裡，度過了生命最後五年時光。



這是劉賓雁在美國家中寫作的角落。

當中南海裡決定胡耀邦以及劉賓雁命運的會議召開時，劉賓雁已經不在北京。從元旦開始，學潮四起，上百萬的大學生走上街頭，高喊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這讓鄧小平、陳雲們如坐針氈，驚恐萬分。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北京城裡瀰漫著不祥的氣氛。

為了保住自己的發言權，不留授人以柄的口實，賓雁決定暫時離開北京。1 月 5 日，他和朱洪登上了飛往三亞的飛機，到陽光下的海灘去享受幾天難得的休閒——其實這只是颱風眼中的片刻寧靜，恰好在這一天，中央書記處會議做出了開除他黨籍的正式決定。

還沒來得及讓熱帶的太陽給皮膚鍍上一層褐色，1 月 10 日，當地文聯就轉來人民日報社的電話：“立即回話，有要事相告。”賓雁連忙回話，領導找不到，就接通了記者部的一個同事。電話裡傳來了那位朋友急促的聲音：“形勢非常嚴峻，非常嚴峻。2 號文件你還沒有聽說嗎？方勵之、王若望已被開除黨籍，你也差不多了……”這個“差不多了”是什麼意思？是不便直說，還是仍有迴旋餘地？這讓賓雁好費猜疑。反復想了半天，他覺得還是公開宣布開除的好，那樣，全國和全世界就都知道他今後的銷聲匿跡是怎麼回事了，否則，悄悄地消失，會讓人以為是自己因害怕而不敢再說話了。

其實，對這一天，他早有準備。八年前選擇這條路時，他就有上刀山下火海的決心，1982 年以後，看著站在改革前排的人一個個落馬，如哲學家郭羅基、作家白樺、詩人葉文福、評論家阮銘，以及人民日報社的領導和同事王若水、還有中宣部的理論家李洪林等等，賓雁就知道自己早晚也是這個下場。現在，他擔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這次逆流將有多大規模和勢頭，要牽涉的人有多少，地位有多

高，對改革事業的影響有多大……

當飛機在北京機場上降落時，賓雁才想到了自己：迎接自己的是什麼人呢？會不會是警察呢？

不是警察，而是報社新任的黨委書記許仲英、總編室的黨支部書記王庚南，還有賓雁的女兒小雁。報社還派來一輛麵包車——聽說要去接“老劉”，報社的司機們爭著要去。這種歡迎是賓雁多年外出歸來時沒有享受過的。他在感激的同時，又生出一種荒唐感：好像我是凱旋的戰士一樣。

取行李時還有個奇遇：一個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微笑著向他走來：“你是劉賓雁同志吧。”他伸出手來，自我介紹說：“我是從駐外使館回來度假的。”然後他正色說：“我們使館的同志們都很敬佩你。”他把這句話重複了幾遍。賓雁想，駐在外國的人，大概對國內情況不太瞭解。就暗示性地問：“2 號文件看到了嗎？”回答很爽快：“看到了。”最後，這個人說了句更讓賓雁吃驚的話：“祝早日獲得諾貝爾獎！”

女兒小雁向賓雁報告，連日來，向賓雁表示慰問和支持的電話不斷，還有不少並不熟識的人找上家來表達敬意，一些外國記者要求採訪。這些信息使賓雁深為感慨：中國變了，儘管上層沒有多大變化，還在堅持幾十年不變的專制統治，但是下面的基礎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人心大不一樣了。1957 年那種萬眾一腔討伐“右派”的局面已不復存在，上面和下面的聲音截然不同，完全對立。真正隔出“兩個中國”的不是台灣海峽，而是中南海的高牆。

報社黨委通知劉賓雁回來的目的是要辦理開除黨籍的手續。按中共黨章的規定，必須由該黨員所在的黨支部通過開除的決議，

然後交上級黨委批准。然而，報社黨委分別找賓雁所在支部的所有黨員談話時，90％的黨員反對開除劉賓雁，而且態度堅決，難以說服或壓服。於是，他們一直不敢召開支部大會，執行符合黨章的程序。後來，他們又想了一個辦法，想通過中國作家協會黨組來開除賓雁，但北京分管意識形態的市委副書記徐惟誠找了幾個作家黨員談話，反對開除賓雁的達半數以上，剩下的幾個還有拒絕表態的。這條路也走不通。

最後的開除決定是違反黨章規定的程序，由人民日報社紀委來出頭承擔這個責任。在這個過程中，賓雁獲得了兩次說話的機會，一次是 1 月 15 日，他在看了中央書記處的決定後發表了 45 分鐘的講話，聲明自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最忠誠的擁護者，有自己全部的言行可以作證；自己作品中所揭露的問題，都是黨應該解決的問題。而中央書記處的決定沒有列出開除的理由，是不嚴肅的，這使自己的申辯無法進行。這個強硬的聲明被錄下音來，直送中央。第二次是 1 月 22 日，賓雁又在報社紀委聽取最後陳述時對著錄音機發表了兩個小時的講話，並在開除決定上簽下了如下的意見：“開除程序完全違反黨章規定，開除決定從頭到尾是不實之詞。我保留黨章賦予我的全部申辯權利。”

劉賓雁注意到，這次被開除黨籍的過程與 1957 年有了很大不同，也與“文革”中審判者搥桌大喊的鬧劇不一樣。雖然人民日報社紀委執行了鄧小平的決定，但是面對劉賓雁時，所有參加者都面無表情，除了照本宣科地讀中央決定的文件以外，任何人也沒有“自選動作”，誰也不多說一句話，沒有義憤填膺、理直氣壯的譴責，更沒有舉拳高呼口號的場面，甚至沒有人敢於直視劉賓雁的眼睛。這

些人似乎都成了沒有感情和思想的機器人，一副例行公事、與己無關的樣子，誰也不想在這個過程中留下任何個人色彩——甚至在多年以後他們之中也沒人願意接受對當時情況的採訪，沒有一個人覺得充當這次精神死刑的劊子手是一種值得誇耀的榮譽。而劉賓雁長達幾小時的最後陳述沒有被打斷一次，全部被錄下音來，門外還停著一輛車，儀式完畢，錄音帶立即被直送中南海。此時，那些參與者們則像完成了一次骯髒的醜行一樣，低著頭匆匆四散。和他們相比，賓雁似乎更像一個勝利者。

如果說成功能夠充分展現一個人的才華，失敗則最能顯示一個人的文化人格。在賓雁鏗鏘有力的最後陳述中，歐洲騎士的高傲、俄羅斯貴族的尊嚴和中國儒俠的風骨依稀可見，作為一個失敗了的戰士，賓雁在中共的宗教裁判所法庭上以凜然正氣和人格力量使強權的勝利變得黯然失色。

第二天，也就是 1987 年 1 月 23 日晚，這一開除決定在電台、電視台向全國公開宣布了，《人民日報》第二天見報。賓雁注意到，CCTV 的新聞聯播中，播音員在念這個開除決定時表情和聲調都很平淡，全無“義憤”和“聲討”的激情。種種跡象都顯示著，這個強權還在頑固地作惡，但是他們已經底氣全無，無復當年那種一呼萬應的聲勢了。

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高牆內外兩種聲音的對立久久沒有消歇。

一方面，按照中共政治運動的慣例，官方媒體上開始了瘋狂的“大批判”，一本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的“反動言論摘編”發到全國，供“大批判”之用——但是很快又收回了，因為中宣部發

現這個材料作用不佳，有擴散“反動言論”之效。有不少人看了說：這三個人說得太好了，我怎麼早沒看到呢！這個“摘編”被收回後，複印件成了搶手貨，在黑市上賣到 40 元一本。

主持這場“大批判”的黨棍胡喬木說：“這三個人中，劉賓雁影響最大，也最難批。”為了徵集批判劉賓雁的文章，他們定出每千字 90 元的稿費（這是當時稿費標準的四倍半）外加每天 15 元的伙食標準，可就是招不來寫手。有的來了，卻拒絕在文章上署自己的真名——誰也不想把自己釘上恥辱柱。原定要舉行一次全國新聞界的批判會，但一再延期，因為很多被點名的單位和人員不願參加，上海《文匯報》躲不過，就派了個小青年來參加，這個人到了北京，交了一篇批判稿就跑了，找都找不回來。鄧力群還主持了一次“預演”，很不滿意，說發言者“怎麼就對劉賓雁恨不起來呢？”兩個星期後這個批判會勉強開了，但會上冷冷清清，會後罵聲四起。連胡喬木都說“這次批判是失敗的”。

黃鐘棄毀，瓦釜雷鳴。對批劉賓雁也有積極的，主要是那些曾被劉賓雁的報導點過名的地方和人物。最先發難的是賓雁祖籍所在的山東省，那裡的電台和報紙對賓雁當年回家鄉沂南採訪算後賬，說他“插手山東，破壞安定團結，遭到臨沂地區幹部堅決抵制”。凡是賓雁曾到過的省市都刮起了翻案風，很多被賓雁點名批評過的人跳出來，要求翻案，有的甚至聲言要到法院起訴劉賓雁；而許多曾因賓雁報導而獲得解放的人則再次受到迫害，有的被迫逃亡；曾經與賓雁合作過的記者，以及賓雁在報導中所表揚過的人，也都受到打擊和清算。例如，在黑龍江省陪同賓雁採訪王福錦案的青年記者楊萬霖就被加上了“劉賓雁在黑龍江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急先

鋒”的帽子，與賓雁合作《千秋功罪》的余以太也受到沉重的壓力，而《第二種忠誠》的主人公陳世忠雖然不是黨員，無法被開除黨籍，就在評職稱時給他顏色，拒絕他的副教授申請，不管他有多少專業成就。還有一些與賓雁沒有直接關係的人，也因為稱讚他的作品，同意劉賓雁的思想而被打成“劉賓雁分子”或“小劉賓雁”……在中國作家協會，則是有人在翻四次作代會的案，說劉賓雁被民主選舉為副主席是一場“陰謀”——所有的是非似乎在一夜之間都顛倒過來了。

與官方的“大批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民眾的態度。

在中央電視台宣布開除劉賓雁黨籍的那天晚上，一個報社的工人遇到賓雁，主動走近他，說了一句：“祝賀你，他們使你成為完人。”一封讀者來信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你完成了你自己。”這天從下午到晚上，賓雁家賓客不斷，總共有 27 個人先後來表示慰問和支持，其中有些是陌生人。

一位名叫魏青的溫州工人給賓雁寫來信，說：“用不著半點虛誇之詞，你是世界公認、當之無愧的當代中國最傑出、最難得、最深孚眾望的作家和記者之一……你突然被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鼓吹者’而被開除出黨，對此，一切未喪失理性和正義感的公民，都感到極大的痛心和遺憾，人們都表示憤慨、不平，對你表示深切的慰問……賓雁同志，僅此一點，就足以教你欣慰終生啊。”他還署真名寫了一封信直接發給鄧小平，對此提出嚴正的抗議。

一位“您的忠實讀者”寫道：“您是一位大寫的人，您是一個忠實的記者，您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您在中國擁有最廣大的讀者。您，是誰也傷害不了的——不管他是誰！我要看您的作品！我要

看！！我要看！！！”

一個叫李勇的年輕人在信中說：“由於‘大人物’的一句話，就使你受到批判、整肅。這種做法是極為粗暴的，是扣帽子、打棍子的再現，是歷史的倒退。賓雁同志，你要咬牙堅持住，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而一個名叫黃顯曠的貴州農村小學教師則在信中宣布：“劉賓雁的被開除黨籍更增加了我不入黨的決心。”

蘭州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姓張的幹部來信中宣布：“我都您的主張和言論是同意的，您的感受與我的感受是一樣的。‘精神汙染’、‘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名詞的發明至少說明我們的黨、我們的社會還處在一種病態之中。”

海南一個潛水艇上的水兵寫道：“我連看兩遍《劉賓雁言論摘編》（他省略了“反動”二字），可這份材料未能達到它的效果，本來看你的‘反動言論’，好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讀後卻使我掩卷深思，一聲長嘆，心中為您鳴起不平來。憑我的感覺，凡看過這份材料，能咀嚼出味的讀者，都會對您表示同情，對您為民說了許多心裡話，表示誠摯的謝意。”

重慶北碚一位讀者的信中說：“……這不是您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劇。請您到我們這裡來，我們將為您和您的一家，提供居住條件和一切生活費用。我們會想方設法賺錢來滿足您的一切生活之必須。如果您將要進監獄或某一勞改農場，請告通訊地址，我們將按月寄送 50 元生活費用，家屬的地址也望一併告知，一切有我們照顧。”

安徽懷寧一位中學生的來信說：“我曾經對同學們說，將來長

大了要當劉賓雁那樣的記者，現在您遭到不幸了，我還要這樣說。”

……

表示慰勉、聲援和抗議的來信、電報和電話便像開閘的洪流一樣洶湧而來。無數素不相識的工人、學生、知識分子、農民和軍人都爭相表達對賓雁的支持。有人猜測他將要入獄，就承諾以後每月從工資中抽出 50 元來補貼賓雁的家庭，有人提出要把賓雁一家接去供養起來，還有香港的企業家和旅居澳大利亞的華僑願意出重金資助賓雁今後的生活和寫作。還有為上夜班的工人，下班後直接上火車來到北京，到了劉賓雁家，沒進門就問賓雁的情況，知道他並沒有入獄，說了聲“保重”扭頭便走。美國著名記者索爾茲伯里來到中國，反復要求見見劉賓雁，見面時他拉著賓雁的手說：“我就是要看看你這個人還在不在”……

新聞界和文學界基本是用消極和沉默來對付這次“大批判”的。其中傳為美談的是文學理論最權威的刊物《文學評論》。1987 年第一期的刊物上原來有賓雁的一篇小文章，文章被撕掉了以後，英文目錄上用墨筆塗成一塊醜陋的黑塊，而文章的結尾因轉到它頁而無法剪掉。這引起了上司中國社會科學院官員的震怒。他們要求《文學評論》發表批判劉賓雁的文章，但主編劉再復用遞上辭呈的行動拒絕了這個要求，這份刊物終於沒有發表一個字批判劉賓雁。儘管後來劉賓雁與劉再復在一些问题上觀點上有分歧，並有過朋友式的爭論（如對劉再復提出“告別革命”的商榷），但對劉再復在這次“大批判”中的表現還是認為可圈可點的。

在逆流洶湧而來的時候，仍有敢於公開站出來支持劉賓雁的勇士，陝西的李貴仁就是一個。這位 80 年代初畢業的中國人民大學

文藝學研究生是《人妖之間》熱烈的推崇者和研究者，從那時他就結識了賓雁。整個 80 年代，他一直注視著賓雁的寫作歷程。當他聽到賓雁被第二次被開除黨籍的消息後，想要以行動來表示對賓雁的支持和援助——他時任陝西華岳文藝出版社的副主編，決定在這時出版一本賓雁的報告文學選集，書名曰《關於不會說假話的中國人的故事》，文章請賓雁的女兒劉小雁選編，李貴仁親自為這本書寫了序言《歷史無情　歷史有情》。這本書居然在賓雁被開除的半年多以後出版——這的確是個頂風逆流、大義大勇的壯烈之舉。這位勇士在“六四”以後被捕，遭到八年囹圄之難。流亡中的賓雁一直關切地打聽他在獄中的消息，並為營救他多方奔走，聽說他出獄後就託人送來了慰問信。

賓雁在《自傳》中說：“這一生中，我因受難而得到過別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過人們的祝賀。我蒙受過最大的屈辱，也享受過極高的榮譽。今天，我卻同時經受著這兩種東西，這時從未有過的體驗。這時幸福嗎？是的。我應感到幸運，因為只有極少數的人有緣得到這種享受。”

在這洶湧的感情洪流中，最讓賓雁感動的是莫逆之友、忘年之交趙越勝的一封來信，隨信還寄來一本周國平的著作《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來信勸慰賓雁：“一個敢於把自己黨內最優秀的人開除的黨，一定是在自掘墳墓，我們又有什麼可急的呢？……時代要你成為大慈大悲大勇大智的活佛。天下事、人間事有何不能溶而化之、包而藏之者？”還用嵇康臨刑彈奏《廣陵散》的典故，激勵賓雁將自身榮辱置之度外；用尼采笔下的“超人”查拉圖斯拉特精神撫慰賓雁的心靈。來信最後說：“我愛你至深，此刻更覺心

痛。但硬漢子死了算，活著就只是為肩著大痛苦，大悲哀，這時你老劉的命運，天命。你受難了，但別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難。基督死前只大喊一聲‘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苦難的民族從來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難，你替全民族受難……”

讀了這封信，賓雁熱淚如泉涌——這是在被第二次開除黨籍時他唯一的一次流淚。但是，賓雁並沒有當面向越勝表達自己的感動和感謝——“男人之間只交換思想和匕首，不交換同情和關愛”，趙越勝是如此解讀這種男子漢的矜持和沉默的，他確是賓雁的知音。

曾经两次遭受開除之懲的劉賓雁，從兩次落難後不同境遇的鮮明對比中真切地感受到歷史前進的腳步。這在他心中喚起了一種希望：這種“倒春寒”的逆流應該不會長久，他總不會再忍受22年的寒冬了吧。他樂觀地預測，半年會有一小變，不出三年形勢當有大變。在覺醒的民眾的強大壓力下，大地回春的那一天並不久遠。他心平氣靜地把這次下馬當成一次身體休整和思想充電的機會，準備用三年的讀書來熬過生命的寒冬，迎接未來的使命。

應該說賓雁的樂觀預測對了一半：半年多以後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果然出現了轉機，“左王”鄧力群取胡耀邦而代之的美夢被跌得粉碎，本來只是橡皮圖章的選舉竟然反常地發揮了作用，在連續兩次落選後，這個野心勃勃的政客不光彩地被淘汰出局（他先是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落選，又在中央候補委員選舉中落選，接著又在選中顧委常委時被淘汰，可謂一敗到底），而另一個改革大將趙紫陽接手了總書記的地位，這讓賓雁心中又升起了一線希望——僅僅是一線希望而已，隨之而來的是新的擔憂。他知道，那個權傾一切

的“攝政王”鄧小平還在幕後操控著大局，這個新的總書記命運會比胡耀邦好點嗎？難說。

不用等三年，兩年後隨著胡耀邦突然去世，一場空前規模的群眾性民主運動就在北京的中心天安門廣場點燃，並以雷霆萬鈞之勢席捲了整個中國，這也在賓雁的預料之中。這個民眾自發的民主運動是對 1986 年底到 1987 年導致胡耀邦下台和劉賓雁等人被開除黨籍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逆流的直接回擊，也確實為中國的民主改革和社會進步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如果當局抓住這個機會，依托民眾的力量開始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改革，中國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並成為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民主改革的領頭羊。然而，這種可能性並沒有變成現實，鄧小平用鐵血手段使中國的希望淹沒在屠城的血泊中，繼胡耀邦之後，中國體制內的另一個改革領袖趙紫陽也應聲落馬，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而黑暗的時空隧道……這個結果是賓雁和幾乎所有的人都沒有預見到的。

在這場風暴來臨前，賓雁已基本上在中國的舞台上銷聲匿跡。一場並不成功的“大批判”在喧囂鼓譟一番之後灰溜溜地收場了，但同時億萬讀者熟悉的記者和作家劉賓雁的名字也隨之在媒體上消失，他的作品從書店裡被撤架，載有他的文字的十幾家刊物未來得及發行就被封存銷毀。這個一向以效率低下而被人詬病的政權唯獨在這方面表現出了高效率。想讓一個大活人從人間蒸發他們都做得到，而讓他的名字在公眾視野中消失只是小菜一碟。

最明顯的變化是在《人民日報》的傳達室。過去每天在這裡等待見劉賓雁的上訪者排成長隊，而現在則冷清了許多，門可羅雀。賓雁家中原來總是賓客盈門，現在也悄無聲息了。

時光似乎倒流了，賓雁一夜之間又回到了八年前沒有摘掉“右派”帽子的原点，面對的還是那個共產黨，還是那個專制社會，還是那個相似的罪名，還是被掃地出門的寂寞。不同的是雙鬢已經生出了根根白髮，心中充塞着八年征戰的硝煙，還有像拳擊手走出賽場後那種問心無愧的疲憊和平靜——我來過了，我盡力戰鬥過了，我有理由和權利享受戰士走出戰場後的寧靜休閒了。

賓雁用一根繩子牽著一輛三輪小童車，上面坐著他的小孫子冬冬，在北京的馬路上慢悠悠地走著，祖孫二人隨意地聊著天，這是多年來賓雁家庭中沒有過的溫馨場景。小冬冬比他父親大洪幸福，大洪小時候就很少享受過這樣的父愛；賓雁也感到一種還債的欣慰，幾年來他還從未有時間和小孫子如此親近過。就在這些日子裡，賓雁還當上了外祖父，小雁生了個兒子淘淘，胖胖的淘淘也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安慰和面對逆境的力量。

凡是見到過這一情景的熟人都難免產生一種難以言說的感慨，一方面，看到這位叱吒風雲的鬥士被逐出戰場，成了含飴弄孫的街頭老人，不禁悲從心生；另一方面，看到他總算有機會享受天倫之樂了，又感到一絲安慰。

然而，賓雁這種寂寞中的安寧卻讓有些人不舒服了。一道通知傳來，要求劉賓雁去出席一些官方精心安排的公開儀式——他們要通過這些儀式向世界證明，雖然賓雁被開除了黨籍，清除出了記者隊伍，作品被禁止發表，言論自由也被剝奪了，但是，他還活著，還有人身自由，就像方勵之還可以作他的天文學講座一樣，這說明共產黨還是講人道的。虛僞！徹頭徹尾的僞善，就像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澡堂一樣！賓雁憤怒而輕蔑地拒絕了這些僞善的表演，沒有出

席任何一次官方安排的露面，他不願意變成權力手中的玩偶和裝點門面的道具。

這期間，賓雁曾有幾次自願地出席過一些公開的活動。一次是 1987 年中國作協和北京作協分會組織的元宵節晚會，他想借機會見幾個作家好友。不料他的出現竟引起了轟動，熱烈的掌聲響起來，人們爭相和他握手，紛紛表示慰問。這讓當局十分尷尬和惱怒，事後怪罪到作協頭上。

還有一次是回天津耀華中學參加校慶。62 歲的賓雁渴望回到自己 20 歲時的舊戰場來尋找青春的足跡。儘管校方迫於壓力，已經從紀念冊上抹掉了賓雁的名字，但是他的到來也還成了校慶的焦點。現在的師生和當年的校友圍了上來，索要簽名、題詞，並爭相合影……看來，想把他從人們的心中刪除並不那麼容易，人心所發生的變化比社會表面的變化要大得多。

孔夫子在一生不得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之後，曾發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慨嘆。賓雁在自己的晚年度過了 18 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但這並非他自己的選擇。

與胡耀邦總書記被趕下台同時被開除黨籍的劉賓雁、方勵之和王若望等三人成了全世界媒體關注的新聞人物，他們被看作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代表和專制制度最新的犧牲品。經過美國著名記者哈里遜·索爾茲伯里的斡旋，當局終於批准了他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講學邀請。

1988 年 3 月，63 歲的劉賓雁登上了飛往美國的班機。

在乘車去機場的路上，他居然向送行的朋友們說起了腳下的這條路——這就是當年他頂著“右派”帽子，拉著大糞車走過無數

次的那條路。他沉浸在回憶中，說：“那車多沉啊，路多長啊，好像總也走不到頭。路上餓了，掏出懷裡揣著的小餅子，一會兒吃一口，不久就吃光了，可肚子還是餓……”說著說著，他眼裡噙滿了淚花。如今，架子車就要換上飛機了，但眼前的路就會平坦些嗎？

其實當時他並不想離開中國，他設想最好是給他一段時間，讓他到中國基層的一個縣去生活兩年，或者就到大興安岭去隱居——作為一個記者和作家，他不能離開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他也太需要實地瞭解中國底層人民的真實生活狀況了，而中國正在發生的劇烈而深刻的變化，正是他寫作靈感的不竭源泉。但是當時的中國哪有這樣自由生活和寫作的條件啊，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只能暫且先選擇出國了，因為在那裡他可以得到國內已經失去了的說話和寫作的自由。

此外，他還有個重要的計劃：在滯美期間，通過讀書看報和考察思考，把一個長期困擾他的問題搞清楚：馬克思主義到底錯在哪裡？該不該一股腦否定掉？對此，他已經有了些直覺性的思考，但還缺乏理論上的論證。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他還想利用國外的研究條件，認真考察一下蘇聯和東歐的經驗教訓，再看看西歐北歐民主社會主義的情況，從中找到一些解決中國問題可資借鑒的東西。一句話，他要把這次外出的機會當成思想和理論的充電，為自己將來的鬥爭尋找方向並積蓄能量。

賓雁臨行前，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為他送行，這次酒會最後變成了一場詩歌酬唱的雅集盛會。冒舒諶、楊憲益、史復、邵燕祥、畢朔望、袁鷹等人都奉上了情深意長的送行詩，從這些詩作中可以看出，不僅賓雁，連他的這些朋友們都把他的這次離國看成

是一次短期的旅行，過後他還要回來的。

“期年始踐乘桴約，平旦將回泛海裝。”（舒諿）

“歲值龍飛行路吉，天南海北任翱翔。”（楊憲益）

“他山應喜石攻玉，吾道莫愁弛又張。”（史復）

“行萬里期書兩卷，話一句抵法三章。

珍藏護牒莫遺失，中國男兒之遠方。”（邵燕祥）

“魯野萬竿誅慶父，玄都千樹憶劉郎。

陽關唱罷人何處？莽莽風濤有雁翔。”（袁鷹）

大家都指望中國的政治形勢不久就能由陰轉晴，改革事業也能“弛又張”，阻礙改革、迫害賓雁的罪魁“慶父”被誅之日，賓雁當能“平旦”而歸，帶著他從海外帶回的攻玉之石，繼續他在“莽莽風濤”中的飛翔。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惡化，這隻大雁一去難返，再也無緣落足他所眷戀的土地了，這些長亭驪歌竟成易水之音。

中國人的歷史感往往不是來自對天際曙光的聯想，而是來自舊夢的反復重現。中國的歷史像是一個由只會寫悲劇的三流作家書寫的蹩腳劇本，又由一個草台劇團來演出。他們有能力鋪排出種種戲劇矛盾和衝突的開頭，卻無力在劇情引向高潮時構想出一個高明的莎士比亞或布萊希特式的結局，於是只得按照陳舊的俗套，當大幕在喇叭嗩吶齊鳴鑼鼓高奏中落下時，一切又都要從頭開始，生旦淨末丑換一身行頭重新登場，老故事還要一次次重演下去。百年前“戊戌變法”時代的幽靈又浮現在人們眼前，斬斷殺伐的慈禧太后、瀛台被囚的光緒皇帝，以及慷慨捐軀的“六君子”似乎都在現實中找到了陰魂附體的替身，長安街上淋漓的鮮血也和百年前菜市口

的碧血連成了一片，而包括賓雁在內長長的流亡隊伍似乎遙遙地跟在康有為、梁啟超之後……

百年一個輪迴，這難道就是中國人的宿命？

然而，劉賓雁不是個歷史宿命論者和悲觀主義者，他相信“事在人為”，相信人的因素和偶然性在歷史上的作用，而不相信所謂的“定數”。他說過：“一切發生過的事，並非都是必然要發生的。眼下正在發生的事，也不都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絕不是自然界；人總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製造、接受或抵抗著各種歷史事件。”那種認為“歷史就必定是、也只能是這個模樣”的說法，“可以叫做‘懶漢哲學’或‘奴才哲學’。這種哲學，眼下正主宰著中國的現實，而幾十年後又會被認為是‘必定是、也只能是那樣’的歷史。但倘如是，記述和研究歷史就失去意義了。”（見 2002 年《爭鳴》上他的文章《撈回歷史記憶》）》這種積極的歷史觀支撐著他從來不放棄影響歷史進程的努力。

為期十年的中國改革時代在 1989 年 6 月 4 日畫上了句號，一場由重裝野戰軍對手無寸鐵的民眾實施的大屠殺為這場改革舉行了葬禮。隨著最後一位改革領袖趙紫陽被這場軍事政變廢黜，曾經主導十年改革的體制內改革派被逐出了中南海，中國共產黨與民眾曾經達成的“改革共識”從此破裂，社會各階層共享“改革紅利”的“蜜月期”也戛然而止，中國的希望又一次被淹沒在血泊中。

這最後一幕的慘烈情景，劉賓雁是在大洋彼岸的電視中看到的。據朱洪回憶，那天，賓雁原本安排要到紐約大學布法羅分校去演講，但在去機場的路上聽說了北京開始大屠殺的消息。到了布法羅，和學生們一起在電視上看了北京傳回的畫面，賓雁的眼淚和

學生們流在了一起，演講會變成了群情激憤的聲討會。當學生們開始為“六四”死難者捐款時，賓雁把大學給的演講費和報銷的機票費都投入了募捐箱。

在“八九”民主運動的高潮時期，從天安門廣場上曾經傳來過呼喚劉賓雁歸來的聲音，不少人（例如當時在廣場上的作家鄭義）就打來電話，希望這位在民間享有盛譽、有資格充當民眾領袖的民主鬥士從海外歸來。他也曾三次打點行裝準備回國，站到他早就期盼的民主運動的最前列。

這裡有個有意思的假設：假如，當年賓雁能夠及時趕回國內，會是怎麼個情況呢？毫無疑問，他的身影肯定會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他的性格、思想和一生經歷決定了那是他命定的位置。就像當年在國破家亡時他無可選擇地站到抗日救亡的隊伍中，1957 年他義不容辭地站在民主大潮的浪尖上一樣，這隻早就呼喚暴風雨的海燕只能翱翔在風暴的中心。而他在廣場上的出現肯定會成為一個焦點，以他在 80 年代改革風雲中的影響力和與胡耀邦共同蒙難的遭遇，他也許能使群龍無首的群眾運動找到一個重心。他的思想高度、人格力量和政治經驗，再加上他在民間所擁有的威望，可能會給運動注入一種理性的凝聚力，這是當時呼喚他歸來的人們所期望的。但是，他的出現能否改變最後的結局，卻無法設想，因為暴力鎮壓和流血已是鄧小平們的既定方針，而處於狂熱狀態的廣場民眾能否認同他的理性聲音，也是未知之數。很可能的結果是他將在廣場上用胸膛迎接橫掃過來的子彈，讓一腔熱血和學生們的血流淌在一處；或者是成為大屠殺後發布的“通緝令”上位列榜首的人物，他將作為這一重大事件中最有影響力的道德領袖和殉道者

寫進歷史。對此是無須懷疑的，他早就有做出這種犧牲的心理準備和道德準備，也早就在等著這一天了。

然而，這只是個“假設”，事實是急促響起的槍聲和急劇逆轉的形勢使他終於未能如願以歸。他只能隔著太平洋的浩渺煙波，心急如焚，熱淚縱橫地看著電視上傳出的血腥屠殺場面，並在海外媒體上發表聲明，憤怒譴責中共當局滅絕人性的暴行，向犧牲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崇高敬意。不能在 6 月 3 日那個黑色的日子裡和民眾手挽手地站在一起，血流在一處，成了他終生的遺憾。“六四”以後的一段時間裡，他作為這一民主運動在海外最有影響力的代言人之一，替那些因被屠殺、被囚禁、被通緝而失去聲音的人們發出了響亮的聲音。這是歷史的重託，也是他自願的選擇。由於這些表態，他和成千上萬的政治流亡者一樣，上了被驅逐者的黑名單，永生不得回國了。

1989 年 6 月，中國政府不准劉賓雁入境，護照過期也不予續簽。而中國作家協會以“請假逾期未歸”的理由，在未通知本人和家屬的情況下開除了他的公職，劉賓雁遭到了未經法律程序的永久性流放。

政治流亡者中流行的一句話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這對賓雁來說十分確切。他是一棵根植與中國土地上的大樹，流亡海外的 18 年，佔賓雁 80 年生命的將近 1/4，如果加上被戴上“右派”帽子的 22 年，正好佔他生命的一半。對一個作家來說，這本應是他思想和創作的成熟期和豐收季節，然而卻基本上被虛擲了。流放中，雖說他的人身獲得了自由，但是卻在他生命的黃金時代戛然中斷了他的報告文學創作，就像把大樹連根拔起，使他的枝葉無

可避免地要凋零一樣。

不錯，他還是個作家，但他是個調查記者式的作家，純靠想象和虛構來進行文學創作不是他所熟悉的方式和得心應手的武器。這些年中，雖然他還依然日日筆耕不輟，留下了多達幾百篇、字數近百萬的文字，但主要是些時事短評和回憶文章，以及給友人們的書信，而他最擅長的報告文學，則一篇也沒有寫——離開了每天都在發生急劇變化的中國土地，隔斷了與民眾的血肉聯繫，失去了觀察生活和感知社會脈動的機會，他還能“報告”什麼？

他仍然還是個出色的演講家，據他女兒劉小雁的不完全統計，流亡期間，他曾在北美、歐洲、香港等地做過七八十次演講，內容主要是對自己生平往事的回憶，和對中國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研究與思考，但是，離開了最想聽他的聲音，他也最想面對的中國聽眾，沒有了中國聽眾那凝視的目光和會意的共鳴，他的演講已經失去了往日那種轟動效應。恰如一個離開了中國舞台和聽眾的京劇名伶，不得不對著荒山深谷去吟唱西皮二黃時，那種悲愴與無奈，又有誰能體會？

他不僅是“失去了大地”，而且是失去了一個戰士致死也不願離開的戰場，這就使他得到的自由天空也黯然失色了。可以想象，流放中的賓雁不會比行吟汨羅江畔的三閭大夫心情好多少。當然，他會如屈原一樣堅信“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然而就像一切政治流亡者一樣，“固將愁苦而終窮”和“固將重昏而終身”的命運注定是無法躲避的，而像索爾仁尼琴那樣經多年流亡後，竟然有一天會以思想勝利者的身份凱旋故國的幸運，則至今仍是中國流亡者們難以實現的夢想。

劉賓雁去國之後大致上的行程是，1988 年 3 月至 6 月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分校的講學，然後去法國和西德訪問 3 個月；同年 9 月接受美國哈佛大學邀請，擔任尼曼（Nieman）新聞研究員。

1989 年至 1990 年，在美國康州三一學院擔任訪問學者。其間曾於 1989 年秋到德國柏林任 DAAD 基金會訪問作家，並訪問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專門研究蘇東民主運動的新發展。

1990 年夏，劉賓雁被三一學院授予名譽文學博士。

1990 年在美國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中心擔任訪問學者。

1991 年到 1996 年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和“中國學社”執委會委員。並獲得紐約言論自由基金會獎。

1994 年 3 月，劉賓雁到西班牙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了題為《中國的制度改革與文化重建》的論文。

1999 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亞太中心擔任訪問學者，同年擔任了“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藉助這個平台，他撰寫和發表了大量時政評論，其中絕大多數是評論中國所發生的事情。除此之外，他还特別關注拉丁美洲的形勢發展，其實這也是在為考慮中國問題找一個參照，因為他一直擔心中國會走上“拉美化的道路”——如智利、阿根廷一樣，極權專制會走向極致，導致一個更黑暗、更血腥的軍事獨裁時期（這種危險一直存在，即使到今天也是中國的夢魘），他雖然遠離故國，但心中所想的還是祖國的命運。

在 1992 至 1999 年期間，他創辦了英文月刊《China Focus》（中國焦點）並擔任主編，報導中國社會動態。

1993 至 1996 年間，他還創辦了中文月刊《大路》，其宗旨是

向中國大陸傳播新思想及世界民主化動態，但刊物能突破封鎖進入中國大陸的數量十分有限。

2002 年，這位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流亡者被選為海內外自由作家組成的“獨立中文筆會”的首任會長。

2003 年，劉賓雁獲得美國紐約人權觀察海爾曼·赫米特獎……

從這個簡單的編年中人們就可以看出，這位被迫流亡、有國難歸的遊子，並沒有在困境中消沉，也沒有另覓他徑，改弦更張，而是持守著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側耳傾聽著中國大地上傳來的每個細微的希望之聲，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托舉著祖國未來的希望。

流亡中的賓雁還是一個記者，一個中國記者，他的女兒小雁說，在他晚年的生活中最看重的是有人來訪，最好是有從國內來的客人。 到那時，他就會莊重地拿起一支筆和一個小本子，認真地記下來訪者帶來的國內信息，還不斷地提問，儼然像記者在採訪。 國內所發生的一切變化都讓他欣喜，或讓他焦慮，都會引起他的深思——大洋浩瀚的煙波擋不住他對祖國命運的關切目光。

他的兒子劉大洪在闊別八年後才於 1996 年到美國來探望父親。 他發現，父親在房前空地上開闢了一個小菜園，裡面種滿了北京人日常吃的蔬菜，如黃瓜、韭菜、豆角、青椒和西紅柿，其中頂花帶刺的北京黃瓜是父親餐桌上夏天不可缺少的一道美味——用如今流行的語式來說，他吃的不是黃瓜，而是北京的味道。 有朋友來訪，他就到菜園裡摘下新鮮的黃瓜，用報紙包好送給朋友，這是他最貴重的禮物。 對祖國，對北京的思念滲透在他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

在美國流亡的 18 年，儘管有了人身自由，生活條件也還安定，

但是，賓雁並未“樂不思蜀”。有好幾次，國內的朋友去看望他，進門就聽他說：“歡迎你來探監！”他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是個流放的囚犯。除了讀書和寫作以外，經常陪伴著他度過寂寞時光的只有朱洪、一個小孫子和一隻可愛的白色長毛小狗——這隻小狗在賓雁去世後不久也隨之而去了。

深知父親心事的小雁說，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能回到北京去，“即使能在馬路牙子上坐一會兒，跟一個老農民聊聊天，他就幸福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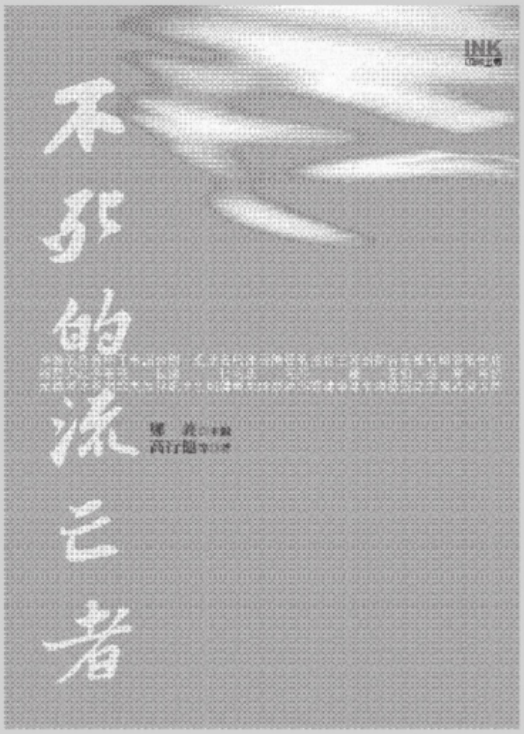
如今，“夢”突然變成了中國最流行的政治主題詞，為了應該做什麼樣的夢，當局又允許人們做什麼樣的夢，爆發了一場可笑而又可悲的大論爭——強權不僅要限制人們的行為思想，甚至要規範人們夜裡作的夢！賓雁晚年牽魂動魄的夢其實很簡單，就是能回到北京，再到馬路牙子上去坐一坐——那個他 16 歲就漂泊到古都，讀書時經常端著飯碗坐下來吃炒餅的馬路牙子；那個他在被打成“右派”後，拉著臭氣衝天的大糞車走累了，就坐下來休息一下的馬路牙子；那個遇到上訪告狀的難民，他就席地而坐，掏出小本子來進行採訪的馬路牙子；那個第二次蒙難後，他曾經拉著兒子的小三輪車，和大洪坐下來聊天的馬路牙子；那個在 1989 年曾留下坦克履帶的印痕和學生市民淋漓鮮血的馬路牙子……嗚呼！連這樣一個最不奢侈的夢，他竟然也無法實現。

宋代詩人楊萬里的詩句“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依然是中國現狀的寫照。而他這首絕句的後兩句“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還只是夢中情景，“萬山”似乎仍無盡頭，而“溪水出村”還不知要等到何時。

然而，賓雁就像個長夜不倦的守夜人，一直在星空中尋找著那顆遲早要升起的啟明星，直至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盛禹九：20 年漂泊喜重逢
李貴仁：人民心中永不熄滅的火炬



鄭義主編此書，
慶賀劉賓雁80壽辰。

第十八章　痛定思痛

賓雁最可貴的貢獻是，儘管他對“人民”的認識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他一生所說的一切和所作的一切，都是身體力行在為喚醒民眾的“存在自覺”和“權利自覺”而努力，他是“人權”最熱烈、最忠誠的呼喚者和保衛者，這是他最重要的遺產。從形式上看，賓雁是個失敗者，他被開除黨籍了，被封筆封口了，被逐出國門了，被拋屍異域了，但是歷史將證明他最終會是個勝利者——中國“公民社會”的先賢祠裡將有他尊貴的一席

許良英、胡佳、老鬼、嚴正學等在墓前合影。攝於 2013 年 8 月。

趙越勝每次回國，都會來看望老友劉賓雁。

邵燕祥夫婦來到墓前吊唁。

學者王康在賓雁墓前長跪不起。

新華社老記者戴煌回憶劉賓雁。

希臘神話中有个悲劇英雄叫西西弗斯，他因綁架死神，妄圖在人間消滅死亡而觸怒了眾神，遭到了嚴厲的懲罰——要求他把一塊巨石從山下推上山頂。這巨石實在太重了，每每未到山頂便滾下山，使他前功盡棄。於是他便一次次地從頭再來，永無休止地重複這無效又無望的苦役。幾代中國人付出慘重的代價，為爭取自由民主和社會進步所進行的長期鬥爭難道注定只是西西弗斯式的徒勞？都說有春花必有秋實，但為什麼我們的收穫季節總是遲遲不能來臨？賓雁和海內外期待變革的人們對中國的未來曾做出一次又一次的預測，但每次實現的結果總是各種可能中最壞的那一個，這是為什麼？

作家鄭義為賓雁的 80 壽辰準備了一份禮物：他所主編的《不死的流亡者》一書。賓雁把書贈給一位朋友，在扉頁上寫道："歸去的日子也許不遠了，但幾十年荒誕而神奇的歷史卻仍未結束。須知，我們知的不夠，想的也遠遠不足。我們的使命尚未完結，這首先需要一個清醒的頭腦和對過去的充分反思。"

反思 80 年代走過的道路，追索改革失敗的原因，是賓雁在流亡中一直在思考的問題，這個思考直到他臨終也沒有停止。

第一個原因明擺在那裡：中國改革面對的對手太強大和瘋狂了。這強大不僅來自於已成傳統的黨對國家專制機器的全面掌控，還來自於掌控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已經借"改革"之名暴發為一個新生的既得利益階級。現在人們對這個新的利益集團叫什麼名稱還沒有達成一致，有的叫"權貴資本集團"，有的叫"官僚資產階級"——不少人對把這個新生階級劃入"資產階級"範疇提出質疑，認為它們並不具有"資產階級"的正面屬性。劉軍寧先生就說：

“‘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是一個謊言，我只看到權貴，沒有看到資本主義。”

但人們有一個共識：都強調它們和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其實，這就是先知式思想家、理論家密洛凡·吉拉斯（一譯為德熱拉斯）所說的“共產主義新階級”。歷史上所有的階級都是先形成階級，有了經濟、政治的要求，再去謀取國家權力，這個“新階級”不同，它是一伙人（所謂“革命黨的核心集團”）先通過“革命”奪取了國家權力，然後依靠手中的權力掠奪社會的巨額財富（當然打的旗號是“國家所有”和“全民所有”），在這個過程中成長壯大為一個人數很少但控制了國家政治經濟命脈，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新階級”——以“消滅階級”為號召而開始的共產主義革命，最后却製造出了一個擁有空前權力和財富的龐然怪物“共產主義新階級”，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諷刺和嘲弄。

吉拉斯在他的名著《新階級》中描繪了這個“新階級”誕生的三個階段：以列寧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的英雄時代”，“新階級”在一夥“革命者”中萌芽；以斯大林為標誌的“偉大領袖時代”，“新階級”在此時形成並發展壯大；然後是後斯大林時代的“集體領導階段”，吉拉斯稱之為“現實人物的時代”，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常人政治時代”或“庸人統治時代”，這一時代的掌權人既無打江山時代的“英雄”色彩，也無坐江山“領袖”的權威地位，但他們所代表的“新階級”在這一階段已根深葉茂，成為一個由國家權力的實際壟斷者和社會財富的實際所有者組成的寡頭集團，名義上的掌權人只不過是它們的大管家、總經理和代表者（“三個代表”理論的真諦便在於此）而已。

吉拉斯說：“共產主義的英雄時代是過去了，共產主義偉大領袖的時代已經結束。現實人物的時代正在開始，新階級已經建立。如今它們在權力和財富方面正處於巔峰狀態；不過它缺少新觀念。它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向人民宣揚了。所剩下來的事，只是它為它自身辯護而已。”

他還著重指出：“在全部三個階段中，權力始終佔一重要地位。”“共產主義的真髓——權力——也由手段變成自身的目的。”到了第三階段，這一實質再也無法掩蓋了，“權力成為當代共產主義徹頭徹尾的化身”。

吉拉斯在上個世紀 50 年代初寫下的這些文字與當今中國的現實不是榫卯入扣、嚴絲合縫嗎？只是他還少說了一句：當這個“新階級”的統治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到挑戰時，他們會以法西斯式的瘋狂來捍衛自己的權力和既得利益。極權專制主義是它們唯一可能的選擇，而民主制度與它們的階級本性是格格不入的，儘管有時它們也會打出“民主”的旗號來騙人。

中國的“共產主義新階級”就是這樣幹的，如今它們已經進入了赤裸裸地捍衛手中權力的“第三階段”，不擇手段地鎮壓一切反抗的思想和行動於萌芽之中，而且在鎮壓時，根本不講法律，也不受道德約束——它可以無視任何人類共同的普世準則，也無視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包括萬法之本憲法）。在動用坦克機槍血洗京城後，更是有恃無恐，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不經司法程序就竊聽電話、阻斷網絡、監視居住、限制自由、秘密綁架、非法關押、刑訊逼供、製造僞證、枉法裁判，乃至私刑暗殺，人間蒸發，以及千奇百怪的“被車禍”、“被自殺”都已成家常便飯，最近甚至發出了要

“活埋”幾百人的恐怖威脅。這個階段的中國名稱是“維穩時代”，中國正在變成了特務橫行和警權無限擴張的國度，毛澤東所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已經被他們演繹到極致了。

共產黨所建立的政權機器曾經是孕育這個“新階級”的花盆，現在這個怪物已經大到要脹破花盆的地步了。共產黨的衰落和崩潰並非由外力所致，而是這種癌變的必然結果。蘇共和蘇聯的覆滅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它們的衍生物也都難逃這個命運——“重慶事件”只是中國劇變開始的信號，“異化”理論正在得到新的證明。

蘇聯和東歐制度轉型的過程基本是非暴力的，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流血，這是因為那裡的統治者大多數還遵守了一個道德底線：不能用民眾的鮮血染紅自己的椅子。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雖然參加了“八一九”政變，但是在關鍵時刻他並沒有給軍隊發子彈，軍隊和民眾發生對立後，他又下令軍人回到軍營去。為此，在他得到特赦後，普京還親自給他頒發了一枚勛章。東德的最後一任國防部長、國家人民軍總司令特奧多爾·霍夫曼簽署了將東德人民軍與西德國防軍合併的“最後一道命令”，他說：“社會內部體制的轉變，本不是人民軍的任務；軍隊也不應是黨和國家領導層對付內部矛盾、維持自身統治的工具。”這種道德底線是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政治文明的結晶，即使在马克思的故鄉，邪惡的“黨軍論”也不能掩蓋這文明之光。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是個例外，他企圖模仿中國“六四”的榜樣命令國防部長瓦西里·米利亞調集大軍來“恢復秩序”，但米利亞竟然以自殺拒絕了這個命令。他的死導致軍隊倒戈站到民眾一邊，將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夫婦送上了刑場——誰說“更無一個是男兒”，這才是真正“男兒”的選擇！而在

中國這個尚未進入現代文明而且公開拒絕普世文明的國度裡這是不可想象的，軍隊和整個暴力機器都是黨的工具這一列寧主義理論還被奉為核心理念。一切希望在中國實現和平轉型的人萬萬不能忘記這個最重要的“中國特色”——馬克思曾把中國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類型稱作“亞細亞方式”，以區別於歐洲的社會發展類型。這個獨特的類型當然有其不同的特點，其王朝更迭、社會轉型時的格外殘酷性就是其中之一，把吃人生番式的野蠻對手想象為一些文明人是個最大的錯誤。

中國歷來的統治者都是“權力拜物教”的忠實信徒，“權力至上”是他們的首要信條，林彪那句“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權就失去了一切”是他們共同的心經。鄧小平的所謂“四項基本原則”中，其他三項其實都是軟道理，可以做出多種解釋；唯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即把權力的寶座始終放在自己的屁股底下才是硬道理，絕無商量的餘地。當他們的權力受到挑戰時，暴力鎮壓是他們的第一反應，也是最後的選項，即使屍骨成山、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老軍頭王震在大鎮壓時居然說出“殺 20 萬人，保 20 年平安”這樣血腥的話來，這是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內很少有人敢想和敢說的。這種帶有原始野蠻性和殘酷性的執政理念，確實有“中國特色”，從秦始皇到成吉思汗等專制暴君那裡繼承來的嗜血基因，又加上了列寧斯大林的冰冷血脈。這就使中國非暴力和平演變的幻想碰上了一堵難以逾越的血牆。“六四屠城”和接踵而來的“暴力維穩”就是這一邏輯的必然結果。

與如此心毒手狠、老辣野蠻的強勁對手相比，黨內改革派一方則顯得太天真軟弱了。劉賓雁在去國十週年的時候曾寫過一篇文

章《毛澤東的另一半遺產》，其中說到：“我們只顧為每次‘反自由化運動’中途而廢沾沾自喜，而不知那並不表明我們強大，事實證明，對方的下一次反撲總是比前一次更強烈，而最後還是他們成功了。”他還做了這樣的對比：對方每做一件事，都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有準備的；而我們這一邊就是散兵遊勇，各自為戰，不成氣候。例如，1981 年春“批白樺”時，軍方發言的，每人手裡都拿著打印好的稿子，顯然是事先經過討論才定稿的；而我們這一方可就慘了，表情上就是一副挨打的樣子，沒有任何準備。他特別指出，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的領軍人物，生怕被指為搞“非組織活動”，一直不敢和知識界接觸，更不敢把問題訴諸民眾，而知識界與黨內進步人士之間也並無多少聯繫。以無組織無準備的力量與有組織有準備的對手較量，讓沒有任何法律保障權利的民眾面對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限制的無限權力，最後的勝負可想而知。道義的力量總是敗在暴力的強權面前，這是迄今為止的記錄，但這是永遠無法改寫的記錄嗎？

不僅如此，這個對手的強大還表現在他們有讓人吃驚的應變和適應能力。他們本來是改革的死敵，但到了屠城以後的 90 年代，他們又把“改革”的旗幟搶了過去，以“深化改革”的名義對已有的改革進行了反攻倒算，把零售式的“初級腐敗”上升為批發式的“高級腐敗”；把原來在桌子底下偷偷進行的盜竊變成了台面上的公開分贓，對國有資產和社會財富進行了明目張膽的鯨吞，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裡，速生了一個空前強大的官僚資本集團，這個“新階級”的核心是所謂的政治精英，在他們身邊的還有一群附生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他們的三角聯盟就是當今中國的統治力量。這導致了

社會觀念出現了一次雪崩般的大倒退。在 80 年代曾一度受到衝擊的“官本位”觀念，到 90 年代又全面回潮，官僚體系的權力和利益不但完好無損，而且比原來更強大了不知多少倍，還迅速擴展到經濟、文化、學術等一切領域，“官本位”又加上了“官商本位”、“官學本位”，甚至“官妓本位”——那個依傍數個有權有勢的“乾爹”而囂張一時、無所忌憚的“郭美美”就是典型。當年的“下海潮”變成了逆向的“當官熱”，考公務員成了大熱門，花錢買官成了一種時尚和公開的秘密。由這個權貴利益集團實行的專制極權統治，擁有超強的資源調動能力，不受任何監督和限制（這讓任何國家的統治者都艷羨不已），它可以用超過國防經費的“維穩費”來維持自己的統治，企圖用無限的暴力和無窮的金錢來建立一個超穩定的千年王國，甚至財大氣粗地推出了一個步老殖民主義後塵的“世界戰略”——這固然是個終將破滅的美夢，但要打破他們的美夢卻也並不那麼容易。中國的變革必須面對的是這樣一個強敵。

由此，劉賓雁又思考了另一個問題：中國知识分子的責任。

在《毛澤東的另一半遺產》這篇文章中，他寫道：“我終於發現，‘六四’之後對政局作出錯誤的樂觀估計，說到底是把人的因素看低了。”這個“人的因素”中，知識分子佔很重要的地位。賓雁認為，“八九民運”中，青年學生是主力，但是他們太年輕，有政治熱情但沒有政治經驗，不應對失敗負主要責任，主要責任應該由“年長的知識分子”，也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來承擔。

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特殊的作用——他們是中華文化“道統”的傳承者，備受尊崇的“天地君親師”中就有他們的一個席位。社會失序天下大亂時，“禮失求諸野”就是向他們來求

恢復之道。在中國近代的思想文化更新和社會轉型中，他們也曾起過巨大作用，他們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著和批判者，也是現代普世文明的引進者和傳播者。但是，自從中共政權建立後，中國知識分子遭到了比“焚書坑儒”更徹底的毀滅。

中國知識分子的毀滅和墮落有兩個關節點：一個是“反右”，經過此役，知識分子隊伍確實被打得七零八落，總體上已潰不成軍，後來的“文革”則是把戰場徹底地打掃乾淨了。當時，極端仇視知識分子的黨棍柯慶施說過一句惡毒而露骨的話：“知識分子就是一群斷了脊梁骨的癩皮狗。”除去其中仇恨的惡意外，這句話倒說出了一些真相。第二個關節點是“六四”，在用鐵血手段進行鎮壓的同時，當局還從“戰利品”中撥出巨資來收買和籠絡知識分子，以換取有良知者的沉默和無良知者的賣身，這一手法居然大見成效。在“六四”和“六四”以後，知識分子中的多數保持了怯懦的沉默，眼看著血花紛飛而抽身躲到一邊，而不敢發出一點抗議之聲；一些曾經發出過一兩聲呼喊的人後來也紛紛轉向倒戈，變換臉孔；更有些所謂精英高唱盛世頌歌，到盛滿血肉的權力之鼎中去分取一杯羹。除了少數堅持正義立場和道德底線的人之外，總體來說，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個歷史關頭的表現是不及格，沒有道義擔當和歷史責任感。

學養深厚的老知識人資中筠對中國知識分子現狀的描述是：“如果說，前 30 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為威武所屈，那麼現在有話語權的上層精英多為富貴（名利）所淫，而多數尚未站穩腳跟，忙於為稻粱謀者，則可以說是為貧賤所移。”而一部分所謂“文人”在“因頌聖而名利雙收中不但墮落到無恥的地步，而且已經超越了起碼的

人道底線”。這個概括是準確的。其實,吉拉斯對此早有先見之明:“一個遭受壓迫的心靈不得不被迫腐化。”

劉賓雁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沉痛的反思。他說:“我說過的錯話裡有一句是:‘苦難之樹一定會結出幸福之果’。20 年的歷史證明,受難者並不一定是這個果園的園丁。”這是他從知識分子隊伍在“反右”、“文革”和“六四”後的大潰散、大分化中悟出的道理。他說過,高壓可以使一些人變成鑽石,但也會使一些人成為粉末。夸父逐日般的真理追求,精衛填海式的不懈努力,九死不悔的犧牲精神,固然是中華文化中光照萬古的精華,但是,在幾千年的文化遺存中,也不乏機會主義、虛無主義、犬儒主義的糟粕。每當社會革命和改革失敗以後,這些殘渣都會洶湧泛起,瀰漫一時。退縮逃遁可以說成是參透世事、隱逸山林的浪漫,胯下之辱、唾面自乾可以說成是忍辱負重的深沉,而背棄良知、投靠強權則可以說成是深識時務的練達和與時俱進的機巧,一切怯懦卑鄙的醜行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說詞。對此,賓雁說:“我們人人心裡恐怕都有一塊秦始皇時代建造長城時的秦磚壓在那裡,又重又冷。”

賓雁在總結中國知識分子的大潰敗時說:“中國 90 年代的真正奇跡,不是經濟增長速度,而是在短短的十幾年內完成了歐洲中世紀結束後幾百年資本主義發展中對於人性、倫理、道德的破壞。”他還指出,“中國面臨的最大危險,就是在被破壞了的人性引導下的中國人的自我破壞或自我毀滅。一切阻礙私慾得逞的人,都是不擇手段、冷酷無情地毀壞的對象。同時,無所顧忌地毀壞自己和子孫後代的生存環境。”而面對這個空前的大破壞,作為文化和道德的承傳者,知識分子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因此應反躬自省。“中國

人確實有理由把中國土地上發生的一切禍害乃至自身精神、道德上的缺陷歸咎於中共五十年的統治。國人精神上許多問題在心理上的根是缺乏自愛自重，那也是長年極端貧困和政治壓迫造成的那種自輕自賤、自暴自棄狀態的產物。問題是為了改變中國的現實，我們就不能不同時改變自己。”他還指出，要搬掉壓在中國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其中一個就是中國人自身精神的缺陷，尤其是知識分子。這是他一直關注的問題，早在 80 年代他就提出：我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課題就是“人的重建”，而知識分子的道德重建和責任承擔就顯得尤其重要。

流亡海外期間，劉賓雁看到，流亡者中間爆發了“文革”中常見的那種派系紛爭。他感慨地說：“不時感到在沒有自由時未曾體味過的孤獨和悲哀。在這塊自由的土地上，流亡者中，正常的論爭無法展開，是非顛倒，真僞混淆，正不壓邪，竟一如在專制之下！這能怪誰呢？”（見《劉賓雁小傳》）他 1993 年曾在華盛頓召開的一次流亡者大會上面對這種紛爭，含著眼淚說道：“我們大家講點良心，好不好？”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缺失讓他痛心疾首。

知識分子要改變自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解決與權力的關係問題。遠離權力、拒絕利誘的“清高”，曾經是中國“士”最看重的品格。隱士許由聽了請他去做官的邀請後跑到潁河邊去洗耳，不讓這些髒話汙染了自己的耳朵；而另一個隱士巢父則把牛牽到上游去飲水，怕洗下來的汙垢髒了自己的牛。這是中國文化的千年美談，但是這早已成絕響。在長期的專制社會裡，知識分子逐漸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越來越成為附著在權力體制下的寄生物。科舉制度將幾乎所有的“英才”都攬入權力的彀中，“學成文武藝，貨與

帝王家”成了士人唯一的出路。“學而優則仕”，出將入相是一般讀書人的追求，當個帝王的清客，被尊為“帝王師”，可以與帝王同床而眠甚至腿壓龍腹，則是其中最狂妄者的夢想極限。即使標榜瀟灑絕塵、鄙棄權貴的“隱士”，也大多走的是曲線通往權力的“終南捷徑”。“翩翩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衙”，說的就是這種耐不住寂寞、擋不住誘惑的“假隱士”的醜態。如今，在權力至上、物欲橫流的時代，知識分子的操守受到了更嚴峻的威懾和更強烈的誘惑。“六四”以後伴隨著暴力鎮壓而來的金錢贖買裂解了知識分子隊伍，腐蝕了知識分子的靈魂，造成了慘不忍睹的文明墮落。君不見，多少“精英”拜倒在強權腳下，以奔走王侯左右為幸，以所上“奏摺”被圈閱為能，以與達官貴戚合影為標榜，以奉命抄寫聖諭為光彩，以進中南海侍講為無上榮耀，以到禁臠中分一杯羹為得意……士風之敗壞如此，如劉賓雁一樣敢於批龍鱗拔虎齒為民請命者還有幾人？像米奇尼克一樣永遠站在權力的對面說話的獨立知識分子還有幾個？“權力是腐蝕人的”，被腐蝕的不光是握權者，也包括艷羨權力的知識人。如今“公共知識分子”已成一種特殊時髦，可真正能保持其真諦“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者卻如鳳毛麟角，並不多見。過不了這一關，中國知識分子的膝蓋就是軟的，脊梁就是彎的，永遠也不能頂天立地地站起來。

知識分子要改變自己，就要改變自己和民眾的關係。知識分子大多原本來自民間，可一旦登上廟堂和象牙塔就與民眾逐漸疏離。劉賓雁就曾反省道：“我現在之有勇氣，也應該感謝‘反右派’運動。‘反右’以前，我是肩不能擔，手不能提。到了1958年，我忽然被打到社會最底層，被剝奪了一切，黨籍、資歷、地位，什麼都沒

有了，成了一個真正赤手空拳的農民。一些人下來，還帶著工資，我是‘極右’，只發 20 元生活費，連抽煙都困難啊！”他說，到這時他才發現，“我在 1956 年、1957 年已成為貴族了，13 級幹部，出去可坐軟臥、飛機，稿費還很多。人變了，只有你什麼都沒有時，你才有貧民的感情，才能以貧民的立場來觀察社會……”

賓雁說的是他沒有墮落的外部原因，人們無法要求、也不應該要求所有知識分子都經歷劉賓雁那樣的坎坷遭遇，但是，要努力和民眾站在一起，與民眾同呼吸共感受，而不是千方百計地脫離民眾，鑽營進入民眾壓迫者的行列，這一點應該是能做到的。至於他這種選擇的自身原因，還在他所接受的文化遺傳上，俄羅斯的 12 月黨人都是貴族，但是他們卻能自覺選擇為民眾去犧牲受難終生，這是賓雁從小就崇拜的英雄之路，也是每個知識分子都能夠借鑒的。賓雁的一生始終拒絕寄生於權力，努力和底層的民眾站在一起，這是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和應該恪守的道德底線，他為我們做出了“改變自己”的一個範本，也是我們長久懷念他的根本原因。

說到“民眾立場”，這又牽涉到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劉賓雁的反思中，如何看待“人民”這一概念也是他反復思考的課題。

在“黨文化”的詞典中，“人民”是僅次於“黨”而排在第二位的概念。當然，“黨”是最尊貴的皇冠，而“人民”是皇冠上最常用的飾帶，“黨和人民”是經常連接在一起的組合詞組。然而，一主一僕這個順序不可顛倒，胡績偉就因為提出“人民性高於黨性”，顛倒了這個順序而遭到批判和廢黜。除了“黨”之外，“人民”是出現次數最多的詞，國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

“人民代表大會”，行政機構都冠以“人民政府”的頭銜，各級法律機構也都稱“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國家銀行是“中國人民銀行”，貨幣稱“人民幣”，黨報叫“人民日報”，官員稱“人民公僕”，警察叫“人民警察”，官辦醫院叫“人民醫院”……至於其他領域，以“人民”冠名者不可勝數，除了監獄不叫“人民監獄”和廁所沒叫“人民廁所”之外，“人民”似乎覆蓋了一切。“人民”這個詞受到的最高待遇是毛澤東賜予的——當億萬國人跳著腳山呼“毛主席萬歲”時，他曾站在天安門上居高臨下地揮著帽子，用浓重的湖南方言和尖细的嗓音回應曰：“人民萬歲！”

如今，人們已經開始認識到，這個迷人的口號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局。最近有細心的人發現，人民幣中面值一元以上的兩元、伍元、拾元、貳拾元、伍拾元和一百元鈔票上印的都是“領袖”，而且一度發行的“四個老頭（毛劉朱周）”百元大票（也稱“藍精靈”）早已悄悄匿跡，如今流通的又是紅彤彤的“一個老頭（毛）”了；只有五角、兩角、一角三種零錢上印的才是“人民”，“人民”加起來只值八角，是個微不足道的零頭。這肯定不是偶然疏忽所致，而是刻意的精心安排，背後透露著一種深刻的理念。這種意味深長的對比形象地說明了“人民”在這個國家裡的真實地位，也說明了毛的幽靈依然在大地上遊蕩。

“人民崇拜”是民粹主義的核心理念，其理論根源來自於所謂的“盧梭之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激進派依照盧梭的理論，凡事都拿“人民”來說事，用“人民”的概念取代了“上帝”的概念，作為一切革命暴力合法性的依據。對此 19 世紀的保守主義理論家柏克曾評論說：“法國那幫理論家對人類有著深深的愛，但是對具體的

人卻很不耐煩，更為糟糕的是，索性把他們忘掉。”現代的“人民拜物教”教主毛澤東更是如此，他一方面對抽象而虛無的“人民”高呼萬歲，一方面卻把具體而真實的“人民”踩在腳下，毫無尊重和憐惜。他不僅用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把幾千萬人送進了死亡和災難的深淵，還在60年代初年製造了空前的大飢荒，讓“人民”餓死了3750萬，甚至還瘋狂地準備把中國投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火海，即使讓當時的六億人口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多少罪惡都假“人民”之名而行！《盧梭之錯》一書的作者朱利亞爾指出：“人民最高主權，這個縈繞於19世紀政治哲學的幽靈，完全可以適合一個極權政體。”而思想家一平先生對此有一句很精到的評論：“極權是集體命運的賭博。”

這一論斷在中國得到了完全的驗證，在這個號稱是“人民共和國”政體內，極權專制達到了極致。在產生對黨的“領袖崇拜”的同時，也順便產生了一個所謂的“人民崇拜”，二者相輔相成，一呼一應，幾乎天衣無縫。一聲有名無實的“人民萬歲”換來了幾十年對“最高領袖”的癡迷崇拜，其狂熱程度只有當年德國人對希特勒和蘇聯人對斯大林的崇拜可以相比。“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語），“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劉少奇語），“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語），“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報刊常用語）等說法應運而生，成了幾代中國人最熟悉的習慣性話語。直到今天“代表人民”仍是政權合法性最重要的說詞，而在普通人們的心目中，也還存在一個似乎永遠正確而絕不會犯錯誤、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秉持世間公平正義的最終裁判者——“人民”。這一信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在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領

袖的光環逐漸褪去，並被拉下神壇以後，“人民”仍然在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是“領袖崇拜”的替代品。幾代追求自由民主和社會進步的知識分子，最終都寄厚望於這個隱居不露、沉默無聲的現代列維坦“人民”，希望這個巨人有一天會出山亮劍，扭轉乾坤。國內外民主人士的一次次前景預測，都是建立在這個信念之上的，劉賓雁也不能例外。

然而，這個神性的“人民”並不存在，有的只是一個數量驚人龐大，而又經常處於無聲狀態的生命集合體——稱之為“集合體”只有類別劃分的意義，實際上只是一個個以原子狀態生存的個體，其間聯繫很少，並非以整體形式存在，而且在“人民”內部還存在著不同的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他們之間往往又是互相衝突甚至互相敵對的，不可能只有一個代表者。兩千年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和長期“分而治之”的極權統治方式，以及刻意打碎一切民間社會組織的近代革命與專政，像粉碎機一樣使這些生命個體都變成了卑微而孤立的沙粒。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說：“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錮在私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自顧自，專制制度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凜若秋霜，專制制度將他們凍結成冰。”

這些生命砂粒孤立而消極的存在是極權專制的最好條件和基礎，而他們的覺醒和聯合則是專制制度最可怕的夢魘與大敵。用暴力、恐懼和政治運動來製造這些沙粒，並嚴防這些砂粒以任何形式聯合和組織起來，是極權專政機器的首要任務；而不停地往民眾的頭腦裡注射麻醉劑和致幻劑，以防止這些砂粒產生“存在自覺”從而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則是中宣部和意識形態部門的主要功能。

中宣部曾發出內部通知，禁止在媒體上出現“公民社會”和“納稅人”的概念，最新動態是在十八大後中央辦公廳、中宣部和教育部又下達了空前嚴厲的“七不准”禁令，即大學課堂上不准講“普世價值”、“公民社會”、“公民權利”、“新聞自由”、“中共的歷史錯誤”、“權貴資本主義”和“司法獨立”等七方面的內容。

在長期反復的暴力鎮壓，以及無孔不入的奴隸意識灌輸與冰冷自私的物欲主義熏陶之後，要想使這些砂粒型的個體變成有“存在自覺”和“權利自覺”的現代“公民”，由潛在的力量變成現實的力量，談何容易！所以，劉賓雁在自己的晚年，把對“民族性”的批判個改造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 80 壽辰慶祝會上講話的最後部分集中談的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時代，“人民”的狀態、性格和文化水準是不同的。上個世紀，波蘭人可以因為牛肉漲價而走上街頭，這個世紀初，突尼斯人可以因為一個小販被城管打死而掀起一場革命，而中國人對罪惡的承受能力似乎要強得多。由於歷史、文化的遺傳不同，中國的“人民”作為一支有獨立意志的力量出現在舞台上，還剛剛處於萌芽階段。在這以前，他們只是作為重大歷史事件的舞台背景和改朝換代可資利用的工具而存在。這種消極的存在並沒有使他們免除動亂之苦和勞役之艱，正相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為每次社會動亂和改朝換代付出犧牲和“埋單”的恰恰是他們。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中很少有形而上的信仰與真理求索，多的是對功利的崇拜與追求，這種“成王敗寇”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只承認和接受成功者的權力，卻不計較取得成功手段的正邪，這就使“人民”總難逃成為“王者”的戰利品或“敗寇”的犧牲品。“六四屠

城”前推著小車上廣場給學生送飯送水的市民一夜間就可變成“小腳偵緝隊”的慘痛事例說明“人民崇拜”的虛幻性。嚴格地講，“人民”是附生於專制主義的概念（所以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主張寧可用“老百姓”來取代“人民”這個被過度濫用的詞），而“公民”才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前提和基礎。中國人要從歷史的重軛和現實的高壓下解放出來，成為現代國家的真正主人和現代社會的尊嚴公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指望他們在一夜之間就覺醒並成熟起來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況且，“人民”也是可以被收買、被分裂和被腐化的。如今，中國已是一個千瘡百孔的腐敗社會，從 80 年代初的“不正之風”，到 80 年代後期的“腐敗現象”（第一次使用這個詞的是趙紫陽，當時引起了一片驚叫），這股邪風愈演愈烈，如今，局部的權力腐敗現象已經發展為整個社會的潰敗，如同癌細胞已擴散到整個肌體，吏治腐敗、司法腐敗、金融腐敗、教育腐敗、醫療腐敗、新聞腐敗、慈善事業腐敗乃至學術腐敗等概念一個個出台，都得到了大量事實的印证，可以說當今中國已經是無處不腐敗了。在這個過程中，“人民”也不可避免地在腐敗著——儘管機會不多，但是，“無人不罵腐敗，但無人不想腐敗”這句俚語說出了其中的奧秘。所謂“世風日下”指的就是由權力腐敗帶來的“全民腐敗”。

為了維護鯨吞社會財富的權貴資本集團的利益，官方一方面將“暴力維穩”升級為“恐怖維穩”；另一方面又“用人民幣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就為腐敗的合法化和泛化提供了新的動力，也為極權專制的苟延殘喘注入了強心劑——君不見，在山東臨沂非法囚禁陳光誠一家居然發展成了一個產業，給幾百人帶來了致富的機會；

而在北京“截訪”和關押上訪民眾的“黑監獄”也成了一本萬利的大買賣。當今中國社會從上到下的腐敗比“六四”前要嚴重千百倍，涉腐的金額幾乎每五年就上升一個數量級，《人妖之間》中王守信與今日的貪官相比已成“小巫見大巫”，不可同日而語；1980 年在《中國青年報》和《人民日報》上刊登出來的豐澤園年輕廚師陳愛武反不正之風的新聞曾轟動全國，並被評為當年的“十大新聞”之一，而那位在飯店吃白飯 16 次的商業部長王磊所欠下的飯錢僅有區區 190 多元（他不久就因此而黯然下台）。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是個“廉政模範”了。腐敗不斷升級，可反腐敗的勢頭和聲音反而漸行漸弱，似乎人們已經見怪不怪，麻木地接受了這一現實。曲解孔子的“精神按摩師”于丹所開出的犬儒藥方“既然改變不了現實，那就改變自己”，成了不少人信奉的處世哲學。這種普遍的精神淪落是最可怕的腐敗。

事實證明，“領袖崇拜”和“人民崇拜”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一對雙胞胎，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領袖”；反過來說，有什麼樣的“領袖”就必然有什麼樣的“人民”。其實，“領袖”和“人民”的這種共生關係在法西斯的符號中就有最直觀的說明。1921 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創建了世界第一個以法西斯命名的政黨，其名稱來自古羅馬，標誌是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間插着一柄斧头。那一捆束棒，音讀即為法西斯。思想家邵建先生認為，法西斯主義的最大秘密就藏在這個神秘的符號之中：“法西斯不可能是個體的，也不是烏合之眾一般的群體，它是個體被束縛在一起的一個集體……”邵建指出，這還只是法西斯的一半，最後需要完成的是同樣重要的另一半，那就是插在束棒之中的斧子。這裡斧子象徵

著權力，而一束棍棒則是權力支配的對象。

他還由此總結出一個“法西斯公式”：法西斯＝團結就是力量＋一切服从權力。其實，這個公式還可以有個更簡潔的表述：法西斯＝“人民”＋“領袖”。

需要注明的是，這個“人民”是一群被捆縛在一起的，只有服從的義務而沒有任何權利的個人的集合體，往往是以義和團、紅衛兵式的群體暴力形式出現，其主要成分是“暴民”，其實行的是“暴政”，如在“文革”的“群眾專政”中所推行的“多數人的暴政”；而“領袖”則是享有一切權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約束的至高無上者，其代表人物有一大串，毛澤東是其中的登峰造極者。漢娜·阿倫特在她的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就指出：“暴民總是叫喊要尋找‘強人’和‘偉大領袖’。”

這類極權国家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例如，政治領袖喜歡穿軍裝，喜歡大廣場，喜歡閱兵式，喜欢大型團體操和運動會，日常生活的語言中喜歡使用軍事術語，如“戰線”、“戰役”、“刺刀見紅”、“打殲滅戰”和“人民戰爭”之類的詞匯，墙上和街頭喜歡不斷更換横幅和大標語，到處流行宏大叙事的口号，動不動就是“劃時代”、“里程碑”和“偉大勝利”，廣播電視中經常播放气势恢弘的大合唱、進行曲，其節奏、旋律和風格與納粹裝甲兵第一師的軍歌《閃電部隊在前進》驚人雷同，媒体上則充滿了意識形态的宣傳和鼓動，提倡無私奉獻與犧牲個人利益，渲染“盛世”氣氛，迷信舉國體制，呼唤万众一心，强调统一思想，鼓勵人人都在螺絲釘的崗位上安分守己，無所奢求……這是劉賓雁所生活的時代人們睜眼可見的現狀，每日必聽的聲音，

對此，賓雁雖然早就深惡痛絕，但是卻無法迴避，甚至在自己的文字表達中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這種時代的烙印，“人民崇拜”即是其中之一——當然，劉賓雁和一般的“人民崇拜”者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人民在他心目中從來就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苦有難的活體，他以畢生的精力和熱情為這些苦難民眾奔走呼號，這與那些抽象謳歌“人民”而實際上蔑視個體生命的官僚、政客和學者有天淵之別。

“人民崇拜”這個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之大成的意識形態，是極權主義武庫裡最後的殺手鐧和救命稻草，其最近的樣本就是薄熙來“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將來還必然有人不斷地施放這個毒器。中國再也不需要“人民萬歲”式的蠱惑宣傳和對民眾力量的惡意利用——如果沒有慈禧太后的恩准，“義和團”鬧不進京城；沒有毛澤東的特許，“紅衛兵”也成不了什麼氣候。這些歷史的教訓人們一刻也不應忘記。

這樣說並不是要讓“人民”來承擔極權專制制度長命百歲和社會全面腐敗的責任，而是要破除一個虛妄的幻想和一套陳舊的邏輯，不要再等待一個新的救主在中南海裡登基，來普渡眾生；也不要指望一支名叫“人民”的“天兵天將”一夜之間從天而降，重整山河。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改革已死”，是說歷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章，而“憲政”是這新篇的主題詞。人們應該把關注的目光轉向紅牆外的民眾中所產生的每一次以直接利益訴求為起點的維權鬥爭，並努力將這種訴求提升為“公民權利”的覺醒——當從屬於黨和領袖的“人民”變成了現代意義的獨立“公民”時，“公民社會”就應運而生了，“有憲法而無憲政”的現實才會改觀，而中國“三千

年未有之大變局”才有可能出現。

對此，賓雁晚年有殷切的期望和信心。他在 2000 年致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的信中就寫過：“中國幾十年的苦難造就了一種現實力量、物質力量，即平民的崛起……這個力量不僅對於埋葬舊勢力，對於在廢墟上重建一個較好的社會也是至關重要的。”

賓雁最可貴的貢獻是，儘管他對“人民”的認識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他一生所說的一切和所作的一切，都是身體力行在為喚醒民眾的“存在自覺”和“權利自覺”而努力，他是“人權”最熱烈、最忠誠的呼喚者和保衛者，這是他最重要的遺產。

在將要來到的大變革中，中國的西西弗斯們終將把巨石推上山頂。而在這一盛舉中賓雁仍然和我們站在一起。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資中筠：新中國 60 年文場士風怪現狀

邵建：法西斯公式

劉賓雁：迷霧重重八十年

第十九章　丹柯之心

為引導族人走出密密叢林中的漫漫長夜，丹柯撕開胸膛，掏出自己的心，用發光的心來照亮道路。當隊伍走出密林，來到陽光明媚、獻花盛開的草原上，人們在歡慶勝利時，却忘記了丹柯，甚至用腳踩碎了那顆仍然在燃燒的心。於是，勇士高貴的心從此化作飄蕩在草原夜空的藍色螢光……

2010 年冬至，劉賓雁安葬在他摯愛的土地。 熱愛他的親人、同事、朋友和讀者靜靜地低頭緬懷。

劉賓雁去世前一個月，和《黃河邊的中國》作者曹錦清交談，音猶在耳。

劉賓雁讀過的書在書架上伫立，等候主人。

劉賓雁用過的英漢字典仍存。

晚年的劉賓雁對中國的大變革一直抱著殷切的期望。1990 年夏天，他在巴黎見到了好朋友趙越勝，談起回國的希望，他說：共產黨今後的日子不好過了，因為殺人和社會結下了血仇，很難永遠靠暴力鎮壓。 幾年之內形勢定有大變，到那時他就可以回去了……當時國內外不少人也都是這樣估計形勢的，誰也沒有料到中國從那個鮮血橫流的“巴托羅繆之夜”開始的長夜竟然會如此漫長。

蘇聯在改革的啟動者赫魯曉夫下台後開始的停滯時期“勃列日涅夫時代”（也是特權階級腐敗的黃金時代）長達 18 年，難道中國也要經歷一個相同的沉悶而黑暗的長期停滯嗎？賓雁看到了這個危險，但是他不願意相信這種可能。 那樣的話，中國人付出的代價就太沉重了——可事實比這還要殘酷，中國的“勃列日涅夫時代”比前蘇聯的還要長，腐敗的程度比蘇聯還要嚴重，這個長夜已經持續了 20 多年，至今仍未破曉。 賓雁晝思夜盼的大變革卻遲遲沒有到來。

時光無情地流逝，對政治流亡者來說，時鐘的嘀嗒聲和走馬燈式的日出日落變得更加殘酷和无情。 每一次日出都喚起一絲希望，而每一抹晚霞都渲染著無奈的失落。 造物主似乎在以漫長的心靈煎熬來懲罰著那個世界上人數最多、但又最沒有信仰的族群。 而這個族群中最敏感的心靈則首當其衝，承受著最大的寂寞和痛苦——賓雁，這個被稱為“中國良心”的流亡者就在如此的煎熬中度過了自己的晚年。

2002 年 9 月，77 歲的劉賓雁被發現罹患了直腸癌，第二年 3 月接受了一次手術治療。 雖然健康情況一度似曾好轉，但他已不可逆轉地進入了人生的最後階段。 但是，命運在這時顯示了他的公正

和公平——就像賓雁在第二次被開除黨籍前曾獲得過那個輝煌的“唯一的夜晚”一樣，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又享受到一次隆重的向世界和朋友們告別的機會——在普林斯頓舉行的 80 壽辰文學晚宴。

那是 2005 年 2 月 27 日，這是離賓雁的生日（農曆正月十五）最近的一個周日，從歐洲各國和美國各地趕來的朋友們紛紛聚集普林斯頓校園中最雅致講究的教工俱樂部，參加他 80 歲壽辰的晚會。除了他的家人之外，來者中有他的多年老友，北京鄰居、東北鄉親和諸多新朋，凡能來的幾乎都來了，不能來的也傳來了電話祝賀，或寄來了生日禮物。 這是賓雁流亡 18 年以來最隆重的一次朋友聚會。 會場內外洋溢著歡樂氣氛，連老天也來湊趣，連綿多日的陰雨戛然而止，露出了和煦陽光，空氣中透著春天的氣息。

會場前方矗立著一尊剛剛鑄成的劉賓雁青銅胸像——那是國內的藝術家朋友精心設計、又在美國澆鑄加工而成的藝術精品，凝聚著海內外中國人對這位流亡者的愛與敬、理解與思念。 會場中響起悠揚的樂曲——那是普林斯頓大學生樂隊現場奏響的弦樂四重奏，精心選擇的曲目是斯梅塔納的《我的祖國》、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和中國歌曲《松花江上》，這都是賓雁一生最喜愛的樂曲，也是他漫長生命的伴音。 隨著音樂聲，張辛欣、嚴亭亭、北明、張讓等幾位大陸和台灣女作家朗誦起賓雁作品的選段，恰好在這時，《在橋梁工地上》和《第二種忠誠》主人公的第二代打來了祝賀生日的電話……這是一個多麼溫馨動人而又富涵寓意的夜晚啊——與 1986 年底首都體育館那個“唯一的夜晚”遙相呼應，都是賓雁生命中歷史性的時刻。

這一天，已經重病在身、長期臥床的賓雁居然奇跡般地出現在人們面前，他精神奕奕地參加了整個晚會，還發表了總結自己人生旅途的講話《我這 80 年》，這位記者、作家和演說家生命中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依然贏得了全場的笑聲和經久不息的掌聲。

賓雁的這次“最後的演講”是研究他一生思想發展的重要材料。

他的講話首先從那尊青銅塑像說起：“這座塑像應該屬於胡風，屬於鄧拓，或者屬於遇羅克、王申酉，反正不是我。”——他還是一如既往地謙遜。

他說：“我想，我們這一代人，大概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吧，要繼續存在下去，有一個意義：可以作為一個標本——大家可以從我們身上看到一些……至少是中國的歷史吧。”——這可以作為“劉賓雁時代”的注腳。

他說：“我這 80 年的一生啊……真正為中國人做事情的時間不超過九年，就是 1956 年到 1957 年一年，加上 1979 年到 1987 年 1 月那八年。 大家想想看，中國人多可憐哪！”——中國人都應該如此算一下自己的生命。

他說：“1957 年我當上了‘右派’，對我來說，是最好的選擇……”接著，他假設自己如果躲過了那次劫難，會是什麼結果呢？

他說，一個可能是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例如“文化大革命”中被抓出來，像許多人一樣死掉；一個可能是能安全地活下來，並養尊處優當個“高幹”，但只能寫些毫無意義的文字，虛度一生；還有一個可能，是和“四人幫”搞到一起，因為“張春橋我跟他還有點關係（指 1950 年曾一起訪蘇），所以很可能跟姚文元差不多

了……”他的這些話引起哄堂大笑——含淚的笑。

在笑聲中，賓雁把講話引向一個嚴肅的話題：“……80 年以來的教訓是——我們太狹窄了！”他一字一頓地說出“太－狹－窄－了”這幾個字，然後解釋道：“我們的眼睛就是看著政治……太過於集中到政治上面了。”

隨後，他鄭重地推出了論述的核心：“我認為根本的根本是中國人本身的問題。”他進一步指出，首先是中國知識分子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他責問道：在十年改革中，在“六四”運動中：“他們——你們——知識分子到底幹了些什麼？”他特別嚴厲地斥責了大陸上正盛行的“頌聖文學”：“所以才會有張藝謀的《英雄》，才會有《康熙大帝》、《乾隆皇帝》，現在又在演《漢武大帝》……”

接著，賓雁激憤地拋出一句話：“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社會！我有時就在想：活該！真是活該！”——這可不僅僅是激憤了，而是一聲振聾發聵的斷喝。

這既是對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嚴厲反省和譴責，也是對一些依然跪倒在“領袖”陰影下的愚民的痛切呼喚，他終於在走出“領袖崇拜”之後，也走出了影響他多年的“人民崇拜”誤區。 這應該是他臨終前的又一次思想超越，這標誌著他最終已經在精神世界和道德王國與中國共產黨所信奉的的那一套階級、政黨和“人民”的理論分道揚鑣了。

他在這次講話中還說過“中南海越來越不重要了”。 這標誌著他已經基本完成了從一個體制內的改革派到立足於民眾的體制外變革者的轉變。

這意味著，賓雁已經認識到，體制內改革派主導的改革已經失

敗，上下曾經達成的“改革共識”已經破裂，中國變革的希望已經不在於紅牆內的爭鬥，而在於紅牆外的民眾以“公民”的姿態登上歷史舞台的中央，以“兌現憲法”和“維護憲法”的合法訴求為旗幟，以非暴力的公民運動尋求社會達成新的“憲政共識”，用憲法來實現對無限的專制權力的制約，和對公民權利的切實保障。

賓雁晚年的這個思想發展，是他多年的觀察和思考的結果。他隔著大洋看到，大戲還在按著舊劇本繼續上演。“六四屠城”以後，鄧小平曾於 1992 年發表“南巡講話”，企圖給沾滿鮮血的雙手重新戴上“改革”的白手套，以此來收攏人心——這也和 1905 年慈禧在鎮壓了“戊戌變法”後上演的“大清王朝最後的改革”驚人地相似。鄧小平果然是弄權的高手，他這一招也確實有效，延宕了迫在眉睫的矛盾總爆發，給中國帶來了 20 年高壓下死水一般的“穩定”。但是，新一波的偽“改革”已與 80 年代的改革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改革 2.0 版本”與 80 年代的“1.0 版本”有了本質的區別。

“1.0 版本”的改革儘管並沒有實行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在理論上還承認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要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例如，80 年代中期曾提出過“黨政分開，政企分開”，要改變“以黨代政”的弊端，1988 年 5 月 19 日，趙紫陽主持的黨中央曾下達文件，決定取消“政法委”，代之以一個權限有限的“中央政法領導小組”，職能是領導和協調政法方面的工作，給法院相對獨立的司法權。在至關重要的利益分配方面，“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承諾還曾包括普通民眾，改革初期農民從土地承包制中得到了實惠，工人從效益工資中得到了紅包，離開體制“下海”的人得到了發展的天地，知識分子的工資也有了較快的增長，社會各階層都收

到過“改革紅利”，這種“普惠”的改革一度曾是全民的狂歡節，每一個改革措施出台都受到民眾的熱烈響應——這也是“八九民運”的主體還局限於青年學生，社會各界雖然同情和支持，但並沒有發展為全民反抗運動的根本原因。當時工人、農民等階層腰包中的“改革紅利”還沒有花完，這導致他們還沒有因徹底失望而行動起來。

而“2.0 版本”則剔除了一切政治改革的內容，用“四項基本原則”把改革嚴格局限在經濟領域，還對已有的初步政治改革進行了反攻倒算，例如，在“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方面大踏步後退，又恢復了毛澤東倡導的“黨的一元化領導”，不僅政府管企業，黨委還成立了“企業工作委員會”直接管大中企業。總掌公、檢、法大權的“政法委”不但沒有取消，反而在“維穩”的旗號下得到空前加強，最後演變成了權傾一切、作惡多端的“第二中央”，還掌管了軍隊以外的“第二武裝”。在這一階段，官方也曾推出過一些所謂“改革”，諸如“文化體制改革”、“社會管理改革”等，其實是借“改革”之名來強化“維穩”，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僞改革”讓人啼笑皆非，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只能證明中南海中已經無人想要改革，改革真的已經死了。在利益分配方面，陳雲提出的“還是我們的孩子們可靠”得到了鄧小平的認同，成了組織路線的重要原則，從 90 年代開始，“文革”中高喊“老子打天下，兒子坐天下”，高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老紅衛兵們紛紛被提拔到黨政要津，“黨天下”開始明目張膽地向“家天下”過渡——“太子黨”的政治野心在整個 80 年代一直受到抑制，“六四”後他們終於揚眉吐氣了。這也與慈禧改革中出台的“皇族內閣”異曲而同工。從少年時代就自

詡為“革命事業天然的接班人”的“紅二代”、“太子黨”們不僅開始大踏步走上國家權力的高峰，也成了“先富起來”的優先對象。這種“權錢合一”的“改革”成了權力與資本聯姻的豪華婚禮，和權貴們對國有資產與壟斷行業進行瓜分的饕餮盛宴。吉拉斯所說的“共產主義新階級”在這一過程中像放出魔瓶的魔鬼一樣迅速膨脹壯大，很快就羽翼豐滿了。1992 年以後的所謂“改革”，受益者只是左手握緊權力右手攫取金錢的極少數權貴及其子女，普通民眾完全被排除在外，他們不僅沒分得一點“改革紅利”，還成了僞“改革”祭台上的犧牲：工人賠上了自己的就業機會，農民則大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成千上萬的居民住房被強拆，民辦企業受到權貴壟斷資本的強力打壓（江澤民曾說過要讓他們“傾家盪產”），知識分子則被封嚴了嘴巴，因血統繼承（一端是權力和財富的繼承，一端是卑微地位和貧窮的繼承）而固化的新階級劃分使社會完全斷裂，普通民眾子女通過各種努力進入社會上層的通道被徹底切斷……除了權貴集團之外的社會各階層都成了這一波“改革”的受害者，“改革”曾有的聲譽已被徹底透支和敗壞。

斗轉星移，以體制內改革派為主導的改革之頁正在被歷史掀過，十年改革的花果飄零，所剩無幾，中南海內的改革力量日見衰微，當年一度鼎盛的改革方陣如秋葉般凋落，如今只剩下幾個八九十歲的老人還在用最後的生命堅守著改革思想的街壘，捍衛著改革夢想的榮譽和尊嚴。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中國的這場改革已成隔夜殘夢。“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如今，一度曾經喚起民眾熱血激情的“改革”一詞已成祭台上的冷豬肉，當年的號召力已盪然

無存，儘管有人還對“改革 3.0 版本”的出台抱有幻想，但這已經成了夢囈般的歷史回聲。在人們心目中“改革”已經成了一個醜陋的字眼。新的聲音響起了：“改革已死，放棄改革夢想，丟掉改革話語。”（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語）“在 1980 年代，每個人都支持和敬佩改革……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有人利用改革的觀念來進行掠奪。例如，為了獲得經濟增長和政治表揚，一個城市官員會徵用土地，建一個新區，這就是所謂的改革。”（歷史學家章立凡語）……

曾經被胡耀邦視為“可以當總書記”的人選、中國黨內民主派的領軍人物之一朱厚澤在胡耀邦下台後幾天也被從中宣部長的位置上拿下，並在不久後召開的十三大上被逐出了中央委員會，當時他只有 58 歲。在經過 20 多年的政治冷藏後，他也於 2010 年 5 月 9 日逝世。他臨終前不久說：“我們這些老人（體制內主張改革的老人）的存在，給年輕人以希望，但實際上並不存在這種希望。”這被視為他和體制內改革力量的政治遺囑。

美國國父之一傑斐遜晚年在談到歐洲革命時說過：“假如 18 世紀的君主們能夠致力於漸進性的改革環境，為了進步性的提高而做有益的進步性的調節，那他們的臣民就不會被迫通過流血和暴力去尋找輕率和破壞性的革新。”中國的統治者們又在犯歐洲 18 世紀的君主們所犯過的錯誤，他們頑固地堅持“不走邪路（實際上是普世文明之路）”，放棄了改革的最後機會，使中共黨內民主化和中國政治改革的所有幻想都已煙消雲滅，這個體制通過自身改革而和平轉型的最后一絲希望消失在一次次的等待和失望中了。

這次假“改革”之名而強制推行的大掠奪和大分贓在賓雁生前就已經開始，在他去世後達到了高潮，其結果是造就了接近世界

上基尼係數最高值的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最新數字是中國的基尼係數 2010 年已達 0.61（與“冠軍”南非接近），遠遠高於危險線 0.4 和世界平均水平 0.44（這是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機構公布的調查結果，而 2013 年 1 月中國政府公布的數字是 0.474，比 2008 年的 0.491 還要低。官方的數字引起了普遍質疑，美聯社的報導說這個數字比童話還不真實）。最近彭博新聞社調查了中國政壇“八大元老”（即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楊尚昆、王震、宋任窮和薄一波）的直系子孫及其配偶共 103 人的財富，他們之中的 26 人在主導中國經濟的國有壟斷企業中擔任高管，43 人擁有自己的私人企業或在私企中擔任高管。其中僅王震之子王軍、陳雲之子陳元和鄧小平的女婿賀平三人領導和運營的國有大公司 2011 年的總市值就達 1.6 萬億美元，相當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 1/5 強，真可謂“富可敵國”了。另有統計數字顯示，佔中國人口不到 1%的新生權貴階級已經壟斷了42%以上的社會財富，鄧小平所標榜堅持的“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新階級》作者吉拉斯所說的“特權官僚專制制度”的典型。這種階級關係的變化和利益分配的新格局徹底地改變了中國，使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變成了極少數壟斷國家權力和財富的寡頭與整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之間的鬥爭。如今的民眾運動已用不著青年學生來打先鋒了，在“六四”時相對消極的旁觀者工人、農民和利益受到侵害的市民等各階層都站到了“維權”鬥爭的最前線，成了每年發生的上十萬起“群體事件”的主力軍。鄧小平改革的第二波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放出了魔鬼，將中國引進了地獄之門，使中國成了一個充滿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的大火藥桶，隨時有爆炸的危險。一種可怕的絕望情緒正籠罩著全社會，一

個幽靈，革命和動亂的陰影正在大地上徘徊。

如今，很長一段時間已經不被人們提起的“革命”一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人們的話語裡，很多人對此憂心忡忡，不少人反復聲明自己不希望出現革命性的動亂。他們忘了一個常識：任何革命都不是哪個人一聲呼喚就發生的，誰也無法製造出一個革命來。歸根結底，革命是由暴政激發出來的，是對專制暴政必然的懲罰。最近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由於新科常委王岐山的推薦成了熱門書，但是，不同的人從這本書中讀出了不同的內容：有人讀出了和平改革的失敗必然導致暴力革命和破壞力巨大的動亂，有人讀出了暴力革命很容易產生新的更可怕的暴政和舊制度的重生，有人看了這段話會心一笑：“當改革開始之後，舊制度剩下的部分就更讓人難以忍受。”而官方則顯然對下面這句話更感興趣：“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他們似乎由此得出結論：還是不要輕言改革的好，因為對癌症動手術有可能會導致癌症的加速擴散，改革也可能會誘發出“革命”這個魔鬼來，導致“亡黨亡國”……

不管怎麼說，幾乎一切人都感到了一個巨大的恐怖陰影正猛撲過來，各階級各階層的人都在打點後路，正在發生的第三次移民潮（第一次是留學潮，第二次是政治逃亡潮）就是高官大款們的選擇，老鼠已經開始從將要沉沒的泰坦尼克號巨輪上逃跑了。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刻，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將要來臨的社會大震盪呢？

這個問題，敏感的劉賓雁在去世的前一年（2004 年）就曾經提出來過，他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怎样告别革命？是否告别得了？》。他雖然提出了問題可沒拿出答案，只是愼重地說：“大量事實證明

革命並非一定要使用暴力，也有辦法不使‘文革’期間的破壞重演。”他並沒有排除發生革命的可能性，但對革命可能引起的破壞也憂心忡忡。看來對這個問題的最終答案還需要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自己來書寫。

現在，建立在屠城血泊之上的中國“勃列日涅夫時代”已臨近終結，十年“暴力維穩”也已走到盡頭，以“重慶事變”為標誌的黨國體制瓦解崩潰過程已經開始，大變革時代的啟明星正在冉冉升起。時過境遷，中國的希望已經不在於中南海內是否有新的改革力量出現，而在五湖四海的民眾之中，變革現實的真正主力軍正在覺醒並開始作為一種新生的獨立力量登上舞台，來自體制外民眾對憲政的呼聲和愈演愈烈的維權風潮，已經讓中南海高牆內的權貴們徹夜難眠了——這還僅僅是開始，如果清幽的茉莉花香都能讓他們連打噴嚏，那百花盛開的衝天香陣定會讓他們呼吸窒息、中樞癱瘓呢……

事實證明，對此抱有期望不是一個虛幻的夢想，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已經逐漸超出了具體的利益訴求，越來越帶有政治色彩，2011 年發生的廣東“烏坎事件”就有一個標誌性的變化，村民們在提出土地維權的利益訴求時，直接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的腐敗，明確提出了民主憲政和反腐敗的要求；而 2013 年初發生的《南方週末》抗議事件更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聚集在報社大樓前的人們亮出的口號是“解除報禁，新聞自由”和“憲政夢”，無關“人民幣”，完全是抽象的制度訴求。在趙紫陽逝世八週年的日子裡，許多上訪者聚集在北京火車站，然後來到他的故居，打出紀念這位改革犧牲者的大標語……這些來自中南海外的重要信號證明了民眾正在

迅速覺醒，鬥爭口號正在從“形而下”轉向“形而上”，標誌著“公民社會”的日益成長，這才是中國的真正希望所在。

無須感嘆，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該過去的正在過去，而應該到來的正在到來，儘管中國的改革和社會進步如此艱難和緩慢，但黑夜終歸會過去。 而在未來的變革中，前期改革失敗的教訓還將作為前車之鑒發揮著作用。 這就足以告慰那些改革的犧牲者們了——包括胡耀邦、趙紫陽等，當然也有劉賓雁——其實這正是賓雁早就引頸期盼並用畢生努力來呼喚的大變局。

就在這大變局正在快步到來時，2005 年 12 月 5 日，報春的大雁在普林斯頓闔上了他的眼睛。

劉賓雁在參加 80 誕辰晚會時，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肝部，經化療、放療後，體質逐漸虛弱，接著出現了肝癌後期的肝腹水症狀，身體器官已经全面衰竭了。12 月 4 日，醫生通知朱洪，病人的肝臟已經完全壞死。

“六四”以後，普林斯頓曾聚集了一群中國流亡者，劉賓雁以他的影響力和人格魅力成了這些海外孤兒聚會的中心。 賓雁瀕危的消息通過電話在朋友圈內傳開，最先來到的是在耶魯大學任教的中國作家蘇煒。 來到病房，他故作輕鬆地說，自己是到普林斯頓因公出差，順便來探望的。 賓雁聽了，吃力地回答：“真巧了。”然後斷斷續續地說：“將來，我們想起今天這樣的日子，會非常有意思。”最後，他對蘇煒和一同前往的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漢學家林培瑞說：“謝謝，謝謝你們來看我。”

一直守護在病床前的劉小雁說，這是父親臨終前所說的最後一句完整的話。

對賓雁最後的話，人們至今還在做著各種解讀：

——是說對蘇煒編造的善意謊話，他已經心知肚明。自己的生命已經到了最後關頭，蘇煒匆匆趕來，是專門來向他告別的？

——是說“我們”還有度盡劫波、重新聚會的機會，到那時會相逢一笑，共話當年所經歷的一切？

——是說在海外流亡的日子，18 年的苦苦抗爭，終將在未來顯現出其意義，成為人們永遠的記憶和“非常有意思”的話題？

也許這些解讀都是正確的，賓雁直到臨終還是個滿懷希望的樂觀主義者，他還相信總有一天可以和朋友們共同回顧這個時代，檢點自己在這個時代中留下的每個足跡，他還等待著“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然而，這一刻終於沒有等到，賓雁就走了。他最後闔上雙眼、停止呼吸的時間是在見過蘇煒和林培瑞之後的第二天凌晨零點 25 分。

這天清晨，普林斯頓紛紛揚揚地下了一場大雪，漫天皆白，大地縞素，像是在為一位悲劇英雄的離去而誌哀。

也許，“共剪西窗燭”的聚會還有機會，但那將是在天堂的伊甸園吧……不，應該是在人間，當中國度盡長夜、迎來光明的時候，朋友們在舉酒狂歡後，會談起已經成為歷史的往昔，其中必然包括這段普林斯頓的日子，到那時，賓雁會帶著笑容，披著榮光，翩然而降，來到我們中間，和我們共同回憶起那些“非常有意思”的往事——是的，定會有那麼一天，我們深信！

當人們發現賓雁已經停止呼吸時，朱洪還在輕輕地呼喚著：“賓雁，賓雁 ，賓雁……”還用手撫摸著賓雁赤裸的手臂，然後淚眼迷

離地對身邊冒雪趕來的鄭義北明夫婦說：“怎麼還是溫熱的？還是溫熱的……”

這個當年身體纖弱的上海姑娘，追隨賓雁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這期間，她陪同賓雁經過了無數的風霜雨雪，承擔了可怕的命運重壓；流亡以後，她成了賓雁身邊須臾不可離的護衛天使，身上爆發出令人驚訝的力量。照顧賓雁的生活，幫助賓雁的寫作，給賓雁當翻譯，當司機，開車購物、迎來送往，家務外交集於一身。很多朋友都驚嘆艷羨賓雁有這樣一個 12 月黨人妻子一般的賢內助。

如今，賓雁走了，她該如何活下去啊？眼見著，這位幹練的女主人在這一刻立即衰老了。當時，朱洪和小雁曾在賓雁闔上眼睛時對賓雁發過誓：“一定要帶你回到中國。”果然，經過五年多的抗爭和努力，她們終於兌現了諾言，讓賓雁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的妙峰山下了。而幾乎從那天起，朱洪就躺倒了，也逐漸喪失了語言的能力，每天只能靠輪椅來行動，用一絲微笑來回答朋友們的問候。只有那盯著牆上賓雁木刻畫像的執著目光還顯示著她不息的愛……這是劉賓雁一生傳奇的裊裊餘音。

“那是最美好的時期，那是最墮落的時期；那是智慧的歲月，那是沒有開化的歲月；那是信仰堅定的時代，那是懷疑一切的時代；那是陽光明媚的季節，那是黑夜深重的季節；那是滿懷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絕望的冬天；人們擁有一切，人們一無所有；人們直入天堂，人們直墮地獄……”

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篇所寫的這段文字好像是專門為劉賓雁所生活的時代寫的，恰如其分，絲絲入扣。

在這個光明與黑暗交織的世紀天空，曾掠過劉賓雁的身影。

通往賓雁在普林斯頓最後的家叫石磨坊路，正義與邪惡衝撞纏鬥的歷史磨盤，碾碎了賓雁的生命。就像摩西不能進入伽南一樣，賓雁終究也沒有親眼看到過中國人的聖地，而是倒在了奔向聖地的路上。

鄭義先生曾以《石磨坊路》為題寫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念賓雁的文章。文章的結尾是他告訴自己的女兒："這條小路的那頭，是一個我曾經進入過的最美麗的童話……"

這個關於劉賓雁命運和心靈的童話不僅屬於他，作為這個時代的縮影，它也屬於我們每個人。賓雁用他那顆燃燒的心所講述的動人故事，不應該也絶不會被遺忘。

然而，卻有兩種力量指望着用遺忘的泥土來埋葬這個名字。

一种力量是他终生的死敌——極權專制主義"新階級"的權貴們，他們在賓雁的生前死後，用盡一切手段封鎖有關他的信息，刪除他的名字，銷毀他的文字，屏蔽他的聲音，以圖讓他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當賓雁已身患重病時，曾多次給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等人寫信，並通過可靠的渠道送到他們手中。賓雁只向他們提出一個並不過分的最後願望：讓我回國，死也要死在中國的土地上。

其中通過老友盛禹九轉交的信是這樣寫的："我被確診患了腸癌，國內子女急切希望我能回國治療和休養。我本人也有意看看國內的變化，同時探望幾位親友。長姐劉放養我成人，恩重如山；1957 年又受我牽累受難，現一身傷病，年邁八十，時間不多了，我亟欲一見，略盡如子之心。同業老友健在者二、三人，亦期有一會之機。此外便是看病、買書，別無他計了……"

然而，這個絕無人性的冷血強權集團卻拒絕了一個 80 老人最

後的人道要求，甚至對他的骨灰安葬在故土也設置了重重障礙——難怪病中的賓雁曾發出感慨和疑問："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腳踏一踏那片土地，他們為什麼要害怕一位年過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

其實，答案不說自明：他們害怕這位老人一腳踏上這片土地，就會引起一場十級地震，使他們的統治大廈頓時如豆腐渣一樣傾覆坍塌。儘管他們現在天天高喊"三個自信"，實際上是"過墳地吹口哨"，他們根本沒有一絲自信，有的只是深入骨髓的恐懼，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讓他們心驚肉跳。

還有一種力量來自另一個極端——那些似乎和賓雁並肩而行的隊伍中，有人已經迫不急待地準備要和賓雁"分道揚鑣"，在賓雁遺體未寒的時候就站出來對他指手劃腳了。

高爾基有一篇散文詩《丹柯的故事》，說的是：為引導族人走出密密叢林中的漫漫長夜，勇士丹柯撕開胸膛，掏出自己的心，用發光的心來照亮道路。當隊伍走出密林，來到陽光明媚、鮮花盛開的草原上，人們在歡慶勝利時，卻忘記了丹柯，甚至用腳踩碎了那顆仍然在燃燒的心。於是，勇士高貴的心從此化作飄蕩在草原夜空的藍色螢光……

北明女士曾引用這個故事來說明一些人的心態：這些人以為自己已經手持更明亮的火炬，甚至以為已經擁有太陽了（是否如此大可懷疑），不但無情地一腳碾碎了丹柯之心，甚至回頭嘲笑那曾照亮道路的心靈之火是如何黯淡——當然，勇士丹柯不會計較這些，引導人們走出密林長夜才是他所關心的；但是，這種輕慢是道德的嗎？就算你踩著賓雁的肩膀登上了更高的台階，難道你就有權譏諷腳下

的肩膀太低了嗎?

這就用得著賓雁晚年經常說的那兩句話了:“政治不能非道德化”和“我們大家講點良心,好不好?”

然而,這兩種力量都不可能使劉賓雁的名字被人們遺忘,充其量它們只能像日月之蝕一樣暫時擋住天光,但終究無損於賓雁的光芒。

對劉賓雁逝世的消息,儘管大陸中國的官方媒體不作一字報導,電腦網絡上也進行了瘋狂的屏蔽和刪除,但是,這個消息還是在國內廣泛傳播開來了。人們以各種方式寄託哀思,劉賓雁治喪委員會收到世界各地雪片一樣發來的唁電、輓聯、信件和捐款,報名參加治喪委員會的人士達到近千人,其中中國大陸就有 300 多名,他們大都冒著風險勇敢地署上了自己的真名。12 月 17 日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劉賓雁追思會雲集了從美國和世界各地趕來的 200 多人,成了這些年來中國流亡者辭世後參加人最多的悼念活動。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還決定,把劉賓雁的青銅胸像永久陳列在這所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閱覽室中,並收藏賓雁生前的大量文稿。中國當代記者和作家能獲得如此殊榮的除賓雁外再無一人。

最能說明賓雁價值的不是這些顯赫的榮譽,而是在追悼賓雁逝世期間發生的一件“小事”:尚在國內的藝術家嚴正學先生在聽到賓雁去世的消息後,決定在他所居住的浙江台州,為賓雁的追思會進行三天的義務募捐,藉以測試劉賓雁在人們心中的分量。他寫了一篇題為《魂兮歸來》的募捐函,到處奔走散發,三天募集到 6008 元。捐款者有企業家、商人、政府公務員和法官,其中最讓嚴正學感動的是,他到一個公共廁所裡如廁,順手把募捐函放在賣手

紙的櫃台上。回來後發現廁所清潔工正在一字一頓地讀募捐函，然後推出一把硬幣給嚴正學，共有三枚一元的，四枚五角的，說："這是我為'中國良心'的捐款。"他告訴嚴正學，前幾年曾被人綁架到地下黑煙廠去當苦工，失去了自由。絕望之際，他在一本撕得破爛的舊雜誌上讀到了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天天反復看這篇文章，成了他最重要的事情。從中他得到了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心，直到最後被解救出來……這個廁所工最後還在捐款名錄上鄭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王永林"。嚴正學攥著這伍元錢，禁不住嚎啕大哭起來。

儘管賓雁去國 18 年不能回，儘管當局對他的名字實行了最嚴厲的屏蔽，儘管他已經長眠於異國他鄉，但是他還活在中國普通百姓的心中。有什麼比這更能讓人感到安慰呢？被嚴重汙染的中國太需要這樣的"廁所清潔工"了！

如今，不斷有人悲嘆，大陸中國沒有戈爾巴喬夫，沒有葉利欽，沒有索爾仁尼琴，沒有薩哈羅夫，沒有團結工會；甚至也沒有蔣經國，沒有美麗島……是的，這是事實。但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是"至少我們還有劉賓雁"，如自由主義理論家劉軍寧先生所言："不要問中國的蔣經國在哪兒，也不要問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在哪兒，要問造就蔣經國與戈爾巴喬夫的公民態度和公民行動在哪兒。"我們的希望不會在悲嘆和埋怨中產生，而在於要像劉賓雁那樣行動起來，啟發每個"廁所清潔工"的自覺，形成變革的大環境，造就產生戈爾巴喬夫和蔣經國的土壤，到那時，該出現的歷史角色就必然會應運而生了。

正如賓雁所言，"中南海越來越不重要了"在將來中國的變革

中，民間壓力的足夠強大才是決定性的因素。這裡需要的是春雨潤物般的不懈啟蒙，精衛填海式的堅韌努力，追求的是“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最後成功，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虛妄幻想和無所作為的消極等待。

邵燕祥贈賓雁的一句詩“鴉雀無聲雁有聲”傳誦甚廣，簡潔而準確地說明了賓雁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裡所佔據的獨特地位。無獨有偶，賓雁逝世後，為抗議當局對這一重要消息的嚴密封鎖，大陸上一位著名的時政評論家在網頁上貼出了一隻大雁在雲天中自由翱翔的圖片，又貼出了一群大雁呈“人”字隊形隨頭雁頂風前進的圖片。

如今這隻領航的大雁已在獵人和歲月的炮火中隕落，但“雁過留聲”，他在烏雲翻滾的時代天空中所留下的高亢嘶鳴久久不息，至今仍餘音迴盪。其實他留下的何止是幾聲悲壯雁鳴和一行雪爪鴻泥，他“踏石留跡，抓鐵有痕”，在中國新聞史的崎嶇石板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跡、在遮天蔽地的專制鐵壁上留下的道道抓撕之痕，這已經化入永不消逝的歷史。

陳奎德先生在追思會上的這些話，應該是對賓雁的蓋棺之論：

——當代中國，禮崩樂壞，道德淪喪，貪腐橫行，濁浪滔天。於是有了劉賓雁。

——他因良知而挺拔，他因正義而高貴。

——賓雁先生的意義，主要不是政治見解，而是道德人品；主要不在意識形態，而在悲天憫人；主要不在物質層面，而在精神引力；主要不在上層集團，而在草根大眾。

——他來了，他說了，他做了。如今，他去了……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北明: 劉賓雁先生逝世前後

蘇煒: 穿岩的水滴

郭羅基: 賓雁, 我要歡笑

嚴正學: 我為劉賓雁募捐到人心

鄭義: 石磨坊路

王軍濤: 賓雁的執著與掛念

劉軍寧: 關於改革的頂層設計是一條死路

陳奎德: 劉賓雁祭

第二十章　人字雁陣

是的，賓雁的死敵——那些教廷的大祭司們還沒有忘記他，用切齒的仇恨和徒勞的封鎖；而有良知的作家、記者和廣大讀者也沒有忘記他，用不滅的記憶和真誠的懷念。他不僅是幾代新聞人心中的偶像，他的新聞思想和新聞改革實踐，也是當代新聞事業發展的方向標和不竭的動力

旅美學者高爾泰為劉賓雁所寫的輓聯：莫道英雄去不還，已聞新雁起寒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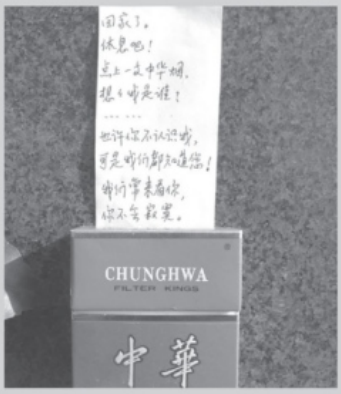
胡舒立

盧躍剛

程益中

高勤榮

2011年劉賓雁安葬一週年之際，墓地前來了一群年輕新聞人。



“點上一支中華煙，想想我是誰？”不論是誰，他必定是——讀者。

劉賓雁是個記者，也是個作家，但首先是個記者。他的作品幾乎篇篇都是新聞要素齊全的新聞作品。他所開山創新並一生使用的的主要武器“報告文學”實際上是新聞性的真實，哲学性的思考加上文學性的表达，三者的统一體，其基本屬性是新聞，真實是它的生命，哲學是它的靈魂，而文學是它的衣衫。一般來說，它比單純的新聞要思考得更深刻，表達得更有感染力。他的作品氣勢宏大，高屋建瓴，思想敏銳，語言質樸，不玩弄文字遊戲，戒絕了流行一時的僞先鋒派花哨形式，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賓雁風格”，為中國文壇注入了一種強勁的陽剛力量，對中國新聞和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著名報人和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認為“報告文學”應該叫“報導文學”或“非虛構寫作”更確切。除了這種來自作品自身規律的需要以外，從外部原因來看，這種新聞體裁和文學樣式是中國嚴苛的新聞審查制度下的一個特殊產物，官方的出版審查對文學作品比對新聞報導要相對寬一點，給新聞加上文學的外衣似乎更容易過關。這是在沒有新聞自由的環境裡逼出來的一種生存之道，也是對文化專制的一種無聲抗議。

劉賓雁是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和實踐承前啟後的重要一環，他在空前嚴酷的文化專制時代爭取了新聞自由的一線空間，延續了自由新聞的血脈。

翻開中國新聞史，你才會發現原來我們還曾有過那樣輝煌的自由主義新聞傳統，中國新聞界還曾經有過那麼多閃亮的群星。

中國近代新聞傳媒誕生很晚，是國門洞開、西學東漸的伴生物。但最早引進先進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和革新家幾乎都是中國新聞事業的開山者。為了傳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啟發民

智，救亡圖存，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從創辦大眾報紙開始自己的事業。1874 年主持成立中華印務局，創辦中國第一份民辦報紙《循環日報》的王韜與官辦的洋務派報紙不同，把報紙辦成了民間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論壇，並親自動筆，每天撰寫“論說”一篇，開了“文人論政”之先河；寫下中國思想史上的“奇書”《盛世危言》的鄭觀應在書中就列舉了報紙和新聞在救災、除暴、傳播信息等方面的強大功能，大聲疾呼要允許民間辦報，並指出：“若欲富國強民，捨此而無它！”他還奉勸朝廷應學習英、美的新聞自由，而不要學習日本的新聞審查，主張頒布“報律”（即新聞法），以保障“秉筆者主持清議之權”，反對“閉塞言路”，這已經有了現代自由主義新聞理論的雛形了；而變法革新的領袖康有為則先後創辦了《萬國公報》和《強學報》，梁啟超也創辦了影響力更大的《時務報》，他們以此為陣地，宣傳“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的變法改革思想，為後來的戊戌變法大造輿論；而中國自由主義的激進大師譚嗣同則更進一步，主張報紙應是“民報”，是“國口”和“民口”（即國家和民眾的喉舌），他還主張“道（真理）非聖人所獨有也，尤非中國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以私諸中國則大不可。”這簡直是在主張“普世價值”，反對所謂的“中國特色”了（見他的大作《仁學》）。改革派的靈魂嚴復也辦過《國聞報》和《國聞匯編》。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在報上發表了“六君子”死難的真相和康有為脫險的經過，還親自寫了《戊戌八月感事》詩哀悼死難者；《時務報》的“總理”、新聞奇才汪康年一生在報館工作了 26 年，除了《時務報》外還先後辦過《昌言》、《時務日報》、《京報》等報紙和“海外通訊社”，1911 年因患肺結核死於報館，臨死時口中還念念有詞：“袁世凱不是華盛頓……”至於民國

時代，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足跡的著名報人就更是一大串閃亮的名字了：孫中山、章太炎、于右任、陳獨秀、胡適、李大釗、蔡元培、邵飄萍、任白濤、戈公振、史量才、張季鸞、成舍我，乃至王芸生、徐鑄成、儲安平……報紙和刊物在他們的手下都曾經有了搏動的生命，會發出嘆息歌哭和嘻笑怒罵，成為風生水起的大變革時代的弄潮兒和見證人。

然而，這個群星薈萃的系列到 1949 年便戛然而止了，中國自由主義新聞的血脈被一刀斬斷，歷史走到這裡遇到了一個懸崖。中國的新聞從業者雖然人以萬計，報刊品種也以千數，但是從那一天起他們都失去了自己的面貌、個性和不同的音色，變成了一台台只會播送同一張唱片的留聲機。每天成千上萬噸的新聞紙上都印著一模一樣的字句，重複著按設定程序生產出來的制式官方新聞。這裡有的只是震耳欲聾的寂寞，鋪天蓋地的貧乏，實實在在的空洞，和千真萬確的謊言，不但沒有了真實的信息，連人話都不多了。

在這 60 多年裡，如果一定要找出一個真正新聞人的標誌性代表來，那就非劉賓雁而莫屬了。他是一個奇跡，就像洪荒時代孑餘的一頭恐龍，大戈壁中枝葉扶疏的一株胡楊，兵馬俑陣中一個脈搏跳動體溫猶存的肉身，死寂的山谷中憑空乍響的一聲洪鐘。他不僅僅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還是一種不死的人文精神和新聞理想的化身。正因為有了他的存在，中國新聞才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等因奉此”的語言垃圾堆裡透出了一線人氣和生機，才有了值得一說的歷史；反過來說，刪掉了劉賓雁名字的中國新聞史肯定只是連篇的謊言和廢話。

在上個世紀的 50 年代，中國新聞界曾颳起過一次為時不長的

變革之風，風源是當時的《中國青年報》。瞭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劉賓雁是這次變革的主要推手和鼓動者之一。這是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新聞界第一次改革的嘗試，而改革的理念主要有兩個，那就是“辦大報”和“干預生活寫真實”。

所謂“辦大報”，就是對報紙的定性、定位、功能、活動範圍、報導視野和目標讀者等根本性的因素進行主動的突破。這是對當時媒體管理體制的一次挑戰，也是向新聞本體迴歸的一次努力。

中共雖然標榜是一個要“打翻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的“革命黨”，但是，從一開始就從傳統的專制制度那裡繼承了官僚體制的舊框架，在內部實行了壁壘森嚴的等級制。待進城建政之後，這個官僚體制又像墨跡擴散一樣迅速地覆蓋了整個社會。新聞媒體是最早被收進官僚管理體制籠筐的社會機構，因為毛澤東早就把“槍桿子”和“筆桿子”視為政權的兩大支柱。從那時起，中國的所有新聞媒體老闆都是一個——黨，黨管媒體成了一條不言而喻的法外之法，民辦報紙一份也沒有了（最後一份名義上歸“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主辦的報紙《光明日報》1957 年“反右”以後也被中宣部收編了）。在這個前提下，全國的新聞媒體被納入黨政體制序列，又根據屬地管理和部門管理的原則被縱向區分為不同的等級，如中央級、部級、副部級、省級、地市級、縣級等。而從橫向來看，除了各級黨委機關報之外，各部門機構主管的報紙又被統稱為“行業報”，它們的報導範圍就被限定在該行業的範圍之內。如《中國青年報》的主管部門是團中央，它就被定性為“團報”——共青團的工作報紙，就像《工人日報》由總工會管，主要報導工會工作，《中國婦女報》歸婦聯管，只能報導婦女工作，《計劃生育報》歸計生委管，只管報導計劃生

育工作一樣。

這種以前蘇聯為範本複製的管理體制使治下的媒體與新聞之間隔了一條鴻溝。它的第一屬性不是新聞，而是“宣傳”——它報導的不一定是事實（或者說一定不是事實），但一定是官方想聽到，也想向人們灌輸的聲音，這就使所有的報導都有了一個預設的籠子。而每個媒體又都有一個事先畫好的視野邊界和報導範圍，這就給它的內容加上了第二道藩籬。“在籠子裡跳舞”是這種現狀的形象描述，而且這個籠子的空間小得可憐，連伸頭直腰都有困難，何談起舞？

50 年代《中國青年報》的改革首先就把矛頭指向了這個僵死的體制。他們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目標：沖決“團報”的籠子。理由也很充分：報紙的目標讀者群是全國的青年，而青年是全國各地、各行業的主力軍和生力軍，幾乎沒有一個地方和崗位上沒有青年，而青年人所關心的事情也無邊無界，古今中外、各行各業、各個領域都在他們的關注之中，因此，這份“青年報”就不能只辦成狹義的“共青團工作”報紙，必須是一份全方位、全視角、功能齊全、面向全國的綜合性“大報”。在這一指導思想的形成過程中，劉賓雁從蘇聯帶回來的《共青團真理報》辦報經驗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份報紙是當時蘇聯最有活力和銳氣的報紙，在社會生活中舉足輕重，影響巨大（如今在蘇聯解體、蘇共垮台以後，這份報紙依然生存著，當然已經面目一新，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了），這讓中青報人深受鼓舞。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得到了團中央的支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當時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是胡耀邦，這是中共領導中少有的思路開闊、思想解放、有進取精神的幹部。

所謂“干預生活寫真實”，也是劉賓雁“西天取經”的結果。奧維奇金關於新聞要“寫真實”和“大膽干預生活”的思想為中青報人提供了借鑒的榜樣和改革的理論武器。賓雁不僅熱心地“傳經”，還身體力行，用《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等作品為“寫真實”和“干預生活”做出了有說服力的範例，對推動報紙的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中青報推出了一個專門進行社會批評的欄目“辣椒”，以短小精悍、尖銳大膽、語言生動而聞名全國，那個時代的讀者很少不是“辣椒迷”，這些人現在都是70歲以上的人了，但提起當年的“辣椒”仍然記憶猶新。其實，這個靈感也來自蘇聯，蘇聯《共青團真理報》有個欄目叫“鱷魚”，就是“辣椒”的範本。這當中賓雁的引進之功顯而可見。

可惜的是這次改革為時不長，就被1957年的“反右”運動所打斷了。當時改革的主將和劉賓雁一樣，幾乎全數被打成了“右派”，改革也中途而廢了。但是，這為中國後來的幾次新聞改革積蓄了經驗，準備了思想理論武器。

到了80年代，《中國青年報》進入了她的第二個高峰期，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又成了中國新聞界的一面旗幟。這時的賓雁已經離開了中青報，到《人民日報》去馳騁天下了，但是他們當年形成的辦報理念仍然是中青報改革的基礎。80年代的中青報已經實現了賓雁那一代的夢想，儼然成了一張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大報”，最高發行量一度達到二百多萬份。其介入社會生活之廣泛，進行輿論監督之銳利，研究中國問題之深度，和表現形式之創新，一時都成為全國媒體的榜樣。特別是賓雁所開山創造的“報告文學”體裁，在那時的中青報上已經成了標牌式的重量級武器。那個時代的中青

報培養出了一大批劉賓雁型的著名記者和報告文學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有李大同、盧躍剛、賀延光、麥天樞、張建偉等人。新一代的中青報人站在劉賓雁那一代的肩膀上，攀登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們都自豪地承認自己就是劉賓雁的衣缽弟子，薪火傳人。他們雖然比賓雁小了一代，多數沒有機會與賓雁共事，有的甚至沒有見過面，卻都對賓雁一往情深。

當然，賓雁的事業繼承者不光在中青報，在《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地的新聞界中有一大批，不少新聞人是沿著他的腳印走上新聞之路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是一隻領頭大雁，在他身後列成了一個呈梯次隊型的宏大“人字雁陣”，這已是當代中國新聞界的中堅力量。高爾泰先生奉獻到賓雁靈前的輓聯“莫道英雄去不還，已聞新雁起寒汀”，絕非虛言。

賓雁被開除黨籍，離開人民日報社以後兩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了。中國新聞界受到一次嚴峻的考驗。在運動的高潮中，全國所有媒體，包括報紙、電視台、電台幾乎無一例外地站在了抗議學生一邊，嚴厲的新聞管制癱瘓失靈了，新聞出現了半個多月的“大解放”，廣場上的情況、社會各界的反響得到了充分的報導，這在中共建政以後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6月3日夜到6月4日晨，大鎮壓開始了，全國、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北京。在這個歷史性的關頭，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在頭版上居然出現了這樣一則加框新聞，標題是《北京這一夜》，全文如下：

【本報6月4日凌晨5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3日22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了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员的傷亡情况。

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进天安門廣場。

這條消息連標題帶電頭和標點只有170個字符，沒有任何具體細節，讓人根本無法瞭解現場的真實情況，似乎已經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地步了。但是，這是對“六四屠城”的第一篇由官方權威媒體發布的新聞，也是曇花一現的“新聞大解放”的終結。仔細閱讀這則消息，可以從中得到這樣一些重要信息：

其一，事件已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宣布這一定性的不是黨中央的《人民日報》，而是軍方的《解放軍報》；

其二，沒說是誰“暴亂”了，只說事件是由“戒嚴部隊進城”引起；

其三，軍隊開槍了；

其四，有了大量傷亡（眾多醫院報告）；

其五，部隊已“突進”到天安門廣場；

第六，標題《北京這一夜》是中性的，沒有表示對軍隊行動的支持和讚揚。

每一個讀者都可以讀懂：最重要的東西不是已經說出來的話，而是在槍口和刺刀下無法說出的東西。這是一篇必將寫進歷史的重要報導，其意義甚至遠遠超過皖南事變後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上刊出的周恩來手書“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在看似平靜平淡

的簡單報導後面，是可以想象的血腥恐怖真相，是新聞人壓抑不住的無比悲憤。這就是劉賓雁剛剛離開不久的《人民日報》，這份報紙多年來說了無數的謊話，這一次雖然沒有說出全部真話，卻沒有說謊。這則消息原來有上千字，經過七砍八削，最後見報時只剩下這 170 個字符了。但這 170 個字符的份量重如千鈞，超過很多人一生所寫文字的總和，足以在中國新聞史上佔據重要的一頁；而這篇報導誕生的幕後故事更應該讓人們知道。。

寫這篇報導的記者是劉賓雁在《人民日報》的同事、學生和好友張寶林，劉賓雁的骨灰安葬儀式他也在場。他的岳父是原《大公報》著名記者高集，1946 年南京學生和市民舉行示威被鎮壓的“下關事件”中，他作為現場記者也被毆打致傷。沒想到 40 多年後，他的女婿也要成為一次空前血腥的大屠殺的目擊者和見證人。

6 月 3 日晚上，張寶林一直在木樨地一帶採訪民眾阻攔軍車的情況。他親眼看到軍人開槍、市民倒地、血灑長街的慘景。每次槍聲響起，他都伏身在地，而每次都看到身邊有倒下而永遠站不起來的人。當他身上帶著傷亡者的血跡跑回報社，報告現場情況時，泣不成聲，聽者也圍成一圈，嚎啕大哭。這時，前方記者相繼回到報社，每個人的講述都引起一片哭聲。《人民日報》總編室裡灑滿了悲憤的淚水。

6 月 2 日下午，主持報社工作的社長錢李仁召集緊急編委會，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布自己馬上開始休假；而總編輯譚文瑞戒嚴前突然吐血住院，這時主持工作的是第一副總編陸超琪——錢李仁和陸超琪在兩年前開除劉賓雁黨籍時，曾持反對意見，還直接找中央表達過，但最後不得不執行了中央的決定。這次，他們都以

各自的方式對大屠殺表示了的不合作立場。

當時，記者們圍住了陸超琪，哭著說：《人民日報》在歷史上犯過多少次錯誤，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還有一個多月前發的“四二六社論”，哪次不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我們為他們揹的黑鍋還少嗎，今天，難道我們還要再說謊嗎？群情激憤，空氣像要爆炸了。

陸超琪眼裡也滿含著淚水，說：“你們先把稿子寫出來。”

記者們商量著寫稿子，隔著大玻璃窗看到陸超琪正在和另一名副總編輯以及兩位總編室負責人在開會。

到凌晨 4 點，陸超琪桌上的紅色電話機響起來了——是中宣部副部長王唯純打來的，他厲聲宣布：今天軍隊清場的消息，誰也不准報導，否則誰報導誰負責！

此時，坦克已經隆隆地開到了報社大門前，士兵們端著衝鋒槍怒視著大門前聚集的人群。 編輯、記者和報社的家屬們站在槍口前向著士兵們喊話、譏諷和怒罵。 突然，槍響了，僅距幾米遠的槍口發出了刺目的閃光，一排子彈呼嘯著從人們頭頂掠過。 人群頓時肅靜下來。

這槍聲震盪著總編室。 張寶林就在這槍聲中寫下了 100 多字的稿件，記下了他和其他記者們在北京街頭見到的情景，以及從電話中不斷傳來的血色信息。 而最後的壓力全部集中到陸超琪的頭頂——發，還是不發？

最終的決定是發——但是要刪節。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刪節，一千多字的稿件只剩下了那 170 個字符。 但是，總歸是發出去了，這個必將寫入歷史的短消息，這個在坦克炮口前寫下的文字，這個捍

衛了中國新聞人最後尊嚴的表達。

雖然賓雁已離去，但他的思想、風骨和影響猶存。賓雁隨後在海外對這一事件發出的怒吼，絕不僅是他個人的聲音，而是中國新聞人共同的心聲。

2004 年夏天，賓雁逝世的一年前，《中國青年報》院內又發生了一起轟動世界的事件。本來在“六四”以後，隨著全國對民主運動的大鎮壓，中青報的第二次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夭折了。在整個 90 年代，中青報偃旗息鼓，鋒芒頓斂，發行也直線下滑，從 80 年代後期的 200 多萬份直降到 40 萬份，少了五分之四。但是，團中央還是不滿意，要求《中國青年報》徹底扭轉辦報方向，從“綜合性大報”退回到“團報”，即 1951 年創刊之初所確定的“青年團工作報”的定位上去，這一倒退半個世紀的荒唐決策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絕大多數記者編輯包括報社領導的抵制。為此，團中央痛下殺手，突然對報社班子強行改組，從人民日報社調來了一個執行他們意志的新人當頭，組成新的領導班子。這一必將把中青報至於死地的決定激怒了整個報社，以著名記者、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為代表的 70 多名中青報編輯記者聯名寫信給團中央書記處和第一書記周強（此人後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2013 年成爲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提出了有理有力的強烈抗議。但是，他們的意見遭到周強的斷然拒絕，他派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此人現任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到報社嚴詞訓話，竟說出“誰要是不聽話，隨時可以滾蛋”這樣的粗話來。於是，盧躍剛針鋒相對地寫了一封公開信，連同原來給團中央的信一齊發到互聯網上，要讓大家看一看“誰該滾蛋”。一場絕無先例的大風波就這樣鬧起來。

流亡國外的劉賓雁對此極為關注，把這叫做“趙勇和盧躍剛之間的戰爭”，還在香港《爭鳴》上發了一篇文章《盧躍剛破天荒的挑戰》，對盧躍剛們的抗爭發出了強力聲援。他在文章中回憶了自己親自參加和親眼看到的中青報兩次改革的歷史，高度評價了年輕一代中青報人的鬥爭：一個下級單位的成員與上級領導公開決裂，把堂堂共青團中央放到被告席上，讓他們在全世界面前出了醜，這是“前所未有的”，是“打破歷史記錄的”。

盧躍剛從來就沒有見過比他大 32 歲的劉賓雁，2000 年他託人把自己的作品《大國寡民》和三大本報告文學《自選集》捎給流亡中的賓雁，兩人才建立了聯繫。劉賓雁仔細閱讀了這些書，給盧躍剛寫了回信，這封寫於當年 8 月 14 日的信中欣喜之情洋溢於文字之間，大有相交恨晚的感慨。他說：“同那些比我年長 32 歲的人相比，你我之間的距離是短多了。這是什麼東西造成的？很值得思索。是否由於我們人雖兩代，卻以不同方式經歷了相同的人民大苦難？當然縱使是同代人，甚至有過相同經歷（比如當右派）的人，相互間的距離也未必比你我之間更小……”盧躍剛的作品《在底層》後面有兩篇評論，說他的作品已經超過了劉賓雁，對此賓雁表示完全贊同。說：“只想告訴你，被超越也能是一種樂趣，而且我為不能在中國體驗你所發生的影響深感遺憾！”他絲毫沒有“後生可畏”的忌妒之心，卻有“後生可喜”欣慰之情，其英才相惜的仁者心胸著實令人感動。

盧躍剛的復信也同樣真誠動人：“1979 年，您的《人妖之間》發表時，我在四川涼山地質隊當苦力，正在為改變命運而苦苦掙扎。七年後，我調進中國青年報，聽說了您的很多故事，大多有傳奇色彩。您 50 年代任過主任的青工部，後來改為經濟部，90 年代初期，我曾

任過經濟部副主任，有非常強烈的前仆後繼的感覺……”

他還寫道：“我認為，在當今中國，當一名優秀的記者或作家，應該有起碼的歷史感。所謂歷史感，其中一條，就是不能重蹈許多前輩在荒唐歲月裡人云亦云、助紂為虐的覆轍。歷史證明，那種甘當‘工具’、‘喉舌’的選擇，重則禍國殃民，輕則敗壞風氣。我編這套書的主要意圖，就是要延續您為代表的中國青年報敢於講真話，敢於面對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和衝突，敢於觸及社會敏感部位的傳統，讓那些有志於中國社會進步的年輕記者知道真精神之所在，雖然為此要付出代價……”

兩人還在信中深入地交流報告文學的寫作體會，研究國內各種思潮起伏演變的原因，分析海外民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這兩個從未謀面朋友的交流一下子就進入了最深層。一老一少，兩代鬥士，隔山隔海的這種傾心交談，既證明了賓雁思想人格的感召力，也預示著中國自由主義新聞事業的光明前程。火種不滅，希望就不滅！

盧躍剛一直期待著有一天能和劉賓雁聚會一堂，促膝暢談；賓雁也迫切希望能和這個後起之秀會師於勝利之日。但是，他們終於沒有等到那一天。

2005 年 12 月 5 日，賓雁在美國逝世的消息傳來，第二天晚上，盧躍剛按預定日程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去演講。走上講台，他無言地擦去主人原定的講課題目《以人民的名義》，板書了“記者的底色”幾個大字。然後說，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我要換一個題目來講。一位偉大的記者和作家昨天去世了，你們知道是誰嗎？聽眾默然。接著他問：“你們知道劉賓雁嗎？”全場六七十個新聞系的研究生一臉茫然，無人響應，只有一個人用不確定的低聲回答：“知道。”

盧躍剛又問:“誰知道劉賓雁的代表作是什麼?”全場死一樣的寂靜……

盧躍剛後來寫了一篇題為《有一個人,叫劉賓雁》的文章,記錄了這個時刻。他說:“我可以用‘驚心動魄’來形容這種‘寂靜’。”……短短的十七八年時間,就忘光了,忘得真快,忘得真徹底,要知道這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新聞系的研究生課堂!……他們謀殺了歷史,也謀殺了記憶!

於是,他就把這一課變成了“關於劉賓雁的 ABC”……

到了 2009 年,賓雁逝世後的第四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為慶祝改革開放 30 周年,搞了一次報告文學評獎,從 1978 年到 2008 年全國發表的報告文學作品中評出 30 篇優秀作品,代表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最高成就。但是,評委會通知,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國當代最重要的兩位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蘇曉康的作品不在評獎之列。全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中國青年報》記者、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的衣缽傳人之一盧躍剛於當年 2 月 26 日發表了一封致報告文學學會的“公開信”,對此提出了嚴重抗議。

他在“公開信”中宣言:“如果剔除了劉賓雁、蘇曉康,30 年報告文學的歷史是完整的和真實、客觀的嗎?獲獎作品能代表 30 年報告文學的‘最高成就’嗎?”他還列舉了劉賓雁的代表作《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和《千秋功罪》,蘇曉康的代表作《陰陽大裂變》、《神聖憂思錄》、《洪荒啟示錄》和《烏托邦祭》等,深情地說:“至今我們都很難忘記這些作品發表後社會反響的盛況。無論是從影響力而言,還是從文體的開創性而言,即對 20 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的貢獻而言,當下獲獎的同時期作家沒有能超過劉、蘇二位的。取消

了頭馬的競賽有什麼意義呢？……我始終認為，評價 20 世紀中國報告文學，書寫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歷史，繞不開劉賓雁、蘇曉康，他們是上世紀 70、80 年代中國報告文學標誌性的人物。”盧躍剛這些勇敢評論的意義在於，他打破了賓雁和曉康去國後關於他們名字的長期禁忌，使一段塵封的歷史又回到了人們的視野，這在竹幕後的大陸文壇和新聞界激起了層層漣漪。

當時，評委會已經決定要將盧躍剛的作品《以人民的名義》列入獲獎名單。但是，盧躍剛說：“排除劉賓雁、蘇曉康，作為獲獎者，至少我有這樣的強烈感受：這是讓我們這些 30 年報告文學文體風暴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來抹殺歷史，嚴肅講，是一種對作家人格和智力的調戲和侮辱。戕人，然後自戕。”

他莊重宣告：“我不能參加這次評選。這次評選的標準、結果，有違我報告文學創作的主張和價值觀、歷史觀，也有違我之前做出的相關決定。”

這封正氣凜然、大有賓雁遺風的“公開信”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才是對賓雁及其作品的公正評價。劉公的在天之靈應該笑慰，他不但沒有被人們忘記，後繼者還大有人在焉！

當本書的寫作正在進行時，盧躍剛又打來電話，氣憤地通報了這樣的事實：2011 年 11 月中國作家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其間，作協官方網站的資料庫關於歷屆作協領導人的介紹中，公然刪去了第四次代表大會民主選舉出的副主席劉賓雁的名字。這是對歷史的又一次篡改，說明對劉賓雁的清剿在他去世後仍在繼續。對此，盧躍剛表示了強烈義憤和譴責。

這裡較多地舉了盧躍剛的例子，因為他是賓雁在《中國青年報》

的事業傳人，也是繼賓雁之後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 其實，當今活躍在中國新聞最前沿的優秀新聞人中間，誰沒有一個他和劉賓雁的故事啊。

你去問問胡舒立吧，這位被海外稱為“最危險的女人”的新聞界“老虎殺手”，曾經先後是《財經》週刊和《新世紀》週刊的掌門人，她在陳良宇倒台前就公開揭露了上海社保大案，打響了一場反腐大戰和政治搏鬥的信號彈；在中共十七大前又揭開了驚天的“魯能”之謎，矛頭直指一個在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這在中國都是史無前例的。 要知道，這位新聞女強人 80 年代初作為《工人日報》的記者時，就曾跟著劉賓雁一起出去採訪、寫作，受過賓雁的耳提面命，賓雁是她剛出道時的老師。 在賓雁骨灰安葬儀式上，始終攙扶著朱洪的就是這位賓雁的好學生。

你去問問程益中吧，這位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聞自由獎”的《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的創始人，是世紀之交中國新聞界高擎自由火炬的風雲人物和一面旗幟，曾以他的膽識魄力和輝煌業績震驚了新聞界，也曾因此遭到囹圄之災。 他迎著正在降臨的災難說出的名言“沒有熬不過的黑夜，沒有等不來的黎明”，曾經感動和鼓舞過全國有新聞自由理想的一代人。 他雖然沒有機會追隨劉賓雁左右，但是他心目中的榜樣始終就是劉賓雁啊！

你去問問高勤榮吧，這位當今中國因報導而住冤獄時間最長的鐵血記者，也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新闻自由奖”的獲得者，他原在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觀察》雜誌任政法部主任。1998 年因為揭露山西運城地區耗资两億八千萬的假滲灌工程，被誣陷判刑 12 年，實際被押八年零四天。 出獄後至今還在為自己的冤案奔走呼號，同時

仍為民请命，連爆驚天大案，繼 2009 年揭發了山西省焦煤集團董事長白培中被劫匪搶了 5000 萬元卻報案 300 萬的離奇怪事後，幾年來，再一系列揭轟動全國的新聞，如《山西一人大代表四個老婆十個娃》，以及“房媳”張彥擁有山西、北京兩個戶口 12 套房產的黑幕揭開，就是他最新的戰例。 因此他不斷遭到了死亡威脅，但他說，做一個劉賓雁式的記者是他的人生理想，為此九死而無憾!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有多少人是在《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的感召下才拿起新聞筆的呀……如果有人能寫出一本大書《追隨著劉賓雁的身影》，那將是一部氣壯山河的英雄譜，一部中國新聞人追隨摩西的出埃及記。

是的，賓雁的死敵——那些教廷的大祭司們還沒有忘記他，用切齒的仇恨和徒勞的封鎖；而有良知的記者、作家和廣大讀者也沒有忘記他，用不滅的記憶和真誠的懷念。 他不僅是幾代新聞人心中的偶像，他的新聞思想和新聞改革實踐，也是當代新聞事業發展的方向標和不竭的動力。

賓雁最早和老一代中青報人喊響的衝破禁錮“辦大報”的思想，如今已經成了所有有出息、有雄心和事業追求的媒體人共同的理念。 信息時代的來臨也給這種理念提供了充分的合理性證明。在互聯網已經覆蓋整個世界的時候，媒體的受眾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聞的讀者、觀眾和聽眾的地域性越來越淡化，人們的視野、信息來源和關注興趣正在迅速地全國化和全球化，貼近性當然仍受到重視，但誰也不能要求一個人只關心自己所生活的小範圍內所發生的事情，一個老農民也會對發生在萬里之外的“911”密切關注，一個縣城的小青年喜歡看 NBA 或世界杯也沒什麼可奇怪，而全國各地

的新聞信息受眾隔著千里之遙睜大眼睛看重慶發生的事情，難道不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嗎？地球變小了，人們的眼高了，對新聞和信息的需求更普世化了，這就是媒體要面對的現實。你憑什麼要求他們只看他所生活的行政區劃之內的媒體呢？即使是一個地市媒體，如果不全方位、全視角地報導全國、全世界的重要信息，讀者可以不買你的報，電視可以換掉你的頻道啊。想死的就別變，不變的就等死吧。

在這個信息已經全球化、受眾已經“全息化”的信息時代，再堅持陳舊的按行政區劃、按官場級別來規定媒體的新聞視野和報導範圍，就成了一個愚不可及的笑話了。中宣部三令五申不准搞“異地監督”卻效果不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這裡。用僵死的計劃經濟時代的理念方法來管理信息時代的媒體和新聞，注定是死路一條，可那些榆木腦袋還是抓住陳舊的老本本念經，你拿他們有什麼辦法呢？當年盧躍剛對團中央的破天荒挑戰，後來《南方週末》對省委宣傳部的絕地反擊，這種媒體人“造反”的舉動絕不會只是偶然的特例，而是民眾維權鬥爭的升級版，追求新聞自由的抗爭已經匯入憲政運動的時代主流了。

如今，一批適應信息時代和市場條件的“小報”已經迅速發展成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大報”了，特別是在 90 年代崛起的一批“都市報”已經在市場上生了根，開了花，結了豐碩的果實，而原來壟斷輿論的“老大”——各級“黨報”卻都在公信力喪失，發行萎縮，經營不善的泥潭中沉淪，迅速邊緣化了。你隨便到哪個城市的街頭報攤去看看，那裡陳列的報刊中有“黨報”嗎？肯定一份也沒有！《河南日報》就曾做過這樣的嘗試，拿到報攤去擺了一天，結果一張也沒賣

出去。他們除了靠財政補貼運行，靠行政命令攤派以外，別無良策。這種苟延殘喘的局面還能支撐多久呢？實踐已經證明，真正的“大報”絕非那些戴著頂戴花翎的“官報”，它將在公信力和影響力的激烈競爭中從市場中產生，沖決現行新聞管制體制的羅網是新聞事業發展的必然。

而賓雁關於“干預生活寫真實”的新聞思想的重要性，也被越來越多的媒體認識到。當今的新聞改革，實質上是個“說真話運動”。真實是新聞的生命，而說假話則是“宣傳”的本質。新聞要報導真實，要干預社會生活，這不僅是一些新聞人的主觀意願和道義選擇，也是新聞自身規律的要求。

這些年來，官方傳媒用了太多的輝煌字眼來歌頌曾有的“改革”，早已令人生厭。其實所謂“改革”說穿了不過是對常識和常態的回歸。就像一個精神病患者，有一天突然不瘋了，恢復正常了，對他和他的家人可能是個值得慶祝的好事，但說這就是什麼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未免就太誇張了，因為其他人並不都是瘋子。把土地交給農民自己去種，何時該播種，何時該收穫，讓他們自己當家，用不著政府去下命令，這固然是個進步，但幾千年來不早就是如此嗎？讓商品到市場中去流通，按市場規律辦事，這也是個進步，但1949年以前不早就是這樣了嗎？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不是一直這樣做嗎？這哪裡是什麼驚天動地的新發明？只有在中國，由於發瘋的時間太長了，恢復一點常態才值得慶祝一番——別忘了，沒恢復正常的事還多著呢！。

這兩年，理論界煞有介事地就民主是否是個“好東西”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一時辯論雙方劍拔弩張，吵得不亦樂乎，這就很可笑，

也很可悲。從100年前的“五四”時代，先賢們就隆重地從西方請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怎麼到100年後連這是不是個“好東西”都需要再論證一番了？按照這個邏輯，需要證明的東西還有一大串：“空氣是個好東西”，“水是個好東西”，“陽光是個好東西”，“糧食是個好東西”……如果每樣都證明一番，那得寫多少篇論文啊！這就是中國理論界的最高水平，這就是精神病尚未痊癒的最好證明。

新聞就是如此，劉賓雁最早在中國提出的“干預生活寫真實”，其實就是新聞的應有之義和正常功能，並非是什麼新要求和新發明。可在有長期新聞管制史和虛假“宣傳”風行的中國，這個常識性的要求至今還是大逆不道的異端思想，要走出這一步還要付出慘重的犧牲。所幸的是，儘管連續受到打壓和整肅，儘管幾代新聞人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劉賓雁只是其中的一個），自由新聞在中國不但沒有絕跡，反而在大石頭下面不斷生出綠色的枝條來，特別是在互聯網普及和網絡媒體誕生以後，新聞的發布和傳播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每個人都成了記者，每個手機都是一個新聞發布源，新聞管制已經日漸失靈——當局還想一手遮天，但他的手太小了，除了遮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什麼也遮不住了。真實的信息，直接影響社會的新聞，以及當局最害怕的揭露性報導，已如春風下漫山遍野的綠芽一樣洶湧出土，根本禁不了擋不住鏟不盡。有意思的是，這種來自民間的聲音已經開始影響上層了，例如，最近上台的習近平論及反腐敗時說了一句“蒼蠅老虎一齊打”，其實這早就是流傳甚廣的網絡語言了。當然，在這澎湃浩盪的民眾聲浪中，秉承賓雁思想的新聞人還是領唱的高音。賓雁的夢想正以一種他自己沒有預料到的速度和路徑得以實現了。

更令人欣喜的是，追隨賓雁之後的“人字雁陣”不僅隊伍嚴整浩盪，而且水平也在不斷提高，甚至開始超過賓雁那個時代了。盧躍剛在論及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過程時，把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狂飆突進階段”，代表作家是劉賓雁、徐遲；第二是“浪漫理性階段”，代表作家是蘇曉康，其高峰是 80 年代末的《河殤》；第三是“客觀理性階段”，他自己正在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型。不光報告文學，整個中國新聞報導的發展也是如此。

國外新聞學把新聞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意見（觀點）為主導的新聞”，一種是“以事實為主導的新聞”。前者在依據事實的前提下重視新聞人的思想、立場和觀點的表達，後者強調新聞的客觀、理性、證據及其獲得途徑的合法性。前者可以說是新聞的“浪漫主義”，後者可以叫做新聞的“理性主義”，也稱“新聞專業主義”。劉賓雁時期的新聞觀基本上屬於前者，而以他的學生胡舒立為代表年輕一代新聞人越來越多的屬於後者。這一代新聞人一般受過更專業的訓練，具有更扎實的功底，和更合理的知識構成，其中不少人學會了運用統計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法學等學科的知識和方法來進行新聞採訪和寫作。

這兩種類型的新聞有明顯有不同的色彩，前者如左拉在德雷福斯案的法庭上慷慨激昂地高呼：“我控訴！”後者如報導“水門事件”的美國記者伍德沃德一樣在報導中拿出確鑿的證據不動聲色地說：“我證明。”其實這兩種新聞觀並非根本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盧躍剛在比較報告文學的三個階段後強調說：不管哪個階段，“一條主線鮮明其中，就是劉賓雁先生等作家開創的人道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新聞專業主義只不過是將道義伸張建立在更科學的基礎上了。

在極權專制制度的嚴密控制和打壓下，中國新聞思想和實踐仍然艱難地取得了不斷的的進步和發展，而離偏執邪惡的“黨文化”的陰影漸行漸遠，這肯定是賓雁所樂於見到的。

一位署名 Selfthink 的國內朋友引用了《聖經·提摩太後書》的一段來為賓雁祈禱：“你已打過一場光榮的戰鬥，你已走完你的旅程，你已堅持了你的信念。”從形式上看，賓雁是個失敗者，他被開除黨籍了，被封筆封口了，被逐出國門了，被拋屍異域了，但是歷史將證明他最終會是個勝利者——中國“公民社會”的先賢祠裡將有他尊貴的一席。

曾經到這個世界上走了一遭的芸芸眾生，絕大多數在他們肉體生命結束後就銷聲匿跡，形影無蹤了。 然而有些傑出的人卻不是這樣，他們肉身的消失卻往往是他們永恆生命的開始，他們的思想和精神從此放射出長久不熄的光芒。 這就像我們仰望夜空，有些明亮的星星離我們有千百萬光年的距離，當我們的肉眼接收到這些發自千百萬年前的光芒時，它們也許早已熄滅了，但是這光芒穿過時空，依然會照耀著我們。 劉賓雁就是這樣一顆雖已隕落，但光芒依舊的明星，而且他離我們越遠，這光芒就越持久，越明亮。

本章主要參考書籍和文章篇目：

張育仁：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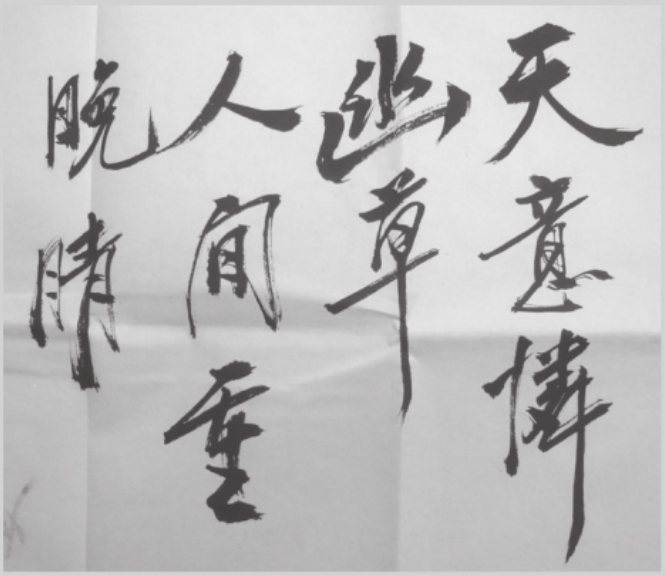
子夜：北京這一夜——38 小時的掙扎

盧躍剛：有一個人，叫劉賓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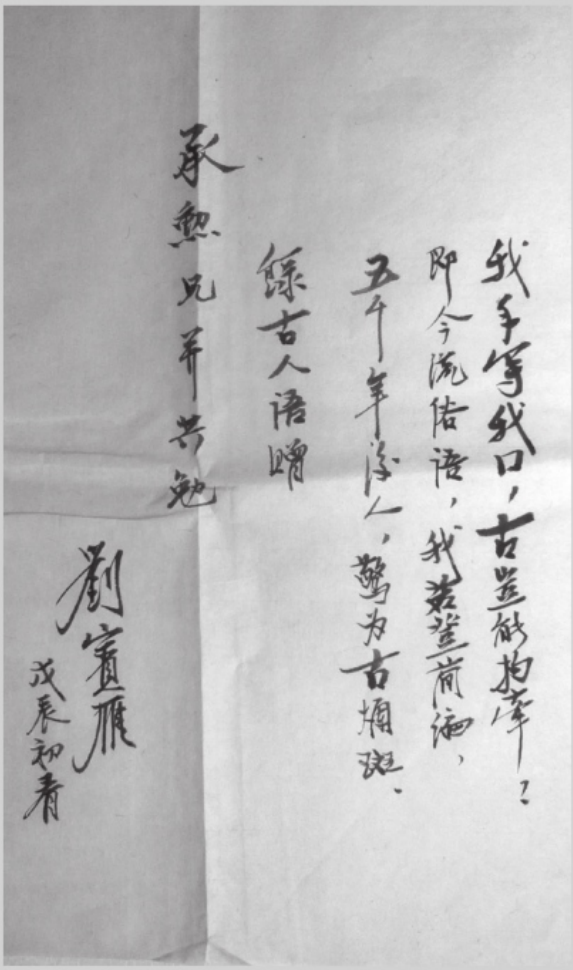
盧躍剛：致團中央的公開信

附錄

劉賓雁年譜初編



劉賓雁手跡之一：錄李商隱詩句。



劉賓雁手跡之二：錄黃遵憲詩句。

一，童年和少年时期（1925–1942）

1925 年 2 月 6 日（阴历正月十五），劉賓雁生於長春。

1928 年，皇姑屯事件發生時，三岁的劉賓雁在沈陽。 這是他記憶的开始。

1929 年，“中東路事件”爆發，賓雁隨父逃難。

1931 年，六岁的賓雁在沈陽開始上小學。 親歷了日本人对東北三省的佔領，其後參加過抵制日貨活動和為關內水災地區災民募捐的活動。

1932 年，全家遷到哈爾濱。

1935 年，日本人强行收購中東鐵路，使担任俄文翻譯的父親失業，家境陡落。 後因家境貧困，劉賓雁曾在街頭擺地攤賣水果。

這一年賓雁經過幾年自學後進入哈爾濱道外太古街小學插班到四年級讀書。

1936 年，到位於哈爾濱道外正陽十六街的北新高小讀書。

1937 年，小學讀書時，因日語成績優秀被學校選為“大東亞共榮圈模範兒童”，赴日旅遊，這時的劉賓雁 12 歲。 這是他第一次出國。

1938 年，賓雁开始閱讀共產黨、國民黨、抗日聯軍的報刊。

1939 年，賓雁進哈爾濱市立一中上初中（當時叫“國民高等學校”）。 此前已經喜歡上了文學，與青年作家關沐南、詩人温成鈞成為好友。 开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加入了由左翼青年作家和詩人组成的讀書會。14 歲便發表了平生第一篇作品小說《母心》（發表在在哈爾濱的《大北新報》，署名“劉靈”）。

1940 年，劉賓雁從哈爾濱的中學退學（初中二年級）。

1941 年，劉賓雁隨出嫁的姐姐劉放到了日本佔領下的北京。在姐姐的經濟支持下，進入私立北平辅仁大學附屬中學男生部學習一年半。

這年年初，他因為日語成績優秀，被獎勵隨“華北學生赴日觀光團”旅遊。這是他第二次赴日旅遊。

后因經濟困難休學，在家自修，主攻俄語和英語，並讀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

二，地下黨工作時期（1943–1949）

1943 年 9 月，劉賓雁與同學鄧邁從北京來到天津。經左建介紹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秘密青年組織——天津市青年抗日救國會（簡稱“青救會”，後更名“天津抗聯”）。他當時化名劉克，在一家日本銀行當出納以維持生計。

1944 年，劉賓雁任天津抗聯直屬分部主任。

夏天，劉賓雁等四名“天津抗聯”負責人徒步穿越冀中平原，到河北阜平西柏坡，在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城工部接受培訓。

7 月，劉賓雁在西柏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時年 19 歲。入黨儀式主持人為劉仁。

1945 年 3 月，劉賓雁奉命到天津耀華中學當地理教師，改名劉子安。

1946 年 7 月，劉賓雁得到通知：立即撤離，因為大逮捕即將開始。他本擬取道解放區的張家口回東北，但由於交通中斷，只

好北上沈陽，輾轉回到了已被共產黨佔領的哈爾濱，繼續參加當地共黨的工作。

1947 年初，國共內戰開始，賓雁無法返回天津了，留在哈爾濱履行重新入黨手續，在那裡當中學教導主任、青年幹部學校的輔導員。 還參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隊。 這期間，他參加了組建東北民主青年聯盟和青年團的工作。 東北民主青年聯盟第一屆執行委員會成立，劉賓雁當選為東北民主青年聯盟副主席。

1948 年冬，劉賓雁跟隨中共東北局機關從哈爾濱來到剛剛解放的沈陽。 恢復了在天津入黨的黨齡。

1949 年 7 月，劉賓雁參加了中國青年代表團，赴布達佩斯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

三，在《中國青年報》工作時期（1950–1957）

1950 年冬，劉賓雁隨同中共建國後第一個正式出訪團——中國青年代表團到蘇聯，為即將創辦的《中國青年報》、《中國少年報》考察蘇聯的《共青團真理報》和《少先隊真理報》，出訪中認識了朱洪。

1951 年春，劉賓雁正式调到北京參加《中國青年報》的創辦工作。 同年 10 月與朱洪结婚。

1952 年 12 月，生子大洪。 兩年後生女小雁。

1953 年，在《中國青年報》编辑部任編委，分管青工部。 這期間國內開展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等運動，機關內部还開展了“忠誠老實運動”，賓雁初次受到運動的震撼。

1954 年，是賓雁的“國際活動年”：3 月，參加中國政府代表團的記者團，到瑞士日內瓦採訪印度支那問題國際會議；春，蘇聯《真理報》邀请《人民日報》派出一個代表團赴蘇訪問，賓雁任翻譯；秋，作為翻譯陪同蘇聯作家奧维奇金和一批蘇聯新聞工作者走遍大半個中國。

1955 年夏天，肅反運動開始，劉賓雁成了肅反的對象。 由於一些模仿他的筆跡書寫的反革命匿名信，他被懷疑為“反革命分子”，並受到批判。 在被審查期間，他被調離青工部。 幾個月後真相大白，他才被解除懷疑。

秋，劉賓雁去三門峽、甘肅採訪。 在甘肅他开始採寫報告文學《在橋梁工地上》，並於 1956 年春在《人民文學》上發表。 這是他的第一篇揭露性報導，也是全國同類報導的開山之作。

1956 年，劉賓雁被定為 13 级幹部，進入“高幹”行列，享受可以看內部保密文件等特權。

3 月，劉賓雁陪同人民日報社社长鄧拓到華沙參加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會，訪問了《工人論壇報》和《華沙生活報》编辑部。 還應奧维奇金之邀，到库爾斯克他家中作客。 在此期間，劉賓雁聽到了蘇共二十二大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消息，深受震動。 回到北京後，他閱讀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內部文件）。 他说：一生中“再没有第二個事件令我這樣震動過”。

6 月，劉賓雁在哈爾濱採訪。

7 月，劉賓雁參加作協組織的療養，試寫电影劇本。

9 月，劉賓雁到武漢採訪。

10 月，在湖北西部山區恩施採訪卡車司機，他就交通運輸問

題寫了一篇批評稿件《湘鄂所見》，發到《中國青年報》的內參上。

夏秋，《人民文學》6 月號發表了劉賓雁的特寫《本報內部消息》，10 月號又發表了《本報內部消息》的續篇。這些反映新聞界真實問題，力促新聞改革的力作，實際上提出了“新聞自由”的思想。

1957 年 1 月，湖南省委對內參《湘鄂所見》不滿，向胡耀邦告狀。

2 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當時未經修改的原文，特別是“雙百方針”使劉賓雁感到振奮和希望。

2 月至 4 月，劉賓雁到哈爾濱和長春採訪。

3 月，劉賓雁在《文藝學習》雜誌上發表了為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辯護的文章《道是無情卻有情》。

4 月末，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劉賓雁奉命到上海採訪紗廠女工罷工事件。在永大紗廠作了半個多月的調查，和許多工人、各種政治態度的黨員與幹部、群眾分別談話。其間會見了上海市宣傳部副部長周而復和評論家姚文元。

5 月 12 日，劉賓雁所寫的關於上海鳴放情況的第一篇報導《上海在沈思中》見報，毛澤東看了，批示道：“看來，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亂。”

5 月 21 日，劉賓雁在上海電台座談會上演講。

5 月 25 日，劉賓雁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試圖阻止形勢向“左”的方面轉化。但未來得及發出“反右”就開始了。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兩天後又發

表了《工人階級說話了》，標誌著“反右運動”開始了。

下旬，劉賓雁從上海回到報社後，召開黨支部大會，發動黨員繼續鳴放。胡耀邦親臨會場聽劉賓雁發言。

7月8日，報社召開全體人員大會，宣布劉賓雁為“右派”。

9月8日，首都新聞界在北京日報社四樓會議廳召開“批判右派分子大會”，劉賓雁登台挨鬥，他的同事、好友戚學毅當場跳樓自殺。

四，戴着“右派”荆冠時期（1958–1978）

1958年3月5日，賓雁在“右派”結論文件上簽字。然後到山西省平顺縣羊井底村“劳动改造”。在此期間苦學英語，背完一本《英日詞典》。

1959年，在“反右傾運動”中，劉賓雁因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提出批評意見，再次受到批判。

1960年早春，劉賓雁到山东省高唐县繼續劳动改造。

1961年春，劉賓雁回京，被安排到團中央機關農場勞動。

秋，劉賓雁回到報社國際部資料組，剪貼资料，分類歸檔，兼管借閱，並從俄、日、英文報刊上摘譯資料。

1962年12月，報社大部分“右派”摘帽，劉賓雁成為唯一未摘帽的“右派”。

1963年，劉賓雁在植樹勞動中眼睛被樹枝打傷，造成視網膜脱落，左眼險些失明。

1966年3月，“文革”來臨前夕，劉賓雁被宣布摘掉“右派”

帽子。

6 月，“文革” 開始，報社貼出大字報：“右派分子劉賓雁反黨野心不死”。

8 月，劉賓雁正式被宣布重新戴上“右派分子” 帽子，监督勞動。 每天打掃樓道和厕所。 並被勒令不許回家，住進“牛棚”。還被懷疑為“叛徒” 和“日本特務”。

1969 年 4 月　劉賓雁到河南省信陽地區潢川縣團中央五七幹校勞動，作為“專政對象” 接受批鬥。

1971 年 9 月，林彪事件發生，劉賓雁是在幹校聽的傳達。

1972 年秋，軍代表宣布審查结束，劉賓雁既非“叛徒” 也非“日本特務”，恢復 1966 年 3 月的結論。

翻譯前蘇聯文藝理論家格·尼·波斯彼洛夫的《論美和藝術》（1987 年出版）。

1975 年，劉賓雁被准許不時回到北京自行尋找工作機會。他用幾個月時間讀完《資治通鑒》。

1977 年 3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組發表文章《評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 文中再次点名“右派分子劉賓雁”，使他找工作更加困难。

1978 年，到中國社会科學院《哲学譯叢》任編輯，與他人合作編譯了《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並匿名寫了該書的《編者的話》。

1978 年 12 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會。

五，改革開放時期（1979–1987）

1979 年 1 月 24 日，劉賓雁的“右派”問題終獲“改正”。

接受胡績偉的邀請，劉宾雁進入《人民日報》記者部，以特约記者身份重新開始新聞工作。

1979 年 1 月至 4 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的胡耀邦召开理論工作務虛會（中間休會一個月）。 鄧小平在務虛會的第二階段做了《堅持四项基本原則》的講話，腰斬了理論務虛會，從而也腰斬方興未艾的思想解放運動。 此時距十一届三中全會只有三個多月。

2 月，劉賓雁受《中國青年報》的委託，採訪曹天予。

5 月，劉賓雁到黑龍江省青年創作積極分子會議上演講，是為他復出後的第一次演講。

8 月，到黑龍江省賓縣採訪寫作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人民文學》9 月號發表了這一作品。 該作品獲 1977–1980 全國報告文學獎。

夏季到冬季，劉賓雁在五個省市做了不下 15 次演講。

1979 年 10 月，中國作協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劉賓雁出席並發表轟動性的講話。

1980 年 11 月 10 日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定，同意華國鋒辭職，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年初，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後謠言紛傳：劉賓雁被胡耀邦批評，“已被隔離調查，逐出北京，被開除出黨”等等。

3 月，劉賓雁第一次到四川採訪，在成都寫作《畢竟有聲勝無聲》，收入當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賓雁報告文學選》。

劉賓雁採訪自貢鑄鋼廠。6 月，劉賓雁的作品《一個人和他的影子》在《人民文學》第六期發表。 該作品也獲得 1977–1980 全國報告文學獎。

7 月，劉賓雁與記者李春光來到山東省沂南縣採訪寫作《尚未愈合的創傷》（與李春光、王永安、張雷克合作）。

8 月，劉賓雁到沈陽，原本想寫張志新，後改寫《好人啊，你不該這樣軟弱》、《艱難的起飛》和《在罪人的背後》等報導，遭致遼寧省委不滿。

1981 年 1 月 3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劉賓雁的作品《艱難的起飛》，該作品獲得 1981–1982 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1981 年 4 月 20 日，由《解放軍報》首先發表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批判根據作家白樺的劇本《苦戀》拍的電影《太陽與人》。

劉賓雁二訪自貢鑄鋼廠，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三篇小通訊。

6 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8 月，劉賓雁到四川攀枝花市，採寫報告文學《千秋功罪》（與當地記者余以太合作）。 作品第二年 5 月發表在《十月》雜誌上。

1982 年 8 月 –12 月，劉賓雁去美國參加國際寫作計劃。

1983 年，胡喬木、鄧力群組織批判周揚的“異化論”和王若水的“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 接著在全國開展了一次短命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

7–10 月，劉賓雁採訪黑龍江的傅貴，寫下《傅貴沈浮記》（與劉國勝合寫），發表於《人民文學》1983 年 11 期。

這一年劉賓雁還發表了如下作品：

《美國：廣闊而狹小》（《人民日報》1983 年 2 月 28 日）

《向命運挑戰——記張海迪》（《人民日報》1983 年 3 月 8 日）

《在張海迪之外》（《遼寧青年》第 3 期）

《因為我愛——記朱伯儒》（《當代》1983 第 3 期）

《初探美利堅》（《時代的報告》1983 第 5 期）

《全憑這顆心——記優秀共產黨員朱伯儒》（《人民日報》1983 年 7 月 28 日）

《美國這個謎》（《環球》雜誌 1983 第 9 期）

1984 年，劉賓雁三下西安，寫作《白衣下的汙垢》（與袁春乾合寫），發表於《人民日報》1984 年 2 月 25 日，在西安和陝西引起轟動。

這一期間，劉賓雁連續發表了如下作品：

《關東奇人傳》（《文匯月刊》1984 年第 3 期），該作品獲 1983–1984 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五十年間爭雌雄》（《文學家》1984 年第 4 期）。

《蒼蠅是怎樣變成大象的》（與鄭紅深合作，發表於《人民日報》1984 年 5 月 26 日）。

《告訴你一個秘密》（《報告文學》1984 年第 6 期）。

《三十八年是與非》（《人民日報》1984 年 8 月 25 日），該作品遭到了陝西省委的討伐。官司一直打到中央書記處。

這次在西安，劉賓雁還採訪寫作了《撥開長安霧一層》與《中國有個唐安華》，前者後來收入《關於不會說假話的中國人的故

事》一書（華岳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在劉賓雁被開除黨籍一年多後出版），後者發表於 1885 年《三月風》雜誌創刊號。

9 月 劉賓雁與胡舒立到四川宜賓採訪劉永江的情況，並合作寫下《孤雁離失記》（發表於 1985 年《報告文學》第 1 期）。14 日，劉賓雁會見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向他反映劉永江問題，楊命令立即釋放劉永江。

9 月底，劉賓雁被召回報社，原因是陝西省向中央告了劉的狀。社會上紛紛傳說胡耀邦批評劉賓雁，讓他不要做記者了。

10 月 13 日，《人民日報》同時刊出劉寫的兩篇報導，以示闢謠。

《人民日報》11 月 5 日發表了劉賓雁寫的評論《文學面臨生活的挑戰》。

12 月 25 日，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

1985 年初，劉賓雁通過民主選舉當選為中國作協副主席。

劉賓雁作品《殘雪春風鬥古城》發表（《啄木鳥》1985 年第 1 期），《猶聞秦鐘漢鼓聲》（《中國作家》1985 年第 2 期）

劉賓雁的代表作之一《第二種忠誠》發表在《開拓》創刊號、《散文報》創刊號。《文匯月刊》連載劉賓雁日記。

2 月，劉賓雁到上海參加《上海文學》組織的企業家與作家會面並拜會中國作協主席巴金，還訪問《民主與法制》編輯部，拜訪王若望等。10 日，劉賓雁在黃浦體育館給《人民日報》和《安徽日報》的刊授大學學生講課。13 日，同《寧波日報》社同仁座談，晚上同寧波文藝界座談。14 日，當晚採訪杭州市委書記厲德馨。18 日，去海運學院對倪育賢問題進行調查。

3月3日，給《人民日報》刊授大學在北京的學員講課。10日，劉賓雁接到山西省原平縣縣委書記呂日周等聯名來信邀請，到改革的試點縣“體驗生活”，後因故未去。12日，和黑龍江宋秀蘭談，瞭解她從70年代起就和大興安嶺的貪汙盜竊分子、以權謀私的官員進行的鬥爭。21日，在石家莊的北京軍區陸軍學校演講。 在省會和河北省委書記高揚兩次交談。

4月2日，劉賓雁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小說和報告文學授獎大會。6日，晚間到南京大學演講。28日，再去上海海運學院核實材料。 寫成了《第二種忠誠》的續篇《未完成的埋葬》。

5月3日，劉賓雁採訪上海師院趙興華、范清林。16日會見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趙啟正，瞭解上海市委組織部在組織、人事工作上進行的改革試驗。17日，訪何滿子夫婦。

然後，劉賓雁去武漢，參加湖北省作家協會代表大會。 去江西省南昌市，採訪萬紹芬。

9月，由於文章被禁發，劉賓雁在報社內部會議表示“報告文學越來越難寫了。 看來，我不得不停筆一時了”，被被香港傳媒報導為“宣布退出文壇”。

同時，中紀委派出的調查組進駐《人民日報》，“調查劉賓雁等同志的問題”。

11月，終獲准出訪西德，寫《他們不肯忘記》。

1986年7月31日，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會議上，講到“領導者要尊重人們充分發表意見的民主權利”時，離開講稿說：“劉賓雁的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我看了，寫得不錯，沒有問題，在當前改革的形勢下，我們黨需要‘第二種忠

誠’。”

8月7日下午，萬里在家中接見了賓雁，對他說：“我贊成你的觀點。我們黨不僅需要雷鋒精神，需要第一種忠誠，也需要第二種忠誠。如果一個黨不能聽取批評，不能接受群眾的監督意見，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產黨、社會民主黨、自由黨，還是基督教人民黨，都要垮台。”

8月，中共高層不同派系激烈交鋒。在9月28日的六中全會閉幕會議上，各方正式攤牌。萬里發言支持陸定一、胡耀邦，但是薄一波作了長篇發言，主張保留“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中共左派老人李先念、陳雲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幾十年不能取消”。最後，鄧小平表態說：“我提出來反自由化，我最堅決，我講的最多，至少還要反20年。不管這個話原來是從哪兒來的，都無關緊要。”胡耀邦遭重創，這是他政治生命的轉折點。他個人乃至國家的悲劇由此注定，劉賓雁也成打擊的目標。

劉賓雁的作品《三十七樓上的中國》（《人民文學》1986年第8期）、《沒上銀幕的故事》（《人民日報》1986年8月25日）、《未完成的埋葬》（《報告文學》1986年第10期）等相繼發表。這是他在國內發表的最後幾篇作品。

11月，劉賓雁到黑龍江伊春採訪王福錦案，聯名寫王福錦一案詳細報告，送交胡耀邦和胡啟立，建議派出更具權威的調查組，糾正此案。

11月14日，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和李淑嫻四人聚會，一致決定，在1987年春舉辦一次“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

11月27日，劉賓雁在天津南開大學最後一次公開演講。這

一年他先後去了湖南、四川、江蘇、安徽、黑龍江、上海、福建 7 個省市，有 3 個省市去了兩次。 先後在 5 個城市作了十幾次演講。

11 月 30 日，中國科技大學學潮興起。12 月 5 日，學生上街遊行。 觸發全國 29 個城市中的 156 所大學學生遊行。

臨近年終，劉賓雁到福建武夷山採訪陳建霖。 這是他最後一次採訪。

12 月 28 日晚，在首都體育館，在張辛欣導演的晚會《1986 年唯一的夜晚》中，劉賓雁最後一次在聚光燈照亮的舞台上和上萬名讀者、觀眾見面。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對正在出現的學生運動進行鎮壓，鄧小平提出不惜流血的強硬方針。 並點名要開除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的黨籍。

1987 年 1 月 1 日，北京大學學生和上萬市民在天安門廣場遊行，要求民主自由，反對腐敗。

1 月 2 日，中共中央下達 1987 年 1 號文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正式啟動。

1 月 5 日，中央書記處開會，根據政治局會議的精神，正式決定開除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的黨籍。

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鄧小平嚴厲批評胡耀邦，給他扣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罪名。 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

前此，在 1 月 5 日，劉賓雁和朱洪已離京到三亞。 得知消息後返京。

1 月 22 日，人民日報社機關黨委紀委召見他辦理開除手續。

劉賓雁做了長達數小時的最後陳述。

1 月 24 日，《人民日報》公布人民日報社機關黨委紀委決定，開除劉賓雁黨籍。

六，流亡时期（1988–2005）

1988 年，3 月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邀請，劉賓雁赴美講學三個月。6 月，去法國和西德訪問。9 月接受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邀請，擔任尼曼（Nieman）新聞研究員。

1989–1990 年，在美國康州三一學院擔任訪問學者。

1989 秋，在德國柏林任 DAAD 基金會訪問作家，並訪問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研究蘇聯東歐民主運動經驗。

1990 年，在美國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中心擔任訪問學者。

1991 年 –1992 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1992–1996 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中國學社”執委會委員。

1992 年，創辦《中國焦點》（China Focus）英文月刊並任主編，報導中國社會動態。 該刊出版到 1999 年。

1993 年，創辦中文月刊《大路》，向中國大陸傳播新思想及國際民主化動態。 該刊出版到 1996 年。

1999 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亞太中心擔任訪問學者，同年擔任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

2000 年，被選為獨立中文筆會首任會長。

2002 年 9 月，被發現罹患直腸癌，次年 3 月接受手術治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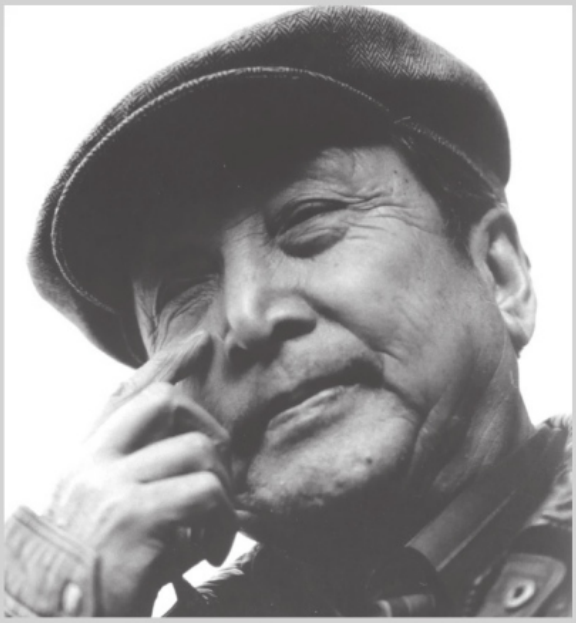
2005 年 2 月 27 日，參加劉賓雁 80 壽辰慶祝晚會，做了一生最後一次演講。

2005 年 12 月 5 日，凌晨零點 25 分，逝世於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

2010 年 12 月 22 日，劉賓雁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天山陵園。

說明：《劉賓雁年譜初編》在編寫中得到劉小雁女士的大力協助，特此致謝。 由於資料不全和時間緊迫，尚不完善和精確，希望海內外有心人提供材料和線索，使之不斷得到補正。

感謝劉小雁女士提供本書全部照片。



後記

讓我怦然心動的是他們這樣一句話:“劉公這位中國啟蒙時代唯一最早發出聲音、影響巨大的天字第一號大記者,沒有一部像樣的傳記留下來,我輩無法向歷史交代!”以歷史的名義發出的這個召喚,讓我無法迴避和躲閃了。“使命感”是我們那一代人心頭最敏感的神經

2013 年清明。

整整三年了，經過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我終於完成了一次踵武劉公人生道路的精神旅程。

我沒有過面見先生，親聆教誨的榮幸，也不是一個有經驗的專業傳記作家，只是劉公諸多黃鐘大呂般作品的一個虔敬的讀者，是追隨劉公航跡的“新雁”中一名普通的新聞人。他的思想和事業曾是我仰之彌高的山岳，他的人生行跡是我遙隨其後而自認不可企及的一個傳奇。我從來沒有敢想象自己會有一天拿起筆來寫他的傳記，那似乎是太狂妄了。

一個偶然的機緣，使我認識了劉公晚年的摯友之一北明女士，她在對我有了一些瞭解後提出一個奇想：建議由我來試寫劉公辭世後尚未有人著手的劉公傳記。我的第一反應是惶恐地拒絕了，理由很充分：從我的人生經歷、思想見識、知識構成，到把握這一題材的能力，特別是文字水平，都遠不具備起碼的資格。我還特別談到對自己的文字表達深陷“黨文化”影響的苦惱，她沒有勉強，只是讓我再想一想。這時他的丈夫、也是我早就心儀的優秀作家鄭義先生也寫來一封信，對我的不自信作了一番熱心的啟發和勸導。他指出，擺脫那套文字枷鎖的桎梏不能只靠認識的覺醒，更要靠寫作實踐的鍛煉。

讓我怦然心動的是他們這樣一句話：“劉公這位中國啟蒙時代唯一最早發出聲音、影響巨大的天字第一號大記者，沒有一部像樣的傳記留下來，我輩無法向歷史交代！”

以歷史的名義發出的這個召喚，讓我無法迴避和躲閃了。“使命感”是我們那一代人心頭最敏感的神經。

於是我就貿然地應允了，雖然還有內心的忐忑。那是在 2010 年的

夏天，我開始收集和整理劉公一生的文字，並把它們一一錄入電腦。

其實，我和劉公命運的交集並非始於這一天。當我整理他的年譜時得知，他的“右派”得到正式“改正”的時間，是1979年1月24日，而我因“現行反革命罪”在看守所被關押四年多以後獲得平反釋放的日子，是當年的1月19日，只比劉公早五天。也就是說，我們是同一批在“平反冤假錯案”時獲得自由的，不必相逢相識，我們都是那個時代死裡逃生的共命運者。

獲得平反後，當時我所生活的小縣城並不接納我這個僥幸生還的幸運者，那些曾經把我送進鐵窗的當權者悻悻地說：“批了你幾年，現在你又回來了，讓我們怎麼辦？你還是走吧——願意到哪兒去就到哪兒去，我們一律綠燈放行。”於是，我又成了一個漂社會的流浪人，到哪裡去，幹什麼事，如何度過劫後餘生，都成了問題……

就在這時，劉賓雁的名字進入了我的生活——這位銷聲匿跡22年的“右派”記者兼作家磅礴推出了他復出後的第一部力作《人妖之間》。我是流著熱淚讀完這部作品的，而且讀了不止一遍。它把我的目光引出了個人命運的狹小範圍，使我看到中國大地上正在開始的一場更重要的鬥爭場景，也給我指示了一條新的人生道路。像劉賓雁一樣，做一名戰鬥在時代最前沿的記者，用自己的筆來直接參加這場影響中國命運的戰鬥，成了我追求的目標。

於是，經過幾年的顛沛流離，再加上機緣巧遇，經同學和朋友的推薦，我終於在1984年——我40歲的時候進了《河南日報》，成了一名姍姍來遲的新聞新兵，別人到這“不惑之年”應該是立足已穩、事業有成了，可我卻剛剛起步，大器未必，晚成已定。而引領我走上這條路的就是他——劉公賓雁，雖然他並沒有見過我這個追隨者的面，也未聽說過我

的名字。

以後的人生道路就無需多說了，當一個劉賓雁式的記者會遭到何種命運是不言而喻的。反正到 2005 年年底我最後一次被免職（在這以前的五年裡，我曾四次在幾家報紙被免除了負責的職務），並被永遠逐離新聞崗位時，正是劉公在美國普林斯頓永遠闔上雙眼的時候。我向劉公作最後報到的方式是在他的治喪委員會名單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向劉公報到時我想報告的是，我幾次被免職的原因，沒有一次是因為我發了違背事實的虛假報導，正相反，那都是些證據確鑿的真實新聞，只是因為踩疼了某些權勢者的腳趾而激怒了他們而已。其中有些報導還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影子，如突破了官方的禁區第一次實時報導公安官員製造慘烈車禍的“張金柱案”的報導，關於世界上最大的公共衛生災難“河南艾滋病”氾濫原因和後果的報導，關於被禁止發表的當代中國最大的人為災難之一“河南東都商廈火災”的現場報導，以及中國當代冤案的代表“聶樹斌案”（至今尚未平反）的首發報導，關於“世界第一大佛”的神秘背景的披露性報導，以及打破流行的行業“潛規則”，首次揭露新聞界自身腐敗的“500 記者排隊領取‘封口費’”的報導，等等。這些報導在影響力方面當然無法和賓雁相比，但方向是完全一致的，特別是這些報導都是在劉公被迫去國以後——我自認為是劉公並未授權的繼承者之一。

跟著劉賓雁的足跡，書寫劉賓雁式的新聞，最後得到劉賓雁式的結果，這也算是順理成章、修成正果了，對此，我不但問心無愧，還有點自豪。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確是寫作劉公傳記的合適人選之一，跟進的士兵為倒在前鋒的領軍人書寫誄文，不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嗎？能以這些文

字做為心花奉獻到天山陵園那尊無字碑前，不是我的榮幸嗎？劉公的骨灰安葬在妙峰山下的那天，我在他的墓前默默發誓，一定要努力寫好這本傳記。

對我來說，書寫劉公的傳記，不僅是個漫長的辛苦勞作過程，也是個寶貴的學習機會，甚至是個精神上的奢华享受。重新研讀劉公一生留下的文字，從他的雁泥鴻爪中重溫那個已經逝去的時代的脈动，檢點中國人在世界背景下一個世紀以來所走過的曲折道路，思考中國的現實與未來，這是一個思想的大考與盛宴，我樂在其中。

三年來，我在南海邊上的一個城市中關起門來閱讀、思考和寫作，幾乎摒絕了一切對外往來，孤獨清靜而紧張充實。在案頭，我擺上了一張劉公的照片，每天坐到電腦前開始寫作時，我都讓音響裡播出劉公最喜愛的柴科夫斯基弦樂四重奏《如歌的行板》，在那如泣如訴的樂聲中進入賓雁的世界。劉公晚年的流亡生活中陪伴他的有一隻白色的長毛小狗，而我寫劉公時膝頭和腳下也正好踡伏著幾隻可愛的小狗。抬頭往窗外看去，是風雲變幻的天空，飄過屋檐的雲朵，或群星閃爍的夜空，遠處是日夜喧騰的大海。每年有幾次颱風光臨，是山搖地動的震撼，水槍噴射似的大雨，和驚天震地的雷霆——然而，比這更猛烈的是時代的風雲和賓雁的一生在我胸中激起的心靈風暴……逝者与生者就以這種方式進行了一次漫長的對話。

這既是對劉公生活和思想的摹擬體驗，也是對自己一生的回憶思考。我承認，書稿中有許多章節在敘述劉公的經歷和命運時，也摻入了自己的人生體驗和領悟。例如：

在第八章寫到“在自己的政治死亡書上簽字後，賓雁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最可怕的不是死亡的來臨，而是對死亡的等待”一段文字時，我寫

下的也是自己當年被投入獄中時和將要面臨死刑時的體驗。我曾寫過一篇《恐怖的等待》的回憶文字來描述當時的感受；

而第九章分析劉公在關於他右派問題《結論材料》上簽字畫押的心理時，也融進了自己的回憶——我當年入獄時也要填寫一張表格，右上角有一欄“所犯罪行”，我寫上的是“思想犯”三字。表面是認罪了，實際是說“思想無罪”，沒想到獄卒看了居然點頭認可，在他們看來，某些思想果然是有罪的；

再比如第16章寫到張辛欣主持的“唯一的夜晚”晚會時，我發了一通“不是任何一個失敗的英雄都有機會享受到如此動人心魄的退場儀式”的議論，寫的時候，我其實是聯想到了自己在2001年被免去《大河報》副總編輯職務後的遺憾。當時我想有個機會向編輯記者們告別，報社的領導問我想講什麼，我說想說明一個願望：報紙不要因我的離去而完全改變方向，面目全非，希望大家能堅持經過實踐考驗而證明是正確的理念和方向。他們一聽就說：“算了吧，上面正要清除你的這種辦報思想和理念呢！”於是我就收拾東西，悄悄離開報社了，連宣布我免職的會議都沒能參加，從此再也沒有跨進過報社大門……

至於其中關於從破除“領袖崇拜”到破除“人民崇拜”的思想歷程，寫的雖然是劉公，但也是寫自己。這兩個相關的“崇拜”禁錮的不是一兩個人，而是整整幾代中國人啊！“劉賓雁時代”不僅屬於他個人，也是我們共同經過的一段歷史。

老天總會有些出人意料的贈與，在為這本書蒐集資料時我還有個意外的收穫：當我追尋劉公的血脈淵源時，發現被劉公視為“如母”的長姐劉放居然是我祖母的親侄媳婦，也就是說，劉公竟是我的父輩親戚，他們年輕時有一段在哈爾濱的共同生活，而大洪、小雁果真是我的同輩弟妹。

這讓我狂喜了一陣——當然這並非最重要的，我並不迷信血緣聯繫的作用，而更看重我們共同的精神籍貫和思想承傳。

當最後敲擊鍵盤、結束本書的寫作時，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三年的時間過去了，我終於該交卷了。但是，這個答卷及格嗎？我不知道。我一直惴惴不安的是，劉公的思想太豐富和深刻了，遠非我這個站在山腳下的仰望者所能窺見全貌，而我所能望見的一面也總會是會有偏差的。這就算是劉公傳記的一個試探版本吧，將來一定會有大家寫出更真實、更全面、更深刻的版本。希望這只是那些版本的墊腳石，倘能如此，我也就滿足了。

原來準備這本書在 2015 年劉公逝世十週年前出版，這樣還有兩年多的時間可以繼續補充材料，推敲文字，使作品更成熟些。但是，形勢急劇變幻，劉公生前盼望的大變局正在發生。讓這本書早日出版，讓劉公的思想和聲音成為大變革中不可缺少的聲部，這就有了緊迫的現實意義，所以我決定提前出版。其不完善之處留待將來再去補充吧。

非常感謝朱洪、大洪、小雁為我寫作時提供的寶貴支持，特別感謝鄭義、北明夫婦對我寫作的啟發鼓勵和關鍵性的重要指導，沒有他們的信任和支持我無法承擔這個重任；感謝胡績偉（他在去世前不久還精神充沛地接見我一個多小時，談的全是劉賓雁）、戴煌、邵燕祥、趙越勝、盧躍剛、張寶林、盛禹九、劉保端、胡舒立、余以太和王康等前輩與同仁給我提供的重要材料和寫作指導，感謝余英時、一平、高爾泰、郭羅基、陳奎德、劉再復、萬潤南、陳一諮、錢鋼、李貴仁、嚴正學（他如今還在獄中堅持著他的行為藝術）等未謀面的朋友所寫下的重要資料給我的啟示和教益，感謝一切追隨劉賓雁的有志之士所給我的精神動力，也感謝那幾隻三年來在寫作時日夜伴隨在我身邊的小狗，它們是我這段詩意生活的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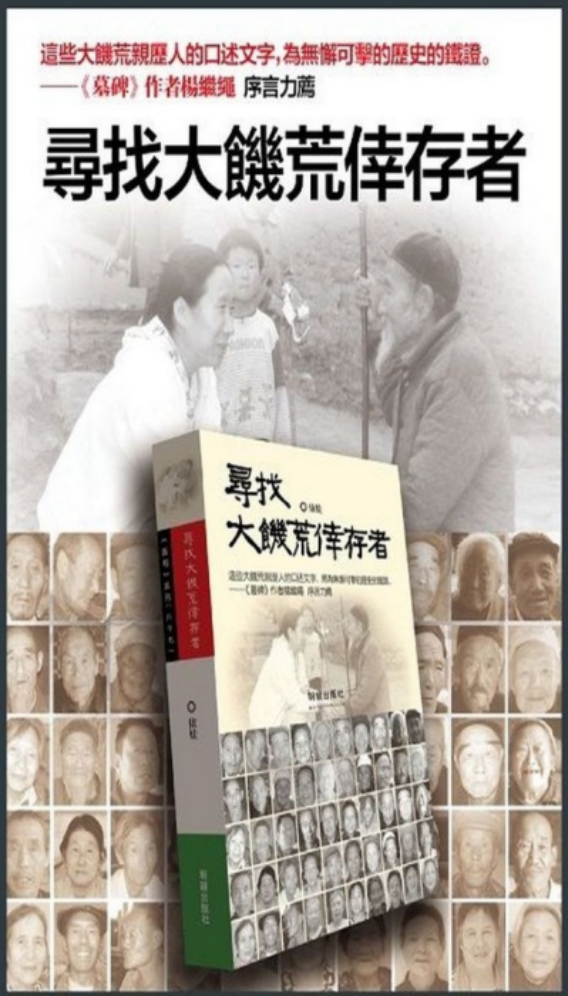
者……

一句話，感謝給我提供這個向劉公表達心意機會的命運，和一切給我幫助和支持的人們。

我始終覺得，劉公並没有遠離我们，他一直眯縫着眼睛，用深情而專注的目光在巡視着這片土地，也在審視着我们的靈魂。

再見了劉公，與您神交魂會的這些日子是我永遠難忘的記憶。好在我們相聚的時候不會太遙遠，到那時，該向你報告的事還多著呢！

作者　於2013年6月



封面設計：紐約客設計所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新聞史上，我們還找不到另一隻如劉賓雁那樣的大雁，能夠如此英勇如此熱情如此痛苦地在風暴中飛翔。它的每一次俯衝，每一聲號叫，每一滴淚水，每一片被折斷的羽毛，都在人民的大海上激發出雷鳴電閃和掀天的巨浪。——旅美作家 鄭義

無論是從影響力而言，還是從文體的開創性而言，即對 20 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的貢獻而言，當下獲獎的同時期作家沒有能超過劉賓雁、蘇曉康二位的。……他們是上世紀 70、80 年代中國報告文學標誌性的人物。——中國記者、報告文學作家 盧躍剛

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導致的溫情傾向，他的天真輕信和善良，又使他不可能“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的一些人和事……不合常情處，也就是高於常人處。——中國詩人 邵燕祥

莫道英雄去不還，已聞新雁起寒汀。——旅美學者 高爾泰

ISBN 978-1-940004-40-2
9 781940 004402
定價：HK149 NT489

内容簡介

您打開的這本書是一個人的傳記，他叫劉賓雁。

2005 年 12 月 5 日，去國 18 年的老流亡者在美國新澤西的雪夜與世長辭。次日晚，著名記者盧躍剛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演講。“一位偉大的記者和作家昨天去世了，你們知道是誰嗎？”聽不到任何回應。他接著問：“你們知道劉賓雁嗎？”只有一個不確定的低音回答：知道。盧躍剛又問：“劉賓雁的代表作是什麼？”全場寂靜，驚心動魄的寂靜。

“驚心動魄的寂靜”終於被打破，有了這第一部劉賓雁傳記。

劉賓雁的一生有無人堪比的傳奇：他的“右派”頂戴，由“第一代核心”毛澤東御賜；終被革出教門，放逐海外，則蒙“第二代核心”鄧小平欽點；他流亡異國，終生不得歸，又賴“第三代”、“第四代”垂恩。劉賓雁等人的二次蒙難，成了中共有民主夢想的領袖胡耀邦被貶下台的導火索、“六四”屠城的引信之一。他的命運與時代的軌跡緊緊扭結。

劉賓雁創造性地運用“報告文學”這個介乎文學和新聞之間的體裁，早年作品《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和晚年作品《人妖之間》、《千秋功罪》、《第二種忠誠》一脈相承，尤其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一篇篇作品問世，洛陽紙貴、萬人爭讀，空前絕後！

劉賓雁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意味著重振人的尊嚴，呼喚人性回歸的時代，在中國新聞史上，意味著恢復新聞的真實性和人民性的時代。劉賓雁從“人間蒸發”中復活，再次舉起他的火炬，照耀著我們的精神原野。